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 河海社会学 (研究生版)

*Journal of Hohai Sociology*

# 21

2015 年秋季号

总第 21 期

---

# 河海社会学 (研究生版)

---

*Journal of Hohai Sociology*

主 办：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河海社会学（研究生版）》编辑部  
指导老师：沈洪成 卢蔚翎  
主 编：闫春华  
副 主 编：张晓磊  
编 辑：张博 张洁 刘媛 王侠 盛倩倩  
投稿 E-mail : sociology\_hhu@163.com



欢迎扫描二维码添加关注  
《河海社会学（研究生版）》微信公众账号

## 目 录

### 暑期实践

- 农业转型的结构及运作机制：以 S 村与 D 村发展石榴种植业为例..... 徐天宏 (1)
- 甘愿的生成机制研究：基于河南省新县跨国劳工研究..... 李 娜 (18)
- 噪音之害..... 刘礼鹏 (34)
- 自主性的成长：一个群租房事件中的业主维权..... 钱志远 (46)

### 沙集之行

- 沙集：乡土社会中的商业王国..... 宋 姣 (54)
- 理性与人情：家具“淘宝村”生成机制的社会学研究..... 冯 娜 (64)
- 沙集模式：电子商务中的“文化反哺”对代际关系的影响..... 张 洁 (72)

### 环境治理

- 文化变轨：农村生活污染治理模式演化—以农家乐旅游业水污染为例.. 蒋 培 (77)
- 浅析美丽乡村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金巧巧 顾金土 (89)

### 乡村逻辑

- 礼俗与法律：纠纷解决机制的不同逻辑及其后果..... 谢丽丽 (94)
- 农村雇佣关系的权宜理性：以鲁东地区 A 村烟草种植大户为例..... 任宇东 (104)

### 定量方法

- 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研究..... 卢 楠 (112)
- 地位、政治关注、政府信任与基层民主选举中的投票参与.. 李向建 孙旭友等 (122)

## 社工实务

农村留守妇女文化生活的社会工作介入..... 何志扬 田晚荣 (131)

## 移民生计

水库移民长远生计问题处理阶段性效果对比分析..... 邹子楠 伊庆山 (139)

## 博士毕业论文摘要

社会变迁中的村落林业：上村个案研究..... 袁记平 (149)

远去的森林：民族地区生态变迁的社会机制研究..... 耿言虎 (149)

由兴盛到困顿：传统柳编业的变迁阐释：以未来庙村为个案..... 刘永飞 (150)

倾听暮年：李村老人日常生活实践研究..... 仇凤仙 (151)

生态移民行为选择及其演化：以青海省德令哈市生态移民村为例..... 隋 艺 (152)

## 快讯速递

河海大学社会学学科校友座谈会成功召开..... (33)

沈毅教授和杨方博士喜获国家社科基金..... (45)

沈洪成博士喜获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53)

宣朝庆教授讲座：城市知识群体与乡村建设..... (71)

童敏教授讲座：社会工作理论的基本逻辑..... (76)

沈关宝教授讲座：中国的城市化问题..... (88)

社会学系、长三角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系列报告..... (93)

2014级社会学硕士研究生暑期调查报告会成功举行..... (121)



# 暑期 实践

暑期社会实践为社会学专业学生提供了接触社会、扎根田野、提升素质和拓展视野的宝贵机会。2015年社会实践中，2014级社会学硕士生带着一定的问题意识和热情走进田野，期间涉及环境研究、劳工研究、移民研究等热点问题，大家获得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并最终形成调查报告。经编辑部投票遴选，本期推选以下4篇优秀调查报告，希望与读者进行交流。

## 农村转型的结构及运行机制

——以S村和D村发展石榴种植业为例

徐天宏

**摘要：**农村发展特色种植业的实践在农业生产、组织和经营方面经历着从传统模式过渡到现代模式的转型，生态环境、市场影响、政府工作和农民组织在不同方面发挥其作用，因而形成综合的转型之结构。在农业生产方面，种植业调整不仅受到生态环境因地制宜的地域性优势与制约，市场影响也不断刺激着行动者的经济动机；在农业组织与经营方面，遵循项目规划逻辑的政府帮扶与遵循经济理性逻辑的农民行动相结合，生产、加工、消费与生产、观光、消费的纵向一体化成为未来产业化发展的可能模式。

**关键词：**农业转型 社会结构 种植业调整 产业化

### 一、导言

#### （一）研究综述

本报告打算通过呈现一个地方农村发展新型农业的案例来描述、分析和诠释农业转型的结构及其运作机制。

中国农业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阶段，农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正处于有组织的变迁之中，此乃农业转型的要义。关于农业转型的研究性报告及论文已经有许多，但常见的研究只是局限在某一方面的问题，例如土地制度与农业转型的关系、农业转型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等。本报告的贡献恰恰在于试图全景式的呈现农业转型中每一方面的社会运作过程，由此突出社会各方面要素作用所形成的转型之“结构”。所谓“结构”指的是在直接感受到的经验之下潜藏的各种社会安排所体现出来的模式。<sup>[1]</sup>对于农业转型的研究必须着眼于描述与分析是“如何”转型的过程，因而从整体视角上了解各自独立的社会要素（安排）相互联系构成的结构（模式）。于是我们便会深入到不同方面的社会要素是如何运作而促成农业转型，观察并归纳它们的运作机制。

文章的行文逻辑与篇章安排从四个大方面入手：生态环境、市场影响、政府工作和农民组织。首先开篇说明调查案例所在区域的生态环境，包括自然气候、地理、水与土地资源的特点，并简述农业生产在顺应此“天时”而具有的特征。接着，在第三章论述农业转型的外部条件，也便是市场的影响，说明食品消费市场的变化会影响农业生产；并交代农业大环境——所在区域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

清楚“从外至内”（从市场到生产，从区域到局部）的影响是我们理解地方农村如何可能走上农业转型之路的认识前提。第四章和第五章我们可以归为“人和”的因素，关注的正是不同社会群体怎么发挥各自作用促成农业转型。第四章突出政府工作的引导作用与项目制扶持，一方面农业转型要追寻市场脚步，农村鲜有市场信息及资源，实际中必然依赖于政府引导，又一方面农业转型需要资本（农业资金），农民收入（非农收入有限）仍处中等偏低水平不可能由农村内部实现资金的筹措，因而资金来源必须依赖国家的投资和扶持，项目制<sup>[1]</sup>的功能正在于此。最后一章具体讲述农民如何组织起来在村庄内部实现农业转型的运作过程。对农业转型的分析所采用的思路是聚焦于现在较于传统的变化，由此凸显“转型”的内涵。所以，根据调查实际情况，我们依然运用“小规模生产”的理解框架，发现小农的经济理性在转型之中经历了由生产方式到认识方式的全面蜕变，也惊喜的看到家庭种植模式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双重利好，同时发现以合作社为核心的纵向一体化经营可能成为农业产业化的一条可行之路。

文章所用材料部分来自笔者调查获得的田野资料，部分来自相关文献。调查运用访谈法与观察法了解具体事实，文献涉及地方统计资料、县志、论文、著作及法规文本。

最后强调的是，本报告严格遵循从经验材料到概念归纳的研究逻辑，提供了某些方面的经验创新，并借与已有理论进行对话，探讨新的概念与观点，这些都可视作为更进一步的研究所作的铺垫。

## （二）案例简述

笔者于2015年7月26日至8月1日调查了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的S村与D村发展种植突尼斯软籽石榴的情况。

S村与D村皆属于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移民村，在上世纪90年代从原址搬迁至现址。搬迁前两村属于一个大队，世代居于黄河岸边，住土窑洞，用黄河水，以种粮为生。

S村现位于洛阳市孟津县小浪底镇西部。村庄原址为小浪底水库淹没影响区。村庄于1993年从原址搬迁，距离黄河约6公里，搬迁时人均分耕地1亩3分。全村现有210户，共780人，耕地950亩。

D村位于洛阳市孟津县常袋乡北面，全村总面积1.5平方公里，村庄占地面积120亩，耕地面积970亩，分四个村民小组，现有200多户，1000多人。1992年因建设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而搬迁，原址属于直接淹没区，搬迁时全村800多人，人均分耕地一亩半。

移民搬迁后，S村与D村共同受到孟津县移民局的大力扶持。在县移民局大中型水库后期扶持结余资金项目（后文简称后扶项目）扶持下，S村于2008年开始种植突尼斯软籽石榴，发展100户种植户500亩石榴园，经历4年种植，在2012、2013、2014年石榴连年增收，亩产收入在2万元左右。D村于2012年发展90户种植户，第一批发展500亩石榴园，后又发展第二批300亩，并陆续加入种植户，目前石榴尚处于成长阶段，部分结果但未开始销售。

## 二、农业生态环境

农，耕也。农业耕作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因自然条件不同而具不同特点。农作物生长需要热量、光照、水、地形、土壤等自然条件。不同地域的自然条件不同，农作物处于不同的自然环境会有不同的结果，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sup>[2]</sup>一个地域的农业具有其地方性的自然条件所制约的特点。同样，人辟土植谷以为农，引水灌溉以利农，人既需要利用自然来发展农业，自然条件又构成农业发展的约束，于是人在自然环境下的能动选择乃是农业发展的根本。我们把人所活动的自然环境称为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其实包含自然与社会两个系统。所以，要研究一个地域的农业发展，我

<sup>[1]</sup> 项目制本质上是财政资金专项化，是财政体制改革的结果，然后才属于社会治理方式。

<sup>[2]</sup> 摘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们首先需要了解它的农业生态环境。

我们调查的地点是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小浪底镇的两个村庄。为了尽量详细的描述其地域的农业生态环境，我会既利用自己在亲自调查时的所闻所感，也通过文献资料呈现更丰富的情况。

### （一）地理、气候、土地与水资源

孟津县位于河南省西部偏北，居黄河中下游交界处，靠黄河南岸，属洛阳市辖县。县城距省会郑州 134 公里，距洛阳市区 10 公里。县域东连偃师市、巩义市；南依洛阳市市区；西临新安县；北与济源市、吉利区、孟州市相接。全县跨东经 112° 12′ ~ 112° 49′，北纬 34° 43′ ~ 34° 57′。辖区东西长 55.5 千米，南北宽 26.9 千米，面积 758.7 平方千米。其中陆地 696.59 平方千米，占 91.80%，水域 37.85 平方千米，占 4.98%；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 599 人。<sup>[1]</sup>

俗语云孟津地形为“七分丘陵，二分山，一分平地”。县地形西高东低，中部高，南北低，形如鱼脊，东部南北两侧为洛河、黄河阶地，较为平坦。西部山区最高海拔 481 米，东部黄河滩地最低海拔 120 米，全县平均海拔 262 米。县境中西部为邙山覆盖，属于黄土高原的一部分。邙山南接洛阳盆地，北至黄河谷地，由西而东贯穿全境，全长约 55 公里，宽约 17 公里，总面积约 568 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 74.8%。邙山为黄土地貌类型，丘陵起伏，呈丘岗形态。冲沟发育，北侧沟谷为南北向与黄河谷地连通，南侧沟谷为西北、东南向，通向洛河谷地，沟谷一般深 40—60 米，多呈“U”形。根据境内地貌类型和成因，还可分为西北部的构造侵蚀基岩丘陵，中部的侵蚀堆积黄土台塬，东北和东南部河流堆积阶地三类。

孟津属黄河水系，主要河流有黄河、金水河及瀍河等。黄河自西向东流经孟津县，为境内最大河流，蜿蜒县境北部，经小浪底、白鹤、会盟 3 个镇，流程 59 公里。金水河经麻屯镇入洛阳涧河，县境内长 6.5 公里，流域面积 62.7 平方公里。瀍河发源于县横水镇寒亮村，为季节性河流，由北至南流经 4 个乡镇，至洛阳老城东关注入洛河，县境内全长 18.5 公里，流域面积 141.5 平方公里。瀍河、横水为季节性河流，近年流量或减少、或干涸。

孟津地处豫西丘陵地区，属亚热带和温带的过渡地带，季风环流影响明显，春季多风常干旱，夏季炎热雨充沛，秋高气爽日照长，冬季寒冷雨雪稀。全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2270.1 小时，6 月份日照时数最长，为 247.6 小时；2 月份日照时数最短，为 147.5 小时，全年平均日照率为 51%。平均气温 13.7℃，1 月最冷，平均为 -0.5℃，7 月最热，平均为 26.2℃，积温平均为 5046.4℃；在作物生长的 4—10 月份，日温差 5 月份最大为 12.7℃，8 月份最小为 8.6℃；平均无霜期为 235 天。年平均降水量为 650.2 毫米，保证率 80% 的降水量为 600 毫米，最高年降水量 1035.4 毫米，最低年降水量 406 毫米；7 月降水最多，平均为 164.1 毫米，1 月降水量较少，仅 6.9 毫米，夏季降水量变化特别大，易造成旱涝不均。

孟津县土地资源类型复杂多样，土壤分 2 个土类，其中褐土占 93%，为全县面积最大，分布最广土壤；潮土类占 7%，分布在黄河漫滩和一、二级阶地。<sup>[2]</sup>全县土地利用类型多样，呈多元性。其中耕地占绝对优势，说明孟津县是以农业为主的土地利用类型区。受地貌及自然条件制约，林地、园地分布少且不均匀；未利用土地，城镇村及工矿用地面积较大。虽然开垦荒地，废宅基地复耕，却不能补偿耕地之减少。乡镇之间，地域不同人均耕地多少不一，最多为 1.61 亩，最少为 0.71 亩。随着城镇化水平提高，一部分耕地不可避免被占用或改作他用，而可耕地后备土地资源缺乏，可开发的耕地十

[1] 网站报道，2015，《自然地理》（<http://www.mengjin.gov.cn/>）。

[2] 褐土与潮土的形成条件不同，土壤特征不同。褐土经风化作用而形成，具有明显的粘化作用和钙化作用，分布于山地低丘。潮土是河流沉积物受地下水运动形成，主要特征是地势平坦。

分有限。<sup>[1]</sup>从总体人均耕地量来看出，孟津县农村“人地矛盾”突出，这对农村劳动力就业以及农业发展的选择上都有重要影响。

孟津地处丘陵区，水资源贫乏，且分布不匀，地下水埋较深。近年来，地下水位又普遍下降。多在 80—300 米之间，开采难度大，代价高。全县水资源总量为 416024 万吨，其中黄河一级阶地区为 43130 万吨，洛河阶地区为 11473 万吨，黄土台塬区为 361421 万吨。总储量为年平均补给量的 54 倍。地表水 10062 万方，过境水为 7685 万方。水资源可利用量丰水年 15733.6 万方，中早年 14227.0 万方。全县农业人均占有水资源仅 574 方，亩均水资源 341 方，低于全国、省、市水平。黄河、洛河阶地较多水资源很难调到中西部黄土丘陵区 and 基岩浅山区使用。除黄河、中州两条大渠外，全县配套完好机井 1697 眼。有效灌溉面积 20 万亩。随着黄河小浪底工程南岸引水工程和西霞院工程建成，孟津水资源紧张趋势已有所缓解。特别是小浪底孟西灌区设计面积 9.66 万亩。向九泉水库充水调节，为孟津县城日供水 3.37 万方。其节水型生态农业灌区自流灌区向金水河水库、印山渠供水，恢复、改善灌区面积 9.9 万亩。<sup>[1]</sup>

总的来说，孟津县地域的自然条件可以简单概括为：多丘陵，少平地；多日照，少降雨；多褐土，少潮土；耕地多，水资源少。

S 村与 D 村的情况基本与上述一致，这两个农村均在孟津县西部，典型丘陵区，地势起伏，山丘高地较多，平地较少。耕地土壤为红黏土，土层薄，缺水干燥时土壤黏在一块易形成土疙瘩。村庄都处于贫水区，耕地大都为山坡梯田，寻找地下水源、凿井非常不容易，在地下 300 米左右才能出深井水，生活中所用自来水皆是深井水，这几年由政府投资农田水利灌溉设施，基本用上水浇地，在山顶凿井出深井水，另建水塔蓄水，铺地埋管到每块田地。

## （二）农业生产特征

孟津县土地利用以农业（本文中农业指狭义种植业，广义指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副业五种产业形式）为主，据 2000 年统计，全县土地总面积 758.7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 39248 公顷，占比超过一半。

自建国以来孟津县人均耕地面积一直呈下降趋势。全县 1949 年人均耕地 2.73 亩，到 1984 年降为 1.53 亩，耕地总面积下降 13.4%，人口总数上升 54.11%，人均耕地下降 44%。<sup>[1]</sup>2000 年底，全县耕地面积 39248 公顷（58.87 万亩），比 1986 年减少了 536.5 公顷（0.8 万亩），加上人口增加，人均耕地 0.099 公顷（1.48 亩），比 1986 年 0.11 公顷（1.65 亩）减少 0.009 公顷（0.17 亩）。到 2004 年人均耕地已下降至不足 1.3 亩。<sup>[1]</sup>

自然条件恶劣及人均耕地面积下降双重制约了孟津县的农业生产。为了保证粮食产量，一直以来，孟津县粮食生产为一年两熟的小麦与玉米轮作种植模式，每年秋季 10 至 11 月间种植冬小麦至第二年 6 月份成熟，然后换茬玉米到秋季收获。

我们可以观察表 1 中每亩粮食产量及每亩小麦产量的数据。从表 1 可以看出，小麦种植面积及产量占粮食种植面积及产量超一半，每年粮食及小麦每亩均产不到 600 斤。由此可以粗略计算下孟津县农民每年粮食种植收入。以 2015 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格 1.18 元/斤计算，每年亩均小麦收入不超过 700 元。<sup>[2]</sup>而以 2004 年人均耕地面积 1.3 亩计算，每年人均靠耕作小麦所获收入不到 900 元，即使一年两次丰收（夏粮与秋粮），每年人均种植粮食获得收入也不到 2000 元。据调查时村民说种玉米、小麦一年两次，投资下来最多赚一次，纯收入一亩地挣 1000 元，如此与我们计算所得结果大体一致。

[1] 网站报道，2015，《自然资源》（<http://www.mengjin.gov.cn/>）。

[2] 小麦最低收购价格 1.18 元/斤由国务院《2015 年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规定。



表 1: 孟津县 2011-2013 年粮食及小麦产量<sup>[1]</sup>

年份	粮食种植 面积 (万亩)	粮食 产量 (吨)	粮食 亩均产 (斤)	小麦种植 面积 (万亩)	夏粮 产量 (吨)	小麦 亩均产 (斤)
2013	81.73	227973	558	41.09	114237	556
2012	80.81	232304	575	41.82	120023	573
2011	78.79	216066	548	41.42	115859	559

我们根据孟津县近几年农业生产的宏观数据，可以看出孟津县农业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但由于自然条件差及人均耕地面积少的限制，亩均粮食产量不高，人均粮食收入很少，粮食耕作并不具备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劳动产出与投入的比率）。

S 村与 D 村的情况很好的印证了以上结论。他们原来世代代都在黄河岸边种地，粮食收成完全“靠天吃饭”，但基本十年九旱，小麦最多不超过一千斤，少时就几百斤，产量低收入自然不好，村民反映那时“对土地爱理不理，不好好种地也就那么多粮食，没什么收入。”（2015 年 7 月 27 日访谈记录）在粮食收入低的局面下，农民一般会选择出外打工。在九几年时，S 与 D 两村外出打工的人非常多，“大部分出省，四面八方，建筑工地打工、搞装修、做生意、当保姆的各行各业都有。”（2015 年 7 月 27 日访谈记录）

移民搬迁后的情况与之前稍有变化。按刚搬迁时的土地与人数分地，人均耕地在一亩至一亩半之间。但据 S 村村主任介绍如今“人地矛盾”依然很突出，主要表现为过去没有分到土地的人现在想要土地而不得，因为国家自 1998 年实行土地承包 30 年不变后，30 年内新出生的人数比死亡的人数多，“有地的人死了土地却荒着了。”（2015 年 7 月 27 日访谈记录）

粮食种植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原来虽然收成不好，但还会将粮食买卖作为收入来源之一。但如今的情况是只种不收，谁要收谁就拿走。村民这么说：

“别人都是大型收割机收麦子。有些户就是跟开收割机的商量，我不掏钱，你把这里麦子收走，行不行，收了就把麦子拿走。因为麦子还不值得付收割机的钱。土地太薄，麦子收成太少。只种不收，收了也不能卖，不抵收割机的费用，更不抵化肥种子农药的费用，根本不指望种地。”（2015 年 7 月 27 日访谈记录）

另外，半工半耕式家庭占大多数。家庭中外出打工者很多，但完全把耕地抛荒则很少，一般家庭中男性外出打工，女性留在家中继续种粮食。

笔者认为粮食种植的产量低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孟津当地自然条件的限制导致，传统农业以种粮为生更多来自于生存需要。而今天从种粮食的微薄收入可想，农民对具高经济价值的果业种植会更有积极性。接下来我们将从市场出发，分析水果消费的现状与前景，以及市场又是如何影响了农业种植的格局。

### 三、食品消费市场与种植结构

总体来说，孟津县目前力主发展特色农业，特色农业又主要是特色种植业，所谓特色就是表现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随之而来的是种植结构的调整。

<sup>[1]</sup> 表中数据均来自孟津县统计局编《孟津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2013）（共三份）。

### （一）食品消费市场

在西方经济学中，价格是反映供需变化的信号，市场需求的变化可以被消费价格所反映，同时价格也反映产品价值，不同价值会有不同的消费渴望。表 2 是孟津县 2011-2013 年三年食品消费价格指数，由三年消费指数的平均数可以看出，肉禽及其制品和干鲜瓜果的价格指数稍高，而粮食价格指数略低。这反映出肉禽和干鲜瓜果在食品消费中拥有更大的市场需求。

表 2：孟津县 2011-2013 年食品消费价格指数<sup>[1]</sup>

	粮食	肉禽及其制品	蛋类	水产品	鲜菜	干鲜瓜果
2013	100.9	105.7	111	97.9	110.2	95.2
2012	106	103.6	100.5	109.9	110.2	105.1
2011	112.5	122	111.9	117	103.6	130.3
平均	106.4	110.4	107.8	108.2	108	110.2

其实，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食品消费习惯发生了变化，随之而来的是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从原来以粮食为主转型为粮—肉—果并重的消费结构。黄宗智认为这种变化的原因关键在于，人们收入提高后对副食品的消费更胜于粮食消费。肉禽与瓜果旺盛的市场需求进而带动了养殖业与种植业的发展，尤其在种植业中从以往单一的种粮食转变为种植更多高值农产品。

### （二）农业种植结构

近几年，孟津县农作物种植结构发生变化。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以水果、蔬菜为代表的高值农产品逐渐替代粮食种植成为耕地利用的主要方式。

由表 3 的资料可以看出，孟津县农业生产仍然以粮食作物为主，其中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维持在 80 万亩左右，小麦种植面积维持在 41 万亩。但值得关注的是经济作物中蔬菜种植面积呈逐年上升趋势，2011 年蔬菜种植面积较上一年增长了 15.3%，2012 年较 2011 年增长 8.6%，2013 年较 2012 年增长 7.8%。相较于一年人均种粮食收入不到 2000 元，蔬菜种植的经济收入显然更为可观。

表 3：孟津县 2010-2013 年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万亩）<sup>[2]</sup>

年份	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小麦种植面积	主要经济作物种植面积			
			棉花	油料	蔬菜	总计
2010	78.95	41.58	0.38	3.37	6.6	10.35
2011	78.79	41.42	0.33	3.15	10	13.48
2012	80.81	41.82	0.23	1.61	10.9	12.74
2013	81.73	41.09	0.36	2.61	11.2	14.17

但是，农业结构并不会自发完成转型，种植结构的调整并不必然来自于市场需求的变化所产生的动力（主要源自市场的复杂性），因为农业结构取决于农民对种植作物的选择。从农民的角度来说，经济利益的刺激会使农民产生强烈的积极性，毋庸置疑，种植高值农产品非常具有经济潜力。但桎梏

[1] 表中数据均来自孟津县统计局编《孟津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2013）》。

[2] 表中数据均来自孟津县统计局编《孟津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2013）》。

农民行动的因素在于，其自身所拥有的有关市场需求的信息太有限，对市场需求的变化亦不敏感，而且最关键的是其缺乏调整种植结构的农业资本，这进一步限制了其承担市场波动的抗风险能力。

从笔者所调查的 S 村与 D 村种植高值农产品——突尼斯石榴的经历中，我们发现政府（移民局）的有效扶持恰恰帮助农民解决了以上关于市场的诸多难题，并推动了这两个村庄种植结构的变化，从而实现了农民从低价值的粮食种植到高价值的果业种植的发展。

#### 四、政府引导与项目制扶持

S 村与 D 村发展石榴种植业，县移民局不仅起到了积极引导的作用——将生产重心从种粮食引向种高值水果，也利用国家对移民后期扶持项目提供发展所需的诸多条件。本文认为，从移民后期扶持政策中可以凸显以项目带发展的项目制模式，并且此模式很好的运用在了移民局的实际工作中。

##### （一）移民扶持政策

移民后期扶持政策是移民局近十年进行全部工作的指导纲领，按照总体规划，移民后期扶持分两个阶段，从 2006 年开始，前十年负责基础扶持，后十年负责生产发展，扶持工作预计在 2026 年全部结束。<sup>[1]</sup>政策内容多见于关于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规划中，在了解移民局实际工作状况前，我们首先了解相关政策规定是必要的。

2006 年水利部关于印发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规划《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规划编制工作大纲》中的重要内容：

规划的基本原则：1. 坚持移民自愿。2. 坚持解决温饱问题优先。3. 坚持开发性移民方针。

规划目标要尽量量化，提出移民人均纯收入的具体指标。有项目扶持的村组（自然村），还要针对扶持的项目提出应达到的具体指标。

扶持方式的确定，坚持能将移民核定到人的，要尽量将资金直接发给移民个人（以下简称现金直补），也可以实行项目扶持，还可以实行现金直补与项目扶持相结合的方式。

项目确定的原则：根据绝大多数移民的意愿，按“先生存、后发展”及“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原则，……规划应尽量避免安排经营性项目，以规避风险。

采取项目扶持方式的，要提出年度项目计划。

实行项目扶持的，分析项目实施后对移民收入水平和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

同年，河南省政府印发了《河南省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实施方案》（豫政〔2006〕57 号）。重要内容如下：

在 2015 年年底以前，主要解决水库移民的温饱问题以及库区和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薄弱的突出问题；2016 年到 2025 年，加强库区和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改善移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移民收入，使移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逐步达到当地农村平均水平。

采取项目扶持方式的，可以统筹使用资金，但项目的确定要经绝大多数移民同意，并报省政府移民办审核批准。

本着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的原则，编制项目扶持规划，上报省政府审批，逐年解决他们存在的实际困难。

重点加强基本口粮田及配套水利设施，……通过贴息贷款、投资补助等方式对移民能够直接受益的生产开发项目给予支持。

以县为单位，以水库移民村为基本单元，按该村的扶持资金额度和扶持方式，编制完成水库移民

<sup>[1]</sup> 国家对移民的管理分两个阶段，早期安置与后期扶持。早期安置项目资金是国家移民补偿款的结余资金，从 2006 年开始后期扶持项目，由国家财政划拨专项扶持资金。政策预计到 2026 年，对移民的直补和项目扶持全部结束。

后期扶持规划，经同级政府审核后，逐级上报省政府移民办，作为安排后期扶持资金的依据。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规划，原则上五年编制一次。

两份政策文件皆是在 2006 年公布，对移民村的发展皆强调了作好“项目规划”的思想。

第一、相较现金直补，更着重提出项目扶持方式，项目包含基础设施建设与生产开发性项目两种，但明确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优先。多元的扶持方式使移民局在扶持中有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余地。

第二、后期扶持项目要获得该村大多数移民同意，并且要针对解决村中的实际困难，这便规定了移民局与村民的“互动模式”，即由移民村提出项目需求，移民局负责提供帮助，后文将提到实际过程。

第三、明确要求县移民局按每个移民村的扶持情况五年编制一次项目扶持规划，并逐级上报省移民办。结合第二条可知，规划需征得移民村同意，移民村需要参与编写扶持规划的内容，这更进一步凸显移民局与移民村的“互动模式”。

实际上，移民村后期扶持工作普遍采用项目制的方式进行。从政策中可以看出，编制项目规划的程序应该由移民局主持、村内自主完成然后递交移民局，实际情况与此稍有不同，但这一过程在无形中也“规划”思维传递给农民，<sup>[1]</sup>从而使农民具备现代化的发展意识，尤其是大力发展生产的思想，这在后文会详细阐述。

## （二）实际工作

近两年上级政府对移民扶持力度加大，每年县移民局都要申报和处理大大小小许多项目。扶持项目分为：基础设施建设、强村富民战略<sup>[2]</sup>、生产发展三个类别。项目都由移民村自己申报，移民局再根据每个村移民人口规模、村内社会稳定情况，分派指标，每个村额度不一样确立各移民村先后发展顺序，并让移民村把项目分支细化，明确哪些是关键项目。移民局突出强调移民村社会稳定情况，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项目都是发展集体经济，要让大多数移民收益，移民村是否团结、协调一致，事关实际项目能否落实到位，是发展项目的关键环节。移民局考察移民村的领导班子，即村“两委”的工作能力，从项目立项到项目落实的全过程。

上文已说明项目的确立是要从移民村这一层开始编写规划，上交移民局核查，修改完善后再由移民局上交市、省移民办，逐级审查项目规划。层层审查体现了立项过程的严谨性，一旦规划书递交通过一切都依规划书进行。所以，移民局在初始段项目核查的责任很大，其目的不仅是要把许多事情量化，其次还要指导移民村完善项目申报。移民局一名工作人员介绍了项目核查过程：

从春节上班开始就要下去核查。下乡排查过程最少三个月，移民村项目很多，每个项目都得走到，然后逐渐整理出来，哪个村是什么情况，再根据市里下达的资金量，做出报告，有些东西简单概算，然后提供给领导。今年市里下了 1000 万资金，我们筛选四、五十个项目，凡是超过 20 万的项目，村里必须编写可行性研究报告，他们不会做，需要我们来把关指导。不把关哪能出高质量。我们负责 25 个移民村，哪能一个个都弄。每个项目你都得落实清楚，然后再根据市里的资金计划，进行调整。实地调研，就是看村干部能不能把工作落到实处。（2015 年 7 月 31 日访谈记录）

<sup>[1]</sup> 农民乃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定义，即以种植粮食、果蔬等为生计的人。调查中了解到项目规划的编制主要是由移民村干部完成，如此，移民村干部是实际已具备规划式发展思维的人，但他们并未脱离务农的生产方式，所以，在这层意义上，我用全称的“农民”来涵盖包括干部在内的所有移民。

<sup>[2]</sup> “强村富民”战略为 2014 年河南省移民部门在全省移民村实施的新的工作方案，孟津县移民局根据该战略规划到 2015 年末，县 11 个重点移民村“一村一品”的产业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即每个村都有一个科学的产业发展规划、一批致富能人、建立经济合作组织、形成一个主导特色产业，打造一批种养加等发展项目；S 村与 D 村发展石榴种植业属于“一村一品”项目。

对移民村进行扶持的基础工作是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路灯亮化、道路硬化、绿化带美化、打吃水井、修对外道路等。一般，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花费比较大，目前移民局的扶持项目多数还是投资这一方面。更多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也有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有的移民村并没有提出好的生产发展项目，人们光想把村弄得漂漂亮亮，另外也有农民觉得搞生产发展如水果种植要承担许多风险，在没有示范村带动下，农民见不到效益，宁愿保持现状，移民村也不好申报这个项目。另一方面就是移民村基础设施薄弱，有很多实际问题，搬迁二十年来存在基础设施老化等问题，需要重新建设。

生产发展项目包括：灌井、地埋管、生产道路、建深加工厂，虽然也都是基本设施建设，但都是围绕改善生产条件进行。移民从库区搬到安置区，当时的农田水利设施条件等都很差，需要移民局一步步来改善它的生产条件。比如，以前移民村的地都是赖地，周边村庄不要的地、荒芜的地都给了他们。每年冬天移民局便组织移民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打深水井。修建灌溉系统也要根据当地的条件来，这两年后期扶持中，移民局给移民村上灌顶项目慎之又慎，井水抽上来需要存放在蓄水池，然后修建管道把水通道每块地，所有设施建设成本比较大，一系列灌溉设施包含灌井、蓄水池、管道以及其他配套设施。特别是西部山区，项目花费少则三四十万，多则六七十万，这个大项目占资金量比较大，一旦给你上灌顶项目，如果井深 300 米，光成本就是三十多万，再配套电力设施、水房、地埋管，总共就加起来太多。（2015 年 7 月 26 日访谈记录）

2015 年洛阳市移民部门要求各县移民村生产发展的项目不低于百分之八十，但据统计实际很难达到 50%。而围绕“强村富民”战略，孟津县移民局成功发展了“一村一品”项目，进而带动了一批围绕特色林果业建设的生产发展项目。S 村与 D 村发展石榴种植业正是“一村一品”的成功典型。

据移民局介绍，洛阳地区做宣传的特色观光农业共有 15 家，孟津县就占有 14 家。在县里大趋势下，孟津县移民局也紧紧围绕特色农业、特色林果业发展扶持项目。

移民局每年都会举办培训班，给移民村村民进行技能培训，培训一个重点内容就是果业种植。去年 12 月我们举办了养殖业培训，聘请的河南农大、农科院的老师来授课，从大的方面来讲养殖业形势，不仅仅是养猪养羊技术，后来还请了河南省养猪协会的会长。去年还同时举办了种植技术培训，针对的是种植户，都是有意愿来参加的，各村分指标算人数，村干部带队来参加培训班。我们有专门的培训地方，期间管吃管住。我们聘请的是中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洛阳市蔬菜办两位专家还有河南林科院的一个科技组组长，由专家推荐种植品种，群众很感兴趣。（2015 年 7 月 26 日访谈记录）

除了举办种植技能培训班，移民局还组织项目推介会，通过推介会能够很好的推动移民村作出发展立项的决定。为什么要办项目推介会，是因为移民局认为许多移民村并没有意识到生产发展是第一位的道理，他们觉得农民的眼光看得不长远。

### （三）引导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 S 村引进突尼斯软籽石榴的过程证明了依托项目制带给农民发展意识的变化，重点表现为依据科学考察、积极动员农民争取生产发展。

在几年前移民局举办的一次推介会上，河南林科院副院长积极推荐突尼斯软籽石榴。该石榴以成熟早（8 月中旬、农历 7 月初籽粒开始着色变红）、籽粒大（百粒重 56.2 克）、色泽鲜（籽粒红色）、果个大、果红色美观、果仁特软（是全国所有品种中唯一的真正软籽）等特点而突出。1986 年突尼斯与中国建交时赠送石榴树苗 6 棵，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对该石榴品种进行多年试验、观察，培育出第二代软籽石榴。1999 年河南省林科院石榴研究室的刘中甫教授，将该试验品种引入其家乡荥阳刘沟村推广种植，第三年试验成功大获丰收，2002 年 12 月 10 日，河南省林业厅发布第

3号林木良种公告，公告中正式更名为突尼斯软籽石榴。

目前突尼斯软籽石榴种植面积最大和产量最大的是河南省荥阳市刘沟河阴石榴基地，大部分地区还不知有这么高档的石榴品种。突尼斯软籽石榴的引种成功，填补8月份果品市场上没有石榴果品的空缺。它成熟期较早，正赶上中秋节上市，真正的软籽特点又改变了石榴难以下咽的缺点，满足了市场需求，成为人们走亲访友争相赠送的高档水果，销价极高。三年来郑州地区河阴（品牌）石榴批发价每市斤不低于15元，北京、上海大城市超市每市斤25元甚至更高，比所有其它石榴品种价高4倍以上，且供不应求。由于该品种刚从国外引近，国内种植面积少，远远未满足市场需求。石榴又耐贮藏，销售期可达半年之久，其出口前景也极为广阔，经济效益十分可观。从社会效益和市场价格看：“一亩收三万元并不难，再栽十年也不晚”专家预测，突尼斯石榴将成为石榴主产区更新换代的最新品种。

S村村干部得知消息后，从移民局获得专家联系方式，2007年开始自发组织党员、村民代表到河南郑州荥阳石榴基地进行不下十次的考察。考察主要了解该石榴需要的气候、土壤条件及经济效益，专家介绍突尼斯软籽石榴只有在陇海沿线能种，S村的红黏土正适合种植，而经济效益则是有目共睹。通过一番村内群众动员，S村最后决定引进突尼斯石榴种植。

从2008年开始，S村每年都会进行项目申报，移民局着手园区建设和后期配套。项目具体内容：  
引进树苗：村民买一颗树苗5块，村里补贴2块，实际出3块。一亩地标准110棵。树苗栽树得坑是村里帮助打的，用机器打的，一个坑3块。这些钱，先是由村民集资，然后是第二年返还过来，由移民局作为项目资金拨款到村里。

基础设施：09年架电，10年冬季到11年上半年打井（打井不是容易事，打350米深才能出水，得找专家找井位），2011年配套完成，2012建了水塔，水塔建起来后，铺管道，把县城水利局的技术人员找来，通过统一规划，每家每户每一块地都通水。在2013年，到山上修水泥路，主干道和到一家一家的支道。大概有3000米，主干道4米宽，支干道2米宽，支干上拖拉机、三轮车都能通。

这些都是移民局的项目，我们就是写申报需要哪些东西。他们首先考察可行性和资金量，再帮助联系工程队，把钱先打到村的账目，村里再交给工程方。

政府对农村的服务、扶持和设计、引导会起到及其关键的推动作用。正如上一章所提，农村如果想实现由种粮食到种水果的种植结构转变，在缺乏资本（资金、技术、市场信息）的前提下，农民自主主导生产转型更是寸步难行。

政府对农村的扶持具体而言则是以项目带发展，项目制可以简化为生产立项——阶段项目——长远发展的模式。“大干大扶持，小干小扶持，不干不扶持”的思想，在让农民得到实利后便被农民接受，于是政府与农村有关生产发展的“互动模式”便以“申项目”与“批项目”的方式存在。农民获得的实利包括生产转型所需的农业资金、专业技术以及生产设施。另外，移民村与政府都需根据实际情况参与五年一次的规划编写，<sup>[1]</sup>“项目规划”构成农村长远发展的计划准备与实质内容。“规划”带有现代性的特征，从科层制<sup>[2]</sup>政府传递到农民身上，显然会对农民的行为与活动产生重要影响，这也不得不说是项目制的潜在作用。

## 五、小规模生产与纵向一体化经营

这一章我们主要讨论S村与D村在推广种植突尼斯软籽石榴时值得深思的一些现象及问题。具体

<sup>[1]</sup> 在2015年5月，孟津县移民村刚刚完成“十三五”规划书，规划书村中会保留，各级政府移民部门也都会保留。

<sup>[2]</sup> 科层制被马克思·韦伯作为法理型统治方式，以非人格化、集权与档案记录为基础，根据技术、知识进行统治，强调形式合理性，带有明显的规划色彩。

而言，在向农民动员种植石榴时，为何有的农民迟迟不愿放弃种粮食？从中可以看出小农的经济理性的哪些特点？在多地人少的条件下，土地承包面积不均且以小规模为主的家庭经营的合理性在何处？高值农产品的小规模生产是否真正提高农民收入，并且有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社会效益？而在处理农产品的市场销路问题时，农村合作社在生产经营中起到的作用究竟是什么？现状下合作社存在的问题与未来可能的发展又会是怎样？

笔者认为当下关于特色农业发展的讨论可以借鉴 S 村与 D 村石榴种植业作为典型案例。

### （一）小农经济理性

S 村与 D 村在动员农户种石榴的事情上都遇到了同样的困难。移民扶持的政策里明确要求，所有项目必须获得大多数移民同意，项目原则上必须是使全体移民都受益。群众动员这一环节，既是为了获得大部分农民的支持，也是成功申报项目的重要前提。而如何说服以种粮食为天经地义之事的农民成了村委会十分头疼的问题。

动员群众的过程是首先由村两委干部带头表示支持，接下来是作党员工作，要求党员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党员再去说服部分村民代表，再由村民代表挨家挨户的说服更广大的农民群众。村干部、党员及部分村民代表都到过郑州荥阳石榴基地考察，亲眼见识到了种植突尼斯石榴使当地农村富起来的情景，并且他们本身经常参与移民局组织的学习班与推介会，思想上更容易接受生产转型的主意。真正的困难在于数量庞大的普通老百姓。

普通老百姓难以支持种植石榴的理由有三：一是种粮食不会让农民饿着；二是种石榴有风险，怕卖的不好；三是世代代种粮食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第三个理由本身并不成立（因为许多外出农民工并没有把种粮食当作天经地义），它主要是为了辅助前两个理由，而前两个理由可以看出是农民对种石榴这件事情算了笔经济账的结果。

农民理解这事并不难，种粮食并不为了收成（原因前面已说过，产量确实太低）只够饱肚子，虽然赚不了钱但也没有多少农业投入（少了药肥的投入），种石榴首先需要药肥，其次种植经济作物会承包更多土地，土地租金是笔固定且量大的开支，再次石榴得三年挂果，三年间只有投入没有收入，另外石榴销路是个未知数，尤其对于单个的农户而言。如此算来，种粮食只是付出了不小的机会成本（如果只种粮食便会丧失种经济作物或者出外打工可能赚的收益），但却可以满足生存吃饱的需要，而实际情况中，许多家庭对土地不怎么打理，每年种下麦子后，可以有大把空闲时间甚至整年时间在外打工，家庭全部的收益并不会很差；而种石榴需要三年的收益等待时间，每年的种植也需要耗费更多的人力（依种植面积使用劳力）、物力（必备农业机械）、固定时间（每天的农活都会很多，且最好常住农村），同样也增加了减少外出打工所获收益的机会成本，最关键的就是家庭经营水果销售难以承受市场价格与需求波动的风险。笔者把以上因素罗列在表 4 中，可以更直观的了解农民比较种粮食与种石榴的经济效益的过程，我把其称为“小农经济理性”。

表 4：“小农经济理性”对种粮食与种石榴的比较

类别	种粮食	种石榴
成本	较少的劳力、时间、水利、农具、肥药、较少的土地租金	较多的劳力、时间、水利、农具、肥药较高的土地租金
收益	每年产量低但够家庭食用，基本不卖钱	三年后产量稳定，可以卖出高价钱
风险	收成“看天吃饭”	销售情况未知
机会成本	大量时间外出打工	限制外出打工时间

为了解决部分群众不支持或不情愿支持的难题，S村与D村都采取了相同的办法，最终实现将近一半的家庭同意种植石榴。办法就是让老百姓能亲眼见到种石榴的效益，S村“2007年组织村民代表去荥阳石榴基地考察不下十次，每次考察村委租大巴车带着村民去看，又买几筐石榴给大伙尝尝，村民看到郑州的市民到那买石榴的车把路都堵上了就知道这石榴肯定卖的好”(2015年7月27日访谈记录)；D村在2012年开始推广突尼斯石榴，两村在搬迁前原属一个大队，许多村民都是亲戚，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流也促成了D村学习S村种植石榴的结果。通过以上案例我们可以认为小农经济理性虽然也是一种经济理性，但在精确性与前瞻性方面显然不同于市场经济所强调的经济理性，尤其在面对市场风险时小农经济理性更偏保守态度。农民只有亲眼见到实惠后才愿意支持某项行动，便是小农经济理性驱使的行为。

## (二) 家庭种植模式

根据调查，S村与D村石榴种植以家庭劳动为单位。但两村的具体情况也有稍许不同之处。

首先，S村与D村围绕发展石榴种植重新进行了(村内、外)土地流转，将全部种植户集中在石榴园，而家庭土地承包规模依据不同村的“人地”情况而异，总体来看小规模(2亩左右)依然居多，中等规模(7亩左右)有一定数量，稍大规模(15亩左右)比较少。

S村目前石榴种植总面积500亩，为一次性调整，土地全部集中在一座丘陵上。<sup>[1]</sup>2007-2008年进行土地调整，以农户间自调为主。承包土地种植石榴的有百十户，(村里共200户)将近村里一半，大部分家庭承包土地为一亩多或二亩。S村村长介绍了调整土地的具体做法：

我们这边有两座丘陵，两座丘陵相互调整，计划把一座丘陵的土地全部用来石榴种植，各家各户都在一块为了方便管理(移民局建的一些基础设施共所有农户使用)。有的家庭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种石榴，就把土地转给人家，两边土地对换或者私自流转都有。两座丘陵的土地调整了近五十亩。全部都是自行调整，先自己调，然后再村里帮着调。(2015年7月27日访谈记录)

D村经过两次土地调整，目前共有800亩石榴种植面积。第一次调整村内集体土地500亩(近村内土地的一半)，第二次流转邻村土地近300亩，所有土地连在一块。该村还有600亩土地耕作粮食，据村支书介绍未来如果还有人愿意种石榴，会计划再调整200亩土地。D村与S村的土地调整方式不一样，该村将计划开发为石榴种植园的一片土地由村委统一收回(劝说原有承包家庭退地)，再由愿意种植石榴的家庭向村委提出承包数量，用抓阄的方式分地块，并且村委规定承包数量最少3亩、最多10亩。目前，有90户在种植石榴，近村总数(200户)的一半，承包土地数量最多为15亩，最少为2亩。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两个村近一半的土地利用来种植石榴，正在种植石榴的家庭将近占全村家庭总数的一半。

其次，种植石榴有适宜的技术及流程，种植家庭不仅接受外地的技术专家的指导培训，也通过户与户间的经验交流来学习推广技术。

石榴树每株行距一般 $2 \times 3\text{m}$ 为宜，每亩110株，底肥施足。栽植头1~2年主要是长树扩冠，即使结果也应摘除，配合间作其他农作物，如花生、南瓜、西瓜和药材等；第3年开始结果，树势中庸偏弱结果良好；第4年全部结果，第5年为丰年结果更旺，亩产在2000斤以上。

S村与D村都邀请了来自郑州荥阳的技术专家做过指导，主要传授嫁接和剪枝技术，也对具体家庭石榴种植的问题针对性解决。村委与技术专家都保持电话联系，专家热衷推广突尼斯软籽石榴的种植，

---

<sup>[1]</sup> S村另一座丘陵上的其他土地全部租给专业牡丹花种植公司，村内已无剩余耕地。



村民可以随时将遇到的实际问题向他们反应，在初期村委都会邀请专家驻村指导，时间几天到一周不等。由于全部的田地集中在石榴园，村民关于种植技术也会在田间地头相互交流。调查时村民反映，如今基本掌握种植技术，并无技术上的困难。

关于劳动情况方面，村民介绍，种植石榴日常的劳动量并不大，但每天都需要人打理，管理的越好产量才会越高，夏季一天的劳动时间一般为4个多小时；所需机械农具包括锄地机、除草机和打药机，这些设备目前每家种植户都已配备；所需劳力数量一般为两人，有的家庭是夫妻二人打理，有的家庭只有一人（妇女）另一人出外打工，有的家庭是农忙时在家农闲时出外打工；种植人群包括闲适老龄人群、中壮年种植能手、部分返乡打工者以及留守妇女。<sup>[1]</sup>根据种植户对家庭的劳力分配方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全年耕作的种植户，一类是半工半耕的种植户。

依据恰亚诺夫的理解“任何农业企业在组织方面具有的特性是它的系统”，系统被理解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将土地、劳动和资本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和方法”。以上S村与D村石榴种植在土地、劳动和资本（主要包括移民局扶持建设石榴园基础设施和农户自有的机械农具）即呈现了这一图景。

最后，不同规模不同家庭的石榴种植的投入成本及经济收益情况存在差异。笔者虚构甲、乙、丙三户家庭对比说明家庭种植模式的经济效益，甲为种植中户，乙为半工半耕的种植小户，丙为完全耕作的种植小户。<sup>[2]</sup>甲户承包石榴园土地8亩。户主（男）中年（50-60岁），子女已成家，由夫妻二人全年在家负责石榴种植（有时雇短工），属于非常能干的中等规模种植户。乙户承包石榴园土地4亩。户主不到50岁，子女未成家，户主出外打工，由妻子在家种植石榴，户主偶尔回家帮忙。丙户承包石榴园土地2亩为种植小户。户主为老年（60岁以上），子女独立成家，家中夫妻2人，平常由二人打理石榴园。

不同种植户投入成本及收益情况不同。投入成本包括：承包土地数量及相应租金，肥、药用量及花费，农具使用量及折旧费，配套设施（如自建冷库）花费，雇工劳动量及花费，没有农田基础设施的建造与使用费，因为移民村有相应的扶持资金，基本不需农户个人花费。收益包括农闲时出外打工所得与石榴销售收入。利润即为收益减去投入成本。

如果以资本主义的经济核算方式，显然不同种植规模的利润不等，种植规模越大则利润越高。但考虑以家庭作为生产单位时，家庭劳力的活动量（如不同年龄层农户）、人数、劳动时间总量保持一定，就不可能无限制追求种植规模（按照资本主义逐利逻辑），而是选择适度规模。正如表5所列甲乙丙户的种植情况。笔者倾向用恰亚诺夫所提出的家庭劳动消费均衡理论来理解家庭种植模式。但由于目前的调查资料有限，难以对此种模式在经济领域作更细化的讨论。

由上可知，与追求规模化的公司雇工农业经营不同，<sup>[3]</sup>家庭种植模式可以视为小规模生产。和传统家庭精耕细作式小规模农业相比，S村与D村家庭石榴种植中存在因大量资本（技术）投入而产生的影响。其中既包括移民局扶持帮助修建的基础设施，如水井、架电、水塔、地埋管，也包括农户家庭已普遍掌握专家所传授适宜的种植技术，和拥有锄地机、除草机和打药机等机械农具。而同时，它又保留了传统的精耕细作农业中精细化手工劳动，村民介绍石榴在结果前需要人工掏果核里的毛，每亩110棵树、每棵树上每个石榴的工作量太大，有时还需要雇工完成。笔者认为它们符合黄宗智所言的“资本-劳动双密集化”小规模生产的理想型，即在人均耕地面积小的情况下，发展适度的家庭种植规模尽

[1] 调查时并未针对劳动情况进行详细的家庭数据收集工作，略有遗憾，以上结论多来自于和村民的访谈与田间观察。

[2] 此种方法称为“社会虚构”。社会虚构的概念来自陈阿江所著《次生焦虑》（第38页），意思是例子是虚拟的，但内容来自社会真实。笔者调查时只有S村已经有石榴销售收益，列举数据来自该村调查资料。

[3] 调查时发现，S村另一片丘陵土地以租给专门的牡丹种植公司，村民会被公司雇佣劳动，按天计薪酬。S村土地利用的两种方式也说明了当今发展种植业的两种趋势。

可能提高土地生产率，不仅增加经济收入，也解决了村内剩余劳动力（黄宗智称为隐形失业人群，包括返乡打工者、老年人、妇女）的就业问题。

总之，S村与D村种植石榴的案例表明，高值农产品的家庭种植模式在现状人多地少（人均1亩多）的条件下发展适度规模，投入资本与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并结合必要的大量精细手工劳作可以实现“小规模生产”的经济高收入与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双重利好效果。

### （三）合作社：纵向一体化经营

上一节我们讨论了S村与D村石榴种植的家庭种植模式，主要集中于对“小规模生产”的效益分析。下面我们聚焦石榴的销售。从已有的资料来看，由村民自发组建并参与的合作社在水果销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根据孟津县移民局的扶持规划，和两村的实际情况来看，合作社会逐渐完善从生产到加工到销售的纵向一体化（经济学上，沿产业链占据若干环节的业务布局叫做纵向一体化，也称垂直一体化）经营。另外，有条件的农村还会结合观光农业<sup>[1]</sup>的尝试开发出生产—观光—消费又一种纵向一体化模式。最后，笔者发现孟津县其他一些发展更早的典范移民村的经验已证明，以合作社为核心带动农村产业发展，可能会成为农业产业化的一条可行之路。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sup>[2]</sup>

根据笔者在S村与D村的调查，S村于2012年成立石榴种植专业合作社，D村于2014年成立。合作社不收入社费，没有经济利益，成员以村干部为主，目的是帮助群众，服务果农。合作社在农委注册，没有政府补助，功能上属于服务类合作社，按调查中的实际活动内容可以区分为运销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运销合作社是指从事社员生产的商品联合推销业务的合作社，有时候兼营产品的级、包装、加工等业务；供销合作社是指购进生产资料出售给社员，同时销售社员的产品。<sup>[3]</sup>

S村的石榴种植合作社成立早，经历了运销合作社与供销合作社两种形态，营销手段丰富逐步实现品牌化，并开始利用网络平台。D村因为还处于石榴种植期，合作社暂时未发挥实际功能。S村村主任向我们介绍了他们村合作社的营销活动。

运销合作社：12年、13年石榴主要是合作社负责销售。主要是国家机关购买用于送礼，比如某个单位和合作社联系需要200箱，合作社10元一斤向种植户统一收购，再10元一斤统一包装销售。包装有两种，精包装和普通包装，价格一样，石榴数量不一样，精包装一个盒子6个石榴定价100块，普通包装一盒12个也是100块。精包装漂亮大部分是送礼。普通人图个实惠就买普通包装。

供销合作社：头两年，把石榴给机关送礼，现在因为中央八项规定政策，就不好送了。现在合作社统一购买包装箱，种植户从这买走，需要多少买多少。他们在公路边上卖，洛阳到小浪底的旅游专线路边。目前市场主要是洛阳这一块，石榴成熟时，在路边挤满了人，有的上果园去摘，有的就在路

<sup>[1]</sup> 现代农业不仅具有生产性功能，还具有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人们提供观光、休闲、度假的生活性功能。随着收入的增加，闲暇时间的增多，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竞争的日益激烈，人们渴望多样化的旅游，尤其希望能在典型的农村环境中放松自己。于是，农业与旅游业边缘交叉的新型产业——观光农业应运而生。

<sup>[2]</sup> 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二条。

<sup>[3]</sup> 运销合作社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农产品运销方面，源于大机器工业生产条件下，工业品主要通过各种大型的商业机构销售，而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基于其自然特点，供应不能十分均衡，价格变化较大。通过组织合作社专门销售，可以尽量避免经济上的风险。世界各国的运销合作社主要采用三种不同的运销制度：一是收购运销制，即合作社收购农产品后再行销售，销售盈利与社员无关；二是委托运销制，即合作社代理销售，销售款在扣除一定费用后全部交给社员，盈亏由社员承担；三是合作运销制，即合作社将社员所交的同级产品混合销售，社员取得平均收入。

边买。

打造品牌：石榴已经注册了商标，商标叫做浪底花，由合作社负责营销。注册商标用了一年时间，花了几千块，资金从移民资金、多渠道筹集。现在在办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要求更高。有了这些认证，价格可以变得更高。绿色食品认证程序基本已经走完，证书还没下来。

网络推广：13年开始做网络推广，现在是在阿里巴巴上做网站。利用网络这事，移民局培训时有人讲，村书记的闺女是大学毕业生，也建议可以网上推广，所以就做起来了。目前，我们对这个还不内行。我们在三个网站进行推广，在百度搜索洛阳石榴、阿里巴巴和博信网里也有。合作社出头弄这事，都是我和书记负责四处联系人专门弄网站。去年，有人在网上从我们这买走，然后又在网上卖出去。从村里也有发到福建、北京、西安。不过石榴不好运，运费贵，保质期长，突尼斯软籽石榴特点个大、皮薄、口感好，但皮太薄，手用劲稍大，就会把石榴子捏坏了，如果包装不好，中途物流会出意外。在网络上进行销售是很好的主意，但目前通过网络卖的不多。（2015年7月27日访谈记录）

在笔者看来，合作社负责营销的主要作用是通过统一收购、统一定价和创设品牌、市场推广确保了农产品的市场价值。与分散的小农户自销的方式对比，合作社可以发挥的更大贡献在于资源集中、成一定规模的农民利益团体增强了农作物生产方在市场中的谈判权力，从而规避农产品流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弱势”小农户面对大商业资本（批发方）不具谈判能力而形成不平等“买方市场”。这种资源集中的优势可以通过S村合作社努力利用网络来扩宽市场的活动中看出，也便是提高农民在市场营销中的技术实力，利用技术手段加快农产品的信息流通从而推动农产品的物流流通。笔者认为，网络手段的市场推广效应兴许会真正改变农产品流通领域的结构及其结构性问题，当然，这需要更多的调查来支撑这一结论。

在第四章我们曾提到，由于“项目制”的影响，农村发展新型农业不仅是瞄准一时的市场需求，而越来越着眼于长远的“规划”意识。虽然大部分种植户销售突尼斯软籽石榴已经相较之前富裕了许多，但单单依靠初级农产品（是指种植业、畜牧业、渔业产品，不包括经过加工过的这类产品）却有着自身的局限与市场风险。常见的问题是由于水果的储存质量不好而影响了销售。另外可能遇到的问题就是不稳定的市场需求，如一旦发生水果滞销便会陷入困境。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农民对这两点问题早已有所考虑和准备，解决的办法即是走农产品深加工的道路。同样，合作社会在生产—加工—销售的各个环节起到重要作用。由此，以合作社为核心实现农产品的纵向一体化经营。

S村由于在2014年的销售中出现了石榴储存质量的问题，于是提出申请修建公共冷库项目，目前移民局已经帮助他们建好。上一节就提到了，突尼斯软籽石榴的特点之一正是皮薄，但恰恰皮太薄反而容易出现稍储存不当便损坏的情况。一般，从石榴成熟、采摘到销售大概维持一个多月时间，不到农历八月十五开始，到国庆十一节，至多再过半个月。由于一开始村里缺乏储存设施，所以种植户都是边采摘边销售。不过，2014年由于夏季连阴雨，石榴快熟时，因水分过多温差又大，就裂口子，每家会损失几千斤（大小不等）。在调查时，我们还发现S村一位种植户在自家院子旁修建了一个冷冻保鲜库专门用来保存石榴。他告诉我们：

去年共收成2万多斤，下雨坏了7、8千斤，卖了1万多斤。我盖了冷库，存了有几千斤石榴，因为我7、8亩石榴来不及都卖完，等他们（别的种植户）把石榴卖完了，就剩我一家有，价格就上来了。建冷库花了1万8千，买了200个塑料筐，一个筐200块，总共花掉2万多。村里有保鲜库的就我一家，后来村里在石榴园又建了一个公共冷库。我的冷库制冷机用电一个月5、6百元，一年电费千百块钱。（2015年7月27日访谈记录）

种植户拥有了储存设施的确对于保险石榴品质，延长销售期，提高市场价格有很大的作用。但是，

S村建设公共冷库的目的不仅在于此，而是把石榴深加工项目列为十三五规划中的一项。我们尚不知晓S村具体的筹办计划，不过，在与孟津县移民局的工作人员交谈时，他们着重提到了深加工的规划：

这几年重点推的项目就是深加工项目，比如东部妯娌村种爱宕梨（从日本引进品种），发展了近三千亩，规模不是大，而是要做深加工（做成罐头厂、梨汁厂）以目前的面积远远还不够。所以我们一直给移民辅导着，十三五规划中必须上深加工项目，否则利润都让别人赚了，但群众已经很满足了。（2015年7月31日访谈记录）

不仅是S村，D村虽然尚未开始石榴销售，已经建好了冷库，并向移民局申报在村里建个加工厂（已经报批还未开建），计划将卖不出去的石榴加工成果汁。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调查S村时发现了另一种生产——观光——消费的纵向一体化经营模式。因为S村的石榴园正靠着洛阳市到小浪底水利发电站的公路专线，在节假日和周末有洛阳市市民驱车前往小浪底观光时，也会行经石榴园。S村计划将石榴园继续建设为石榴主题公园，融入更多的休闲、观光、消费等元素，项目还在向移民局申请中，目前在公路旁树立了石榴主题公园的广告招牌，不时吸引路人进入石榴园观光。村民向笔者谈到：

县乡政府要举办石榴花节，八月十五到十一前还要办石榴采摘节。都是政府出钱，村民出力就行。去年石榴花节也弄了，来的人不少。专门单位组织石榴花节，邀请乐队、自行车队宣传。从洛阳和外地在国庆十·一到小浪底观光的人比较多，会顺便来石榴园采摘。（2015年7月27日访谈记录）

为什么要实现纵向一体化经营？从S村的案例可以看出，纵向一体化经营能够将销售链条延伸到城镇及以外的更广大市场，这也必然会使农业生产的效益进一步扩大，农民的收入进一步提高。但依然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尤其是家庭种植模式的小规模生产能否有效地支持市场愈加扩大的纵向一体化经营？合作社在协调农业生产与市场需求之间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既需要更深入的理论思考，也亟需更加丰富的田野资料。

可以相信的是，无论是生产——加工——销售或生产——观光——消费的纵向一体化经营都不可避免的需要农村专业合作社来负责推动。2014年孟津县筛选孟津妯娌精品梨种植专业合作社作为首批全民创业重点项目予以强力扶持，预计带动近千人就业。<sup>[1]</sup>这也是比这两村更早发展的典范移民村的经验让我们有相信的理由。

## 六、结论

在本报告的开头，我便提出一个任务，即研究农业转型必须首要说明是“如何”转型的。而意图研究如何转型的过程则要建基在整体性的观察和理解各方面的社会要素。本文将生态环境、市场影响、政府工作以及农民组织四种社会要素（社会安排）纳入到统一的“结构”之中，意义在于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它们彼此之间对于促进农业转型而相互生发的关联与联系。且在对独立的社会要素如何作用的观察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农业转型在每一方面的运作机制，而综合的来看便是农业如何转型的全貌。

农业转型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天时、地利”——生态环境的影响。一个地域的农业发展应很好的利用这个地域的自然条件（即使今天农业技术先进的条件下），地域性既构成农业生产的根本，也成为农产品在市场中确立自身价值的根本（我们常见原产不同地域的同类农产品的价格并不同）。所以，发展新型农产品总是要考察它是否适宜在某一地域进行培育种植，产品的质量是否表现出上佳的品质，这些都牵涉到地域的地理气候特点、水源土壤条件。

另外，市场是当今农业转型的风向标，今天的农业生产尤其具有追逐经济利益的动机。随着国民

<sup>[1]</sup> 网站报道，2014，《我县抓好项目建设带动全民创业》（[www.mengjin.gov.cn](http://www.mengjin.gov.cn)）。

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食品消费习惯发生了变化，食品消费市场中从原来以粮食消费为主转变为粮——肉——果并重的消费结构。市场中不同种类的农产品的消费价格会有不同层次，价格反映出自身的市场需求和价值期待，价格信号一旦很好的传递到农业生产环节，便会促成农民调整种植结构——从传统的以种粮为生转移到高值农产品种植。

政府的帮扶工作是在农民无法自发完成转型下最实际、最自然的结果。一方面农村鲜有市场信息及资源，农民囿于关于市场的视野与知识的局限，实际中必然依赖于政府引导，政府的工作主要是推介市场中高价值的农产品；另一方面农业转型需要农业资金、技术等资本条件，大量半工半耕农民群体的非农收入有限，农村整体经济仍处中等偏低水平，不可能由农村内部实现资金的筹措与周转，政府的专项扶持资金正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最后，从财政体制改革中生发而来的项目制治理方式，真正推动了农业转型的发展，这个过程可以简化为生产立项——阶段项目——长远发展的模式。尤其是政府向农民对于长远发展的强调，规划的方式让项目可以持续增加运作，农业未来发展可以变得更为清晰。

农业转型的核心问题其实是农民如何组织起来完成转型。上文从小农经济理性、小规模生产的家庭种植模式和合作社带动的纵向一体化经营三个层次分析这一核心问题。小农经济理性使农民在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时恐惧风险、更偏向保守态度，所以农民在动员种植、土地流转和承包上困难重重。而只有在亲眼见到实惠后才愿意支持某项行动，也可以说是小农经济理性不算是一种高级经济理性的证明。（高值农产品的）家庭种植模式是在传统农业（家庭）精耕细作的历史方式上沿袭而来，但又具备“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黄宗智，2010）的现代特征，在现状人多地少的条件下发展适度规模，资本投入与技术应用下提高劳动生产率，依靠必要的精细手工劳作可以实现“小规模生产”的经济高收入与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双重利好效果。关于农产品的销售经营乃问题，农村专业合作社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结合了生产——加工——销售或者生产——观光——消费的纵向一体化经营能够大大促进农产品的市场消费，从而增加农民收益。产业化会是纵向一体化经营基础上更高阶段的发展形态，以合作社为核心带动农村产业发展，可能会成为农业产业化的一条可行之路。

## 参考文献：

- [1] A. 恰亚诺夫，1996，《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 [2] 陈阿江，2009，《次生焦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3] 黄宗智，2006，《中国农业面临的历史性契机》，《读书》，第10期。
- [4] 黄宗智，2010，《中国的新时代小农场及其纵向一体化：龙头企业还是合作组织？》，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5] 黄宗智，2012，《小农户与大商业资本的不平等交易——中国现代农业的特色》，《开放时代》，第3期。
- [6] 马尔科姆·沃特斯，2000，《现代社会学理论（第2版）》，杨善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 [7] 孟津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2006，《孟津县志 1986-2000》，北京：方志出版社。
- [8] 周飞舟，2012，《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 兼论“项目治国”》，《社会》，第1期。

☆ 作者简介：徐天宏，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刘 媛

# 甘愿的生成机制研究

## ——基于河南省新县跨国劳工研究

李 娜

---

**摘要：**全球化浪潮导致了劳动力的跨国流动，本文以河南省新县的跨国务工现象为研究实例，试图从底层视角出发去探寻导致劳工在外国企业能够甘愿服从的机制要素的形成过程，另外劳工的利益诉求在制造甘愿的过程中充当了内生动力机制，各方操纵劳工出国的组织机构则充当了外源诱导机制，内外机制的共同作用使甘愿逐渐生成。甘愿机制被制造之后，劳工在世界劳动力市场主要有三种行为回应：服从、容忍和弱者的退出。甘愿的生成过程也是在一步步证实劳工出卖廉价劳动力和资本霸权的胜利这一命题的真实性。

**关键词：**跨国劳工 甘愿 生成机制 资本 行为回应

---

### 一、导论

#### （一）研究背景

随着全球化第三次浪潮的袭来，继商品、资本之后劳动力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跨国流动，国家之间封闭的边界不再固守，而是试图通过卷入全球化的洪流进行一场利益角逐。根据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于 2006 年发布的一份有关世界移民趋势的报告：指出 20 世纪末开始，人类进入了横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移徙时代”之后的第二个“移徙时代”。在 1990 年全世界有约 1.5 亿移民，而 2005 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 1.91 亿人，是 1990 年的 1.27 倍，并且这个数量还在不断增长，当时全世界平均每 34 人里就有 1 个是移民。而目前发达国家经济虽在迅速发展，但是很多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因而为了避免陷入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困境，它们正在积极开发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以期通过一些途径吸引国外廉价劳动力来填补本国劳动力不足的缺口。

面对发达国家高收入的诱惑，号称“全球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也不愿意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搁浅，关注中国发展的当代与未来，背负着沉重的人力负担、受制于资源的不均衡分布、承受着区域发展的政策性桎梏，随着中国“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的劳动力已经开始跨越国家的边界向国外市场流动，中国的对外劳务输出也已经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中国通过大型国企外派的劳务总量依然停留在 2-3 万人；进入 90 年代以后则迅速增长，1992 年超过 10 万人；进入 21 世纪后超过 50 万人。当然在规范的移民政策及制度的保障下，劳务经济确实会对劳务人员、迁出国和迁入国带来益处，但目前不合法的移民操作以及不完善的劳务人员法律保障却促使劳动力市场跨国化的背后潜藏着一个巨大的外国资本对廉价劳动力逐渐蚕食鲸吞的阴谋，这个问题触及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

河南省新县作为全国优秀对外劳务合作行业基地县、河南省外派劳务基地县，已经先后向日本、

韩国、新加坡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外派劳务（研修）人员 1.8 万余人次，涉外劳务人员稳定在 2100 人左右，年均劳务收入 3 亿元。河南省新县的对外劳务输出事业已经初具规模，这与当地的县情及人口资源状况是分不开的，但在发展对外劳务输出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些正规和非正规对外劳务操作共有的“灰色空间”的存在都在一步步证实劳工出卖廉价劳动力和资本霸权的胜利这一命题的真实性。

## （二）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本文试图以河南省新县的对外劳务发展状况作为案例进行深入研究，试图以微观视角来分析全球化下的劳工进行着怎样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体验？再者，从底层视角出发去探寻导致劳工在外国企业能够甘愿服从的机制要素有哪些？劳工自身及其家庭、国内相关组织、国外雇主这些行动主体存在怎样的互动方式促进了资本对劳工掠夺廉价劳动力的贪婪趋势，而劳工却甘愿服从并且产生认同。此外本文对生产过程中甘愿的研究，并不代表抹杀工业生产中强制因素的存在，而只是在极力证明甘愿的成分在上升而强制的因素在下降，目前的甘愿现象较之专制主义生产模式下的强制现象更为突出，因此本文以甘愿为研究的视点。

本文是基于为期十多天的田野调查写成，主要采用深度访谈、参与观察和文献研究法，访谈的对象涉及劳务局工作人员、“社会黑中介”工作人员、外出务工归国者、打算外出务工者、务工家属、新县工会工作人员。通过和这些人员细节性的交流，探寻了被访者对外出务工的认知、行动以及评价，并且也从话语交流中洞察到一种弱势劳工群体的无奈与一种单依靠劳务经济而缺乏县域支柱产业支撑的一种不可持续之虚假繁荣的发展状况。在此期间，笔者也拍下了大量照片，可以对一些场景有直观且鲜活的了解。同时我们也深入到劳务局这一外派机构中，查阅到一些官方组织资料和信访记录档案。

## 二、文献回顾

### （一）国内研究

国内对于劳务移民的研究主要是以关系论的视角切入，并且忽视了对劳动现场和劳动过程的研究，李明欢《“相对失落”与“连锁效应”：关于当代温州地区出国移民潮的分析与思考》一文考察了温州移民移居西欧除了经济动因外，还有一些社会心态的作用，突出表现为因“相对失落”而烘托升温的崇欧慕侨的社会氛围，在此社会氛围中，早期温州赴欧移民作为移民网络的第一组环扣如何形成移民纽带发挥连锁拓展功能。王春光在《移民的行动抉择与网络依赖——对温州侨乡现象的社会学透视》一文中发现社会关系网络的路径依赖作用是通过行动者的交往和互动、影响交往和互动的价值取向或偏好（特别是对利益和社会地位的价值取向和偏好）发生的，并为后者服务的。具体到温州侨乡，社会关系网络的路径依赖是这样发生的：强社会网络发挥强作用，一般来说，出国都是在亲戚和朋友的帮助下进行的；其次，这样的帮助对帮助者来说，不仅是尽道德义务的行为，而且跟他们追求个人、家族和亲戚在侨乡的社会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关于劳动过程的研究中，郑广怀主要是探讨了国内非正式就业中的劳动控制问题，他延续了布洛维“赶工游戏”的思路，将非正式就业的制衣工人在不受保护的劳动状态中仍然努力工作的原因归

结为“老板游戏”的存在。游正林以劳资关系比较和谐的私有企业为研究场域，揭示出资方是如何对工人进行“软控制”，他们是如何在工人中制造认同，而且这种认同主要是基于资方对劳方所出台的一系列“善待措施”，如给员工提供宿舍、食堂、医务室等生活服务设施，并且加快了“以人为本”和“人性化管理”的步伐，而一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工人一方面对自己的工资报酬、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的要求不高，另一方面也不清楚自己有哪些合法权益，因而容易产生认同。

以往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综述以往的研究更多关注于跨国劳工族群性的一面，而忽视了对其跨国性深意的探讨、对劳动过程的进一步分析，和对外劳务派遣过程存在的诸多问题对作为弱势群体劳工的影响。而郑广怀和游正林主要关注了国内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甘愿”现象，因而将劳工问题的研究做了进一步推进。这样的推进工作一方面凸显了社会研究者对于工人阶级的底层关怀，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更好地反思跨国劳工的生存境遇及生产实践提供了指导。

## （二）国外研究

国外对于劳工的研究首先要追溯到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一著述，马克思对于劳工劳动过程的研究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存在的资方和劳方的压迫和宰制关系，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家是通过强制的手段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布雷弗曼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一书中对传统劳动过程理论作了进一步的推进与延伸，在他笔下，将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前后进行了时代对比，在前资本主义阶段，工人所具有的工匠传统促使工人可以凭借自身对于生产知识的全盘掌握而实现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但随着资本主义垄断时代的到来，泰勒制的科学管理和机械化等制度逐渐渗入到劳动体制中，因而工人对生产过程的知识逐渐被剥夺，自身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也逐渐淡化。布洛维对布雷弗曼的论述提出很大的质疑，他认为上述结论不能解释他在厂房里的实际经验，布洛维在刚进工厂时就发现，厂内的工人都非常卖力地在工作，心甘情愿地接受资本剥削，而作者自身后来也参与到了工人们“赶工游戏”中，而工人被资本剥削的“甘愿”机制是在内部劳动力市场、内部国家层面上得以实现，正是由于工人可以得到较好的经济待遇，工人的权益受到企业工会的保护以及发生劳资冲突时，集体谈判制度的良好运作，才使得劳资关系不再尖锐对立，工人对资本剥削的“甘愿”才成为可能。

对于劳动过程问题的关注一直是劳工社会学的核心议题，通过对国外相关文献和经验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马克思关注劳资双方由于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衡而具有的矛盾对立关系，进而导致劳动过程中资方对劳方的控制和剥削，他关注了劳动过程中存在的强制关系；而布雷弗曼详细考察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本身发生的变化，并且只关注工作的客观层面，忽视了工人的主体性；布洛维将工人的主体性带回了劳动过程，但仍然从一个阶级的范畴及制度的层面分析工人的甘愿性机制。所以，从马克思到布洛维的劳工研究始终深陷结构主义的漩涡，用劳动过程理论关照跨越国界的中国劳工，由于其遭遇两个国度所具有的制度和文化的双重夹击，因而跨国劳工的“甘愿”机制的生成具有国内外以及劳动过程内外的多重推动，既不能忽视各方力量对劳工在进入国外工厂前所进行的“甘愿”提前灌输，也不能淡化劳工在进入国外工厂后“甘愿”的继续推进，通过关注劳工阶级的具体体验以及他们在出



国务工过程中的命运和遭遇，从而更好地将中国在地的经验研究和西方的劳动过程理论展开对话，从而丰富和拓宽劳工研究。

### 三、田野点介绍

#### （一）区位状况

新县位于河南省东南部大别山腹地、鄂豫皖三省结合部，总面积 1612 平方公里，东西长 61.6 公里，南北宽 40.7 公里。辖 16 个乡镇（区）、205 个行政村（居委会），总人口 36 万，2010 年常住人口 27.5 万人。

新县是一个山区县，深山区面积占 66.2%，浅山区占 33.8%，人均山场面积 8.12 亩。而人均耕地只有 7 分。新县物产丰富，盛产林果、茶叶、中药材等，其中，板栗、银杏、茶叶、野生猕猴桃品质产量均居河南之冠，被国家林业局誉为全国名特优经济林“板栗之乡”、“银杏之乡”。该县也是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但也是全国闻名的对外劳务输出大县，平均每三十人中就有一人出过国。

#### （二）经济发展概况

新县产业基础薄弱，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该县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个别民营企业近年来有所发展，比如羚锐制药集团是该地的主要龙头产业，工业经济发展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所占的比重较小。

由于新县山地众多，耕地面积较少，因而农业的发展受到自然环境的限制，无法成为农民维持生计的重要产业。而且近几年来，大量的土地被炒热的房地产市场所收购，农民为了寻求致富的道路，纷纷外出打工，新县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和享有对外劳务合作经营权优势，积极进行劳务输出工作，劳务输出日益成为促进新县经济发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该县也成为全省涉外劳务输出第一县。

#### （三）劳务输出历史渊源

新县外派劳务事业是从 1984 年开始的，在外派劳务刚起步阶段，主要是通过引导该县建筑工人参加援外工程，因而工种较为单一，主要是从事建筑行业。新县劳务输出公司在 1984 年隶属县经济联合社，1992 年归属县人事劳动局。

县委县政府为了支持劳务输出，保持其持续健康发展，2002 年成立劳务局，也就是新县劳务对外合作管理局，主要职能是向国外派遣各类劳务（研修）人员，并负责全县涉外劳务市场的管理。新县劳务局下设吉星公司是全国唯一一家被国家商务部授予直接对外劳务培训资格的县级对外劳务公司，目前的劳务外派工作都由它负责。由此，在派出环节上实现了从间接外派到直接外派。

在接收国家上，最初只能向约旦、阿尔及利亚等发展中国家派出劳务人员，到如今可以向日本、韩国、新加坡发达国家进行外派。从事的工种方面也已经多样化了，但主要还是以低端和简单易操作的体力劳动为主。

### 四、劳工的内生机制：打洋工，被表达的希望和欲望

“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回家盖楼房，四年投资办工厂”，这几句话虽短小但却在该县人们的脑

海中勾勒出出国打工的美好图景，只要可以跨越国家的边界，进入国外劳动力市场，满足资本对稳定劳动力及劳动时间的基本要求，就可以打造出一种农民内心所企盼的生活前景。但出国务工的动力是多重复杂因素相叠合的，本节主要是透视务工者选择出国背后的心路历程，这也构成了中国劳工甘愿生成的内生动力机制。

### （一）一切为了生存

村庄里的人们将“出国务工”作为有限选择下的上策，主要的动力来源是生存所需。在传统的农业社会，能够安身立命的首要前提是要有一方利于耕种和繁衍的土地，大别山山区的村庄或沿着山坡、或就着山窝排列，周围山地纵横，只为农民让出有限的生活空间，因而田地的面积也很小，在万般无奈之下，人们走上了“打工”的艰辛道路。

再加上国内劳动力市场人员富余，靠出卖体力做活而没有技能在身的底层农民可选择的空间又遭受了极大的挤压，因而他们从国内走向了国外，村庄的土地和国内的城市装不下他们的希望和欲望，经济诉求是他们考虑的首要因素。

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家庭条件一般的人没有资格过早的享受生活，我们家条件也就这样，我只能先牺牲一些东西，来为以后做铺垫.....（张\*，2015/8/7）

我以前是自己做生意，一个月能挣1-2万，就没想过出国。但是这两年生意不好做，压力很大.....我真的是上有老，下有小，父母两个人年纪大了，时不时要看病吃药，孩子还要吃奶粉，我没收入的话家里就维持不下去了。不能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不过这种事在我们这里，不是很常见嘛！为了生存下去，大人花更多的时间在外打拼，也是为了他。（钟\*，2015/8/7）

新县作为贫困县，人们的生活一直在较低的水平徘徊，但这里又缺乏一些可吸纳冗余劳动力的工厂。迫于家庭生计的考虑，务工人员前往国外打拼，留下了不完整的家庭，从而导致子女的人生历程缺少父母的参与，老人的晚年生活没有子女的陪伴。由此，生存至上、生活至下的逻辑得到了完整的呈现。

### （二）从农村走出来

在农民的叙述话语中，他们渴望通过出国务工挣来的钱财在城市买房子定居，试图挣脱和逃离农村。从农村进入城市定居，一方面可以改变自己的身份，实现自己阶层跃升的梦想，而另一方面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境况。在看到周围众多人都通过出国挣了钱走出了穷乡、定居在了城市，在他们遭遇其他上升流动渠道受阻的情况下，出国务工就成为他们能动争取更体面生活的一个尝试。

你不知道我在农村过的什么日子，那时候我们家穷啊，村里人看不起我们，天天阴阳怪气得骂我们，连门里面的（即一个姓氏的大家族）人都想办法整我们.....那时候也过的邋遢，养了十几头猪，多的时候都有几十头，家里天天不是猪屎就是猪尿.....后来好啦，我女儿出国回来，再加上我跟你小爷（即夫妻俩）在北京打工十多年攒的钱，2008年的时候我们家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跟你讲，我现在过的才叫日子啊，看不见那些人的嘴脸我终于舒服了.....现在偶尔回村，我也扬眉吐气了，觉得自己翻身了，终于堵住了那些人的嘴。

嗯嗯，是的，现在总算好了。

哎，我跟你讲，虽然这么多年我们在外面打工很辛苦，我女儿在国外打工也吃了很多苦，但是我不后悔，要是一辈子都在农村种田种地，我现在根本不可能住在县城了，我一辈子都翻不了身了……

（杨\*，2015/8/8）

通过出国务工可以实现农民由农村走向城市的愿望，除了获得一种生活优越感之外，他们因而也争得了面子，改变了以前被人看不起，进而欺负的失落感和挫败感，在和同村居民比较时，他们也因出国务工致富而提升了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城市的新房子更是他们在国外辛勤努力而取得的一个可供炫耀的资本，从意义层面来看，他们因取得“成就”而获得了周围人的肯定，现在受访者家人也一直渴望再次出国，出国使他们实现了命运的大转变，出国务工的意义不仅在于实现生存境遇的转变，更在于一种身份的转变和阶层地位的提升。

### （三）父母理想的代际转移

新县的出国务工这股风气已经扩散到每个人的心中，人们都希望借助出国实现自己的“淘金梦”，然而出国这件事仍然存在一定的门槛性限制，并非任何人都能够轻易获得准入。韩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劳务人员的年龄是存在一些要求的，韩国一般 18-30 周岁，日本 18-35 周岁，老一代因此受到年龄的结构性制约，因而将自己未能实现的理想押在子女身上，并为孩子创造一切条件为实现出国务工而助力。年轻的一代大多是从专科学校毕业，他们在学校本身学到一些技能，认为去国外的“淘金梦”不仅可以实现父母的心愿，还可以为自己的前途奠定基础。

问：作为女孩子，你选择出国有什么样的原因考虑？

答：出国这件事主要是我妈的想法，我妈就说现在大学毕业也不好找工作在国内，而且工作条件也一般，特别辛苦，出去工作三年可以挣一些钱，这样以后说不定可以买套房，或者车什么的，或者开个店，我现在也没有结婚，这样出国回来后正好也到了结婚的年龄，自己有了积蓄也可以不完全依赖男方的经济收入，成家后的家庭负担可以减轻不小。反正我现在正年轻，更应该出去闯荡一下，这对自己也是一个锻炼的机会。我妈是老了，想出去也没能耐了，所以老一辈的心愿我也是想试着完成。

（王\*，2015/8/7）

对农民而言，从国内的村庄走向国外的工厂，不仅意味着可以实现由农民到工人身份的转变，而且出国务工的前途又被那些膨胀的希望和欲望拉得无比宽广。农村劳动力严重剩余，有向国外劳动力市场出让的需求，工业资本对于廉价劳动力的渴望，使农村劳动力找到了可以获得生存和生活的出路，村庄里的出国务工时代就此而拉开帷幕。

## 五、中国式的外源机制：各方力量运作的“出国术”

出国务工之梦被寄予了农民众多的希望和欲望，为了使其尽快圆梦，本节进一步探讨务工人员及其家庭、劳务局、社会中介机构的出国务工策略和操作过程。出国务工正是由于各方力量的助势如雪球一样翻滚，越搞越大，污浊的一些杂质连同洁净都肆意卷入，“出国术”的运作过程也是对劳工在进入世界工厂之前，将甘愿机制提前制造的过程，从而使劳工能够顺利“打上洋工”、“做好洋活”。

### （一）关系资源的动用

在村庄里，家庭纽带所搭建的亲情民间网络是农民在遇到重大事情时首要可以依靠的资源。该县作为贫困县，许多村民家庭条件状况较为贫穷，出国之前所要缴纳的大量费用对于许多家庭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经济包袱。因此，一些家庭想尽办法去向周围的亲戚朋友借钱来支付这笔为数不小的出国开支，亲朋好友基于血脉的联系都愿意提供资金帮助，务工人员出国之前便是夹杂着还债和还人情的双重压力去国外打工。在出国前除了亲友可以筹措出国费用外，当然一些已经在国外务工的亲友还可以帮忙在国外找工作。因此出国务工已不止是一个人的事情，各种人情关系网络都参与到这一过程中。

出国所花的钱由父母垫付，以后用自己的工资偿还（不用给利息）（孔\*，2015/8/9）

我们村有一个人已经在美国待好几年了，是他给胡光稳牵的线，说来美国很好挣钱.....办签证找的不是中介，直接找的是一个有门道的人，那个人就是我们村的那个谁推荐的，说他很靠谱，当初他出国就是那个人办好的.....既然这么一说，就证明他有能力把人送到美国嘛，然后我们就相信他，就把事情交给他办了。（胡\*，2015/8/9）

### （二）三位一体的外派机构

新县劳务局的主要职能是负责全县涉外劳务市场的管理。然而在对该县劳务局的实际走访中，俨然可以发现劳务局的门外挂着好几个牌子“新县对外劳务合作管理局”、“新县外派劳务培训中心”、“吉星公司”。新县劳务局的前身是县劳务输出公司。新县对外劳务合作管理局下设办公室、培训中心、财务股、综合股、日本业务股、韩国业务股、涉外劳务管理股、后期管理股、法制教育股、创业指导股和机关事务股等 11 个股室。

河南吉星公司（以下简称“吉星公司”）是劳务局的下属企业，成立于 1984 年。1999 年，经原外经贸部批准获得外派劳务培训资质和外派劳务经营资质，吉星公司现下辖县外派劳务培训中心（现发展为涉外职业技术学院）、驻日本名古屋和驻韩国首尔两个国外事务所，是一家从事涉外劳务培训、派遣、管理的国内外知名的对外劳务合作公司。

前党支部书记、劳务局局长同时兼任吉星公司董事长李太福，享受副县级待遇，官方话语中的吉星公司受劳务局监管，但又是劳务局的下属企业，在实际业务中与劳务局联系很密切，与劳务局形同一体。所以新县劳务局、吉星公司、涉外职业技术学院三者的关系很微妙，在老百姓的叙事话语中一般都是认为走正规渠道都是由劳务局外派，而官方解释是“劳务局是政府管理机构，不存在派人。我们劳务局是官方机构，通过劳务局接管派出去的人都是安全、收入各方面有保障的人，信任度比较高。所以人们传统思维上还是会选择通过劳务局出国。劳务局是管理劳务市场出国的机构，实际上是从吉星公司派出去的。劳务局对所有的派出机构都要管，是河南省县级唯一有外派资格的机构。”工作人员的解释漏洞百出，一方面强调只管理，但又说劳务局也可以外派。

工作人员在向我们介绍业务情况时谈到，报名部门是在吉星公司，而劳务局专设一个服务平台，服务平台专门是为出国人员提供信息登记的地方，先去劳务局局服务平台登记，然后国外企业从服务

平台挑选合格的劳务人员。那么，劳务局会采用怎样的方式把务工者打造成适合国外企业要求的合格工人呢？

### 1. 意识形态的规训

进入劳务局报名并交过一切出国费用之后，就要进行出国前的培训。出国前的培训工作分为行为、语言、技能和体能培训，培训学校的老师通过对外国文化、规章制度、安全教育等内容的讲解，让学生首先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使他们在正式进入工厂后能够很好的适应。

涉外职业学院经常向学生介绍一些务工人员在国外致富的成功案例，这些事迹在大家心中燃起“发洋财”的热火，这些务工人员短短几年就可以挣一大笔钱，回国之后就可以过上富人的日子，有的劳务人员还利用买房子剩下的钱开店。涉外职业技术学院经常让学生写一些在国外的实习感想，大都是给人们塑造一种美好的职业发展前景，从而吸引不少人们想要去国外打工。当然，除了积极向外界及学生打造国外打工的美好景象，同时他们也对一些负面报道进行了把控，绝口否认有劳务人员在国外遭受了不公的对待或者任何相关的侵权事件的发生。极度美化出国打工这件事，让更多的人认为出国打工可以改变命运。

经历成功学的洗脑之后，他们还会对劳务人员进行“多劳多得”意识形态的灌输：“中国不是讲究按劳报酬吗？你们要想赚得票子，就要多干活，不然之前花大价钱出国不都白费了，时间就是金钱，一定要抓紧每分每秒好好干活，我们县的人能干、听话、不闹事的品牌一定要在国外树立起来。”有位匿名人士还透露：一些老师在对他们进行唤起奴性的意识训导，这位老师告诫他们“要做钱的奴隶，就要做外国人的奴隶”，也告诉学生“日本人小气、抠门是因为日本人办事过于认真，遇事经常要站在老板的立场上换位思考，一定要听话不闹事，时刻要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周围的人和事。”

“嗯，也有老师讲日本当地的法律法规，但其实讲太多我们也记不住，我们只要记住不惹事不闹事就行了”（张\*，2015/8/6）

在不断宣扬的生财的门路面前，想要出国的人们被外界不断地强化一种“劳动观念”、“服从观念”、“听话观念”。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提前训导使劳工在潜移默化中丧失了为自己争取权益的反抗本能，只能做一只温顺的羔羊，为该公司的劳务事业发展打造品牌，然后投身于流水线上消耗体力，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贡献劳动价值，自己当然也可以获得相较国内较高的收入而甘愿承受。

### 2. 提前预警性的惩罚制度

在劳务人员出国之前，要和外派机构签一份合同，这份合同规定了劳务人员在外居留的时间、不能中途回国、或者规定年限不回国而滞留国外有何后果。为了提高劳务人员的履约率，能够使他们踏踏实实在一个雇主那里干活，不在国外随意跳槽，劳务机构要求劳务人员提供一些担保，具体包括现金担保、行政担保、亲属担保、房产担保。这些名目繁多的担保制度就是为了防止劳工的一切不听话举动而设置的具有提前预警性的惩罚制度，一旦劳工在国外不守规矩就会失去出国前所缴纳的现金担保，行政担保人员也会遭受到丢失稳定工作的危险，家属也会有连带责任，房产证也会被扣留。

这样一种提前被警示的惩罚制度的存在使劳务人员感受到一种制度的威慑力，进而顺理成章地揭

示出劳务人员在世界工厂里规矩听话“守法逻辑”的万般无奈。当然这种“守法逻辑”已经遭受到了质疑，为适应业务发展需要，进一步规范对外劳务合作业务的经营秩序，切实减轻外派劳务人员的经济负担，经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商务部决定取消企业向外派劳务人员收取履约保证金的规定，改为由外派劳务人员投保“履约保证保险”。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称对外经济合作企业（以下简称企业）指经商务部核准取得对外经济合作经营资格企业。

二、自本通知生效之日起，企业不得再向外派劳务人员收取履约保证金，也不得由此向外派劳务人员加收管理费及其他费用或要求外派劳务人员提供其他任何形式的担保、抵押。

三、为了化解经营风险，规范外派劳务人员履行双方之间签订的外派劳务合同或协议（以下简称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义务，企业可要求外派劳务人员投保“履约保证保险”<sup>[1]</sup>。

法律已经将担保制度废除，但为了保证工人的“守法逻辑”仍然发挥作用，现实中这种担保制度仍在偷偷运作，从而使外派机构既能够掌控劳务人员的行动，又能够换取更高的利润空间以及赢得与外国资本合作的机会。

问：现在还需要这么多担保吗？

答：现在还一样。现在行政担保还有，房产担保没有，他让你弄钱担保。他让你押三万块钱，不押钱不让你走。回国之后可以退，但退很麻烦，跟他要钱的时候，拖一天又一天。他三万块钱给你存在银行里，拖一个月他吃一个月利息。亲属担保是直系亲属，必须有两个人，就是防止你出去闹事，也不能违法，也不准随意跳槽。行政担保要求是国家公务员。（兰\*\*，2015/8/10）

### （三）地上工作的黑中介

新县的劳务经济现在已经发展得热火朝天，一些不法分子也开始将自己的脏手一步步伸向劳务外派的大蛋糕，但这些不具有合法外派资质甚至是没有经过工商登记注册的社会黑中介居然明目张胆地在街面上大挂广告牌，走访了几家中介所之后，发现了他们外派的服务链是怎样一步步做到深入人心，并且这样的操作又是如何在务工人员的甘愿机制上产生作用。

#### 1. 高费用的压力

众多黑中介都是以具有工商部门的营业许可证为名来欺骗广大劳务人员，只要有人质疑其外派的合法性时，他们都以具有营业许可证作为可以外派劳务的合理依据。许多劳务人员选择黑中介，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便利条件：第一，一般是通过“滚雪球”的方式才选择这一途径；第二，通过具有外派资格的劳务局办完出国手续所要耗费时间太长，因为通过黑中介可以根据个人意愿选择是否花费时间进行培训，所以大部分人认为时间就是金钱，节省培训的时间直接到出国。“这家劳务中介是我哥推荐过来的，他之前出国就是通过这家中介，感觉还可以。而且相比劳务局的话，很快就能送我出去。劳务局的话，把你送出国等的时间太久，因为正规的必须要参加培训，他们那里培训时间挺长的。”

（何\*，2015/8/11）第三，黑中介可以为劳务人员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他们一般都有挂靠机构，往国外偷偷外派劳务人员的门路已经打通，而且能够提供一条龙服务，为了帮助劳务人员更好的获得

<sup>[1]</sup> 网站报道，2014，《关于取消对外经济合作企业向外派劳务人员收取履约保证金的通知》（<http://www.cfen.com.cn/>）。

签证，一般是以旅游、留学的名义帮助其出国；另外，黑中介可以根据外方雇主的实际要求为他们量身定制一套假材料，方便劳务人员成功被雇佣和入境，还可以帮助劳务人员贷款。

以上便是人们选择黑中介的原因所在，但是以上种种的便利诸如省事省时而又能够充分照顾百姓意愿的操作机制是以高昂的中介收费来换取的。“我们出国一套基本的流程走下来，从帮你做材料到帮你弄签证，再到送你出国，需要8万。但是你办留学，我们还要跟国外的大学协商下，给你发录取通知书吧，然后你得交点学费吧，所以就比常规的多了1万。”（\*\*信息咨询服务中心，2015/8/12）出国之前的高额投资，让许多劳务人员都倾尽了家庭的财力，因此他们要有“咬着牙挣钱”的决心，国外的生活再艰辛，也要坚持下去，一定要通过劳动将成本收回，并且还要获得富余。

## 2. 非法身份的限制

黑中介的存在，仅仅可以帮劳工顺利踏进国外的领土，甚至有的劳务人员都需要自己去华人街找工作。通过黑中介出国，劳务人员并不能获得合法的居留资格，因此随时都有被遣返出境的风险，但只要不被本地人举报并且能好好在雇主手里工作，他们也可以待上几年，所以劳务人员都是抱着侥幸心理过着每一天。黑中介运作下的劳工在国外的工作和生活没有制度性的保障，只有忍受眼下的各种不利处境才能避免被遣返。“要是非正规的那这个我就管不了你了，我只负责把你送出去，你回来的事儿我还要管啊？要是正规的，那我必须要管你.....选择哪种方式，是你自己的意思，肯定是风险高但是收益也高.....但是说实话，你在外面要是不犯错误、不偷东西、不打架闹事，就不会有人查你的，你在外面干几年工作，回来买车买房多好。”（中介A，2015/8/12）

“怎么会出问题呢，你只要不打架不偷东西，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大家出去都是为了挣钱的，都本分的很。这个.....我们只收你那么点钱，你不能让我管你一辈子啊。我们只负责把你送出去，国外的事情你要自己多操心。”（中介B，2015/8/12）

问：那能换工作吗？

答：你要是干的好好的，干嘛自找麻烦呢？安安稳稳在一个地方把活儿干好，越来越熟练之后，工资就会越来越高。你不用担心，只要你在国外老老实实干满一年，那这个钱我是全额退给你的。

问：那要是我在国外被遣返了，退钱吗？

答：这个不退，我们收钱就是把你送出国，帮你找到一份活儿做。能不能做好，那得靠自己。（中介C，2015/8/12）

不能提供任何权益保障的黑中介，为了降低送出人员被遣返的风险，在出国前都会告诫劳务人员只有好好干、在一个地方安下心来、要本份老实，才能够挣到钱，从而使出国之前的投资终有所值。缺失一些制度保障的劳工只能选择甘愿机制，服从和劳动观念由于其货币化劳动目标的追求更加强化，众多非法劳工在国外工厂工作，尽管他们可能拥有一定的技术水平，但是非法劳工的身份时刻会提醒他们一定要抓住一切机会尽力挣钱，他们不会像那些合法劳工那样可以在工资、劳动强度等方面做出一定的选择，或用技术去讨价还价，他们时常因为不具合法性的身份而处在被驱逐出境的忧虑和恐惧中，这种身份的脆弱性不仅使国外工厂可以低成本雇佣中国工人，而且也成就了国外雇主对工人劳动

过程中的控制，并且再加上一些因素的杂揉使工人能够心甘情愿地认同国外雇主的控制手段。

## 六、跨国下的外源机制：别样的生产管理

跨国劳工在经历了一番中国式的资本规训工程而将“甘愿”精神的精髓提前注入之后，他们便带着一种内化了的劳动天职观的资本主义精神进入国外工厂，发达国家工厂的管理者采用了一系列“善待措施”逐渐培植远道而来的中国劳工对于企业的信任，这些协调劳资关系的制度化手段是中国劳工产生“甘愿”的结构根源，本节重点从薪酬制度、内部劳动力市场和企业社会责任运动规则的遵循来探究外国企业如何使中国劳工产生甘愿，进而为资本积累效力。

### （一）赶工游戏下的薪酬制度

中国劳工进入外国工作场所前，根据工作环境的不同，首先会产生两种极为显见的分化即进入大型工厂或者进入私人小部门，大型工厂一般会采用“计件工资制”，根据工人在工作时间内完成的劳动量来获得相应的报酬，因而催生的是一种“多劳多得”的薪酬激励制度；在一些小型私人企业一般会采用“计时工资制”，上班不是按工作日计算工资，而是以工作时数为标准，上一个小时就记一个小时的工资，并且上班时间越长工资越多。以上两种薪酬制度促使劳工们都被卷入到布洛维所提出的“赶工游戏”中，他们只能马不停蹄地卖力赶工。

赶工游戏导致中国劳工陷入到疯狂的加班热潮中，在他们的具体工作体验下，发达国家劳动环境除了可以给他们固定的基本工资之外，不断加班的超时工作将会使他们的工资额外提升的空间更为诱人，因为薪酬和产量、工作时数直接挂钩。在韩国一位劳工谈到，他们的加班工资是平时基本工资的1.5倍，如果是过年等节假日，工人们上一天班就可以抵上三天班的工资，除了支付工人正常工资额度的1.5倍，然后还要翻三倍，实际上就是基本工资的4.5倍，这些是由当地的劳动法明确规定的，在他们那里，标准的工作时间是一天8个小时，一周40个小时，周一到周五是正常工作日，再加班的话，就是原本按小时结算工资的1.5倍，正是采用了加班与薪酬挂钩的制度，使得工人激发了赶工和加班的斗志和劲头。

### （二）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

在布洛维的甘愿机制当中，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具体有两个层面的指涉，首先是工厂内部具有在岗培训这一制度性设置，工厂内部可以给工人提供工作流动机会，避免工人的跨工厂流动；其次，工厂内部能够良好地解决工人的实际需求比如提供较好的工种、工资以外的补贴、工作保险和社会地位等，正是由于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中，极大地协调了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

在跨国劳工工作的就业环境中，也能看到一种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构建。首先，以进入日本工厂及私人小企业的劳工们为例，他们都有健康保险、厚生年金（相当于医疗保险）、伤害保险等保障机制，这些保险是企业必须给工人们按时交付的。中国劳工如果在国外患病，一般情况下都是工人们所在的组合和会社帮助出钱看病，极个别有时自己去看病的话，可以使用健康保险报销医疗费，其中国家负担90%以上，自己负担的很少，这使得许多中国劳工不禁感叹国外人权保障确实落实的让他们很满意，



国内都是支付完医疗费之后才能报销。

其次，国外企业使一些中国劳工获得一种地位平等感，这一方面体现在他们与雇主的相处中，另一方面也是因其能够获得同等晋升流动的可能性空间。在韩国工作了两年多的劳工介绍说他们可以和老板在一个饭桌上吃饭，老板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餐厅一般供应七菜一汤，每个月老板还会带到大饭店改善伙食，这种同吃同劳动的经历缩小了劳工与雇主的心理距离，从而能够协调劳资关系。其次，由于一些劳工具有较高的技能水平，他们凭借自己的能力在厂内也可以享受同等的向上流动机会，有一位劳工在工作两年之后就做到了车间主任，管理着异国工人，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劳工在异域环境下的社会地位。

### （三）企业社会责任运动规则的遵循

很多中国劳工都是在经历了两种不同制度下的劳动环境而选择去国外打工，他们一方面抱怨国内就业环境不如意，不能充分保障工人权益，挣得的收入有限，食宿条件较差，当进入发达国家的工厂时，不一样的经济文化氛围带给他们极大的优越感。首先是良好的宿舍条件，一间屋子住3个人，宿舍里面冰箱、洗衣机、空调等电器一应俱全，这使他们对生活条件较为满足，当住宿地点距离工厂较远的时候，雇主一般会为员工配备自行车，方便他们的生活，以便使劳工能更好地投入精力工作；其次，一些日本会社的社长会带中国劳工在国内有名景点去旅游，通过工作之余休闲活动的一起参与极大地使劳工能够很快与雇主建立起良好的朋友关系，进而削减工作场合中劳资关系的紧张对立局面。

经济全球化，使市场经济这个以资本为灵魂和核心的市场运作机制，成为全球性的选择，而如今要介入这一市场，就必须遵守一种新的游戏规则，那就是企业要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也开始在资本主义国家所兴起，这场运动的主要宗旨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的责任除了为股东追求利润之外，也应该考虑相关利益人，即影响和受影响于企业行为的各方利益，其中雇员利益是企业社会责任中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内容。这一运动的推行，与一些跨国公司等大企业只瞄准赚钱的经济行为直接相关，因而国外严格的体制环境导致跨国劳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得到一种不一样的工作体验，但也不能掩盖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剥夺，只是劳工将参照的基点立足于国内的生产过程及就业环境，才使得国外雇主对其的一系列“软”控制变得不再显而易见，而是被国外结构性的制度环境所遮蔽，中国劳工相较之前在国内的工作体验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下降，一种相对优越感反倒成为他们甘愿赶工和服从的精神支柱。

## 七、对资本虚伪圈套的回应

中国劳工在由国内走向国外的过程中，不仅有自己的内生动力机制诸如高收入的利益诉求、阶层身份的跨越、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以国内为参照而生发的相对优越感；而且捆绑在共同利益链条上的国内中介机构和外国企业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完成对中国劳工“甘愿”的制造，当中国劳工进入生产过程后，也在一步步将“甘愿”进行到底，即使在同一个车间下，将参照系的基点由国内转向国外的外国工人，不一样的工资待遇促使他们相对优越感的下移，相对剥夺感的上升，但他们仍旧能够容忍一切不公而非抗争，只有个别人在涉及生命安全时，才将甘愿打破，因此，在一般情况下，甘愿机制是

持续生效的。

### （一）服从：泰勒制下的工人

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工厂，流水线的作业方式将泰勒制和福特制所主张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得到了极致的发挥。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工人们只需要按照规定的要求和操作步骤将产品进行简单处理，不包含任何较高的技能要求，工人们只需在被安排好的某个特定位置，不断地随着生产线的流动而执行几个简单重复的动作。这些繁重而乏味的工作过程已经使一些劳工深刻感受到自己在劳动中的异化，他们只是资本主义生产链条上的一颗颗螺丝。一位于 2006 年去往日本的张女士介绍了自己在工厂里的工作情况，她在山勇株式会社工作，那是一个水产公司，她被安排对螃蟹进行分类包装。对于这样的简单工作要求倒不高，也没有技术含量，张女士之前没接触过这种工作，但不久就学会了，只需要多重重复几遍而已。对于这样的简单机械的劳动，劳动力就很容易被替代，因此出国打工的劳务人员害怕被解雇，都在很努力的完成劳动。

张女士说刚开始的时候比较生疏，到最后操作速度特别快，比方说装蟹棒，有的是装箱有的是装袋，装袋的话她一次能抓四个，先看正面装的数量是否符合要求，因为有的一袋要装 4 个、有的 8 个、有的 10 个，然后再翻过来看反面的产品信息对不对。装箱的话也是这样，但要保证正确。装好之后，一般一箱蟹棒 10 斤重，还要把他们送到冻库。

刚开始由于操作不熟练，张女士在流水线的工作中犯了个错误。工作要求每箱装的螃蟹数量都要一样多，但他们是流水线操作，从分拆到包装到装箱，数量都是算好的，一个环节出错就要重来。在刚开始的时候，张女士有两次装箱时装错了，装多了一个或少了一个，那这就需要自己补救。补救的办法是要挤占自己的休息时间去完成劳动，她把箱子一个个打开再检查，直到每一个箱子里产品数量都正确才可以，这样一种为错误买单的“无偿加班”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大生产已经将鲜活的生命当成了一具冰冷的机器。

当她们把货物包装好后，得把东西送到冻库，一般一天跑十几趟，但是一趟待的比较短，也就一两分钟。但张女士透露：里面真的特别冷，穿的衣服根本不顶冷，每次从里面出来，她的眼睫毛上都是一层冰霜，身上有多冷就更不用说了。工作三年之后，她腿部的关节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流水线上的劳工完全受制于泰勒制工业生产模式的要求，多数劳工甚至以牺牲身体健康来满足资本对于利润的追逐，孔先生讲述自己在韩国做渔工的艰难岁月：打渔期间最辛苦的是寒冬腊月的时候，海面结冰，海风凌厉，拉渔网的手即使戴着三四层手套还是被磨得生疼。中国劳工普遍表现出一种甘愿，放弃自己的利益表达，接受资本主义企业对劳动的榨取。

### （二）容忍：不公平的待遇

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人认为加班是对休息和自由权利的无情剥夺，但在世界工厂里工作的劳工却不约而同都有希望加班的强烈诉求。多数国外企业普遍采用计件制工资制，从而在劳工心中催生一种“多劳多得”的激励机制。面对超额的劳动时间，劳工不仅不会抱怨，反而主动请求留下加班。汪女士谈到自己每天要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十二点，有时还通宵加班。她们是从事缝纫工作的，在工

厂里就想多做几件衣裳，晚上保安要关门了，他们还和保安说好话，让她们多留几个小时。

对于这般拼命工作的中国劳工们却并没有享受到与其他劳工同等的待遇，“那肯定不一样呐，约旦人工作时间短，一天就8个小时，工钱我不清楚。我没有文化，在外面也问人家这些，就是听说他们的工资比我们划算，应该要高点……孟加拉人的工资也比我们高些，这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因为他们好厉害的，我刚去没多久，有一次他们就带头闹罢工，嫌工资低了不愿意干……中国工人不愿意罢工，就想去干活，特别是工期快到的人想顺顺利利地结工钱，不愿惹事，但是我们去干活，孟加拉人就过来打……嗯，是的，他们闹罢工也不要别人干活。所以说孟加拉人齐心，他们想加班就都加班，不想加班就都不加班。那中国工人过的最辛苦了。他们干活也是干最轻便的活儿，像剪线头、缝边儿这种小活儿，我们中国人就干最重的活儿，不管是裁料子还是做衣服、扛布，这些大活都是我们干。”

在约旦工厂里，中国劳工的工作时间最长，工作强度最大，所获得收入却是最少。这样一种不公平的工作待遇仍然不能激发劳工们维护利益诉求的集体性行动，即使身边有争取权益的集体行动发生，中国劳工也是不愿参与的，因为罢工的行为方式，虽然能够向企业管理者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但这种方式不可避免会使工资收入受到影响，再加上，中国农民工群体具有个体行动话、利益碎片化的特征，更强调对工资等经济利益的诉求（李静君，2007）。因而甘愿机制才得以使劳工能够接受和顺从，而不是做出抗争，所有的不合理都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我们到国外花了很多钱，明确知道自己就是去出卖劳动力的，出国之前给我们培训的人就说“能忍的就忍，老板满意我们才过的顺利”。你看新县现在每年出去那么多人，主要就是我们不仅效率高而且便宜，更重要的是我们讲规矩、不惹事，所以比较好用。出去的人都是想挣钱的，不是想去搞矛盾的，所以不是很大很大的困难，我们不会挑起事端，只求顺利度过工期拿到钱。（张\*，2015/8/6）

### （三）弱者的退出：人身安全的危机

在许多劳工看来，他们可以忍受工作的“枯燥”、“无聊”、“没有意义”，甚至可以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而超负荷工作。但夏女士却在合同未到期的时候，突然选择放弃在日本打工，她说“挣钱虽然重要，但是人身安全肯定更重要”。她向我们倾诉了在国外的不幸遭遇：她于2013年5月去往日本，合同规定是在日期间要工作三年，她只工作了两年半，选择了提前回国，一切都是由于换房子所导致不愉快的经历。她们之前住的房子是二层独栋的小楼房，就像小别墅似的，3个女工住一个房间，房子里空调冰箱一应俱全，条件比国内的家里还好。但是第三年雇主让她们换房子，换到那种很低矮的木制小房子，那种房子大门都不能上锁，只有一个铁扣，特别不安全。而且这种房子都是落地窗的，在外面的人能清楚地看见里面的人在干什么，她们年轻女孩儿感觉很没用安全感。这个事儿虽然没发生在她身上啊，但是她的工友经历了，这让她对以后的生活也充满了不安和恐惧。有一天晚上，在女工睡觉的时候，有日本男人冲进房间里欺负她的工友，而那位日本男人事后也没有受到处罚。

由于夏女士未能按照合同约定而提前回国，把她外派日本的劳务局以她提前回国判定为违约，夏女士回国后去劳务局找相关工作人员理论，想让他们把夏女士在出国前交的这半年的中介服务费退还，

然后把当时作担保的钱也拿回，但劳务局以将她顺利送到国外为名，而想办法推脱，孔女士出国前向劳务局共交了五万元人民币，但劳务局未能履行其职责，孔女士受雇的工作单位连她的安全都无法保证，导致孔女士忍无可忍，被逼回国内。由于对于出国务工制度的不健全和各方机构自身逐利的要求，导致劳工在国外务工期间，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许多回国人员基于自身在国外的务工经历，事后大骂劳务局是个汉奸机构，把中国人送到国外去干最脏最累的活，然后他们从中间抽成拿好处。

在资本的生产逻辑下，许多劳工内心并不愿意为资本服务，不想过国外一种“叫花子的生活”，不想继续被当做机器。但他们已然被提前灌输了甘愿机制，因为在国外工作可以带来相较国内较高的物质报酬或其他回报，从而使他们产生“服从”、“容忍”的整体认知和行动，而不会选择高风险的“罢工”、“抗争”。仅仅在生命安全得不到保证的条件下，迫不得已才会选择退出，退出行为的背后更是将一种资本的合谋状态揭露出来，

## 八、结论

中国农民工与世界工厂的相遇，是各方行动主体基于自身利益的追逐而必然创造的结果。在资本所编织的利益空间下，我们需要以怎样的心态梳理发展思路呢？“打洋工，发洋财”这一让人感到诱惑的口号背后被寄予了无数处于欠发达地区农民的希望和欲望，这些希望和欲望是一种利益的诉求。

随着这一生财的门路被逐渐挖掘，许多正规和非正规的劳务中介机构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操作劳工出国。但由于我国出境就业法律的不健全和政策性机会存在的不合理姑息，就是在不健全处和姑息处，这些机构找到了追逐利润的空间，他们以各种方式来使劳工服从于外国雇主，试图从意识形态、制度层面、施加压力等层面来制造一种劳工的甘愿机制，这种甘愿服从而不抵抗的机制是在出国前就被提前制造出来。

当中国劳工怀揣梦想来到国外工厂后，外国雇主从薪酬制度、内部劳动力市场和企业社会责任运动规则的遵循这些制度化手段将甘愿继续制造，因而在遭遇国内外多方行动主体的甘愿制造之后，劳工在世界劳动力市场主要有三种行为回应：服从、容忍和退出。退出只是极少数的选择，大样本的案例证实甘愿机制在国外生产过程中的发挥是有效的。当劳工进入工厂后，他们面对泰勒制的管理方式，只能服从流水线的转动，接受劳动的异化，将自己转变为资本主义大生产模式下的一具冰冷的机器。基于生存的需求，他们渴望通过超额透支劳动时间进行加班，但多劳多得的逻辑并没有被公平的实现，虽然内心认识到一种不公的待遇，但在甘愿机制的作用下，他们失去了集体行动的觉知。直到自身安全面临逼进的危险之后他们不得已才选择了退出。

审视中国新县对外劳务经济这一发展模式，我们更需以一种全局观念和国家观念来思考这一发展形态，挤入全球化的经济浪潮，分享资本的跨国流动，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资本不断积累的背后是对廉价劳动力的榨取，在我国跨国劳工的保障制度不健全和法律制度不完善的条件下，我们的行为就会在短视和利益的驱动下变得愚蠢。农民的口袋确实殷实了许多，房地产市场也浪潮高涨，但要想使这种发展模式开展的更为稳健，还需要在制度和政策上赋予农民工更多权益和保障。

## 参考文献：

- [1] 布洛维，2008，《制造甘愿》，李荣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 [2] 常凯，2003，《经济全球化与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工会理论与实践》，第8期。
- [3] 哈里·布雷弗曼，1979，《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方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4] 李明欢，1999，《“相对失落”与“连锁效应”：关于当代温州地区出国移民潮的分析与思考》，《社会学研究》，第5期。
- [5] 李静君，2012，《制造同意：基层政府怎样吸纳民众的抗争》，《开放时代》，第7期。
- [6] 马克思，2004，《资本论》，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
- [7] 王春光，2002，《移民的行动抉择与网络依赖——对温州侨乡现象的社会学透视》，《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3期。
- [8] 尹豪，200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劳务输出发展研究》，《人口学刊》，第1期。
- [9] 游正林，2009，《制造认同的又一种模式——G公司协调劳资关系的基本经验》，《社会》，第1期。
- [10] 郑广怀、孙慧、万向东，2015，《从“赶工游戏”到“老板游戏”——非正式就业中的劳动控制问题》，《社会学研究》，第3期。

☆ 作者简介：李娜，河海大学社会学系2014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张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海大学社会学学科校友座谈会成功召开

2015年10月27日，在河海大学庆祝百年校庆之际，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学科师生在江宁校区厚学楼208室成功举办校友座谈会。会谈期间，社会学学科教师、返校校友和在籍学生代表共聚一堂，追忆学生时代，畅谈人生理想，气氛融洽而愉快。

下午1:30，社会学学科校友座谈会拉开帷幕。本次座谈会由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毅杰教授主持，院长施国庆教授致辞，他首先对返校校友们表示热烈欢迎，然后简要介绍了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历程，又讲了移民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等研究方向的发展现状。施院长强调校友不仅是学院发展的依靠力量，而且是学科发展水平的重要评价标准，希望广大校友与母校加强互动，为母校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随后，孙其昂教授、黄健元教授和陈阿江教授代表在籍的导师们发表讲话，他们同大家一起回顾了社会学学科10周年发展历程，肯定了学科多年发展取得的良好成绩，并希望学科在以后的发展中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青年教师代表沈洪成老师和博士后代表易前良老师的发言，他们表示河海社会学学科有自己的风格和气质，身在其中，要以踏实的姿态不断进取。

接下来，博士毕业生代表陈如、陈涛、仇凤仙、许巧仙，硕士毕业生代表杜瑛、丁百仁、杨娟、陆宏生，社工学生代表王霞纷纷发言，有的人难忘恩师的指导，有的人感谢社会学的熏陶，还有人谈到了自己的工作，校友们的经历和感悟让在校生们受益良多。

座谈会结束后，参会人员合影留念，纪念这次难得且难忘的重聚。

# 噪音之害

刘礼鹏

---

**摘要：**随着我国航空事业的发展，机场周围人们对飞机噪音的抱怨越来越强烈，向政府上诉以及要求搬迁机场的事件越来越多。飞机噪音已经成为束缚航空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和突出的社会问题。本文通过南京 H 村的环境抗争案例的分析，展现了当代中国农民的环境维权现状。

**关键词：**H 村 机场 噪音 环境抗争

---

## 一、导言

机场噪音包括民航飞机和军用飞机的飞行噪音，本文是从民航飞机飞行产生的噪音来加以论述的。航空噪音以高噪音、时间短、频次多而影响周边环境，主要表现在飞行航线的两侧敏感区域，具有污染范围大、时间短等特点。目前随着我国航空事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地区改、扩建机场以增加航班班次及加大飞机机型，以满足城市日益增长的航空运输量，这样对航线两侧，尤其是跑道两侧的区域形成严重的噪音污染，且影响程度变的日益严重。

本文以南京市 L 机场与 H 村为个案，研究了 L 机场产生的噪音对 H 村村民的影响，H 村村民对政府、机场采取的行动以及政府、机场的反应，探究了村民、村干部、机场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及村民的受害心理。

本文主要运用访谈法与观察法收集资料。首先运用访谈法与座谈会，笔者于 4 月中旬、5 月初、8 月与 9 月到 H 村与村民进行了深入的访谈，同时在村民陶大妈家与参加上访的所有村民进行了一场座谈走访会，对该村的基本情况、上访活动等基本信息有了全面了解。此外，笔者于 5 月初走访该村的第二天与那些上访村民一同去机场，作为一个局外观察的角色，笔者观察了村民上访的整个过程，同时在村民离开后与机场领导进行了访谈，也了解到了一些基本情况。同时笔者也通过网络了解了相关新闻，了解了一些二手资料。

## 二、案例介绍

### （一）案例

L 国际机场位于南京市 JN 区 LK 街道，是江苏省和南京市的门户，是国家主要干线机场、华东地区的主要货运机场，与上海虹桥机场、浦东机场互为备降机场，位列全国千万级大型机场行列，是国家大型枢纽机场、中国航空货物中心和快件集散中心，国家区域交通枢纽。禄口国际机场于 1995 年 2 月 28 日正式开工，1997 年 7 月 1 日正式通航，2005 年被世界卫生组织授予国际卫生机场称号。至 2013 年底，已开通通往 60 个国内主要城市、20 个国际和 3 个地区城市的 140 余条航线。截至 2014 年底，禄口机场有 3600 米跑道两条，航站楼两座，总面积超过 40 万平方米，机坪面积近 110 万平方米，规模居华东第三。2014 年 7 月 12 日 T2 航站楼与第二跑道建成通航，成为我国第四个 4F 级机场。

H村是位于南京市江宁区某镇的S大队的一个小村庄，全村大约有67户，共有约200人，有20几个青壮年在机场工作，村里面有十几个上小学的小孩在村内生活，该村尾离2014年7月新建好的跑道很近，据村民讲500米不到，村民介绍，从去年七月份跑道建好投入使用以来其产生的噪音一直都对该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从去年村民7月份开始就先后去过省政府、市政府、区政府、信访办及机场，由于距离政府路途远远因此去的比较少，而机场差不多每个月都会去，据村民介绍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去机场去了二三十次了。

## （二）被调查者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的主要调查对象是H村的上访村民及L机场的相关工作人员，H村上访村民中大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除一名开拖拉机送他们去机场的男性之外，其余的都是女性，此外其中还有两位80多岁的老年人，由于调查对象太多，这里就介绍主要的调查对象。

张大爷：60岁上下，H村老队长，他主要负责开车将上访村民送到机场，并在上访过程中充当村民的领导角色，在上次笔者观察的那次村民上访过程中他就代表村民与进行了谈话。

陶大妈：60岁上下，据笔者了解，她与她儿子是他们上访活动的主要负责人。

张大妈：60岁上下，身体不好，犯有风湿病，我们第一次到H村就是到她家与她进行交流的，第二次去该村时她领着我们去陶大妈家并将上访村民集中到陶大妈家为我们组织了一场座谈会。

张大哥：40岁，陶大妈的儿子，有两个小孩，都在外面念书，其妻子在机场工作，主要从事卖饮水工作，为机场噪音的事去过市政府、省政府及信访办，机场去过一两次。

张秘书：30岁左右，机场某部门秘书，她在村民上访初期负责接待村民工作。

王书记：40岁左右，机场某领导，在笔者与张秘书访谈过程中刚好碰到王书记经过，他得知我们的来意之后特意停下来跟我们交流了一会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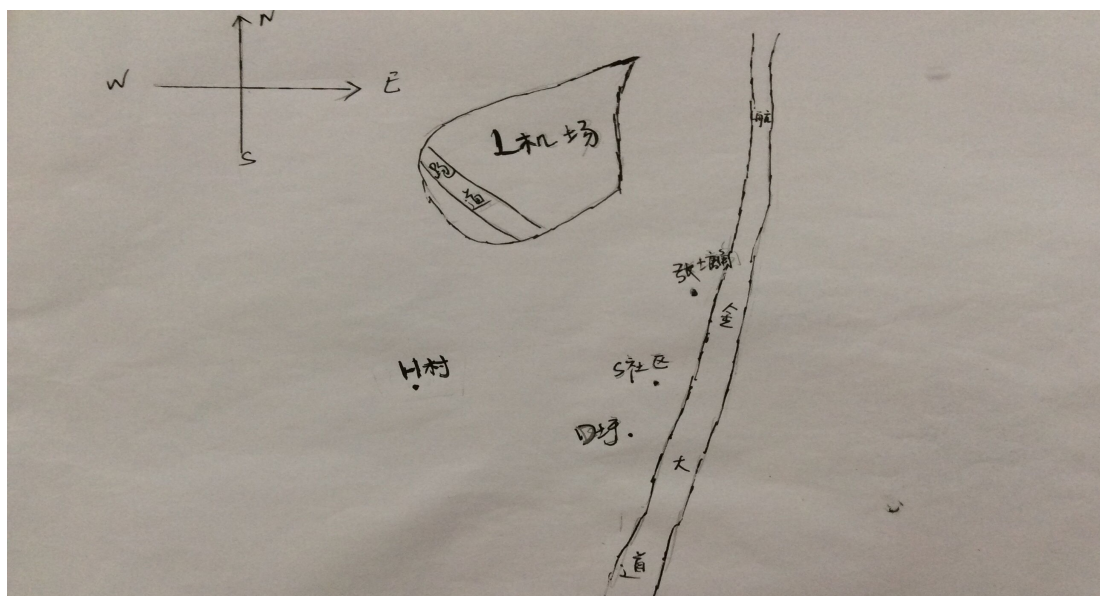


图1: L机场与H村示意图

### 三、噪音出现

作为我国的主要干线机场，L 机场承担了华东地区大量的货物集散和客流运输，由于发展的需要也在不断扩建航道。与那些化工厂及核电站等风险明显的产业不同的是，飞机场由于不存在由于事故而给周围居民产生影响，因此周边居民对飞机场的前期建设并不会排斥，因此居民对飞机场噪音污染的认识在建之前是不知道的，往往是在飞机场建成之后才有的。

去年那个 7 月那个跑道开始用，8 月份就有了。建机场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吵，要是知道有这么吵我们就不能让他们建了。（张大哥，2015/5/7）

这时，村民也是从自己的感知方面，觉得飞机的噪音太大，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影响。由于飞机场每天都在运行，而在晚上甚至半夜是飞机场运行的高峰期，而这个时间段正是村民需要休息的阶段，因此虽然只是居民的感受，但是感受却是很明显的，据村民介绍，从去年 7 月份新跑道建成通航开始就陆陆续续有村民往政府打电话反映情况。

我当时去了江苏的信访办，当时呢信访办的领导，他说你们后邓家边来找我们，我们也不感到奇怪，因为我们早就有心理准备，通航之后每两天电话上访就过去了，去年通航的时候，老年人的电话就直接打到省政府了。（张大哥，2015/5/7）

此外，H 村的飞机噪音大小还和风向有关，据村民介绍，刮西北风的时候声音真的是很大，面对面讲话都听不清，而刮东南风的时候噪音则比较小。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场周围飞机噪声环境标准》规定，机场周围的特殊住宅区、居住及文教区的噪音必须小于（包括）70 分贝，而除一类区以外的生活区的噪音必须小于（包括）75 分贝。

表 1：适用区域和标准限值

适用区域	标准限值 L <sub>w</sub> ecpn/dB
一类区域：特殊住宅区，居住、文教区	≤70
二类区域：除一类区域以外的生活区	≤75

注：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场周围飞机噪声环境标准》。

此外，2010 年 11 月，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发布《镇（乡）域规划导则（试行）》，该导则要求沿机场跑道方向距跑道两端各 1~3 千米，垂直于跑道方向距离跑道两侧边缘各 0.5~1 千米范围应列为各类建设开发活动的禁建区或限建区。

以上是国家出台的一些对于机场噪音的标准，而对于 H 村噪音究竟有没有超标，笔者分别询问了村民及机场。根据居民的说法，该村与机场跑道的距离 500 米不到，而且当时环保局派人去该村测噪音测了三次，第一次测的时候噪音超标了，而第二次第三次测的却没超标。而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前后两次矛盾的情况，村民认为是“上面觉得实际噪音太高了”所以第三次测噪音的时候专门挑飞机少的时候或者飞机往老跑道飞的时候再测。

而根据机场的说法，H 村受机场噪音影响是肯定的，但是肯定达不到拆迁的标准，而对于这个问题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是因为由于村民、政府对机场测的噪音结果的不信任而导致机场需要启动新



的方案。

笔者去过H村访问过五六次，因此也可以说是去那体会过飞机的噪音，笔者在调查的时候特意算了一下飞机起飞的频率，在10分钟内有3架飞机起飞过，这意味着每隔3到4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飞，而飞机飞过的时候声音是比较大的，而且这还只是白天。据村民介绍，晚上尤其是下半夜的时候飞机飞的更频繁，而且噪音更大，扰的他们睡不着。

此外，H村噪音的大小也受风向的影响比较大。据村民介绍，刮西北风的时候噪音很大而刮东南风的时候则很小。

另外，还有这个飞机每天早上在这个地方起飞，你们不相信可以去看看，到我们村住一下，看看这个噪音的事情，特别是那个风向的影响，如果是西南风的时候，那个噪音对我们的影响稍微好一点，如果是那个北风，我们站在对面讲话都听不到。遇到西北风那声音真的是很大啊。（张大爷，2015/5/8）

这里有一件事值得一提，笔者于7月14号去该村调查并约定那个周末与老师去该村住一晚，体验一下实际的噪音并带上仪器帮他们测一下噪音，然而一天之后该村村民打电话给笔者委婉拒绝了去他们村测噪音的约定。

小弟啊，现在我们这边刮的风是东南风，测噪音的话不好测哇。要不等到下半年刮西北风的时候在联系你们来吧。（陶大妈，2015/7/21）

#### 四、找政府

据村民介绍，从去年7月份新跑道通航运行开始就有村民觉得机场噪声很大睡不着觉而打电话到政府反映情况，那时只是个人采取的行动。随着越来越多的村民觉得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们开始团结起来向上面反映情况，于是就从个体行为转变为集体行为。而最开始他们的集体行为也是向政府反映情况。

据了解，他们最早去的是信访办，村里派了几个青年人去了江苏的信访办。据村民介绍，当时去信访办上访时接待他们的干部态度特别好，那边的干部承认了解H村噪音的情况，认为除了拆迁没有别的办法解决，并承若一个月之后会回访，后来并没有回访。村民回来之后就没有消息了。

后来村民代表陆陆续续去过省政府、市政府、区政府及禄口镇政府。虽然省政府离H村很远，但是村民代表也去过了很多次，据村民介绍就是今年他们也派了四个老头子去了省政府两三趟。而当问及省政府有什么答复的时候，村民表示，没有正式的干部接待他们，上面真正的领导根本就不知道，得不到信息，所以就没有答复，每次去了回来之后都是石沉大海。而有时政府会对村民代表讲机场不归他们管要村民去找机场，而村民去找市政府、区政府时他们表示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而有的则让他们等。而让村民比较满意的是禄口镇政府的一个书记，村民表示，当村民们去镇政府时，一个书记接待了他们，对他们讲了对农民要公平，该书记去过H村几次，他讲H村噪音是不需要测量的，因为声音实在是太大了。村民们认为该书记对村民们是比较关心的，并表示下次去镇政府还要去找他。

#### 五、找机场

村民介绍，当他们去找政府时政府回复他们机场不归他们管而让他们去找机场；而当他们去机场

时机场又回复他们要去找政府。因此村民们就是在政府与机场之间来回打转。找过政府之后他们就去了机场了，而由于政府离H村远，村民们则选择更经常性的去机场。这里有所不同的是，去政府村民们一般是派三四个村民代表去，而去机场的话则是全村每一户有愿意去的话每一户出一个去，因此每次有二三十个一起去机场，而这二三十个大都是一些老太太。她们去机场可以说是非常频繁的，就跟“上街”一样。哪天晚上吵的实在厉害了或者是哪天闲着没事，一商量就集体去机场了。

5月7日笔者去H村调查时得知第二天他们将去机场，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以及了解他们在机场的行为及机场的反映笔者决定第二天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参加他们的活动。第二天在约定的地点笔者见到了来机场的村民并与他们共同乘坐由该村老队长开的拖拉机一同前往机场管理处。小小的拖拉机翻斗车搭乘了将近三十个人，每个人几乎是前胸贴后背，再加上当时那个紧张的氛围，虽然手中握有学校出具的证明，笔者的心可以说是吊到了嗓子眼了。

村民们一到机场管理处，就直接到门口的保安室，进入保安室之后，村民们上厕所的上厕所，跟保安们聊天的聊天，而保安们一见到村民们就立刻拿起了电话。当村民们要求见领导而保安回复领导不在的时候，村民们直接堵在了机场管理处的大门处，不准车辆出入，而后保安将村民们带入了机场管理处的大厅。村民们的行为与保安的反应都显得家常便饭一般，非常熟练。

在机场管理处大厅，村民们一直喊着要求见领导，此时出来的是一个30左右，高高瘦瘦的女士，后来得知她是某部门的张秘书，张秘书就一直在那与村民们进行交涉。她要求村民们坐下来慢慢谈，而村民们则表示见不到领导就一直这样吵这样闹。后来一位机场男领导A出现了，而当村民问及是不是领导时，当A表示不是机场领导，于是村民们表示“你不是我们就不坐，我腿很疼，跑的累死了。要你们领导来跟我们讲话”。而A回应，“你是希望习主席来给你解决这件事啊，领导是不可能接受你的召唤”。旁边的保安也附和道，“你叫领导领导就出来了，你们大队书记也不是你们想喊就能喊到的”。在那些村民当中，那个开拖拉机送村民们去机场的老队长应该是村民们的代表，他当场就直接质问领导A。

为什么到现在你们领导没一个出来，打发打发，这个飞机早上飞得人家睡不着觉，为什么到现在不解释，不管到航空公司也好，航空公司影响老百姓，上边一级一级追究这件事，你们又不处理这个事。如果我影响你们机场，马上大小人物都挂掉。就是这个原因嘛，推来推去，你们航空公司推省政府，省政府说航空公司是实营单位，有权处理这件事情，跟老百姓处理清楚。为什么到现在没认出来，航空公司说无权解决，对我们就说走走，打发打发就行啦。（张大爷，2015/5/8）

而领导A与秘书都表示很无奈，但是机场与政府在一起解决。最后在领导A及秘书的劝说之下村民们激动的情绪慢慢的被安抚下来。在一间会议室内村民们与领导A进行了“谈判”。在大厅村民与机场人员的交流中机场注意到了笔者等几个“陌生人”，可以说机场的人对待我们还是很谨慎的。当问及我们是谁时，笔者不小心透露了是学生想来看看的情况，而村民陶大妈则说是她的孙子孙女和她们一起上机场来的。很明显机场领导并不相信陶大妈的说法，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跟笔者担心的那样将笔者等人赶出去，而是邀请笔者等几个一块去看看，看看村民们的说法并判断判断。因此笔者经历

了村民们在机场的整个活动。

进入会议室，机场服务人员立刻就给村民们倒茶递水，村民们也开始与领导交谈起来，虽然其中有一些村民谈到一些事情绪很激动，但是整体情况还是挺和谐的，期间村民们还给在场和他们沟通的领导倒茶，显得很“和睦”。尔后，当一位村民出去上厕所被保洁员拒绝回来后，在村民中间引起轩然大波，整个和谐的氛围立刻就被破坏掉了，村民们开始闹起来了，将手中的水泼向领导，大声叫骂起来了。在这种混乱的场景下笔者等人只好出去了。过了一会儿，村民们陆续出了会议室，并由机场的大巴送了回去。最后走的时候村民陶大妈跟我们说：“我们走了，我们不走领导不会出来，快下班了”。

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村民们在去机场进行的环境抗争行为中带有这样几个特点。

首先是带有“依情理抗争”的特征。罗亚娟认为，农民的环境抗争行为，除了欧博文和李连江提出的“依法抗争”、于建嵘提出的“以法抗争”外，还有一种农民依据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情理“依情理抗争”，虽然我国长期以来都宣传“法治社会”、“送法下乡”，乡村法律得到很广泛的普及，但是“实际他们并不熟悉相关法律法规，抗争行为因不合他们经验中的情理而起。”<sup>[1]</sup>在罗亚娟等人的研究中，他们把“情理”扩展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习惯性的、常识性的做人处事规范。在与村民的交流过程中，村民始终强调，就是因为上级领导不去他们村了解情况、上级领导不知道他们村的实际情况而导致问题一直无法得到解决，所以他们很渴望上级领导，无论是机场领导还是政府领导能够去他们村看看实际情况。

刚才不是讲了吗，叫他们领导来体验一下子，老百姓供他们吃、供他们住，就是木有人来。（某村民，2015/5/7）

你吵我们我们就来吵你们，我们这么吵领导听不见？（某村民，2015/5/8）

其次是会使用“弱者的武器”来进行环境抗争。董海军通过调查发现农民在维权抗争中常常利用自己作为弱者的或自视为弱者的“身份”来进行抗争。他认为，抗争者以自身的弱势来作为抗争资源，将自身的弱势武器化从而成为一个抗争事件。这种抗争机制就是“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即农民在维护抗争中将以弱者的身份作为抗争的武器。

如果老百姓要影响你们机场，下面大小管理者个个都能讲话，如果房子影响扒掉，人影响抓掉，送到监狱，那么老百姓所说的影响没有哪个领导站出来，讲这个地方的确是吵，对老百姓有影响，为老百姓说公道话，哪个敢讲？（张大爷，2015/5/8）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村民们是以一个平民老百姓的“弱者”身份来进行谈话的。他认为如果是老百姓影响领导，领导就可以立刻行动起来；而如果是领导影响老百姓，领导则是不管不顾的，很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意味。

## 六、抗争外的村里人

### （一）半参与者与旁观者

---

<sup>[1]</sup>罗亚娟，2013，《依情理抗争：农民抗争行为的乡土性》，《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据村民介绍，H村共有60多户，而参加环境抗争活动的有二三十个。而参加活动是有一定规则的，这叫“速生规范”，是群体性行为中的一个概念。而在H村村民的环境集体行为中的规范则是，每一户按人口数收钱用于村民去机场、政府的路费，没个人口收十块钱；而去机场则是每户派一个去。无论是收钱还是去机场都采取自愿原则。因此，在自愿原则下必然会出现不同的情况。除了全力支持并参与环境抗争行动之外，还有半参与者、旁观者以及反对者。

所谓半参与者指的是那些只出钱不出人的家庭。他们或是出于各种顾虑而不敢出人或是对环境抗争不怎么抱希望的村民等。而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这样几个：其一是怕报复，据村民们介绍，这村里有几户怕村干部报复而不敢参加或是不敢明显的参加村民们的集体抗争行动。其二是没能力，有些户是困难户，他家自己都顾不上，更别提去参加村民们的活动。其三是不怎么抱希望，即他们对村民们的行动不抱希望，但是乐于交一点钱，让其他村民自己去闹，最后成功了自己也能获利，这其中带有一点搭便车的心理。

而旁观者则指的是完全不参加村民们的环境抗争行动，而七原因除了上述的半参与者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与村干部家有关系的村民。据村民介绍，与村干部家有关系的，即村干部家的亲戚是不参与村民们的活动的，不交钱也不出人，有时候甚至充当村干部的眼线替村干部监视村民们的行为，向村干部汇报村民们的行动。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村民的环境抗争活动中大多数是老年人，而且都是老太太，其中还有两个80多岁的老太太，青年人是不敢参加环境抗争活动的，至少是不敢明显的参加。据村民介绍，他们第一次去机场时还有青年人参加，回来之后被社区找过谈话，之后他们就不敢参加。按照村民们的说法，青年人去了是“要倒大霉”的。而在笔者与机场领导谈话时领导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他们村的年轻人一般不来，对吧，他们年轻人刚开始来过几次，后来公安一直盯着他们，这是一生的黑点，就完了。（王书记，2015/5/8）

此外，村里还有一部分人是在机场工作的，这一部分人是不敢去参加村民们的环境抗争活动，因为他们也怕报复，怕下岗。而有村民认为这也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原因之一。

就是因为是在机场上班的不敢讲，任由机场的人胡作非为，啊懂啊？我家老婆也在机场上班，你不敢出头，出头你就下岗。（张大哥，2015/5/7）

## （二）反对者

反对者指的是村里反对村民的环境抗争行为，或许我们会感到疑惑，既然村里噪音这么响，作为生活在村里的村民不支持就算了为何还要反对村民们的环境抗争行为呢？这里的反对者主要指的是村里的村干部。H村有一个村民在SH大队担任村书记，是该村唯一的一个村干部，根据村民的说法，是村干部导致他们拆迁不了，之后还一直极力阻止村民们的环境抗争活动。

据村民们介绍，当时建新跑道要拆迁旁边的村庄时，“上面”来人调查H村的情况，而当时村干部则将本来只有70户的村庄抱成700户，这样机场觉得村太大就没有拆。因此是村干部导致了他们现在的情况。

而每次村民到机场去，村书记都会通知机场，按照村民们的说法，村干部是替“上面”监视村民的，而且村干部与机场是相通的。此外，无论是“上面”来领导还是来媒体都会被村干部通过各种途径给“忽悠”走。

他们和机场一样，就是想把老百姓抓起来。他们最反感村民到机场去，就是不要我们去。

我们就是不知道这里有什么门道。我们现在请谁都请不来，一请来就（被村干部）忽悠走了。（张大哥，2015/5/7）

作为H村唯一的一个村干部，他为何不像别的村那样维护自己村的利益反而“胳膊肘往外拐”呢？是因为受上一级政府的压力吗？通过调查，笔者认为即使有“受上一级政府的压力”这一因素，这一因素占的比例也很小，其中肯定还有其他的原因。

根据笔者的调查，笔者得出了这样两个原因。

其一是村干部的贪污。据村民介绍，当时有政府领导去H村访问，说从1997年建成老跑道开始就有补贴发给村民了。

他来我们村访问的，他讲来了解我们老百姓的情况，他讲97年开始，97年造那个老跑道开始你们村上就有花费了，就是震动费、污染费。97年开始就发给我们老百姓了，20年了已经，他讲“阿有发（钱）给你们老百姓？老百姓讲一分钱都没看到过。（陶大妈，2015/9/12）

此外，村民陶大妈告诉笔者，上次机场大巴送他们回来的时候导航导不到H村，导致司机把他们送到秣陵、东山去了，折腾了很久才回到家。按照他们的说法，实际上地图上H村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H村本应该是被拆迁了的，拆迁的经费也已经下来了，可是村干部及政府勾结起来，把本该用于他们村拆迁的费用给瓜分了。村民们认为，为了掩盖事实，村干部一直都是极力阻止村民们的环境抗争活动。

其二是村书记迫于压力。而这压力不是来自上一级政府，而是来自隔壁村的，本大队的出纳会计。当问及本村的村干部为什么不帮本村时，村民答道，村书记要保他的位置。

他要保他的位置哎，一个会计，出纳会计是别的村的，在那个村，拆的话要拆3个村，机场不肯拆3个村么，机场只答应我一个村，他（书记）非要拆3个村。不拆的话那个村的会计要搞他的嘛。（陶大妈，2015/9/12）

由于笔者只能从村民那边获取相关信息，因此村民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笔者很难判断，但是综合笔者的调查与切身体会，笔者认为这其中必定存在更复杂的缘由。

## 七、两次测噪音——机场与村民的博弈

在今年4月份左右，经过村民持续不断的找政府找机场反映情况的活动，H村的噪音污染终于得到政府与机场的重视，可以说是小有成效，机场开始对H村进行了噪音测量，据村民介绍噪音共测了3次，每次进行一周的时间，共测量了3周。但是，村民们满怀期望的噪音测量最后却很失望。

村民介绍，第一次测噪音时测的噪音非常高，而第二次第三次测的噪音则很低，他们认为是机场搞得鬼，是为了不拆迁而故意的，测噪音只是走下程序，政府和机场是相通的，“官官相护”是在与

村民交谈中村民说的次数最多的一个词。

他们当时来测的时候也是年轻人，第一次测的时候他们说，乖乖，这噪音怎么这么高啊。后面又说没有影响。怎么可能啊，当时第一次我明明听到测噪音的人跟我说噪音很高，后面两次又没有，后来我听人说，这个测噪音也是有技巧的，你说飞机不在这边飞测量什么东西呢？（张大哥，2015/5/7）

村民认为，由于第一次测的噪音太高了所以第二次第三次噪音机场就专挑刮东南风噪音小的时候来测噪音或者将本来在新跑道上飞的飞机转移到老跑道上飞之后再测噪音，这样一来测的噪音就很小了。

由于村民对测的噪音不满意，引发了他们的愤怒情绪，并使得他们更加频繁的去机场闹事。

你说都测三次了，把我们老百姓当死人吗？你来测，我们老百姓又不懂。所以我们就去机场那边冲，不给进就冲。（张大妈，2015/5/7）

村民持续的环境抗争行为再次换来了效果，环保厅于8月23日去H村测了噪音，这次测了9天，从23日到31日，最后2天是追加测量。但是村民介绍，这次测量机场又搞鬼了。据了解，环保厅前面在H村测噪音时机场那边还不知情，因此测出来的噪音非常高，达到了90分贝、100多分贝。而第3天的时候机场有领导去了H村，领导回去的第二天村民就发现没有声音了，飞机不飞了，因此测出来的噪音只有7.2分贝，再加上机场对待村民的态度，这引发了村民们愤怒的情绪。于是，测完噪音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1日，村民们去机场质问，并进行了比较激烈的环境抗争行为。

我们去了26个人，上个礼拜去的，我们讲过一个星期再去。打架嘛，干么事打架呢？我们躲在一个大厅的大门，进会议室的一个大玻璃门，我们这边霸一个，那边霸一个。有保安过来我们就拦了几下那个保安，拦了几下么我的腿疼我不敢跟他们打。有个人来送饭的我们跟他抢，当时11点多了要吃饭了，进去也不给进，我们不给他进，要真正的领导来了我们才（不会这样做），我们真的不想这么所，他没有真正的领导来，跟他讲一次不行，跟他讲一次不行。讲的有什么用呢？（张大妈，2015/9/12）

他们去机场质问为什么飞机不飞的时候，机场人员回答是在修跑道。

他不，他搞鬼了。本来飞机是这样走，他那样走不就是搞鬼了么。就是测噪音的时候新跑道不用，跑老跑道。1跑道是新跑道，他就不跑了，往2跑道（老跑道）那跑了。我们去问（机场），吵的他讲我们修跑道。就那几天修跑道么，他讲哎就那两天修，我们航空公司讲的，我们修跑道不关我们的事。（张大妈，2015/9/12）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村民们在面对第一次测噪音失望后，在第二次测噪音时所采取的一些策略。在第一次测噪音中，村民们并没有太在意，也没有关心、注意测出来的结果，即使是在第一次得出很高的数听测噪音的人惊讶了一声也没有注意，而在最后结果的时候才发现被欺骗了，可是木已成舟，没有任何证据，也于事无补。在第二次测噪音中，尽管是环保厅来测的，村民们还是留了一个心眼，首先派村民ZLF监督测噪音的过程，由于测噪音的地点就是在ZLF家进行的，因此比较好监督，此外村民们都时时刻刻关注测出的噪音的每一次结果，可以说每一次测出的噪音有多大村民们都知道。

从这两次测噪音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机场与村民之间的博弈，有学者认为，受害者与受益者之间

的关系很复杂，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互谅互让，理解支持，加强合作，共同解决问题；二是一方热情，另一方形式上的附和，缺乏配合行动，缺乏实质内容（或者是不应不合，不亲不疏）；三是双方矛盾尖锐，相互抵制。而机场与村民之间的博弈可以视为第二种关系。刚开始村民不断的去找机场找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机场作出形式上的附和——测噪音，但是在暗地里却做些小动作，使得噪音的实际数值失真，村民不满意继续找机场闹事。在机场，接待村民的领导说理解村民，体谅村民，并表示这也是没有办法，这也是一种形式上的附和——同情村民，并试图以这种方式安抚村民，但是村民并不买账，继续闹事。最后环保厅出面进行第二次噪音的测量，这一次机场同样在暗地里“搞鬼”，试图想像上次那样耍手段“混过去”。但是第二次村民学聪明了，他们对噪音的测量过程进行了监督，同时，在机场搞了“小动作”的时候他们能够及时的作出反映，比如去向机场“质问”。

### 八、熟人社会与环境抗争

“熟人社会”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在我们的传统社会里，人际关系织成了一张张庞大而复杂的关系网，或血缘、或地缘、或姻亲，人与人多多少少会有蛛丝马迹的关联，要么沾亲带故，要么非亲非故，因彼此熟悉，就彼此关照，大家可以通过“熟人”织就的网络，沟通关系、打通关节、解困排忧，同时也可以寻找捷径、超越规则、徇私舞弊，甚至徇私枉法。而作为一个传统社会，在H村村民的环境抗争行为也带有一定“熟人”的特征。

首先，在村民们组织起来进行环境抗争的时候，由于本大队的书记是本村的，因此该书记就利用家里自己人，时刻监视村民们的一举一动，因此村民们有什么行动，村干部就能立刻知道。

我们本村也有内鬼，跟国民党和共产党一样，有地下组织，我跟你讲，内鬼就是跟社区有关系的人。我讲的你们应该能听懂，我们是搞地下组织的。里面有叛徒。打个比方就是，我是社区领导，他和我是家门，其他的是外门，你们叽里呱叽里呱啦，说我的事情的话，他就会向我汇报，你们说我的坏话，我就会想办法制裁你们，你们应该听得懂我的话。（某村民，2015/5/7）

笔者于5月7日去H村进行调查，第二天与村民们一起参加村民去机场的活动，而据村民介绍，在第二天早上该村书记就打电话到机场通知机场村民们请了不少学生。也就是说，只要村里面有什么风吹草动，村干部立刻就能知道，这正是村干部借助“熟人社会”来掌控村里的情况的。

此外，笔者于7月21日去H村调查，并与村民约好第二天与老师一起去该村住一晚，体验一下该村的噪音，并对该村的噪音进行测量。可是第二天该村民打电话给笔者，婉拒了笔者的要求。

不然上次怎么不让你们来呢？村干部知道了不好搞哎，他厉害的很。（陶大妈，2015/9/12）

在熟人社会，哪一户有发生了什么事情，家长里短的村民们立刻就能知道，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村民们怕惹事而不敢让笔者住并测噪音。

熟人社会还会影响村民们与村干部的相处方式，在与村民的交谈中，村民表示，由于村书记是H村人，大家都很熟悉，毕竟是同住一个屋檐下，低头不见抬头见，因此他们不好跟他吵。

书记是我们村上的，要是没那么好的肯定要吵架呗，要是是生人不跟你吵吗？我们村庄吵成这样你不管，啊！你还是个人吗？他在这个村庄你就不好跟他吵。我们都这么熟了怎么好吵呢，要是

你是别的村的我们认不认你管你呢？我们就天天去找你去跟你吵，你们不管我们，把你这个书记轰下来，这个村庄就不好轰哎。（张大妈，2015/9/12）

此外，参加环境抗争的村民在整个环境抗争过程中对村干部的态度变化值得我们注意。虽然村干部与村民们不是一条心，但是村民们对他的态度也不总是不满的，在与村民的交谈中，笔者了解到村民对村干部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开始村干部监视村民们的环境抗争活动时，村民对村干部是厌恶的；村民们怕村干部报复而不敢参加环境抗争活动是对村干部的惧怕。而后来当谈到村干部时，村民又露出了不一样的神色，你搞不懂，搞不清。有时候让你去，有时候又不给你去。也就是说村干部对村民们前后不同的态度让村民们很疑惑。

有一次我们准备去机场去，他打电话给老队长家，跟我们打个招呼，跟我们讲你们去一部分人，留一部分在家，他讲环保厅要来人他讲，我们就留了七八个老头子老太太在家等，等了一天没来，你搞不清究竟是真心还是假心。你搞不清他，现在我们不听他的，他讲的话我们自己心里有数，不听他的。（张大妈，2015/9/12）

村干部突然通知村民们在村里等领导，这让村民们误以为村干部的态度转变了，惊讶之余村民们还是听从了村干部的话，在家里等领导，可是最后领导没有来，导致村民们对村干部的失望，从此村民再也不相信村干部了，也导致了村干部失信于民。

## 九、结论

随着我国飞机场的不断兴建，越来越多的居民也在不断的遭受由飞机噪音产生的困扰。虽然对于那些深受噪音之苦的居民，国家会有一些相对应的补偿措施，但是有时候补偿也无济于事，更有甚者连补偿都没有，们是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受害者。由于机场的建设涉及到方方面面，不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村庄而轻易做出改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受害村庄更处于无力地位，这类村庄更应该受到我们的重视，就像H村那般。

在中国经济高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以“公共性”要求少数公民承担过度的“忍受”，甚至以公共性为名，限制、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样做是不公正的。“环境公正”应该成为我们所有社会的追求。美国环境保护局对环境公正的定义是：“所有人，不论阶级、种族和民族，都享有免受环境伤害的权利，在公共健康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面前人人平等。公平对待意味着，任何人，不论种族、民族或阶级，都不应该承担因工业、市政、商业或联邦、州地方和部落政策执行带来的不成比例的环境伤害。”（EPA, 1999）

在H村，我们可以看到，是完全没有环境公正可言的。从去年7月份新跑道通航运行开始就有村民展开了环境抗争运动，作为底层农民，他们是弱勢的，他们不知道去找谁，只能一级级的去找政府，最后找到机场。而他们找政府找机场的行为好不容易获得了一些成效，获得了两次测噪音的机会，可是机场却百般搞鬼，试图掩盖噪音的事实。此外，村民在环境抗争中除了要应对机场之外，还要应对来自村干部的压力。作为本村唯一一个村干部，不仅不帮本村维权，还落井下石，替“上面”“监视”村民，与“上面”沆瀣一气。这里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在H村从十年前开始村里就不准建新房子



了（以防村民为了拆迁时能获利更多而建房），而本村书记却在最近建成了一幢新房，理由是儿子要结婚了。而村民则认为是在借着自己是村干部利用“特权”，想从拆迁中获利更多。那么，作为一个小小的村干部，为何会有这样的特权，也为何会从服务村民的村干部变为村民们惧怕的“村霸主”，这都值得我们反思。

人家有钱有权有势我们老百姓怎么晓得呢。怕他报复耶，人家有权有势。（张大妈，2015/9/12）

而作为此次事件中的协调者——政府，更应该有责任敦促机场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在实际过程中，虽然它曾经也对村民承诺过，但是村民一回家就“石沉大海”，导致失信于民。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官官相护”。在他们眼里，机场、村干部与政府就是勾结起来对付老百姓的。

虽然在与机场保安的交谈中笔者听到一个说法是说H村都是一些老太太吃饱了没事干看到周边别的村被拆迁了获取了极大的利益，他们也想从中分一杯羹，因此才会去机场闹事。这只是机场保安站在自己的立场对闹事村民们的评价。而通过笔者的切身经历及调查，笔者认为机场噪音对H村存在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有问题存在就要解决问题，为何从建成新跑道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了，H村村民也忍受噪音一年多了，为什么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问题还是悬而未决，真的是如机场所说是因为村民否决了机场第一次测的噪音而导致机场需要从头再来？在整个噪音事件中，机场和政府是不是应该多多反思，为了村民的利益，赶紧“行动”起来呢？

笔者于9月12日去H村做了调查，当时村民们满怀期待的告诉笔者下周一就能出结果了。然而笔者于周一打电话过去询问结果时，村民回答没有结果，不知道“上面”到底怎么搞。环境维权运动又陷入了低谷。或许，他们又要去机场了吧。

☆ 作者简介：刘礼鹏，河海大学社会学系2014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张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沈毅教授和杨方博士喜获国家社科基金

2015年6月10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发布了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名单，我系沈毅教授申请的《当代中国人社会关系的历史变迁及其“个体化”进程研究》和杨方博士申请的《“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下东部沿海核电站的社会风险与社会稳定研究》获一般项目立项。

据了解，本次国家社科基金中，社会学类重点项目15项，一般项目134项，青年项目81项，共有160家单位上榜。此次河海大学社会学系获得两个项目，显示出我系日益提高的学术能力和科研水平。

# 自主性的成长：一个群租房事件中的业主维权

钱志远

---

**摘要：**在“制度—生活”分析框架下，以N市Z小区群租房事件为个案，对业主维权过程加以考察。研究发现：从“依靠制度主体治理”到“自发组织‘别动队’治理”再到“业主与政府的协同治理”，业主自主性不断地发育并获得释放，在群租问题的治理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社区场域中，社区治理制度与业主维权呈现出一种相互胶着和彼此建塑的“再生产”过程。改进和创新城市社区治理体制，应发挥和培育业主的自主性，从而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治理。

**关键词：**自主性 “制度—生活” 业主维权 社区治理 群租

---

## 一、研究问题与文献回顾

近年来，在我国的城市社区中开始蔓延一种独特的房屋出租形式——群租。所谓群租，是指“大城市中小区里出现的，建筑物的某一单位的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第一承租人），改变房屋原来的建筑结构和功能布局，将其分割改建成若干小间后，再次向两个以上的社会各类人员分别按间出租或按床位出租的行为并由此形成的租赁关系”（刘嘉祺，2009）。在城市生活的外来中低收入群体面对越来越高的房价和租价，而选择价格实惠的群租房居住。但是，这也引发了一系列纠纷和公共安全事件，导致业主、租客、中介等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矛盾的激化。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业主对于小区群租问题的维权行动开始出现。业主维权对于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基层社区治理机制的创新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学者们在这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些研究从理论视角上可以归纳为两大类：第一类以公民社会为研究视角，通过考察在维权抗争中业主与政府的关系来探讨中国是否出现了公民社会生长的迹象。夏建中认为业主委员会维权行动“体现了公民社会的主要属性，堪称中国城市公民社会的先声”（夏建中，2003）。沈原也将业主维权视为“从维护产权走向要求实现公民权”（沈原，2007）的过程。但是也有学者对业主维权代表了公民社会崛起的观点持有谨慎的态度。石发勇认为业主委员会并不一定能够担当起在中国城市中培育良性运转的公民社会的重任，这种组织“所面临的各种局限和制约，尤其是相关各方对关系网络的过度利用，又可能导致和加剧少数既得利益业主精英排斥大众参与的寡头统治和准派系政治，进而有损于基层治理和社区民主”（石发勇，2010）。第二类是社会运动理论的视角，将业主维权视为一种社会运动，强调业主维权运动中的核心因素。张磊采用资源动员、政治过程和利益集团等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分析来我国城市社区的业主维权，认为业委会的成立、维权精英和积极分子的带领、业主的丰富资源、有效的动员、适当的策略这五个要素对业主成功维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张磊，2005）陈映芳则在社会运动理论的视角下分析了中产阶层市民组织化维权运动的问题，认为社会发育和市民组织化表达行动的桎梏在于政治法律限制。（陈映芳，2006）

然而，公民社会理论和社会运动理论视角都是在“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下概括出来的，根植于西方的经验而非我国的生活实践。虽然这些理论视角已被证明有一定的有效性，但对于全面剖析我国

独特的社会生活实践还存在着质疑。具体而言，公民社会理论建构起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强调了“国家”和“社会”这两范畴有内部的统一性以及外在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第二，强调两者之间既对立又相互依赖、在力量上此消彼长的互动模式；第三，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公民社会组织，能够监督和约束国家权力。（肖瑛，2014）但1978年以来我国的社会变迁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都极具本土文化特征，而并不具有西方公民社会传统。由此，宏观静态的“国家—社会”框架难以把握我国转型过程中形成的独特动态的社会运行机制。（李友梅等，2008）另外，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同样强调了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论，社会运动的过程是成熟社会抗衡国家权力的过程。其中关于中国是否已产生成熟社会的问题还有待考量，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具有复杂的交叉渗透关系。因而，针对城市业主维权的研究，需要新的、基于本土经验建构的分析框架。

目前为止，现有关于业主维权研究主要集中于开发商、物业公司以及基层行政管理机构这三个方向上，对于群租问题的维权研究则鲜有所见。这不仅是业主维权的新现象，更是业主与业主、业主与租客之间的博弈，而政府变为一个协调者与制度设计主体，而不是直接利益相关者。因此，沿着这样的研究思路，本文运用本土化的“制度—生活”分析框架，选取N市Z小区群租房事件为个案，通过事件中不同阶段业主的策略性行动来揭示业主维权的自主性是如何不断发育并获得释放的，并解读制度设计与人们日常生活之间相互建构的动态关系，进而探讨这对加强和创新社区治理体制的意义。

##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 （一）分析框架

国内著名学者李友梅和她的团队基于我国国情提出并构建了“制度—生活”的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主要包括“制度”、“生活”和“自主性”这三个核心概念，“制度主要是指以国家为主体的直接和间接的社会管理制度。生活是指是普通民众在与他人不断发生关系的日常实践中所形成的生存方式，局限于非科层制的社会生活领域。自主性则是指镶嵌在生活之中、运作生活和改变生活的个体和群体的理性化——不是纯粹工具理性，而是多元化的和混合的理性——的自我选择、自我设计、自我组织和自我调控的行动。”（李友梅等，2008）

改革开放以来，制度与生活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持续互动，我国社会的自主性逐步回归。在维权行动中，业主的自主性不断发育，挣脱制度的束缚，逐渐突破科层化的秩序，推进社会管理多样化格局的形成，推动正式制度变革。“国家—社会”宏观的分析框架难以切入这样中观与微观的社会实践，而略过了其复杂过程。而“制度—生活”分析框架强调在具体的社会背景下解析制度设计与人们日常实践之间相互建构的动态关系，揭示生活主体自主性发展和成长的过程，并且也关注制度主体的策略性行动。总之，能够在微观层面上分析和解读制度与生活的关系。由此，针对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制度—生活”分析框架比其他分析框架更具解释力。

### （二）研究方法

本文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文献法、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文献法主要做法是，通过查阅相关法律

法规、政策性规定和媒体的相关报道来搜集关于群租房问题的各种文献资料，以及收集业主维权的投诉材料并从中解读他们的个人感受。在本研究中运用的参与观察类型是“作为参与者的观察者”，在维权骨干的帮助下，笔者参与了业主的维权行动，现场观察业主、群租客和政府的互动过程。深度访谈是本研究运用的主要调查研究方法，通过对业主、群租客和政府官员的访谈以了解各方主体在整个群租房事件中的思想、行为和态度，并掌握群租房事件的发展轨迹。

表 1：“角色—时间矩阵”：群租房事件不同阶段的简要脉络

时间	业主	群租客	政府部门
(2013年)	购房入住	二房东改变房屋原有空间，投资增加床位和配套，出租给群租客	
(2014年3月)	群租房问题引发了业主的不满	群租房问题严重影响小区居民正常生活	NJ 市政府发布《关于开展“群租房”整治的实施意见》，加强整治工作
(2014年7月)	业主依据政府文件规定，多次投诉群租房问题	群租客不配合清查行动，只有两户群租户答应年末搬离整改	区住建局、公安局联合业主开展清查行动，进行了取证和登记暂住证。后不了了之
(2015年2月)	业主实施门禁卡出入制度，自发组织别动队 <sup>[1]</sup> 值班，核实进出人员身份	群租客认为业主损害了自己的利益，与业主发生冲突，要求二房东解决问题	住建、公安等部门疲于应对投诉
(2015年3月)	业主共收缴复制的门禁卡 70 多张，业主声明他们反对的是为了逐利的“二房东”以及破坏房屋结构的群租	二房东和租客与业主进行“拉锯战”	综治、住建、公安、地税等部门等互相推诿扯皮
(2015年4月)	业主鼓励正常合租，将小区可供出租房源公布，让租房人和业主直接面对面，免去中介环节	群租客与业主冲突缓和	管委会 <sup>[2]</sup> 介入协调，重新协调各部门加强整治
(2015年5月至今)	业主委员会成立，更换物业公司，加强物业管理	群租现象得到遏制	住建委声明结合《物业管理条例》的制订把关于群租房整治的内容放入条例内，结合法律的作用，提高管理的水平。条例已经列入立法的计划

### 三、Z 小区群租房事件的发展脉络

Z 小区地处 N 市 X 区紫金山麓，建筑面积 16 万平方米，是环境优美的高档社区。<sup>[3]</sup>一方面，Z 小区地处高新技术软件开发区，毗邻多家上市企业，企业职工租房需求大。另一方面，2013 年 1 月份

<sup>[1]</sup> “别动队”是业主自发组织的维权队伍。

<sup>[2]</sup> 因为 Z 小区在软件园内，没有成立居委会，现在由软件园管委会代行居委会管理。

<sup>[3]</sup> 依照学术规范，本文中地名经过匿名化处理。

Z 小区开始交付入住，而大量业主因交通不便等原因并未入住，造成小区闲置空房较多。在经济利益的导向下，房屋出租中介（通常所说的“二房东”）将这些闲置房承租下来。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二房东”通过改变房屋原有空间，增加床位和配套出租给企业职工，从而赚取更多的租金，这就导致了 Z 小区群租房问题的出现。“群租房里头私自改变房屋结构，一个 120 平米的房子被隔成 10 来间。还私拉电表，一个房间里头有 10 几个电表，那还得了呀，这造成火灾怎么办？”（访谈记录：ZA20150805）可见，群租房问题有严重的安全隐患，这损害了业主的生活环境及生活品质，所以，反对群租的业主维权行动应运而生。

角色—时间矩阵（见表 1）为我们展现了 Z 小区群租房事件发展过程中业主、群租客和政府部门三者之间的一系列互动过程。显而易见，不同的主体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依据具体的情境而行。不同的政府部门轮番登场，采取符合自身利益的策略性行为，从积极主动的整治实施到消极被动的推诿扯皮再到社区治理制度的创新。群租客同“二房东”与业主及政府部门展开“拉锯战”，采取“拖”的策略，“你强我就弱，你弱我就强，能拖就拖”。<sup>[1]</sup>业主首先采取的是合法性的策略，依据相关规定向政府投诉，期望能够依靠政府部门解决问题。在多次投诉未果后，业主自发组织“别动队”进行维权行动。业主维权行动推动政府进行社区治理的制度创新，最后，在业主、政府的合力下 Z 小区群租乱象得到遏制。

#### 四、业主在维权过程中自主性的成长

从 Z 小区群租房事件的发展脉络来看，业主在社区治理上发挥了主导作用。在维权过程中业主自主性不断地发育并获得释放，并与社区治理制度呈现出相互建构的动态关系，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 （一）第一阶段：建构行动合法性，依靠制度主体治理

2010 年至今，国家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治理群租房问题的制度文件<sup>[2]</sup>，这些制度文件的出台激励并保护着业主日常生活的合法权益。陈鹏指出在城市业主维权过程中，业主常表现出强烈的法律意识，宝贵的公民勇气和优越的民主训练。由此他提出了“法权抗争”分析范式，并阐述了“上访维权”、“诉讼维权”和“立法维权”这三种业主维权的方式。（陈鹏，2010）同陈鹏的研究发现一样，笔者发现在 Z 小区群租房事件的第一阶段，业主通过建构行动的合法性策略进行维权，以及在此基础上依靠制度主体治理。

##### 1. 政策话语的运用

横幅标语“响应 NJ 市 78 号文精神，加强群租房整治”、“喜迎青奥会，驱逐群租户”、“坚决打击群租，构建和谐社区”等。（观察记录：QZ20140702）从横幅标语中可见，业主直接将小区的群租问题通过援引政治话语建构为一种对社会和谐稳定构成威胁的策略，让问题政治化。这一方面能彰显业主维权言行的权威性和正当性，另一方面也能引起有关政府部门的关注。

<sup>[1]</sup> 访谈记录：LA20150805。

<sup>[2]</sup> 比如 2010 年国家住建部颁布的《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N 市政府 2014 年 3 月也出台了《市政府批转市住建委等四部门关于开展“群租房”整治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宁政发〔2014〕78 号）。

## 2. 依制度规范抗争

根据 N 市政府发布的 78 号文明明确规定，以街道为主要责任主体进行整治，全面负责本辖区的“群租”整治工作。街道根据区政府统一部署，建立由街道主要领导任组长，公安、城管、物管、综治、人口等部门负责人任副组长的整治工作小组，依托社区、物业企业、协管队伍等基层力量，落实责任方，保证措施到位，切实开展整治工作。因此，业主在制度规范的影响下，根据文件上的规定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希望依靠政府的力量解决群租问题。区住建局、公安局在接到多次投诉后，联合业主在 Z 小区开展清查行动，进行了取证和登记暂住证。这一维权过程，这不仅仅反映了以规范为核心的维权策略，更体现了业主的规则意识和公民意识。

这一阶段反映出业主在遭遇到社区问题的时，能够在制度的规训下依靠制度主体进行合法化的自我维权。然而，由于群租问题的复杂性及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政府部门在清查行动后并未采取实质性的惩罚措施，之后不了了之。随着群租问题的日益突出，业主维权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

### （二）第二阶段：建构行动合情性，自发组织“别动队”治理

政府文件虽然不像法律一样能够设置罚则对一些具体事项进行处罚，但依然具备一定的效力。然而，从表 2 可以看出各政府部门对于 Z 小区群租房纠纷并未采取积极的行动，而开始疲于应对，相互推诿扯皮。陈阿江将此现象称为文本法和实践法的分离，即正式颁布的法律、政策或文件中的规则与当事人在处理实际事物时所遵守的规则相分离。（陈阿江，2010）

与政府部门消极应对相对应的是业主的行动开始呈现出一种“不耐心的冲动”。赵鼎新将中国政府的合法性界定为绩效型，即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来源于政府的经济表现、道德表现和国防能力。（赵鼎新，2006）因此，当多次投诉未果后，业主就会从合法性的角度否定政府的治理，质疑制度的规范性。在这一认知过程中，参与维权的业主在具体情境及互动过程中共同建构了行动的合情性策略，自发组织“别动队”进行治理。

表 2：政府部门对 Z 小区群租房纠纷的回应<sup>[1]</sup>

政府部门	回应
公安局人口管理支队	群租房屋整治办公室在整治期间是设在我们部门，但随着群租房专项整治工作的结束，各部门以各司其职为主，办公室已经不存在了
派出所	我们只能进行人口管理，对于房屋结构改造这一块要由住建局来进行相应的处罚。对于人口超过规定范围的租户，我们也没有个明确的法律法规来进行对他进行处罚
区住建局	针对群租房，只有市级住建部门有执法权，我们区住建部门只能督促整改
街道办事处	小区坐落在软件园内，软件园专门成立了管委会，对里面的人财物进行管理，我们只负责外围和街道辖区内的管理
软件园管委会	我们主要是一种牵头的的作用，协调方方面面的部门，但我们本身是没有行政执法权的

### 1. “诉苦”策略

“我们这租房的很多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一些人晚上很晚回来一路吵闹，搞得我们睡不着；有些

<sup>[1]</sup>网站报道，2015，《南京群租房调查报告》之二：群租泛滥的背后》（<http://www.nbs.cn/>）。

晚上进门将门撞到砰砰响；最让人生气的是有的人大小便憋不住了，竟将粑粑装在塑料袋里从楼上往对面河里扔，结果没扔好，扔到别人家的墙上。有的房间简单改造之后，增加了卫生间，卫生间装修根本达不到标准，有些邻居厨房上面竟然渗透出黄色的斑点，这还得了。我们没有办法，政府说要整治群租房，那我们也打电话投诉了那么多次，什么部门都没用，没办法，这不都是逼急了吗。谁愿意啊，如果能有一点点解决的办法，我们业主不会找最笨的办法（自发组织值班）。”（访谈记录：WA20150803）从访谈中可见，业主诉的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苦”。业主一方面苦于群租问题严重侵扰自身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苦于政府部门治理低效性。因此，业主以“诉苦”的策略赢取旁观者的同情并建构自发组织“别动队”维权的合情性。

## 2. “黑脸”与“红脸”唱和呼应

“我们这个（别动队）就是自发组织起来的，职责就是看门。最初我们在小区 QQ 群里号召了一下（值班看门），马上就有二三十人业主响应。后来，大家晚上吃完饭就不约而同地到门口值班。我们这样值班核实进出小区的人员身份，其实主要不是针对租客，而是希望打击背后的“二房东”，让他们知道这个小区群租生意没法做。另外，我们也通过联系大房东（房屋实际所有者）希望他们不要将房子租给中介，万一房子出现安全问题，他也逃脱不了关系。我们队伍中还有人负责联系电视台，让媒体报道我们小区的问题，我们希望联合社会大众的力量（解决群租问题）。”（访谈记录：HB20150804）从中可见，唱“黑脸”体现在业主以共同保护小区环境和安全为出发点，自发组织起“别动队”在小区门口值班，并核实进出人员身份。这一策略虽然侵害了一部分合法租户的权利，但也有效地打击了以群租为牟利的“二房东”投机行为。而唱“红脸”既体现在业主通过“情和理”说服大房东，也体现在业主希望取得大众媒体关注。通过媒体传播和一般民众在道德上的同情，业主诉求和行动就具有了合情性。

这一阶段反映出简单化的制度文本无法完全安排复杂性的生活领域，而业主能够自我调控生活领域的维权策略来超越制度对生活的单向规训的权力关系。随着这一过程的演进，业主维权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

### （三）第三阶段：业主与政府的协同治理

面对业主维权的自主性不断地成长，政府开始进行社区治理的制度创新。业主维权的一系列策略在社会上吸引了广泛的关注，相关媒体对 Z 小区自发组织维权进行了多次报道。在舆论的压力下政府部门改进和创新城市社区治理体制，并且重新协同社区业主治理群租问题。

#### 1. 创新社区治理体制，扩大业主的自主权

区住建委声明将结合《物业管理条例》的制订把关于群租房整治的内容放入条例内，结合法律的作用，提高管理的水平。<sup>1</sup>新的《物业管理条例》中关于群租房整治的内容，不但赋予了业主的合法权益，而且扩大业主的自主权，规定了业主委员会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

---

<sup>1</sup>N 市政府已于 2015 年 7 月发布了《住宅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其中明确提出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设施和环境，禁止下列行为的发生：1. 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改变房屋用途；2. 损坏或者擅自改变房屋承重结构、主体结构 and 门窗位置；3. 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改为卫生间、厨房，或者将卫生间改在下层住户的厨房、卧室、起居室、书房的上方；4. 违反临时管理规约、管理规约或有关人均建筑面积，使用功能等规定出租房屋；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及时进行劝阻、制止，并向相关部门和业主委员会报告。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有权依照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要求行为人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排除妨害、恢复原状、赔偿损失；业主、物业使用人有权向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投诉和举报，对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业主委员会可以依据管理规约的约定或者业主大会的决定，对侵害业主共同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2. 成立自治性组织，与政府的协同治理

首先，以“别对队”为主体的维权业主促成了Z小区业主委员会成立，并经过政府部门的协调通过业主大会更换物业公司，加强物业管理。小区群租房问题整治已从以业主“别动队”治理到以物业为主导的“堵疏结合”治理过渡。其次，软件园管委会重新协调公安、住建等部门联合业主委员会进行了新一轮整治工作。再次，业主鼓励正常的合租。业主委员会经过统计将小区可供出租房源公布，让租房人和业主直接面对面协商，从而免去中介环节，打击了“二房东”的投机行为，这样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业主与群租客的矛盾。在业主与政府的合力下Z小区群租乱象已经得到遏制，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在这一阶段反映出，一方面业主不断生长的自主性推动着制度主体进行社区治理的制度创新，另一方面制度主体也通过制度创新来重新引导、管理和释放生活主体的自主性。

##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制度—生活”分析框架，以N市Z小区群租房事件为个案，从“制度”与“生活”之间关系变化的角度出发，对业主维权过程加以考察，发现业主维权在群租问题的治理上发挥了主导作用。从“依靠制度主体治理”到“自发组织‘别动队’治理”再到“业主与政府的协同治理”，在维权过程中业主自主性不断地发育并获得释放，并与社区治理制度呈现出相互建构的动态关系。业主维权受到现有社区治理制度规范、价值观等因素的规训，建构出行动合法性策略，从而运用政策话语和制度规范抗争，这是一种从上到下的“形塑”机制。随着维权运动的深入，简单化的制度文本无法完全安排这种复杂性的生活领域，而业主能够自我调控生活领域的维权策略，通过“诉苦”和“黑脸”与“红脸”唱和呼应的策略建构行动的合情性，来超越制度对生活的单向规训的权力关系。制度主体面对业主不断生长的自主性，进行了社区治理的制度创新，这是一种由下到上的“建构”机制。这时制度主体与生活主体在社区场域中形成了一种相互胶着、彼此建塑的“再生产”过程。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然而，思考社会治理创新却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制度的层面，“治理”必要要嵌入到社会治理的场域之中，必定要与生活主体发生联系，必定要在生活世界中实现，这就要求我们走进生活主体和他们的实践中，去了解制度主体和生活主体的互动。从Z小区群租房事件中，我们可以发现业主的自主性在群租问题的治理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布迪厄所说“内在行为倾向，亦即外在性的内在化，能使外在力量起作用，但必须遵循内含这些外在力量的机体的特殊逻辑，也就是以持久的、系统的和非机械的方式起作用。”（皮埃尔·布迪厄，2012）也就是说，外在的制度强制规训必须遵循生活主体内在的自主性。因此，笔者认为改进和创新城市社区治理体制应该“走出原先‘等、赖、靠’政府的较消极被动的社区生活空间”，（孙其昂、杜培培、张津瑞、杨正联，2015）发挥和培育业主的自主性，从而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治理。



## 参考文献

- [1] 陈映芳, 2006, 《行动力与制度限制:都市运动中的中产阶级》, 《社会学研究》, 第4期。
- [2] 陈鹏, 2010, 《当代中国城市业主的法权抗争——关于业主维权活动的分析框架》, 《社会学研究》, 第1期。
- [3] 陈阿江, 2010, 《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4] 刘嘉祺, 2009, 《法律视野下的“群租”问题》, 《法制与社会》, 第34期。
- [5] 李友梅等, 2008, 《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6] 皮埃尔·布迪厄, 2012, 《实践感》, 蒋梓骅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 [7] 沈原, 2007, 《走向公民权:业主维权作为一种公民运动》, 《市场、阶级与社会——转型社会学的关键议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8] 石发勇, 2010, 《业主委员会、准派系政治与基层治理——以一个上海街区为例》, 《社会学研究》, 第3期。
- [9] 孙其昂, 杜培培, 张津瑞, 杨正联, 2015, 《“规训—反规训”空间的生产——NJ市H社区公共空间违法侵占的实证研究》, 《城市发展研究》, 第3期。
- [10] 肖瑛, 2014, 《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视角转换》, 《中国社会科学》, 第9期。
- [11] 夏建中, 2003, 《中国公民社会的先声——以业主委员会为例》, 《文史哲》, 第3期。
- [12] 张磊, 2005, 《业主维权运动:产生原因及动员机制——对北京市几个小区个案的考查》, 《社会学研究》, 第6期。
- [13] 赵鼎新, 2006,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作者简介: 钱志远,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盛倩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沈洪成博士喜获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2015年10月15日,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公布了2015年度省社科基金立项项目名单,我系沈洪成博士申请的课题《流动儿童的家校关系及合作模式研究》(项目批准号:15SHC002)获批为青年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着重点关注江苏省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努力扶持中青年人才的发展。沈洪成博士的研究延伸了其在教育社会学领域的探索,对解决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具有现实意义。近年来我系学科建设水平稳步提升,教师获得项目基金的数量和质量亦有较大提高,这对本系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 沙集之行

扎根田野，注重实践是河海大学社会学的学科传统与特色。每年度开展的一系列实地调研，为增进学生科研水平与分析问题能力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契机。2015，在社会学系沈洪成老师、胡亮老师和沈毅老师的指导下，2015 级硕士生深入苏北，了解沙集镇的塑料和电商产业发展情况，并结合社会学理论对收集到的资料加以分析，形成调研报告。经编辑部综合考虑，特选出以下 3 篇优秀调研报告，以供读者参阅。

---

## 沙集：乡土社会中的商业王国

宋 姣

---

**摘要：**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惯用模式是公司加农户的方式，这种方式中公司掌握定价权，与农民争利，处主导优势。而“沙集模式”则提供了一个不用背井离乡就可以在自己创业的致富经济模式，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中笔者通过田野调查，试图以“差序格局”和“乡土社会”为视角切入，通过阐述沙集在乡土社会中如何进行商业模仿以及其家庭作坊式的经营模式破解“沙集模式”瓶颈难以突破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沙集 差序格局 乡土社会 商业模式

---

### 一、导言

孙寒是沙集电商第一人，2005 年他辞去月薪 3000 的工作买了台电脑回家开网店，家里人以为他只是贪玩，非常不理解，村里的衣食住行离不开土地，但是他却宅在家里足不出户，有些村民便以为他是搞传销。渐渐的，孙寒在网上卖一些小礼品，但是销量一直没有做大，2007 年机缘巧合，孙寒走进一个家具连锁卖场，感觉里面的简易拼装家具简约时尚，适合 80 后的口味，他暗自算了一下成本，觉得利润可观，于是买了几件样品回村，然后请木匠改变设计加工并生产，自己拍照上网销售。当月销售额超过两万，净利润 5000 多元，6 个月的时间销售额达到了上百万，而孙寒足不出户就能赚钱的事情引起了村民的注意，大家见他每天发货十几单却没有人上门付钱，更没有什么店铺门面，开始还有些迟疑，但是因为他赚到钱，村里人也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一些平时要好的朋友也开始和他学习开网店。但是这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孙寒担心市场被瓜分，便和朋友签订协议，要求不再教他人开网店，并且对擅自使用他们产品照片的人向网上商城投诉，但是很快他就发现这个协议有名无实，因为大家都是亲戚朋友，抬头不见低头见，投诉伤感情。

就这样，因为电商模式可复制性强，村民陆续的学习开网店，周围村镇的农民也过来学习，区

一个镇，便聚集了几百家天猫店铺。随着网商的增多，跟进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一条产业链便在沙集自发形成。目前沙集快递就有 47 家以上，家具配件厂 20 多家，专业的家具摄影就有 9 家，从东风村到淘宝村，淘宝村到电商王国，也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

东风村的村民整天行走在阿里路、天猫路、淘宝大道、三剑客路、马云大道、向东路、春晓路上，淘宝给沙集镇的村民带来了经济奇迹的同时也获得了沙集人的爱戴，这从他们的路名中就可窥一二。

“沙集模式”的优点是农民可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变身为网商与市场进行对接，快速接收市场讯息，与外界接轨，避免有效信息在传递过程中遗失或者变异，在市场竞争中以对手的姿态出现，而不是弱势且惯性的从事生产活动。但是目前的沙集则遇到了市场瓶颈，在他们放下锄头拿起鼠标连接世界的时候，在他们熟练掌握电脑放眼全局的时候，是什么干扰了他们的生产？是什么压缩他们的利润？又是什么阻止他们的创新？

与经济学视角的解读不同，本文通过农村所特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来解构“沙集模式”的瓶颈所在，在差序格局的沙集，危机是怎么形成的？创新是否是被允许的？这种无限复制的模式又有没有持续盈利的可能？

##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中，笔者运用了质性研究的方法，对多个个案进行了深入访谈，并结合观察法，进一步了解“沙集模式”，本文不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是尝试对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解释，对其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于笔者于 2015 年 11 月的实地调查和访谈，主要参与方式是深入访谈法和观察法，并在村书记的带领下了解了东风村兴起的全过程，而东风村村民乐于和外人交流，因此笔者很顺遂的目击了东风村村民加工、洽谈、接单、包装、发货等一系列的情境，并获得了一手资料。

## 三、乡土社会中的商业模仿

家具电商的模式让部分沙集人民的生活开始有规律的在加工、洽谈、接单、包装、发货之间轮轴转，东风村 1000 多户人家中有 400 多户在网上开店销售家具，而沙集镇有 3000 多家网店，这一新产业已经代替以前的废弃塑料加工业，成为东风村的经济新支柱，全村每年产值达数亿。

乡土社会中的商业模仿来的盛大而浩瀚，2003 年阿里巴巴成立淘宝网，而 2007 年孙寒便开始上网做生意，对其模仿所带起的电商热潮使得东风村走在了全国农村网商前列，在东风村的影响下，周边有六个村在 2014 年被评为淘宝村，沙集镇被评为淘宝镇。2014 年双十一当天，沙集镇的销售额突破 6000 万，那一年家具网销额达到了 40 亿。

所谓“沙集模式”，特指沙集农民网商自发式产生、裂变式成长、包容性发展的现象。自发式产生，指沙集农民从一开始创办网店开展在线销售及相关加工业的产生与初期的成长，基本是依靠当地农民自组织的力量，自发式的萌芽和涌现；裂变式成长，是指从 2006 年沙集镇东风村的第一个农民网商出现，到几年间全镇发展到 3000 多家网商，主要靠细胞裂变式的简单复制而获得整体规模的快速发展；包容性增长，是指依托第三方市场化的电子商务平台，一方面草根农民能够其他网商一样享

受数字经济带来的便捷和商业机会，另一方面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可以参与到电子商务创业和发展中来。而之所以“沙集模式”能够轻易被模仿并产生裂变，有以下几个原因：

#### （一）较低的准入门槛

在笔者的访谈中，谈到是如何走上电子商务之路的时候，几个被访者的答案中不约而同的存在着同乡的影响，甚至大多都在商业模仿中得到了他们的帮助。除去电商带来的巨额利润给村民造成的模仿风潮之外，2014年沙集镇政府对塑料产业一刀切，也导致很多以前从事塑料加工的村民不得已走向转型之路，那些本不熟悉电脑操作的部分中老年人也开始走上了电商之旅。

当笔者问及为何从事电商或者电商相关产业的时候，几个受访者分别说出了他们的原因：

夏大叔：我原来是做废品的，后来由于孙寒带头做电商，而且去年废品“一刀裁”不让干了，本来就已经有一部分人从废品转向网络了，我自己做废品也不好，而且由于妻子问题，自己在家。通过跟侄子学，我自己也开起了网店，刚开始侄子也帮自己卖一些，后来自己就能卖了。我打字相当慢，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和客户聊天根本不行，后来年轻人就建议我买一个4G手机，我是81年高中毕业，一般的字都会写，所以我就在手机上用手写和客户聊天。有些事情需要在电脑上处理，我就用电脑处理。现在废品不让干了，但是总不能在家吃空，所以我就在网上卖起了儿童床和餐桌等家具。我非常注重产品质量，所以有客户对自己很信赖，多次订购自己的产品。并且给自己评价说产品质量很好，超出预期，老板是个实在人。自己的儿童床是四面护栏，别人的是三面护栏，自己的还多了一个小孩上床的梯子，而且等孩子长大，护栏可以拆掉。最多一个人买过五次货。而且介绍朋友买。

儿子以前在天津在卖水果。去年回来，儿子由于对电脑不感兴趣，所以在家卖了两三个月水果，生意也相当好，因为以前在天津也卖过水果。说话能力强。儿媳妇开网店，从别人工厂拿货，人家先紧着自己的，所以她拿货有时不方便，后来儿子也开了一家工厂。也做实木，生意还可以。年纪大了，宁愿多出点力，将就干着塑料，但是塑料不让干了，这（开网店）又相当复杂，只能慢慢学，现在还学得不太好。

“乡土社会”是一种同质性较强、以亲属邻里感情为纽带、以机械团结为主的社会，扎根于农村社会之中。上面的案例中，夏大叔是一个五十岁的中老年，高中学历（也有很多小学学历），在塑料产业被取缔之后从事电子商务，他不会打字，便买了一个智能手机和买家手写交流，因为尝试不久，还有一些生疏，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的生意。在最初的时候，夏大叔是通过自己的侄子教学开了网店，不会的时候侄子最初还会帮他买卖，后来，他熟练掌握之后，便通过物美价廉的营销策略让自己的网店升星升砖。夏大叔从事电商不到一年，在这一段时间主要任务就是增加店面的信誉以及提升购买量，这是为了招揽买家拉拢生意必须所做的伏笔。而在笔者采访的时候，夏大叔已经基本收回了所有的前期投入资本，而这说明他的店铺已然成功的打入电商市场，但是这并不是全部的事实，面对同质性竞争带来的压价低利润，大叔一张床的净利润被压缩到只有二十多元，再加上偶尔遇见的恶劣买家和可能遭受的意外（火灾等），风险还是很大的。

而大叔的儿子以前是卖水果的，他也经营过网店，但是效果不太理想，索性放弃了，后来大叔的

儿媳妇因为能说会道，便重新干起了电子商务，最终夫妻两个人一个负责销售一个负责生产，配合默契，而且生意也已经上了台阶。

蒋某：我们都是这一片的，认识比较早，他年龄比较大，都是家边附近的，经常串门，从这个村串到那个村，很容易认识，能够交流到一起，就成了朋友，他后来毕业后回来就弄家具摄影，我其实没学，只是看他做（家具摄影），感觉很简单，我自己也有开网店，我是卖家，所以找他给我后期处理一下店铺什么的，一学就会了，现在我自己店铺自己处理，感觉比较方便，后来就变成和他合伙做这个（家具摄影）。

配合电商兴起的还有一系列的配套产业，比如摄影、木材进口、零部件配置、物流等等，而这些行业的进入门槛也并不高，案例中的蒋某本身也是淘宝店主，相比较于为他人工作，他选择和朋友就地开店，而开店需要对店面进行管理，也要对产品进行图片系列包装，而刚好他有熟识的人做的就是家具摄影，他从旁观看之后觉得难度不大，不大长时间自己便学会了，后来索性和该朋友合伙，闲暇的时间做起了家具摄影。

较低的准入门槛使得电商发展裂变得以发生，从而在量的积累上存在优势，但是优势也是劣势的所在，急速扩充的市场带来了膨胀的竞争，当大家还沉浸在赚钱的喜悦中时，危机便悄悄来临。

## （二）可控的资金投入

能否筹措出商业流转所需要的资金是一个理智的商业行为开始的前提，而沙集的经济模式在农村具有可复制性必然有其资金筹措途径，当笔者问及被访者相关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回答也具有共性：

夏大叔：需要贷款时，政府给予帮助的，这一点，我觉得不太现实。我们这各家如果资金不够的话，会找亲戚朋友贷款。现在淘宝网也可以贷款，各方面都是自己想办法。

新盖的厂房花了4万5千多，所以还欠一点帐，有困难的时候还有几个朋友能帮我，不管借多少都愿意借给我。资金不够的时候，说一声就给送过来了。

我自己也用不了多少钱，连网店包括各方面，7、8万块钱也就转过来了。我不进太多货，像木料，我就进的够干就行了。资金多时就多进一些，资金少时就少进一些。比方说我就两千，进两千的木料，我可以等做好卖出去后，资金收回来再进下一批。

蒋某：成本也要不了多少，反正要借钱我都是给亲戚借的钱，借钱也借不了多少。淘宝上就可以贷款，很方便的，分长期的和短期的，短期的有半年的，长期也有好几年的，还钱也有两种，一种是按月付利息最后截止时间淘宝上将钱在支付宝上划走，支付宝上钱不够的话它会提前提醒你，另一种是按月还钱，一个月还一部分。淘宝上借钱比在银行借钱容易多了，而且利息也不是很高，不用找人担保，程序那么麻烦。淘宝不怕商家借钱，你的信誉身价都在它那边，它知道我们的底细。

上面两个案例中的两个人分别是中年和青年，但是他们的资金筹措途径大致相同，一来网商开店并不需要大量的原始资本，所以借钱也并不是常有的事情，二来就算借钱，银行永远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若真的需要借钱经商的话，他们的第一选择也只是亲戚朋友或者是方便快捷的淘宝。调查期间村干部极力夸大银行借贷的低息便利，但是实际运作更能说明一些问题。尽管村会计王万军声称睢宁

县存在网络青年贷款（中国农业银行支持）性价比更高，只需要提供三个月的交易截图，无需担保，就可以得到贷款支助，利息只有 5 厘多一点，而信用社需要 8 厘多。但是笔者在走访多家网商之后，几乎就没有人听说过这种政策。政府的运作相比较网络而言总是有其繁琐的一面，再加上乡土社会中将“诉讼”等与官方打交道的事情视为麻烦事，导致农民更倾向于自力更生，而如今淘宝提供了快捷的资金支持，再加上网商对其熟练掌握并且信任，银行便轻而易举的排在了末位。

### （三）便捷的产业链

当沙集的电商经过一段时间的井喷之后，其形成了一条相互配合并兼容的产业链给后来的商家提供了更大的创业便利，只要想开店，那么原材料可以在电商一条街上购买（无论是实木或者颗粒板这里都有多家），家具配件也可以送货上门，商业摄影和物流快递也是触手可及。有些商家在开始之初甚至不加工生产，他们只是开了一家网店，然后在亲戚朋友那里拿家具进行网上销售：

夏大叔：后面的加工厂做的是床垫的配件边条子。机器织的。因为我去年没干，要是去年干了，后面我就不租给他们了，后面比前面大多了。后面的地方接近 400 平方。租给他们一年 15000。床垫也是像家具一样，有专门生产配件的，有生产面料的，有生产里面的芥草垫的，他们做床垫的，也是进别人的原料、配件我们那个南北一条街，用什么配件都可以买到。

夏大叔加工的实木，开始的时候直接在儿子或者侄子那里拿货在网上卖，后来因为生意好的时候厂家也是先供自己的订单，夏大叔觉得不方便，所以就自己雇佣工人进行加工生产，他家的房子是在 2008 年买的，只花了十多万，然后得到了一个两层小楼，且只花了两万就有了一个 400 平米的厂房，他将厂房出租给了别人，自己则在房子前厅加工，所有的木料来自于“电商一条街”，而包装、配件等等按照夏大叔的话来讲就是“被一条街给包了”，而夏大叔卖的是实木床，因此他家的网店也会挂上床垫的照片，只要有人要，他只需到屋后的厂房提货就行了。一般情况下小商户开店所需的所有东西这里都有，但是大户想要降低成本也可以自己去上海或者东北进木材。

## 四、家庭作坊式的经营模式

### （一）前店后厂，两代分工

沙集镇人正常的作息是年轻人网上加班到凌晨，然后早上九点左右家里人在电脑边拿订单，随后进行加工，下午五点左右快递物流运货车便会进村收包裹，如果超过这个时间订单加工还没有完成，则需淘宝商家自己讲快递送到快递站。

随着网商数量增多，竞争压力也随之增大，一部分沙集人选择规模化发展道路，还有一部分选择做精做专走品种差异化道路，但是这些人在沙集毕竟只是小部分，大部分村民依旧还在进行家庭作坊式的生产，选择前店后厂的模式，一般都是年轻的子女进行网上销售，而年迈的父母因为对网络陌生，因此对木料进行加工生产以及包装。

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只能说是一个理想模型，大多情况下，只要条件允许，儿女也是会帮衬一下父母，但是加工木具的大部分工作还是由父母来做。

刘大叔：我儿子啊，他在屋里，我们不懂这些，电脑什么的我都不懂，都是儿子在弄，每天都是

儿子媳妇做订单，我们负责加工，你看这些（厂房里的颗粒板木材），东西是我们从街上批发过来的，做好了物流来拿。

而笔者进到另一户刘姓家里的时候，则看见大厅里一家四口（父亲、母亲、儿子、儿媳）都在，儿子和父亲正在对产品进行包装，儿媳全程背对着我们心无旁骛的对木具进行打磨（这不大耗体力），母亲则在厨房做饭，时不时的能够听见儿子口袋里响起的订单声。

王某：我儿子在楼上，这个厂我是留给我大儿子的，他在新疆，二儿子有他自己的宅基地就在边上，这边方便，他就先加工加工，我给工人做做饭，偶尔也帮帮忙。

每个案例都有其特殊性，这个案例中母亲已然年迈，儿子的生意做大了，母亲帮不上什么忙，但是还是会监督工人并且给他们做饭，而儿子则负责网上销售的所有事情。

笔者走访的商家大都是前店后厂，其坐落在本家的宅基地上，但是因为他们厂房规模较大，所以宅基地的面积叠加在一起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土地红线。父子分工是常见的状态，但是面对正在变化中乡土，也有其他的情形。当我问及夏大叔为什么不和自己的儿子一起开网店的时候，他是这样回答的：

夏大叔：我现在还欠一点帐，而且我还没到50岁，不能老是跟在儿子身边，不想问儿子要钱，我是农村的，不像城里人有各种保险，只能自己干。

夏大叔的儿子是前妻生的，但是前妻生病死后，他又再娶了一个河南人，现任妻子在他给其买车之后就回老家没在回来，这种不确定的情形让他在与儿子的相处方式上进退维谷，他现在还在等自己的妻子回来。

## （二）扩大的家庭生产

当电商做到了一定规模，两代分工的做法已经满足不了市场的需要，于是扩大生产新建厂房便成了顺理成章的行为，他们的厂房兴建在宅基地上，都是活动板房，成本低，而且快捷。当人力不足的时候，雇佣工人帮工，这些工人根据需要可以分为长期工人和短期帮工。

刘某：主要我来接订单，这些事情（家具加工）我也会干，因为现在生意越来越好，家里人忙不过来。开始的时候没有信誉，所以也没有什么生意，慢慢才起来的，想过要招工，厂子都已经建好了，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去那里，人也会轻松一点，这边都太拥挤了。

刘某的网店刚开始的时候生意并不好，父亲在工作之余会给他做餐桌，但是随着信誉的提升，父亲便不再替别人打工，专职在家负责加工餐桌，随着信誉提升，刘某的生意越来越好，简单的家庭四人（爸爸，妈妈，自己，妻子）分工已经满足不了需要，所以他已经扩建了厂房，并且准备雇佣短工。

而在雇佣工人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强制要求必须与自己有亲戚邻里关系，但是如果有这样的人情关系在的话，而他们需要工作，那么商家也会优先考虑。

夏大叔：雇的是自己的亲戚，干活也很仔细，按得是计件工资，做一张床，无论大小，60块钱。他是我大儿子的母亲的亲表弟。不论是不是亲戚，你给工资低的，没人给你干，没有论天的，计件工资，按天算的话，他们不给你好好干，像这两个工人他们每天干到夜里十点，上两个月，两口的工资加起来都在1万8，我这是写一张纸，把他们每天做的件数记在纸上，贴在墙上，记满一张时，或者工

资凑到一个整数（10000）时，给他们结算一次。像碳化桌椅，我也是开出条子给我的孩子做，最后够一截子，结算一次。

其实扩大的生产也并没有改变家庭生产的事实，其经营管理依旧是家庭式的，一家人基本上都在厂里，除了分工不一样，吃穿住行都在一起，雇佣工人只是解决人力不足的问题，这些工人没有保险，没有假期，以计件的方式或者月结的方式获得工资，和现代化的公司经营相差甚远，甚至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相呼应。

## 五、瓶颈期的商业王国

裂变式的增长因乡土社会的特质而产生，在电商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都有乡土中特有的人情面子的交换乃至乡土间道德的约束，这些来自乡土的瑰宝在一段时间早就了沙集的奇迹，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它也使得眼前的沙集出现了不可忽视的困境，或者说，它是这些困境产生的症结所在。

### （一）急速压缩的利润

在乡土社会中，一个成功的商业行为在人情道德约束的情境之中不大可能会被隐藏，所以模仿行为来的迅猛快速，部分商家才开始获得了高额利润，同质性的竞争就使得有限的利润空间快速被分摊，为了在竞争中获得优势，那些从小商小贩转行而来的商家只能降低产品的价格，在不断上涨的成本为底线的情况下，利润减少，于是变成了他们不得不面对的困境。

夏大叔：我们网店的价格不是随便定的，会计算木料、人工工资、包装、运费合起来算个成本。看市场价，综合别人家的价格。

我们这边以前做颗粒板的比较多，那种东西便宜也看不出来，但是大家都在做这个，价格越来越低，久了，就没什么收益了，现在大家都开始做实木，这个东西成本就贵了，再加上加工费，但是东西实诚啊，好评率高。我们的利润实际上是很薄的。主要就是走量，卖得多点还可以赚到钱，每天淘宝推广费、广告费都要两百块，如果销量不好还要赔钱。天猫上收的费用更贵，每卖100块钱，手续费要5块，每年淘宝商城的保证金要12万，如果每年的信誉都很好，保证金会减半，就是最少6万。这个保证金淘宝网拿去可以放贷款，商城的推广费比我们商城还要多一点。你不推广，不做广告，你的排名在后面，人家看不到，就卖不了产品，推广越多越好。打比方，我今天推广200块钱限额，到200就截止了，顾客点时，你可以设1块或几块，200块钱点完就没了。价值高，点的就快，你如果设的相当便宜，它就给你排到后面了，可能点的人就很少，价钱一高，就会给你排在前面，看得人就多了，点的就快了。

随着竞争压力的增加，农户大部分只知道压价，通过价格优势得到顾客的青睐，但是这种竞争方式使得电商利润压缩。利润在下降，经营成本却在上升，原材料中的木条单价从十块钱涨到十八块钱，工人工资从25块钱涨到现在的八十块钱，如果技术活好的工人不排除一天挣200块钱，包装用的纸箱从开始单价4毛5涨到1元多，而物流的成本在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也开始涨。

汪某：我们这里以前没有木匠，都是后来学的，这又不难，一学就会，我就是先雇别人做后来自己做的（自己负责网络销售），不过自己家里忙不过来，还是得请工人，好的工人一天能够赚200多，



不过也有计件收费的，就是这样，都招不到人。生意好的时候有人挖角，我就出的高一点，不像以前了。

以前东风村在外打工的人有一千多，现在九成都已经回村，但是即使如此，依旧满足不了东风村对劳力的需求。走到东风村，到处都可以看见招工牌子，但是劳力资源依旧比较稀缺，为此，商家为了留住好的手艺人，便不惜开高价，由此提高的成本则需要他自己承担。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孙寒等第一批起来的电商试图通过行业协会对家具市场进行价格上的统一，可是最后行业协会只变成了一个丢在角落里的牌子，甚至根本就没有人听过还有这种协会。就算有人听过，但是大家也并不遵守，这些来自工业文明的规则在乡土社会没有扎根土壤，甚至就连孙寒本人都不能熟练将这种规则和约束执行起来，协会没有效力，而村民低头不见抬头见，就算有意见，话也不能说的太绝了。

## （二）受限制的扩大生产

对那些跟风模仿而来的商户而言，他们之前的工作内容不同，但是大都是给他人打工或者是卖凉皮水果之类的小贩，这些年近半百产量小的商户的生产只是为了满足生计需要，并没有媒体所夸大的大的抱负，对他们而言，所赚的钱只要能够满足日常所需，比打工强就好了。扩大生产不是他们的目的，只是电商带来的意外的礼物。

夏大叔：我并不需要赚多少钱，你看看我雇佣他们两个人，计件算的，一个月拼命的干，晚上干到十点也不回去，为什么，他们一个人一个月能够赚九千，夫妻两个一个月就是一万，吃饭都在我这里，我到现在才把本给收回来。我不需要赚多少钱，只是因为塑料不让干了，你看我都多大岁数了，也不想出去打工，只要能够保证我的衣食住行就行了，也不拖累孩子。

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报复和追求在这片土地上也并不是随意挥洒，做得好的商户随着出货量的增大，其作坊式的生产方式便遇到了产量的瓶颈，厂房小，产量出不来，也没有库存量，使得他们有些活动不敢做，货也发不出去，解决这些问题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扩大生产，其面临的问题就是土地，可是国家处于粮食安全的考虑所规划的土地红线已经被一再打破，再加上农村的土地政策也尚严苛，使得土地成为约束外来人口甚至本地人口适当扩大生产的瓶颈之一。

## （三）止步不前的创新

既然同质性的竞争已经无暴利可图，那么制作精品家具未尝不是一个好的出路？在转变的人中，当年和孙寒一起第一批做家具的王朴便开始做比较高端的精品家具，其盈利不是通过跑量，而是做精品，通过高利润获得产值。但是他也有他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那就是模仿，不管你做的多好，只要有人模仿，那么你的利润就会被分摊，当然，面对被模仿的人你可以向商城投诉，但是如果模仿的人是你的亲戚朋友邻居，你又能耐他们如何呢？

夏大叔：我用的我侄子的图片，他们当时卖得还可以，我给他说，你把图片给我用下，但是我这个图片如果卖好了，你不能投诉我，他同意了，我才能生产。如果人家投诉你，虽然你销量上去了，但是还是得下架。

如果市场竞争中你面对的是陌生人，那么面对侵权的行为你就会不遗余力的打压，但是相反，如果你面对的是与你朝夕相对的熟人，他们可能是你的朋友，是你的亲人，你的选择可能会怎么样呢？所谓“差序格局”，其实就是扎根于乡土中的利益分配格局，差序格局中的我们都是以自己为起点，以孝悌仁义为标准去对待身边的人，这种情况下，人们世代相见，一般情况下就算有纠葛都会隐忍不发，为了日后好相见。再加上乡土社会中关于产权保护并没有太多概念性的理解，当然，这并不是不可改善的，但是在尚未改善之前，如果一家商户因为别人盗图盗设计而与其争吵起来，落在邻居眼里则显得没有人情。

除此以外，创新最重要的要素是人才，沙集的环境由于之前模仿耿车的塑料产业而有所污染，再加上处于城市边陲的地理位置，使得具有创新性的人才并不将其视作理想的就业基地，除此以外，沙集并没有形成现代化的公司制度，且没有配套的保险假期。

笔者所采访的人都知道创新很重要，创新能够带来新的商机，但是当问及他们是否愿意花成本雇佣创新型工人的时候，大家都持谨慎的态度。

刘某：那要看网上销售的怎么样了，如果销售的好的话我会愿意付钱，但是销售的不好我还得贴各种费用，怎么能给他付钱。

创新是需要成本的，在家庭作坊式的加工无法提供创新所需要的前期成本的时候，能否有条件的改变薪资支付方式也是一个可考虑的途径。瓶颈需要突破的，理性人也会选择去适应，笔者所阐述的沙集也并非一成不变，但是这个改变需要一个过程。市场瞬息万变，而沙集的乡土社会，以及随之而来的乡土情节和观念却持续到现在，现代化的规则适应现代化的世界，沙集究竟何去何从，尚未可知。

#### （四）名实相左的政府帮扶

如果说“电商一条街”较完美的体现了政府意志，也是给外来参观者的一个模板的话，那么模板首先就是不成功的，无论是毫无防火意识的家庭作坊式生产，还是较为糟糕的环境治理，都可以看出镇政府的不甚作为。除此以外，“电商一条街”两侧房子后面的民居还保持着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风格，都是低矮的砖瓦平房，而且道路泥泞不堪。

电商发展使得土地问题摆上了台面，沙集政府因此兴建了电子商务创业园，按照东风村村会计王万军的话来讲，电子商务创业园试图在解决问题的同时，让沙集的经济从 1.0 版本跨向 2.0 版本。在开始沙集模式起步的时候，政府的操作方式是“无为”，让其自主发展，不干涉，不收税，同时，也没有对环境进行维护，对道路等基础设施进行整改。

村会计王万军认为 2.0 阶段的最大的优势就是政府的支持政策从“无为”转向“有为”，也就是政府不介入网商的自主活动和决策，而是专注于环境营造，特别是针对网商共性的要求，试图提供高效的服务，引导网商向现代企业发展。这虽然与笔者目前所见事实向左，但是不排除未来会有质的改变。

沙集镇电子商务创业园分为生产加工区、物流仓储区、电子商务区等五大功能区，建设成标准化厂房 50000 平方米，道路、下水管道、宽带、管网设置、电力等相关配套也全部完工并且免费提供，这样宽松的环境提供使得他们面对大订单的时候也无所畏惧。

可是问题就在于谁能够获得这个产业园厂房的使用权，官方的说法是竞标，但是问及村民的时候，他们竟浑然不知。

我知道有那个地方，不过被谁拿去了就不知道了，不过租厂房十年要花 100 来万，挺贵的，那块地是增减挂钩得来的，政府要是占了地，每年给我们八百块，不知道政府拿了钱都做了什么，我们也见不到公示。

电子商务产业园还是有其作用所在，王跃就是受益者之一，他在进驻产业园之后便拥有 4000 多平米的标准化厂房和一百多名工人之后，以前不敢做的商业活动现在也能举行，还能够有充足的备货，因此突破了土地瓶颈之后他的生意又有了生命力，目前年销售额达到一千多万。

政府在获利之后并未见得与村民分享，其需要做的就是将土地划拨出去，招来开发商，然后租户负责付钱，同时，其占用的还是村民的土地。

产业园里的基础条件充沛，但是除此之外的道路、下水管道、宽带、管网设置、电力、卫生治理等相关配套并不达标。

政府如何转变成为服务型政府并不是口头说说而已，也并不是给外来参观者播放几张 PPT 或者看一段视频的事情，但是同时，如何让政府转型则又牵涉到政府内部的利益纠葛，在沙集，政府究竟能有几多用处，阻碍的用处还是推进的用处，哪一部分的用处多一点，都还有待观察。

## 六、结论

乡土社会的特质使得复制性强的电商能够在沙集迅速崛起，也使得其在量上有了爆发式的增长，从而在短短时间里形成了一条产业链。但是同时，生活在乡土社会中的人有其局限性，因此在选择生产方式上选择了成本较低的家庭作坊式生产，在商业竞争中也选择了较为低端的价格战，这本无可厚非，但是随着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问题便开始显现，利润减少，生产受限，其增长本质上也只是规模上的增长，如何突破电商瓶颈也就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在产权保护没有得到村民的一致认同的今天，创新也后发力不足，在不愿苛责他人易留情面的乡土社会，很少人愿意拿着自己的资金去承担风险，即使其收益可观。

突破瓶颈的声音多种多样，但是其前提都是破除乡土社会人情交往中关于产权保护的错误，等到大家形成尊重各自的劳动成果的共识，生产产品分流，将产品做精做专的同时有条件的进行公司化经营管理，引进人才创新，或许能够突破乡土社会的局限性。

☆ 作者简介：宋 姣，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张 博

# 理性与人情

## ——家具“淘宝村”生成机制的社会学研究

冯 娜

---

**摘要：**目前，农村电商产业的发展引起广泛关注，本文以徐州沙集东风村为例，试图探究其以简易家具为基础的电商产业的生成机制。研究发现，在东风村电商的发展历程中，理性选择和人情关系都发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孙寒等人创业成功的利益带动下，一个个东风村新兴创业人在基于“家具——网商”可复制模式的考量下前赴后继开始了电商之路，而在东风村电商产业不断壮大过程中，人情关系使得大家即使在日益理性化的社会中互惠互助，这种人情让后来的创业者得以生存，也为东风村电商发展成一条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提供了条件。

**关键词：**理性选择 熟人社会 人情关系

---

### 一、问题的提出

2015年10月1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上，李克强总理再次专门部署加快发展农村电商，通过壮大新业态促销费惠民生，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指出，深化农村流通体制改革，创新农村商业模式，并对如何完善农村电商发展作出了具体规划和指导<sup>[1]</sup>。而江苏徐州的沙集镇东风村则走在了农村电商发展的前沿，东风村由于其“全民淘宝”的现象被称为“网络时代的‘小岗村’”。是什么原因使得东风村走上“淘宝”之路？在这一过程中，“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民在新兴的电商工业中如何适应与行动？带着这样的问题，开始了本次沙集东风村的调查。

### 二、研究方法

#### （一）资料收集

本文基于为期两天的田野调查写成，主要采用访谈、参与观察和文献研究法。调查时，先对全村整体情况进行了解，之后，针对不同问题作了更为深入的后期调研。访谈的对象为沙集镇村委会干部、淘宝店老板、工人、快递员等，累计访谈人数15左右，通过和这些人员细节性的交流以及观察，探寻家具淘宝村的生成机制，并且也从访谈中了解到网商们基于自身情况的选择与相互间的人情互动关系。

#### （二）调查点介绍

沙集镇位于徐州睢宁县东部，地处苏、皖两省交界部，总面积66平方公里，辖17个行政村，人口6万。东风村，是沙集镇17个行政村之一，村子有5000人左右，人均耕地不足一亩。与一般农村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不同，人多地少的矛盾促使当地村民选择其他产业的发展。东风村历来有经商创

---

<sup>[1]</sup> 网站报道，2015，《国办印发指导意见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 鼓励农村物流多站合一服务同网》（<http://news.xinhuanet.com/>）。

业的传统，商业气息浓厚。改革开放至发展电商，网上销售家具之前，东风村先后主要做过三项产业：农产品加工（主要是粉条）、养猪业、废旧塑料产品回收与加工。此外，东风村还有外出务工、做小生意的传统，据统计，2006年以前，东风村2600劳力中有一半离开故土外出务工。而现在，在孙寒等人的带领下，当地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很多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开网店，全村约70%的家户拥有自己的网店，2013年11月，东风村被授予“中国淘宝村”的称号。

### 三、理性选择下的东风村电商产业

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对人的行动持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占据了主导地位。亚当·斯密认为人的理性在于他在各项利益的比较中选择自我的最大利益，以最小的牺牲满足自己的最大需要。个人利益最大化是通过交易实现的。人们在追逐自我利益的过程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使整个社会富裕起来。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纯粹理性的情况几乎不存在，只是一种理性的理想类型。社会学的理性选择是“社会人”的理性选择，人们在选择自身利益最大化时会考虑制度的因素、文化的因素，人们往往是在一定文化和制度规范的基础上去追求自身利益。科尔曼承认制度和规范对于人们行为的制约，但他反对将规范作为既定的条件，而是研究规范如何产生并且在行动者之间怎样维持。他认为，“规范指明人们认为什么样的行动是合乎体统或正确的。社会规范是人们认为有创造的，创造并维持规范的人认为，如果规范为社会成员所遵守，他们将获利；如果人们违背规范，他们将受到伤害。”（科尔曼，1990：226）规范蕴含着利益，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产生了对有效规范的需求，有效的赏罚措施是规范真正建立的必要条件。

东风村的电商发展很有特色，每家的网店都是在经营简易家具。不管是走在东风村的淘宝大道上，还是深入到村内，都可听到木料加工的声音，看到房内房外码着的板材或家具。网上可卖的东西如此之多，服装、食品、家电等等，东风村为什么偏偏选择了家具产业？在对各家的家具进行观察比较后又发现，虽然每家网店都在经营简易家具，但有的是经营实木家具，有的是卖压缩板的家具；有的主要是卖床的，有的主要卖酒吧桌椅，有的主要卖衣柜，等等，即使都是卖床的，床的样式也几乎不一样，全村几千家淘宝店，每家有每家的特色。这只是一种巧合，还是网商们基于理性的选择？东风村主要网商存在两种经营方式，一种是开网店的同时生产家具，一种是只开网店，不生产家具，从其他家拿货，这种选择又有着怎样的考量？

#### （一）网商一家具模式的选择

东风村电商产业的发展始于现在已被外界所熟知的孙寒。“2006年孙寒率先在淘宝网注册网店，刚开始他们三个人（被誉为三剑客的孙寒、夏凯、陈雷）在做，他们在网上只是卖点儿手机充值卡、小饰品之类的。”（2015年11月7日，村干部访谈记录）村干部在介绍东风村电商发展时如此说道。后来孙寒在上海偶然发现宜家家具，受其启发，开始找人制作并在网上销售简易拼装家具。孙寒等人网店成功的经营和较大的利润吸引并带动了周围村民的加入，开网店、卖家具的经验一传十，十传百，

东风村“网店一家具”的经营方式短短几年从小打小闹到如今遍地开花，形成集板材销售、家具生产、家具配件销售、物流快递服务等为一体的产业链，已被奉为一种成功的模式，每天都有几批人到东风村参观调研，最令东风村人骄傲的莫过于国家副总理汪洋的到来。如果说，孙寒等人最初选择制造销售简易拼装家具是一种偶然，但当一种产业链、一种模式的形成必有其必然性，也是一种理性选择的行为。

在说明东风村的电商产业为何走上了简易家具生产与销售的模式前，先来看一下简易拼装家具的特点很有必要。

### 第一，制作工艺较为简单

在访谈中发现，东风村既不盛产木材，也没有制作家具的传统，但是简易拼装家具自身的特点制作工艺较为简单、可拆装、容易运输等特点使其得以在东风村“安家落户”。“弄这个很简单，用不着木匠，只要有机器，自己学学就会啦……一开始是跟孙寒干的，他就是俺外甥，他的场子大，后来我们也学会了就自己单干”（XS 访谈记录）。“一开始找了个木匠干，后来自己慢慢就学会了，就自己干，反正俺家干的也不大，一家人就能忙过来”（WDS 的访谈记录）。在调查中发现，除了一些较大规模的厂子，东风村很多家具网商都是一家人在经营。从板材的切割、钻孔到家具包装，一家人就可独立完成。

### 第二，创业成本较低

大众村虽然有经商的传统，但面对在网上开店卖家具这一新兴的事物，村民们一开始还是抱着观望的态度。然而，当他们看到孙寒等人生意越做越大，钱越挣越多，也不由得动了心。而且生产简易拼装家具前期投资并不大。生产简易拼装家具对场地的面积要求不大，村民们在自家院子里就可以进行家具的生产，即使院子面积不足，可以再在房钱屋后盖个简易厂房。场地问题解决之后，再来看看生产机器上的投资。在调查中了解到，一台制作家具的机器需两万多元，属于当地村民可以承受的范围。即使买不起机器，在家具行业逐渐兴起的环境下，网店新人也可以选择到其他家拿货，自己在网上销售，等资金逐渐累积够可以再选择自己生产加工。

“先是跟人家学，跟人家学会了，我们就自己干……这机器不贵，两万多块钱，其他的东西俺这啥都有，买来板材，买来零部件自己干就管啦。”（WY 访谈记录）

“俺们这都是做家具的，刚开始，看到亲戚家卖儿童床，我问他能不能用他家的图片在网上卖，他同意了，我就开始在网上买这款（儿童床），从他家拿货，后来才在自己家生产。”（XDS 访谈记录）

“我原来在外地工作，后来才回来的，家里就我一人回来，就先从人家家里拿货自己卖，等以后卖的好的话自己再买机器加工吧。”（WXG 访谈记录）

在东风村，不管是自产自销式的网店还是从别家拿货自己卖的网店，在早期从事时都会从对别家家家具网店的成本与收益中做一个考量，再根据自身的情况做出选择。而不管做出那种选择，只要卖家

具，其背后都有一条逐渐成型的产业链的支撑，使其在前期投入时不用投入太多，也不会冒很大风险，而如果选择其他非家具类的产品，其他相关的投入就会大的多。

### 第三，市场需求大，竞争较小

租房一族、学生一族在我国大量存在，他们往往对家具品牌、长久的质量要求并不高，而这种简易拼装家具能折叠、能拆装，节省空间，简约时尚，而且价格低廉，极大的满足了租房一族、学生一族的需求，填补了市场的空白。都说东风村的家具是“山寨版”宜家，但是由于家具的特性，山寨只能是山寨样式，论功能、论质量，东风村生产的家具质量并不比宜家差，但价格却要比宜家家具便宜好多。这对更多讲求短期实用、价格又不要太贵的租房人、学生具有很大吸引力。在网上经营家具的部分网上也曾尝试过销售其他产品，但因种种原因皆以赔钱告终。“以前也卖过衣服，俺儿从浙江那边进过来的，后来都赔啦，赔了个三四万。”（WY 访谈记录）访谈中，当问到有没有经营过其他产品时，一位被访谈者如此回答。在电商产业日益火爆的今天，淘宝上各类产品充斥人们的眼球，很多产品已经到了供大于求地步。以服装为例，当前淘宝上的服装产业已经近于饱和，没有品牌、时尚、质量保证很难在淘宝平台上获得很好的收益。对东风村人而言，服装制作并不是很容易就可以学会的，周围也缺乏服装生产的支撑，同时，也没有上海、浙江、广东这些省市对服装的敏感度，所以不管有没有尝试，或者有没有对市场进行分析，东风村人的淘宝事业都存在潜在的理性选择。

在访谈中发现，东风村既不盛产木材，也没有制作家具的传统，而正是简易拼装家具所具有的这些特性让家具一网商的经营模式具有了可复制性。这种可复制让其他潜在创业人在基于利益的考虑下选择了在网上经营简易家具。所以，即使在没有过多产业优势的情况下，一个有一个东风村的网商成功复制的孙寒等人的创业方法，新的创业人的加入增加一定竞争力的同时也使得相关产业集聚成为可能，最终形成了以家具为依托的网店模式，也形成了产业链的发展路径。

### （二）家具类型的选择

东风村的网店虽然卖的都是简易家具，但每家产品有每家的特色，雷同的很少，尤其是自家也生产家具的店家。一方面，从板材的类型来说，有的生产实木家具，有的采用压缩板作为家具制作材料，其中原因在我们访谈了几家淘宝店老板后得以了解。“一般对我们这些小店来说，做实木的成本要高一些，从实木板，还有人工费，要比压缩板的（家具）难做一些，但需要的机器是小型的，用的场地小一些，做压缩板的话，需要的机器大一些，要的场地大，不过买板子便宜点，加工也简单。”（XDS 访谈记录）由此看来，做实木还是选择是基于场地、成本、劳动力的综合考量。如果家里场地比较大、仅自家人来生产加工，就很可能选择做压缩板的家具，反之，则可能会选择做实木家具。

另一方面，从家具的类型来说，有的网店经营酒吧座椅，有的经营儿童床，还有电脑桌等等，各家有各家的选择。第一是主动的选择，开始选择经营某种产品前，网店老板会根据产品的销量、特点进行选择。“你看我这款儿童床，别家就只有三面护栏，我这个有四面，而且还有小梯子，这种肯定

比三面的安全，我做这个的时候就是看中这点。”“这种桌子卖的还不错，家里边能用，你看俺家里边放着的就是这种，你们学生买着也能用。”（XDS 访谈记录）第二是被动的选择，当产品的成本逐渐超过产品的价格时就很可能让经营者被迫放弃一种产品而再转向新产品的生产。被访谈者透露，在商家淘宝上的产品定价可以下调，但如果加价，淘宝平台会把相应的产品显示排到后面去，这会让买家很难看到卖家销售的产品而使得销量大幅度下降。但面对木料涨价，人工成本也增加的状况，淘宝店老板有着自己的经营法则：“比方说，我这一张床原来赚 30 块钱，现在木料涨了，我就少赚点，到最后老是涨，实在支撑不住了，就只能放弃这个产品，再换其他的经营，你看我原来就是卖这种小桌子的，现在基本不卖了。”（XDS 访谈记录）

### （三）经营方式的选择

东风村的网商主要有两种经营方式，一种是只开网店，自己并不生产家具，笔者称之为只销不产式的经营方式。网店老板在网上接到订单后，再到别家拿货。并一种经营方式是既生产家具，又有自己的网店，我们称这种为自产自销的经营方式。对于资金场地不太充裕或抱着试试看态度的创业者往往会选择只销不产的经营方式。这种只销不产的方式具有什么优势呢？我们可以从投入、风险方面来分析。由于自己不用生产家具，那么生产成本一项几乎为零，主要的投入就在于网店的经营上面，而当市场饱和时，也不会存在滞销的风险。如果经营不善，收益不好，最多是退出市场。这种低投入、低风险的经营方式很适合一些创业起步者。但随着销量的不断增加，资金的不断累积，只销不产的创业人便会转向自产自销式的经营方式。这其中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后起网商放弃“空手套白狼”的经营方式，转而选择另一种呢？

“本来我也是拿人家的货来卖，但是人家自己也有网店吧，人家生产出来家具肯定得先紧着自己用，有了富余的才会给你，有时候我就会因为没货干看着生意做不成。而且，现在家具的利润压得越来越低，别人家给我货肯定还想赚一点，本来利就不大，再加一层就赚不到什么钱了，所以后来就自己开始生产。”（XDS 访谈记录）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东风村“网商一家具”地经营方式并非仅仅是一个偶然，其中是存在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在经历观望、比较、其他产品尝试的失败后，一批批东风村人，前赴后继，选择在网上经营简易家具产品。同时，在市场竞争中，综合考量，选择适合自家生产销售的家具类型、选择适合自己的经营方式，并在一定境遇下做出部分改变。

## 四、熟人社会下的人情关系

在我国，人情、面子是维系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方面，学界也对中国人在人际关系或人际交往中的“人情”与“面子”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黄光国先生首先以西方社会心理学中社会交易论为基础，建构出“人情与面子”的理论模式，他认为，人情在中国文化中，有下列三种不同的含义：第一，人情是指个人遭遇到各种不同的生活情境时，可能产生的情绪反应。第二，人情是指人与人进行社会



交换时，可以用来馈赠对方的一种资源。这时的人情不仅可能包含具体的金钱、财物或服务，而且还包含有抽象的情感。第三，人情是指中国社会中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的社会规范。东风村电商产业发展中，不管是在创业初始还是在日常的经营中，都反映了中国乡村社会中人与人交往的社会规范。

### （一）创业初始中的人情关系

前面提到，东风村电商的发展始于以孙寒为首的“三剑客”，后来孙寒曾住孙寒对门的王朴因见孙寒发货量很大且自己做废塑料回收生意遭遇金融危机打击陷入低谷，前来向孙请教。起初，孙寒并不愿意将经验传授给他。但碍于“情面”，他还是把经验传授给了他。后来王朴又将经验传授给他的兄长王跃。孙寒等五人成为东风村首批在淘宝开店经营家具销售的创业者。后来五个人怕做的多了，会在网上砸价，于是五个人签了协议，按了手印，不在发展下线。然而在农村这个熟人社会里，大家多少都有些亲戚关系，面对亲戚朋友的请求学习，即使签了协议，也很难拒绝，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开网店就像分子裂变一样在东风村快速发展。

### （二）网店经营中的人情关系

经营网店需要有资金、产品网页的图片设计、产品来源，笔者也是根据这几个方面来分析其中的人情关系。

#### 1. 经营资金

调查初期，村干部在向我们介绍东风村电商发展状况时，提到了政府的优惠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资金借贷，“我们睢宁县团委推出一款‘网络青年创业贷款’，只要是开网店、做网商，利息是别人利息的一半，这是很好的。还有，中国农业银行的耿车办事处，它是要给我们东风村网商提供便利的，你要你做网商，提供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支付宝三个月交易截图还有最近三个月的电子发票，就可以进行贷款，也不需要担保，由担保公司进行担保，所有的资金加在一块，贷出的利息是五厘多，比其他贷款利息要低很多。”尽管有着资金借贷的优惠政策，但在访谈多个淘宝店家之后发现，极少有人做贷款，在资金缺乏时，更多的网商选择跟亲戚朋友借钱。“没有做过贷款，麻烦，没钱的时候找亲戚朋友借就行。”（XS 访谈记录）

#### 2. 产品图片的使用

在东风村的淘宝大道两边可以看到多家为摄影店，这些都是专门为淘宝产品进行拍摄的。想要在网上卖东西，就必须提供产品的图片，找专业摄影店拍摄一件产品的价格从几百到几千不等。由于种种原因，经常会有部分网店盗用其他网店的图片，如果产品卖得好的话，在淘宝网上盗图是很可能被图片所有权的店家投诉的，盗图者的产品会被立刻下架。而在东风村，如果本村人用自家的图是不会被投诉的。“我一开始没办厂子，就是用他家的图在网上卖，我跟他说了‘你不要投诉我’”。

（XDS 访谈记录）“外边的人用肯定投诉，要是自己村里边的人用俺家的图也不能投诉，都是乡里乡亲的，投诉了见个面也不好意思啊，私下里给说一声就行了。”（WDJ 访谈记录）对这些电商而言，虽然

别人盗图（有时是说明的情况下用图）给自己的产品经营带来一定负面影响，但由于是本村人，就不得不考虑人情的因素，如果投诉或者不允许同村人用图，虽然经济效益避免受损，但考虑到人情关系的效益，则不得不做出妥协。“凡事不可做太绝”或许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写照。当然，也正是基于这种人情关系，也很少有人是真正的盗图，多数情况下是只是一种知情同意的借图而已。

### 3. 拿货

前面提到，东风村的网店主要有两种经营方式，其中自产自销式的经营方式占大多数，但也有不少限于场地资金的限制只开网店不生产家具的网商，他们通常是在网上接单，根据订单从其他家拿货销售。在寻找货源时，这些商家首先会考虑到自家亲戚那里拿货，然后再考虑其他。“自己的亲戚，放心啊，而且给的也会便宜一些，不过一般人家生产都得先紧着自己用，人家要是也缺货，就只能换其他家拿。”（WXG 访谈记录）即使是自己生产家具的网商在订单多、存货少的情况下也会向有同样产品的其他家拿货，这种相互间的互惠关系一些规模较小的网店得以经营下去。

“熟人社会”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它的特点是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人情和关系是熟人社会的典型话语。民间“熟人好办事”，正是对熟人社会的一种朴素表达。当我们在对熟人社会说“不”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关系”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积极意义，“熟人社会”中的亲情原则为人们提供了情感支持，也为人们获取资源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它对于保持社会稳定与协调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人际间没有了“熟人社会”的亲情原则的话，人们间的关系就可能沦为赤裸裸的物质金钱关系。虽然有研究表明熟人社会的逻辑只能作用于低端的脱贫阶段的合作，但却难以向更高端的致富型的合作进展，但不得不说，人情的关系给创业处在初期的东风村人更多的机会。

## 五、总结

在东风村电商的发展历程中，理性选择和人情关系都发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孙寒等最初的创业人或许可以在对生产家具、开网店的经验的严格保密下获取理性经济人的最大利益，但是基于乡村的熟人社会下的人情法则，不得不向乡亲们传授经验，以换取其他方面的回报或避免社会规范的惩罚。而一个个东风村新兴创业人在基于“家具——网商”可复制模式的考量下前赴后继开始了电商之路。在东风村电商产业不断壮大过程中，人情关系使得大家即使在日益理性化的社会中互惠互助，这种人情让后来的创业者得以生存，也为东风村电商发展成一条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提供了条件。然而，在电商产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这种人情关系以及农民自身的局限性也使得他们的互惠与合作限制于较低的层面，比如借图、拿货等等，更大规模的合作或者集体化经营很难形成。东风村的网店全部都是家庭式的，即使较大规模的工厂也不例外，兄弟之间也要分开单干，“和别人一块干总有些矛盾，你干的少啦，我干的多啦什么的，原来我们这也有一起干的，都分开了。”（XS 访谈记录）而在缺乏这种深入合作而又夹杂着人情关系的情况下，东风村电商的发展也遇到了土地、资金不足、同质化竞争较

为严重、知识产权意识淡薄等发展瓶颈的问题，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还有待研究与实践。

### 参考文献：

- [1] 丁玉杰，2006，《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述评》，《社会学研究》，第12期。
- [2] 费孝通，1998，《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3] 黄光国，2004，《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4] 罗建发，2013，《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沙集东风村电商一家具产业集群研究——“沙集模式”的生成、结构与转化》，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论文。
- [5] 刘兴景，2007，《我国转型社会中社会关系的理性选择》，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硕士论文。
- [6] 张雄，1995，《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世界》，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

☆ 作者简介：冯 娜，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刘 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宣朝庆教授讲座：城市知识群体与乡村建设

2015年9月23日下午，“河海社会学论坛（第十二期）”在河海大学江宁校区水文楼401会议室举行，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宣朝庆教授做了题为《城市知识群体与乡村建设——民国社会学界的历史经验》的专题报告。本期论坛由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毅杰教授主持。

宣教授结合社会思想史和乡村建设史的相关内容，对报告主题做了详尽阐释。首先，1920-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破败、社会动荡引发了乡村危机，吸引知识分子们关注农村建设，并提出两条振兴农村的路径：1. 乔启明、吴景超等人建议农村走工业化道路；2. 杨开道认为必须从改良农村教育、平均地权、便利交通、开设农业银行、提倡农业合作、提倡农村自治等方面入手。

以上两种方案各有建树，但宣教授认为“杨开道方案”更具代表性，不过若想实施此方案，却难以找到合适的农村公共品供应主体，因为当时的中国政治势力争夺激烈，政权极度碎片化；而且政府治理理念并不重视公共品供应。既然政府不可靠，那农村公共品的供应只有靠地方社会的自力救济，但是士绅流失，让农村社区缺乏领袖人才，再加上农村文化中的公共意识发育程度较低，地方社会的自救效果不甚显著。

眼看农村社会遭遇如此困局，城市知识阶层开始真正地“走向民间”，从民谣采集到民众教育，从民俗调查到乡村建设，他们自学术研究起步，最终投身社会改造事业。在有限的条件下，他们开展了一系列“实验”，其中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定县实验具有较大发展潜力。

最后，宣朝庆教授与在场师生互动问答，对当代大学生做村官、村中富人反哺乡村等现象提出自己的看法。

# 沙集模式

## ——电子商务中的“文化反哺”对代际关系的影响

张 洁

---

---

**摘要：**本次调研报告试图通过访谈和剖析典型案例的方法，对沙集模式的发源地东风村农民自发形成、家庭小作坊式生产与电子商务相结合的生产模式展开探讨，尤其是关注由电子商务引发的家庭文化反哺现象，探讨文化反哺对当地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的影响。

**关键词：**沙集模式 电子商务 文化反哺 代际关系

---

---

### 一、“沙集模式”的兴起与发展

沙集镇位于睢宁县东部，地处苏、皖两省交界部，总面积 66 平方公里，辖 17 个行政村，人口 6 万。东风村，是沙集镇 17 个行政村之一，村子有 5000 左右人，一共有 13 个组，人均土地不足一亩。种植水稻、小麦、玉米，一年两熟。

由于当地的土地资源稀缺，种植的经济作物收入低，为了改变本村经济状况，东风村村民经历了创业三部曲：

第一阶段是 1982 年兴起的养猪业，自改革开放，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东风村开始生猪养殖，到 1995 年，养猪业发展到最高峰，全村每户平均养猪达到 10 头以上，每头生猪最高可以卖到 400 元左右的价格，养猪给农民带来了额外利润。但是，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加上市场上生猪供大于求，导致了生猪价格猛跌，农民的养殖收入降低，养殖业开始转型。

第二阶段是废旧塑料回收加工业。东风村村民受到仅有一河之隔耿车镇的塑料加工产业的影响，开始转型从事回收和加工双业务，为塑料产品制造企业供应原材料。一方面塑料加工产业也给当地村民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另一方面塑料处理技术水平低，塑料回收加工产业给当地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由于国家对于生态环境质量越来越重视，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法规，塑料产业低迷。

第三阶段是网店销售及加工业。由孙寒带头做第一家淘宝网店获利后，东风村村民纷纷效仿，从加工到网店销售，电子商务带动了家具的加工制造，板材销售和五金配件、物流快递、布艺加工等相关产业的兴起与发展。由于销售面广，产品适应市场需要，家具行业发展的如火如荼。

### 二、“沙集模式”中的文化反哺现象

#### （一）文化反哺的概念

美国人类学家 M. 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指出，当今世界的代与代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应该主要源于文化传递方面的差异，并从文化传递的角度，将人类社会的文化定义为三种基本形式：前喻文化、

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文化反哺”是周晓虹教授在借鉴米德所定义的后喻文化基础上,结合中国变迁出现的新的文化继承方式所提出的。“文化反哺”是理解处在急速变迁时代中国社会代际关系的一个本土性概念,它在由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所共同引发的变迁维度上理解中国社会代际关系的颠覆或倒置现象,由年轻一代将文化及其意义传递给其生活在世的年长一代的新的传承方式,在急速社会变迁时代,传统代际关系发生断裂,原有教化者(亲代)与被教化者(子代)关系颠覆。

## (二) 文化反哺层面

根据当前农村家庭中的文化反哺的基本内容,将其分为三个层面:科学知识与现代观念、休闲娱乐与消费活动、婚恋家庭与择偶观念。本次调查只侧重于科学知识与现代观念层面,是指东风村的青年外出将网络技术、知识、信息从现代城市向传统和落后的乡村转移,在乡村的父辈中传播现代意识和科学观念,成为东风村青年反哺父辈的时代缩影,这种反哺的层面又成为该村摆脱贫困的重要方式,并为村庄的发展进行了重要的积累。本次调查的重点是考察在科学知识与现代观念这一层面的“文化反哺”。通过对东风村淘宝街上几家商店入户访谈,来浅谈电子商务的兴起中“文化反哺”现象,并简单说明这一层面的“文化反哺”对于东风村当地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

## (三) “沙集模式”中的文化反哺现象

“沙集模式”的核心是“网络+公司+农户”。其中,农户是主体,公司是基础,网络是龙头,在沙集模式中,家庭经营的农户是发挥主导作用的主体,实体公司是农村产业化的基础,而电子商务平台所代表的互联网则是带动农村产业化的引领力量,电子商务平台又受年轻一代所掌控。以前从事破烂行业的老一辈人大都出生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左右,他们从一个贫困的年代走过来,不怕苦、不怕累,吃苦耐劳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符号,他们大多数人没有经历过现代高等教育的熏陶,而那些在“文革”或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孩子,盖因受益于 30 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享有良好的教育和成长环境,对于高科技信息的出现,更多的是积极态度,而老一代在面对新鲜事物时更多的是抵触心理,好多人连拼音都不会,更别提打字了。自高校扩招政策实行后,招生人数迅猛增加,这意味着有多少家庭现在会面临儿女“满腹经纶”,父母却“一窍不通”的尴尬局面。

在东风村以孙寒所代表的这一代年轻人,正好是赶在经济飞速发展,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阶段,接触到计算机、手机等新兴传媒工具,在他们眼里父母从事的塑料回收工作又脏又累,像是在垃圾堆里工作一样。年轻一代对于老一代的嫌弃,使他们宁愿外出打工,也不愿意在家和破烂打交道。年轻人被外面的世界所吸引,不断尝试新鲜事物带给他们的便利和好处。在老一辈看来,会玩计算机的都是在虚度时间,不务正业,村中老人一开始还在议论孙寒是啃老族,沉迷网络,肯定不是在干好事。而从“三剑客”创业成功后,好多年轻人加入到这一行列中,学习网络营销、计算机操作。老一辈的人看到玩计算机也能挣钱,慢慢的开始接受,自己也慢慢的开始接触网络,了解淘宝是什么,但是好多人对于淘宝还只是停留在网上卖东西能赚钱这个层面上,电脑方面也只是简单操作。我们什么也不

懂，都是他们在搞，我们用电脑也只能是听听歌而已。（东风村村长的访谈）

老一辈在计算机、手机等网络通信手段上受年轻一代的影响，关于新兴的传媒手段的相关知识也是从年轻一代学过来。年轻一代不仅在知识水平上面占有优势，而且外出务工也拓宽了他们的交际圈，对于老一辈来说他们增长了见识，见过很大的世面。在东风村几乎每家每户中年轻的一代在负责淘宝网店的的经营、售后服务、打理网店等与网络相关的事务，老一辈负责生产加工。即使家中没有开设工厂，老一辈会出去到工厂里面打零工，而年轻一代则利用周边工厂的资源，自己在家开淘宝店，轻松而且挣钱快。我儿子也在家开着一个淘宝店，在网上卖东西，他只管卖，从别的人家厂子里提货。我在家没事只能出来打个包装。儿子搞我不管。（家具厂打包工人的访谈）

东风村老一辈村民以前农副业都不是很发达，闲暇时间比较多，村民打麻将、婆媳、邻里之间打架现象比较多。受村中年轻一代的影响，有的也搞起网店，有的做家具生产，有些加工厂制造程序简单，对工人要求低，家里的老人都可以做，现在村中无一闲人。制造床垫很简单的，谁都能做，像我奶奶这个岁数的都能裁剪布料，可以帮我们。（椰棕床垫加工厂老板）。电商的兴起使家家户户劳动起来，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改变了原有的产业模式，婆媳之间、村民之间的关系也有所改观。家庭的人均收入每年 20000 元左右，村民打架的少了，打麻将的就更没有了，看到别人挣钱谁家也不闲着，家家户户都有点小钱，你家买宝马，我家买奔驰的，谁家也不会像以前一样，为了点小钱斗气了，整体的素质提高了。（东风村村长访谈）

### 三、文化反哺对东风村的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

（一）“文化反哺”引起的代际分工明确。因为老一辈对于电脑操作，网上营销方面的知识不足，然而年轻一代对于网络驾车轻熟，对于网店的管理、售后服务、营销策略方面比老一代有想法，所以在东风村淘宝街上的店面几乎是家庭中儿子、儿媳主要负责淘宝上的网店经营，在生产加工方面，则是家庭里的老一辈负责。

（二）随着新事物和新规则的出现，一方面使老一辈原有的知识架构、生活经验甚至价值判断丧失了解释力，难以传承下去，另一方面使年轻一代第一次获得了“指点”父母的机会。所带来的影响是年轻一代的话语权越来越重，而传统家庭中的父权式微由于老一代经营的塑料加工产业越来越不符合当地经济发展的主流，当地村民转向年轻一代所创办的电子商务模式，而且年轻一代的经济收入越来越高，占家庭收入主要部分，年轻一代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老一辈降为从属地位。儿子、儿媳很能干，我们这个懒人沙发很赚钱，卖的很好，我平时看看孩子，现在两个小孩了，他们忙不过来，我就帮着看，我也帮忙干活，当时我们学做懒人沙发时，是儿子的主意，这条街上做实木、板材家具的太多了，儿子觉得做的太多了还不如做点其他，从外地看到这个懒人沙发制作挺简单的，成本也低，利润也挺多的，具体卖多少我不知道，他们管着网上销售，我不管那么多，我也不懂那些东西。（懒人沙发厂老板的父亲）我不知道每天多少钱，我是帮他们呢，他们管着钱。（实木家具厂的工人的父亲，这家工厂是实木、板材都做，把实木家具制作这一块承包给邻村的一个木匠，然后这个木匠可以找家人、亲戚来帮忙，访谈对象是木匠的父亲）

(三) 与同辈群体的交往成为了年轻一代获取各种新知识和新的价值观念的途径之一,因此,同辈群体成了年轻一代影响或“反哺”父母的知识“蓄水池”或“扩展内存”。在东风村,孙寒最初在外地打工,返村后与同伴夏凯、陈雷商量着办网店,一开始只是做电话卡、小饰品等生意,后来三个人受宜家家具的启发,从简单的模仿制造与网店销售相结合,慢慢发展起来。夏凯的美术天赋加上陈雷的摄影技术以及孙寒的大胆想法,在当地促成了“三剑客”神话。孙寒等三人给东风村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网店经营加家具生产加工的经营模式,瞬间被本村及周边村民纷纷效仿,老一辈的人不断从他们这一代年轻人身上学到东西。

(四) 来自年轻一代的“文化反哺”不仅使老一代了解到了许多原先陌生的知识、开阔了他们的眼界,而且实实在在地提高了父辈的社会适应能力。东风村从养猪业转为塑料加工产业,在面临着塑料产业日渐消沉,很多家塑料加工产业面临着关门。在转型遇到阻碍的时候,东风村的年轻一代把电子商务引入,开启了沙集模式,拯救了父辈一代的职业危机,我们把零部件发出去,送货上门,零件只需组装就可以用了,只要产品适合市场,就好卖。一个月销量 2000 左右,还得从别的厂提货。现在工厂还缺工人,村子里的人都找完了,我们要从周边村子找人。买家选择我,不是我选择他们,有专门的图纸设计,批量生产形成市场,带动了附带产业,是家具工厂带动了木匠职业再兴起。在之前木匠也不好干,纯手工,效率太低了,一天做不成一件床,现在的机器多先进,又快又准,有手艺的木匠可以在任何家具厂子里找到合适工作,而且工资都在每天 200 左右。(中等型高低床制造厂的老板访谈)

#### 四、小结与讨论

在东风村中,由年轻人把网络手段加入家具生产、小家庭作坊式生产,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模式,也对当地的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冲击,从东风村扩展到邻村乃至沙集镇,吸引了外出务工人员,很多人选择在家创业,而且很多大学生毕业后在找不到好的工作时选择回家,缓解了市场劳动力过剩的压力,同时也带动了农村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农村的养老问题、留守儿童问题得到了缓解。文化反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的代际关系,以前是家长在家庭中占有绝对的话语权,年轻人必须得听从老人的命令,现在年轻人以他们的言行开始影响年长一代人。在长辈丧失教化的绝对权力时,年轻一代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反哺能力,他们开始将知识传递给他们生活在世的父辈。文化反哺的最终发展应是朝着亲子间双向的和平等的方向发展。既有父辈对子辈的教化指导,也有子辈对父辈的文化反哺。农村中文化反哺的出现标志着传统代际文化传承模式的革新。因为它彻底冲破了亲代为教化者子代为被教化者的角色规则,毫不留情地颠覆了千百年来由父及子、父为子纲的代际传承模式。在亲子代际之间,成功实现了子代对父代的文化反哺,影响了传统的亲子关系,代际之间的关系趋于和谐。其意义不仅仅是达成良好的亲子关系,更深层的意义在于意味着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教养观念的改变。

“文化反哺”的出现,也为解决代际矛盾、提高年长一代对急速变迁的适应能力提供了可能。同时,代际分工明确后,缓解了婆媳、父子代际之间的矛盾,奶奶照顾孩子,爷爷参加生产,儿子、儿媳负责电子商务,老有所依,其乐融融。

最后，在人类文化的传承历史上，“文化反哺”体现出的特征是空前绝有，只此一次。“文化反哺”出现的必备条件是：整个社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急剧变迁，这变迁使得同时生活在世的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出现巨大落差。从东风村现有的状况来看，急剧的变迁是不存在的，而且现在慢慢的会改变这种情况，因为现在年轻一代的子代在接受着很好的教育。我现在就想着让孩子好好学，孩子现在在镇上上学，成绩前三，英语基础差，我给她买了一个步步高学习机，每天晚上她都很晚才睡觉，写完作业后会学习一会英语。（海天布艺老板娘的访谈）

### 参考文献：

- [1] 周晓虹，2000，《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亲子传承》，《社会学研究》，第2期。
- [2] 王培刚、张登国，2007，《农村家庭中的文化反哺现象》，《当代青年研究》，第3期。
- [3] 周晓虹，2011，《文化反哺与器物文明的代际传承》，《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作者简介：张 洁，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盛倩倩



## 童敏教授讲座：社会工作理论的基本逻辑

2015年10月19日晚上，“河海社会学论坛（第十三期）”在河海大学江宁校区水文楼401会议室举行，厦门大学童敏教授做了题为《社会工作理论的基本逻辑》的专题讲座。本期论坛由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毅杰教授主持。

童教授从“社会工作如何具有专业性？”和“社会工作是否有自己的理论？”这两个问题为着眼点，深入地讲解了社会工作的理论逻辑。就社会工作是否有自己的理论这一问题，童教授与在坐的同学们进行了讨论，最终在童教授的指导下，大家一致认为社会工作没有自己的理论基础！

童教授就社会工作没有自己的理论这一讨论结果，为在坐同学讲解了社会工作早期的两理论，即心理社会治疗模式和功能理论。他认为心理社会治疗模式具有双重视角：既关注心理也关注社会，即社会工作的个人视角和环境视角。同时，他认为社会工作目前面临两种事实：分析事实和改变事实。基于这样的观点，他认为目前社工的发展状况有三个特点：1. 政府不够重视；2. 社会认知度不高；3. 社会工作者比较年轻，经验不足。在谈到功能理论的时候，童教授从塔夫塔和罗宾森等人的观点为切入点回顾了该理论的发展历程，为让同学们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如何才能做到理论联系实务，童教授让同学们发散思维把学习、工作、吃饭睡觉三者联系起来。这样的游戏，让同学们意识到在开展社工实务的时候要注意个人和环境的联系。

最后，童教授通过寓言的方式，把两种理论整合，告诉同学们问题就像是影子，逃避无法解决困境，因为问题就如影子随你而行，所以必须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 文化变轨：农村生活污染治理模式的演化

——以农家乐旅游业的水污染为例

蒋 培

**摘要：**农村生活环境不断恶化的状况，促使我们去思考环境污染产生的原因与应对机制。通过对农村环境污染状况的实地调查与研究，我们认为农村生活环境污染及其治理方式的变化与整体社会发展的大背景有着重要关联。从传统农村社会中以生存为导向的生存性文化模式下人类被动地适应生态环境，到工业文明时期利用高科技手段来控制自然环境的生产性文化模式，再到生态文明背景下人类主动地平衡物质消费与精神生活关系的生活性文化，这一系列污染治理方式转变的实质就是文化轨迹的变化历程。文化变轨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关联，尚若出现了重大转变也主要是由于人的文化思维模式有了变化。实际的文化运行轨迹脱离理想文化轨迹的状况，主要是由于人类各种不恰当的价值观念所导致的，例如生产性文化下的文化脱轨现象。但幸运的是，人类社会文化自身具有一种“反身性”的特性，对于不适当的行为模式能予以主动修复与纠正，从而制止生态环境继续趋于恶化与社会矛盾不断增多的状况的出现。

**关键词：** 规模养殖 粪肥利用 循环经济

农村生态环境污染的防治已经成为当前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促进农村、农民、农业发展的同时，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也已然成为了各地农村社会发展体系中至关重要的构成指标。但就当前我国大部分农村环境的实际情况来看，除了乡镇企业的发展所带来的一些工业污染问题外，农村面源污染状况也在不断地加重，这其中农村居民日常生活所产生的生活垃圾与生活污水等生活污染的影响就很大。由于当前农村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传统农村旱厕改为了水冲式厕所，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转变了传统社会人粪尿等有机肥的利用方式，转而大量的直接活间接地排入到了周边的生态环境中，这使得农村面源污染状况更加严重。此类由于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等造成的农村生活污染在一些农家乐旅游业聚集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随着近些年来农村旅游热潮的兴起，大量的城市居民在闲暇时间都到农村进行旅游观光，这极大地刺激了部分农村地区的农家乐旅游业发展。此类农家乐旅游业往往依托于周边的景区与旅游点，不仅为游客提供餐饮服务，还可以提供短期住宿，甚至有的地区还建立了各类适宜长期度假的度假区和别墅区来吸引外来游客到当地进行长时间段旅游。随着外来旅游人口数量在短时间内的快速集聚，所产生的各种生活垃圾与生活污水数量也大

大增加，逐渐达到了当地农村生态环境所能容纳的总量。这势必会在短时间内集中式、爆发式地产生较为严重的环境风险，造成区域生态环境状况恶化的可能性。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的恶化开始促使人们去反思各种理性经济行为的后果与不正确之处，不少地区开始尝试利用新的发展模式来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通过个别环节的适当疏通，原有农村生产生活循环模式重新流动起来，农家乐旅游业开始以新的发展面貌出现，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维持了当地生态环境的和谐与稳定。

在农村生活污染环境风险的不加大的同时，各种“治标不治本”的污水处理工程和污水厂项目大量上马，在短时间内对生活污染的处理发挥了作用。但是，通过实际调查，我们发现这种工业文明思维方式的产物同样遭遇到了资金不足、脱离农村实际、治理效果不佳等问题，且从长远角度来思考难以根治农村生活污水所带来的各种面源污染问题。相反，那些基于传统农村社会生产生活实践的循环处理模式在农村生活污染治理过程中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能够结合农村经济社会的实际背景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调统一。本文认为农村生活污染治理路径变化的本质是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农民自身价值观念的转变过程，这是一种文化轨迹变化的历程。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文化轨迹都趋向于遵照理想轨迹来行进，但是有时候会因为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出现实际轨迹不依照理想轨迹行进的情况，这时候就容易出现生态环境恶化与社会状况不稳定等问题。

### 一、农村生活污染及其治理的述评

我国传统的农村社会在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但是随着农村社会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乡镇工业的崛起与农业生产、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农村生态环境开始朝着不利的方向迈进。2007年国家环保局等八部委局出台的《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就明确指出农村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与迫切性。该《意见》指出，“农村环境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工业及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个别村庄饮用水还没有实现达标，一些农村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农民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的重要因素。”<sup>[1]</sup>然而，从2007年到现在，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理，反而在一些方面还有进一步趋于恶化的势头。这其中，农村生活面源污染问题就是其中一个主要的表现方面。根据近几年来国家环保部对全国废水排放源的统计数据，可以了解到生活源污染是水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详见表1。

表1：全国废水及其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年份	项目	合计	工业源	农业源	生活源
2011	废水（亿吨）	659.2	230.9	—	427.9
	COD（万吨）	2499.9	354.8	1186.1	938.8
	氨氮（万吨）	260.4	28.1	82.7	147.7
2012	废水（亿吨）	684.8	221.6	—	462.7
	COD（万吨）	2423.7	338.5	1153.8	912.8

<sup>[1]</sup>网站报道，2007，《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http://www.gov.cn/zwggk/2007-11/20/content\\_810780.htm](http://www.gov.cn/zwggk/2007-11/20/content_810780.htm)）。

	氨氮（万吨）	253.6	26.4	80.6	144.6
2013	废水（亿吨）	695.4	209.8	—	485.1
	COD（万吨）	2352.7	319.5	1125.8	889.8
	氨氮（万吨）	245.7	24.6	77.9	141.4

数据来源：资料来源于国家环保部网站，[http://zls.mep.gov.cn/hjtj/nb/2013tjnb/201411/t20141124\\_291868.htm](http://zls.mep.gov.cn/hjtj/nb/2013tjnb/201411/t20141124_291868.htm)。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全国的废水排放中生活源排放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都在逐步增大。在所有的排放污染源中占据着绝大多数的比例，已经成为最为严重的污染源。相应的环境污染治理任务迫在眉睫。长期以来，我国农村面源污染问题尤其是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污染并没有引起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与工业污染等问题相比，农村面源污染问题始终被认为是危害程度较小，影响范围有限等状况。但其实，农村面源污染所造成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对整个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是复杂而深远的。因此，这就需要我们更加关注农村生活污染问题，能够通过表面的各种污染现象的研究来深入挖掘问题背后的症结所在，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都予以重视。

面对如此紧迫的农村生活污染状况，环境治理成为当前最为重要的工作。从整体上来看，应对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不仅只是一项技术问题，更是一种社会文化机制现象。当前社会科学领域中有关农村面源污染的研究集中于经济学、管理学与法学等学科。从社会学研究领域来看，则多是从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的角度分析环境问题的成因，并探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行为方式等。陈阿江根据对太湖附近一个村庄的经验资料，分析了江南地区农村水污染的社会成因，认为传统社会保持水域清洁的原因在于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及村落社会规范，而90年代以后的水污染的加剧则主要是源自利益主体力量的失衡，村落自治组织的消亡及社区伦理规范的丧失。张玉林认为中国农村因环境污染所引发的社会冲突逐渐增多。这是与政经一体化增长推进机制有着重要关系：在以经济增长为主要任期考核指标的压力型行政体制下，GDP和税收的增长成为了地方官员的优先选择，从而导致了重增长、轻环保的污染保护主义倾向，受害农民难以获得补偿的权利，相应的污染纠纷也会随之升级。王跃生则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分析，认为制度因素对中国农户行为方式有较大的影响，制度因素对农村生态环境有着重要影响。乐波也认为，农村环境有着劣化的趋势，这是与这一时期的制度变迁分不开的，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基层治理体制的变革、法律对农村环境污染事件处罚的缺失等是重要原因。洪大用等提出环境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是特定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产物。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村环境保护长期受到忽视，环保政策、环保机构、环保人员以及环保基础设施均供给不足等一些因素，是导致农村面源污染问题的重要原因。王晓毅也认为，农村环境污染不仅仅在于经济发展初期的粗放式经营，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城乡不平等的二元结构和现在项目式的环境治理模式。如果不能改变环境治理模式，实现城乡统筹，农村环境问题不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自然改善。与此同时，农村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越来越被边缘化，由于农村的知识逐渐让位于外来的知识，农村权力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外界的力量在农村取得了越来越强的支配权力，而知识和权力的转移是导致农村环境问题的

重要原因。秦红霞等提出，农村环境问题尤其是面源污染问题是与村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有着极大的关联。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村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炫耀性消费和农村环境管理的滞后使农村的环境面临严重的危险。可见国内学者对农村生态生活污染的研究主要是侧重于污染产生的原因分析，而有关污染治理方面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少。

相比较于国内有关农村生活污染等面源污染的研究状况，国外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早，部分研究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进行。K. ANGER 对德国基尔湾南部地区长达半年的问卷调查发现，海湾内部部分生态系统遭到生活污水的影响且表现出季节性特征，这是受到了当地社区结构的改变，包括空间等级、稳定性、复杂性、常态性等因素的影响。FREDERIC BASS 对美国明尼苏达地区（大部分地区属于农村地区）的生活污水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社区、人口等因素的分类，他发现各种生活垃圾与生活污水对不同类型的群体在疾病影响上有着显著的差异。STEVE HAMNER 等通过对印度 Ganges 河周边居民的问卷调查发现，由于 Ganges 河周边地区的居民每天向河中倾倒入 2 亿升以上的生活污水，导致该河面源污染十分严重，并且导致了周边居民尤其是那些生活条件较差、教育水平不高的人群遭受着疾病的困扰。Will Joseph Brownlie 等通过对苏格兰地区 156 位私人生活污水系统使用者（PSS）的问卷调查发现，有效的 PSS 利用者能够形成较低的磷（P）污染状况，这主要是每个个体的环境行为有着直接关联，等等相关研究。虽然国外相关研究起步较早、范围更广、手段更多，但在内容上同样主要是从原因的角度出发，缺乏对相应面源污染问题的对策性分析。因此，本文就主要是通过对农村生活污染的调查，来分析农村生活污染产生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以及治理路径的演变过程。

## 二、传统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对接及其生态效应

在传统农耕社会农民的日常生活、生产中，几乎不会产生任何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等方面的面源污染问题。传统农耕社会是一个在较小的范围内能保持物质与能量循环稳定的社会有机体。在此类社会中，日常生活、生活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类废物都能通过自身的生产生活模式运作而得以有效地容纳和消化，所以，传统农耕社会是一种“有垃圾而无废物”的社会。美国学者富兰克林在论述古代东方各国利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废物时，曾说，“当反思我们农场的土地在不到 100 年的时间里就耗尽了肥力的原因，以及为了保证土地的年产量而不得不施用巨量的矿物肥料时，我们便意识到必须深刻了解和认识东方人自古以来一直延续的施肥方法，因为这种方法，中国人利用 1/6 英亩的良田就足以维系一个人的生存。”传统农村施肥利用方式，不仅能够解决肥料紧张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很好地避免各种环境污染。陈阿江等也提出，传统农耕生态平衡最重要的环节是在农户层面上完成的。人及家禽家畜所需，主要来自于村庄范围内的物产，而他们的排泄物又回到土地成为植物的养分，形成土地——庄稼——牲畜——人群之间的物质与能量的平衡。在这个较为封闭的社会有机体内部，不同的部分之间可以形成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保持整体的均衡与稳定。在传统农村生产生活机制中，不同的模式之间是相互衔接的与共同发挥作用，能够保障生产-生活领域之间的有机联系。

从传统农村社会来看，基本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不需要太多的外部输入也没有过多的输出状况，保持整体上的一致性。首先，从外部输入角度来看，并没有各种复杂的物质材料的进入，例如化肥、农药等化学物品。所以，不会存在传统农村社会难以应对的局面。其次，从输出的角度来看，农村社会所产生的各种废物可以很好地进入到生产领域中。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剩菜剩饭等厨房废物都成为了牲畜的食料，各种牲畜、人的尿、粪便等都是较好的农家肥料，进入到田间地头。最后，从传统农村整体的生产、生活方式来看，民众并没有过多的追求高产量、高生活品质的价值观念与思

想文化。在此类文化思想的引导下，民众对于自然资源的索取与利用都是相对比较有限的，有助于自然环境通过自身的修复与净化来维持整体自然状况的平衡、有序。陈阿江等曾设想了一个传统农村的村庄模型（详见图1），在整个传统农村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可以维持区域范围内的自我循环与生态的稳定，实现了村庄内部不同主体之间的有效合作与相互沟通，保持社会有机体的和谐统一。从图1中可以看出，整个农村社会是一个很稳定与封闭的社会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农民的生产生活行为都是依照当地的自然环境状况来开展的，并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社会生活文化体系，或者可以称作是地方性文化。文化的作用是能够不断地传承给下代子孙且作为日常生产生活行为的规范准则，继而持续地巩固与保持地方性文化的长期存在。可以发现，地域的封闭性、社会有机体循环过程的封闭性与文化系统的封闭性等相互联系在一起，相互影响与作用，进一步实现不同系统的封闭与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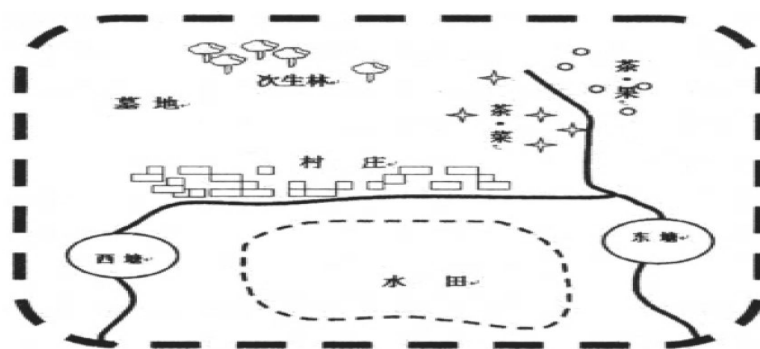


图1：传统农村生产生活示意图

在传统农村社会生活过程中，长久以来形成的地域文化对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按照费孝通先生的理解，传统农民都是在农村社会中“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个群体，农民是极度依赖于土地等资源，可以说是粘在土地之上的。因此，在这样一种生存方式的压力之下，每一个个体都力求通过土地来养活自己和家人，实现和保障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结合当时社会的技术、文化与经济等状况，传统农村实质上就是一个较为独立的生存系统，农民时刻受到这种基本的“生存性文化”的影响。在这种生存性文化作用之下，农民需要长久维持土地的地力与克服不利因素的产生，保持各种物质资源都能够得到有效利用并创造出相应的价值，以期实现最大化物质收获来满足家庭生计需要。

因此，从传统农村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各种生活污水（按照现在的理解主要包括厨房污水和厕所污水）很多都被作为牲畜的食料和田间地头的肥料所消化，基本没有什么外排入外环境的废物。此外，相比较于现代的生活模式，传统的如厕工具主要是以旱厕为主，没有太多的水参与其中，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废物所产生的总量，减少了相应的生态危害。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生产技术与生活观念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很多农村地区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生产、生活模式，这导致了原有农耕社会中的物质能量循环的断裂，各种废弃物不断增多且难以完成自我消解，从而造成当地社会的生态环境状况不断恶化，农村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污染问题也开始呈现出来。

### 三、经济理性下农家乐水污染风险与治理实践

在现代性的生产生活方式下，原有的农村生产生活方式显然难以抵御住新社会思想文化冲击下的生活方式，而这其中以农家乐旅游业的发展表现得最为突出。农家乐旅游业发展所导致的水污染风险，是农村生活污水面源污染的一种集中化模式的体现。通过农村农家乐旅游业集聚地区生活污水污染状况的调查，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农村整体的生活污水面源污染现状。本文选取浙江省北部地区的一个村庄——白村作为调查点来进行研究。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发展农家乐以来，白村所在的地区农家乐旅游业发展模式已经非常成熟，当地不仅有大量的以餐饮和住宿为主的消费服务，同时还衍生出了以长期租赁服务为特色的度假旅游区。在当地农家乐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餐饮和住宿服务的大量消费给当地居民的经济致富带来了机遇。但与此同时，随着产业发展的无序化扩大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人口聚集所产生的各种废弃物也慢慢逼近当地生态环境的可承载容量，容易造成了以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为主的各类生态环境风险。

白村农家乐产生的生活污水主要来源于两部分：厨房污水和卫生间污水。首先，从厨房污水方面来看，厨房污水主要是当地大量餐饮行业发展所带来的，由于在旅游高峰期，大量的外来人口进入当地进行餐饮消费，所产生的生活污水远远超过了当地农村原有的各类基础设施的污染消解容量。就以 2010 年白村的旅游人数总量 26 万余人次为计算依据，假设每人只在当地逗留一天，每天增加的人数就高达 700 多人，给每个农家乐经营户增加约 5 个人的负担。但在实际调查中，我们可以发现，外来游客往往在节假日会在当地长时间逗留与居住，有的游客居住时间甚至长达二、三个月，所以，在实际情况中相应的餐饮业所产生的污水量会更大。此外，以上数据中还没有包括各种在当地购买了度假房的外来“新村民”<sup>[1]</sup>，这类居住群体所产生的餐饮垃圾与污水数量也是巨大的。其次，从卫生间污水情况来看，可能造成的影响会更大。在实地调查过程中，笔者了解到当地农家乐旅游的高峰时间段主要集中在每年的 7、8、10 这三个月，在这三个月的时间段内大量的游客涌入到当地，人口的爆发式的聚集所产生的大量生活污水会对周边生态环境构成巨大的打击。

农家乐经营户数量的增多与规模的扩大，所产生的生活污水数量也直线上升，但与之配套的各类污水处理设施却仍没有跟上，当地农民仍以传统农村房屋化粪池或者三格式沉淀池为主来处理生活污水，甚至有的经营户直排各类生活污水，丝毫没有顾及到周边的生态环境状况。从实际调查过程中可以了解到，当地政府部门其实在农家乐旅游业发展初期就意识到了相关的问题，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与手段来应对农家乐所产生的各种生活污水。在此，引用 2013 年当地县旅游部门发布的《关于重点农家乐特色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工程建设工作的情况汇报》，该报告中指出，“2008 年以来，市委市政府进一步加大了重点农家乐旅游特色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工程建设的力度，在旅游、环保、农办、能源办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和服务指导下，在有关乡镇、村的努力下，工程建设有了实质性的突破与进展，共计有 28 个重点农家乐村（点）建成污水处理系统工程并投入运行，基本实现全市重点农家乐旅游特

---

<sup>[1]</sup> 2014 年春节前夕，笔者到白村进行调查，在村委办公楼前面看到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欢迎白村新村民回家过年！”。这主要就是指在白村购买了当地的“小产权房”的外来消费者，所以，在此，笔者也以“新村民”一词来代替这部分群体。

色村的全覆盖；683户农家乐经营户实现截污纳管，占全市经营户比例的81%，预计总投资达2000余万元，建设资金由市级有关部门不少于50%配套补助和其余由乡镇、村自筹方式进行拼盘。其中，里畝水库库区内已完成太湖源镇白村···”。从当地政府的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当地农家乐截污纳管的工作从2008年就开始落实，并且包括白村在内的一大批农家乐产业特色村庄也是按规定建设了相应的污水处理设施，那么农家乐的生活污水污染的实际处理情况又是如何呢？

通过笔者的实地调查，从当地农民的访谈中了解到，虽然政府出资建设了一些排污水管，但很多都是在路边铺设了一些管道，终端的污水处理设备都没有建立起来，很多农家乐经营户的污水管道也没有接入主管道中，所以，整个污水设施工程建设是一个形象工程，难以发挥任何实际效果。同样，这些情况也在笔者对当地县旅游部门和环保部门工作人员进行访谈过程中得以印证。按照当地县旅游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说法，现在很多农家乐特色村庄与聚集地区基本都进行截污纳管，很多地区甚至可以说是100%实现了污水纳管，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却难以发挥出效力，一是设施建设不完全，很多只是建设了一部分工程，存在形象工程的嫌疑，中看不中用；二是实际完成全部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村庄在污水处理中的实际使用率偏低，甚至有些村庄存在平时从来不用，上面来检查就开动一下的现象。

在这种以经济理性思维方式主导之下的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农民都趋向于更多的物质生产和经济价值，利用大量的现代技术与高效资源来实现量上的增加，例如，传统农家肥逐渐被化肥所取代；农药的使用量也在不断增加；日常生活中的物资消耗转向外部市场输入，各种牲畜饲养行为都几近消失，转而从事更有经济价值的商业行为，等等。正如施耐博格所提出的“跑步机”理论，大量的生产为的是获取大量的经济利益，而大量的消费则是一种社会文化所造成的，大量消费往往意味着个人的一种成功的社会地位的体现。这种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的行为模式，往往会导致一种不正常的消费文化，即使实际所需的消耗远没有这么多，与此同时，这些行为也容易导致极为严重的生态负面效应。这种行为模式产生的根源则在于民众的价值观和文化思维的变化，在此，民众并不仅仅满足于一种生存文化的需求，而是开始崇尚一种新的“生产性文化”的追求。这种生产性文化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满足于自身的物质追求而是为了实现在社会生活中的攀比、炫耀与夸奖等心态的一种满足。在这种生产性文化引导下所生产出来的各种物质资源已经超过正常社会物质需求上限，而且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废物也大大影响了外在的生态环境。

#### **四、新时期农家乐水污染治理的探索与尝试**

随着农家乐生活污水所造成的严重生态影响，很多地区开始寻求新的发展模式，以此来实现传统农村生产生活循环模式的重建，并保持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和谐统一。在此，我们选取与白村同县的童村为例来说明新时期农家乐水污染治理的新模式。童村位于该县的西南部，主要是以农业、林业、旅游业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全村开办农家乐的经营户近十家，可以说是农家乐发展的雏形阶段。童村可以说是大山中的“世外桃源”，生态环境优美，村庄内古建筑保存完好，村落的文化气息浓厚，形成人与生态的和谐统一。但是，在新农村建设的最初阶段，童村也遇到了不少问题，生活垃圾乱堆乱放，生活污水乱排放，牲畜粪便臭气熏天等都是当时村庄实际生活中存在着的真实情况。随

后，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当地村委也开始按照县农办新农村建设的规定与要求，开始设立垃圾回收箱回收生活垃圾与铺设污水管道来进行统一处理生活污水，但实施的效果并不尽人意。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童村位于山谷地带，与周边的村镇距离较远，进行垃圾回收处理的交通运输成本过高，村委难以承担；二是生活污水进行统一纳管处理后，农民没有了足够的农家肥与有机肥来种植蔬菜与培育苗木，而且生活污水的生化处理成本也很高，此外还要附加一定的设备日常维护费用。正是上述原因，促使当地农民思考如何从本村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形成一套合理有效的处理生活垃圾与生活污水的方法与手段。经过不断尝试与比较，童村最后确立通过建设高标准的人工沼气池来有效处理部分生活垃圾、生活污水以及牲畜的粪便。沼气池的循环利用模式，不仅能够为农民提供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燃料，减少对树木的砍伐，也有效地处理了各类可腐烂的生活垃圾、生活污水与牲畜粪便，同时也保障了农民日常生产所需要的农家肥。与此同时，村委在村周边建立了垃圾焚烧炉，通过对生活垃圾进行简单的分类，对可回收部分进行回收利用，对不能回收部分进行焚烧处理，既减少了垃圾的数量也降低垃圾运输与填埋所需要的成本。通过沼气池循环利用项目的建立，不仅减少了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等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同时也为农民提供了更为清洁的燃料与便利的农业生产条件，大大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同样，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通过传统农耕社会的物质能量循环模式可以重新构建起现代社会的循环路径，详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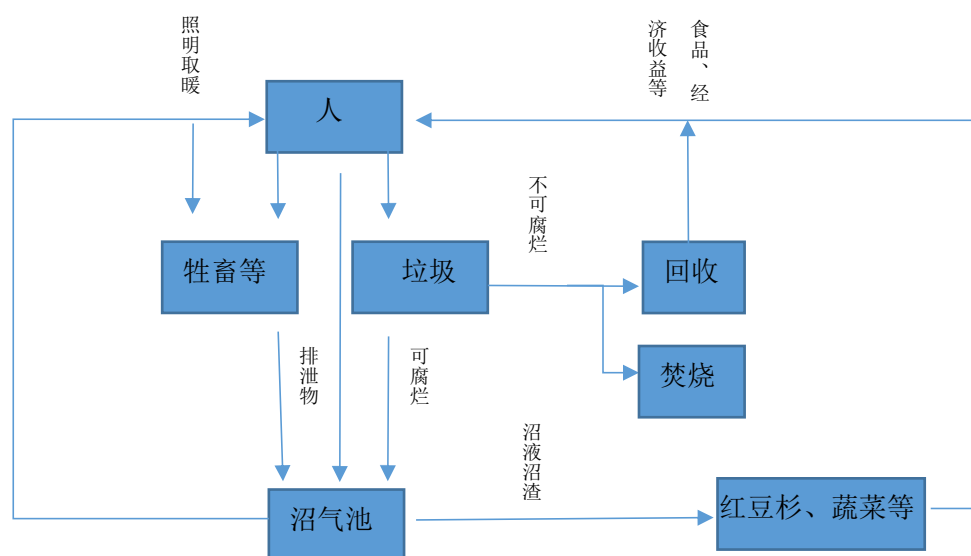


图 2：童村村民生产、生活中的物质能量循环

因此，从童村社会发展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现代社会文化与传统农耕社会文化得以良好结合的前提条件下，地方社会不仅能实现当地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更为重要的是仍可以保持一种稳定、良好的生态环境，在经济与环境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当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村庄都有其自身地域与文化上的特殊性，不能通过一些简单的照搬照抄方法来嫁接农村社会发展模式，而是需要



充分发挥出当地居民自身的积极性来寻找一种适合当地社会结构与文化的前进发展之路。正如美国社会学家 E·希尔斯所言,这类文化具有一种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实质性传统”(substantive tradition)特征,这种特征能够伏脉千里,千年不倒,在当代社会中继续存在,它们同敬重权威、思念过去、信仰上天等人类特殊的情感一样,适应了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的原始心理需要。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外来文化的侵入会转变原有传统社会中的各种生产、生活方式,就有可能与周边的自然环境与生态系统不一致,这就需要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能始终秉持自身社会生活环境中的各种地域性文化,实现不同文化间的有机融合,共同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作用。

鸟越皓之在环境社会学研究过程中提出了“生活环境主义”的理论视角,认为应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待与应对各种生态环境问题。生活环境主义是通过尊重和挖掘并激活“当地的生活”中的智慧,来解决环境问题的一种方法。或者说,就是既能从生活的角度“安抚”自然,又能使其成果得到反馈,用来改善并丰富当地人的生活的一种方法。笔者认为,这种思维方式对改变经济理性之下的盲目生产而不顾外在生态环境状况的生产性文化有着重要启发意义。以生活环境主义为引导的农村生产生活模式,在注重物质资源需求与经济利益获取的同时,也逐渐开始关注各种舒适的生活环境与生态条件,努力保持经济与生态两者之间的一种稳定与平衡,呈现出一种“生活性文化”的取向。生活性文化下的农村生产生活能够很好地维持物质生产与外在生态环境之间平衡,实现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统一。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生活性文化与生存性文化表现出极为相似的文化意涵与行为模式,但从本质上来分析,两者所处的层次与地位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首先,在物质生产上,两者差别很大,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生产效益,物质生产在生活性文化指导下几乎不存在任何阻碍,但这却是生存性文化下的最难以破解的困境。其次,从行为模式分析,生存性文化中个体行为往往迫于现实的压力而做出一种趋于中和行为,具有很大被动性。然而,在生活性文化下,个体具有很大主动权来控制物质生产与外在环境影响间的关系,主动权往往掌握在生产生活主体的手中。

### **五、结论：文化变轨——“人与生态”关系的影响机制**

从农村生活污染治理尤其是生活污染治理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从表面上来分析只是技术手段与实际应用模式的不同,但从其背后的社会文化运行机制的本质上来分析,则是维持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文化背景的不同。从生存性文化的存在,到生产性文化的蔓延,再到生活性文化的诞生,无一不是整个社会发展与变化的结果,而这一切都可以归因于人类自身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在主动与被动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保持自身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统一,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协调一致。

在人类的生存历程中,从以生存为主的农业文明社会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逐渐过渡到了工业文明社会,然后又由于外在环境的变化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新的影响,从而出现了强调人类自身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共存的生态文明社会,认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从文化变轨的角度来看,则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以生存性文化为主的农业社会;(2)以生产性文化为主的工业社会;(3)以生活性文化为主的生态社会。在第一阶段,由于人类自身的工具手段和认知

能力的限制，对于自然资源和外在环境的掌握能力有限，难以实现大范围与深层次的开发利用，而是被动地利用一些简单农业生产方式，极大地受到自然环境的控制，也难以对自然界造成较大的危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比较简单且可以保持相互之间的平衡。与此同时，在人类社会中，由于简单生产机制的作用，人们都为了满足基本需求而进行生产，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不会太大，绝大多数的个体之间的生存状态具有相似性与一致性。在第二阶段，由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高科技，生产活动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大部分群体都积极加入到生产活动中，生产所带来的大量产品远远超越了人们日常生存所需的规模，但个体的自我占有欲望却在不断膨胀，各种炫耀性消费、攀比性消费模式层出不穷，大量的消费品被生产出来，自然资源的耗竭程度加大和各种废弃物数量却在不断增加。以炫耀性、攀比性心理为代表的生产性文化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整体的生态环境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并且逐渐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活环境与精神性需求。在第三阶段，则由于外在环境变化对人类自身的影响，部分人类群体开始明白人类自身的各种观念文化与生产机制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通过强调自然环境的重要性来限制人类各种过度消费行为，保持自然环境的稳定与和谐，把人类的精神需求与物质需求统一起来。在这个阶段，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逐渐从之前的紧张、对立走向统一与协调。

总结来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化主要是文化因素的作用所导致的，从生存性文化转变到生产性文化，再到生活性文化，人类自身在外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中通过长时间的探索与实践来形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整个关系模式变化的背后就是文化变轨的过程，在生存性文化之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被动式的稳定；在生产性文化之下，人与自然之间出现了不和谐状态，外在生态环境趋于恶化，各种灾害发生的概率不断增加；在生活性文化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又开始趋于稳定、统一，但这种关系与生存性文化之下的关系有着很大区别，人类主动意识到外在生态环境对自身的重要性，实现了一种主动式维持生态环境稳定的能力。所以，从不同的文化阶段来分析，人与生态之间的关系就是文化内涵的变轨过程，在生存性文化与生活性文化阶段，两者之间的关系总体稳定、和谐，可看作沿着正确的轨迹行进。但在生产性文化阶段，文化出现了变轨，脱离了原来的轨迹，人与生态之间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与矛盾。通过对三个阶段的概括，我们可以通过下图 3 来呈现整个文化变轨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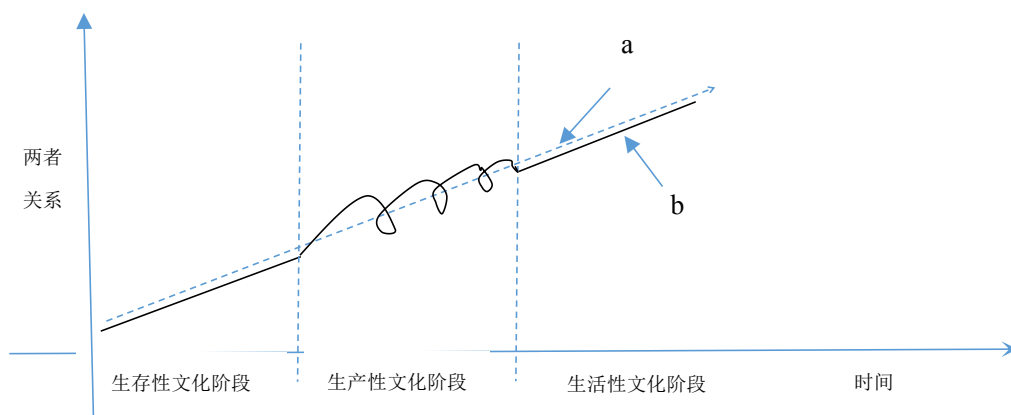


图 3：文化变轨的三个阶段

通过对上图的说明,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文化变轨的整体过程与转变形式。其中,a所代表的虚线可以看作是人与生态之间关系背后的理想文化轨迹,在此轨迹上,人与生态和谐相处,可以称作是一种理想类型。这种理想的文化轨迹实际上是由自然环境状况所构建而成,始终是保持人类与自然之间协调统一的重要准则。b所代表的实线则是人与生态关系背后文化轨迹的实际路线。在大部分时间内,实际路线与理想路线之间是存在着相似或者统一的运行轨迹,这也是维持生态环境和谐统一与整体社会稳定繁荣的重要准则。但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能一直保持两者轨迹的统一,例如在生产性文化阶段,由于社会发展中人类自身文化的变化,导致实际轨迹与理想轨迹之间出现了脱节,相互之间不能够很好的契合,从而也演化出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与社会矛盾等。从整个文化变轨历程来看,实际文化轨迹的运行路线始终是围绕理想文化轨迹来行进,虽然不同时间段的运行轨迹偏差会有很大不同,但两者之间始终是相互影响且以理想文化轨迹为中心。这也可以通过人类社会的“反身性”(reflexivity)文化来予以说明,正是通过对日常生产生活状况予以不断地反思与自我监控,才能逐渐纠正各种不正确的日常思想与行为。正如卢曼所理解的,“反身性”主要指社会系统的“自体再生”(autopoietic),如我们不仅能说话而且还能通过语言来谈论语言,这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基本的构成原则。“反思”或“自我反思”也是社会系统得以构成和维系的重要手段,但它指的是人格化的社会系统对自身认同的谋求,通过反思,即向后看,社会系统能建立起关于自身的协调的历史,从而保持着自身的活力和革新能力。通过人类自身的“反身性”文化来逐渐转变社会发展中各种不利的局面,实现人与社会之间矛盾的修复,树立起正确的社会价值观与文化思维模式。

### 参考文献:

- [1] 陈阿江, 2000, 《水域污染的社会学解释: 东村个案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第 1 期。
- [2] 陈阿江, 2007, 《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太湖流域水环境恶化社会文化逻辑》, 《学海》, 第 1 期。
- [3] 陈阿江等, 2013, 《游牧的小农化及其环境后果》, 《学海》第 1 期。
- [4] 费孝通, 2013, 《乡土中国》, 北京: 中华书局。
- [5] 富兰克林·H·金, 2011, 《四千年农夫》, 程存旺、石嫣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 [6] 洪大用、马馨芳, 2004,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农村面源污染问题研究》, 《社会学研究》。
- [7] 乐波, 2011,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农村环境问题》, 《江西社会科学》, 第 10 期。
- [8] [美]E·希尔斯, 1991, 《论传统》, 傅铿、吕乐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9] 鸟越皓之, 2009, 《环境社会学: 站在生活者的角度思考》, 宋金之译,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 [10] 秦红霞等, 2006, 《村民生活方式与农村环境问题》, 《上海经济研究》第 7 期。
- [11] 王晓毅, 2014, 《农村发展进程中的环境问题》,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第 2 期。
- [12] 王晓毅, 2010, 《沦为附庸的乡村与环境恶化》, 《学海》, 第 2 期。
- [13] 王跃生, 1998, 《中国农业的环境生态问题》, 《经济学家》, 第 10 期。
- [14] 张玉林, 2006, 《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与中国农村的环境冲突》, 《探索与争鸣》, 第 5 期。
- [15] K. ANGER, 1975, *On The Influence Of Sewage Pollution On Inshore Benthic Communities In The South Of Kiel Bay, Helgolander wiss. Meeresunters.*
- [16] FREDERIC BASS, 1914, *SEWAGE DISPOSAL AND STREAM POLLUTION IN MINNESOTA*,

Washington,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7] STEVE HAMNER, 2006, *The Role Of Water Use Patterns And Sewage Pollution In Incidence Of Water-borne/enteric Diseases Along The Ganges River In Varanasi, In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Research April.

[18] Will Joseph Brownlie, 2015, *Assessing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ur In Relation To The Management Of Pollution from Private Sewage Systems*, Human Ecology.

[19] Michael Bell, 2004, *An Invitation to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Pine Forge Press.

[20] Luhmann, N., 1982,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作者简介：蒋 培，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2 级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闫春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沈关宝教授讲座：中国的城市化问题

2015 年 12 月 3 日下午，上海大学沈关宝教授在河海大学江宁校区厚学楼 401 会议室做了题为：中国的城市化问题的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主任陈阿江教授主持。社会学系部分老师，以及社会学系博士、硕士研究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沈关宝教授从费孝通先生的《小城镇》一文出发，分两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当前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及其存在的问题。第一个方面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三个阶段，分别为小城镇复苏与农民亦工亦农阶段、城市发展与民工潮阶段和城市扩张与失地农民阶段。沈教授认为，在第一阶段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小城镇发展是一个可逆的过程，农民在此过程中是有退路的，是没有脱离传统的乡土气息的，是能够落叶归根的。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大规模农民离开家乡到城市打工，形成所谓的“民工潮”，由此带来了农民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村落空心化、经济凋敝等一系列的问题。到了城市扩张阶段，大量的农地作为城市建设用地，所带来的失地农民问题则更为严重。由于有限的理财意识，农民用得到的土地补偿款解决生活所需，甚至消费在娱乐活动上，而一旦他们的钱财消费完了，又没有相应的收入保障，就会带来后续的生活和发展困境。第二个方面是新型城镇化的三个核心问题，分别是“市民化”问题、“均等化”问题和城乡一体化问题。沈教授指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均等化”，是指经济领域之外的均等化，包括所有公民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最重要的是在文化和哲学意义上的人的主体的均等化。

此外，沈关宝教授分享了他当前所研究的社区发展问题，提出新型社区发展的四个目标：1. 经济目标，使得每个劳动者都具有进入现代经济体系的能力；2. 政治目标，法律的完善与社会秩序的维护；3. 社会目标，认清中国现状，找出影响社会资本流失的因素，重建社会信任；4. 文化目标，形成能够凝聚全民族的多元文化。

讲座结束后，各位老师以及一些学生就“社会理想”、“文化发展”、“中国城市化未来发展趋势”和“出身于不同背景的学生应如何做社会学研究”等问题对沈教授进行了提问，沈教授针对问题一一做了解答。最后，陈阿江教授对讲座进行了简要的总结与点评，并表达了对沈教授指导本校社会学学科建设的谢意。与会人员表示参与此次讲座受益匪浅。

# 浅析美丽乡村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金巧巧 顾金土

---

**摘要：**环境治理是一项全民参与的系统性工程。加强乡村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有助于纠正“政府失灵”现象并增强政府的合法性；然而，乡村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仍明显不足，具体表现为：公众参与意识薄弱，能力水平较低。为此，提出完善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对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政府抓好自身定位，适当转变职能；培养地方环保 NGO，拓展公众参与环保的路径；增强公众环保意识和能力。努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美丽乡村 环境治理 公众参与

---

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共建“美丽中国”的概念，强调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随即在 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了要建设“美丽乡村”的奋斗目标，从而进一步加强农村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综合整治工作。但是，我国农村建设在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的同时，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形势依旧严峻，突出表现为面源污染加重、工业化污染加速、生态退化严重等，环境问题已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马永芬，2010）基于环境资源的公共性特征，乡村环境治理作为一项综合性、系统性的工程，即需要政府部门履行环境管理职能，也不可缺少公众的积极有序参与。但现实中，公共参与在乡村环境治理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政府自身定位不准确；公众参与渠道不畅通；公众参与意识薄弱等等。鉴于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采取适当措施，改善乡村环境公共参与问题，促进乡村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

## 一. 加强我国乡村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的必要性

### （一）有助于纠正“政府失灵”现象并增强政府的合法性

在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发挥着重要的主导性作用，但政府也不是万能的，政府在环境治理中存在着许多失灵的情况。首先，政府人员数量少且能力有限，面对日益复杂和繁重的环境事务，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能够获得解决问题的全部信息和知识。针对众多的公共环境问题，政府在现实中常常由于信息的不完备而导致决策失误。而农村中的村民是与公共环境联系最密切的人，村民的积极参与和信息反馈有利于减少政府组织内部的决策错误。其次，政府官员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都有自身的利益倾向，他们往往内含着自利的动机，容易从自身的立场、观点出发，在决策中反映自己的价值观。（黄大熹、汪小峰，2007）而公众的积极参与能对政府人员起到有效监督的积极作用，防止政府人员在决策和执行过程中以权谋私，进而提高政府形象的公信力，增强政府的合法性。总之，公众参与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纠正“政府失灵”现象，增强政府的合法性，推进公共治理目标的实现。

### （二）有助于实现公民权和环境民主

---

\*本研究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江浙沪沿海工业污染的社会风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编号：13BSH026)

在市场经济建立与完善过程中，社会利益格局高度分化，出现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各种利益主体为了争取更多的利益，其政治参与意识以及民主化的要求显著增加，它们要求参与同自身利益关系密切的公共政策，要求政务公开，并通过这些途径力争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中能够反映、兼顾他们的利益。（刘慧，2014）在农村的经济体制下，公众参与的过程是村民在参与中不断学习和提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村民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参与环境事务的能力不断提高，会积极采取措施维护自己的环境权益，也为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加强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是体现村民利益诉求、促进公民社会发展的必要途径和具体表现。

### （三）有助于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美丽乡村”建设，是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的统一体，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龙头工程，其中农村的环境治理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突出特点，如土壤污染、水源污染、工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等面源污染，以及环保行动的广泛性，急需在环境治理中加大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公众参与有利于决策内容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有利于提高村民的环保意识和环保使命感，继而促使村民积极主动防治污染，创造优美宜人的农村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提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

## 二、我国乡村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的困境

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是指在农村环境治理中，公众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规定，平等参与与其环境利益相关的一切活动。（徐成，2015）目前，农村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明显不足，总体表现为被动参与状态。

### （一）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

2003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政府机关要对可能造成不良环境影响并直接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专项规划，应当在该规划审批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意见，明确了民众在参与公共决策的环境权益。在我国的环境立法过程中，也对公众参与作了一些规定，如《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危害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2015年1月1日新出台的《环境保护法》更是扩大了环境诉讼的主体范围，将民间力量有序地纳入环境治理的机制中。但不可否认，乡村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在现行法制中仍存在诸多缺陷。

首先是农村环境治理法律政策的空白。我国一直以来实施的是重城市轻农村的二元化环境治理政策，目前实行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也是针对城市区域发展制定的，并不能适应农村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需要，缺乏专门针对农村环境治理的特殊性而制定的法律法规。其次是相关法律法规过于原则和抽象，缺乏可操作性。虽然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的权利在法律上得到肯定，但内容简单，缺乏具体的执行措施或制度，无可操作性。

### （二）政府自身定位不准确，职能转变不到位

快速的社会转型导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地方政府在乡村环境治理中角色失调。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农村经济发展了，政府的执政水平和职业素质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许多政府官员仍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政府是公共事务主体，居于支配地位，而公民是事务管理对象，处

于被支配地位。各级政府尤其是县乡等基层政府依然将自己定位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能型政府”。另一方面，在社会转型时期，政府职能普遍出现了“缺位”与“越位”的现象。“权力越位”，即决策前无需征询公众建议或仅是象征性的听取公众意见，而作出决策时却未参考公众的良好建言。“权力缺位”，即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领域，却总是不到场。（唐建兵、武香利，2014）此外，地方政府中的决策者受发展观念的影响，基于理性主义的政府部门拥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和积极性，很容易为追求经济利益而无视对农村环境的破坏而引入一些污染项目，进而会损害村民利益，挫伤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在政府的管治下，公众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意愿和热情会大大降低。

### （三）地方环保 NGO 作用有限，公众参与渠道不畅通

我国公众可以通过政治性和社会性两大途径参与农村环境治理，但由于村民普遍文化素质不高，不愿触碰行政、司法等参与途径。环保 NGO 的出现则为公众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社会性参与途径。环保 NGO 作为政府组织职能的必要补充，在组织公众参与环保活动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现实情况中，农村环保 NGO 数量极少，且能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一方面，由于农村地域的局限性，环保 NGO 大多都分布在城市，农村地区鲜少；且受到地方政策局限性，组织的合法注册门槛高。2006 年《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状况蓝皮书》统计，我国存在的环保 NGO 有 2768 家，其中政府部门发起成立的民间组织占 49.19%，民间自发组成的占 7.12%，学生环保社团及其联合体占 40.13%，我国港澳台地区及国际环保民间组织驻大陆机构 21.6%。从数据来看，草根环保 NGO 数量极度缺乏。另一方面，农村可提供的资源有限，地域内的环保 NGO 基本上都依赖于县乡等基层政府的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扶持，这也就决定了县乡等基层环保 NGO 开展的环保实践活动将主要是在当地政府的领导或指导下进行，这样的环保行动难免增添上官方性的色彩，而草根性和群众性特征不足，在民众中的公信力也将受到影响，继而所产生的动员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也大大降低。

### （四）公众参与意识薄弱，能力水平较低

城市“重经济，轻环境”的发展理念和观念意识正不断灌输到农村地区。现实中有不少农民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或者追求更高的收益，忽视乃至漠视对于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行为。此外，农民不仅应该是公共环境的消费者，还应该成为公共环境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但由于受农村的文化传统影响以及公民社会发育的不完善，村民对公共环境漠不关心的现象较为普遍，参与环境治理意识薄弱。最后，由于对自身拥有的环境权利无知，无法明确感知自身权利受到侵犯；等到环境危害产生，又由于文化水平及法制观念的不足和环保知识的缺乏，不善于利用参与权，难以及时做出应对，无法采取正确和理性的行为，参与环境治理的能力水平较低。而且农村的环境基础设施设施相对落后，生活卫生条件比较差，村民在环境治理的问题上很难形成一定规模的参与状态。

## 三、完善美丽乡村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对策

###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针对目前公众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法律法规的不足，一方面，我国应尽快在宪法和环境基本法中把公民的环境权确立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另外，要出台针对性的法律法规明确赋予公众参与农村环保的权利和权益，并对环境信息公开化、环境决策民主化、环境公益诉讼加以规定。另一方面，我国还应建立并完善与公众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相关的各项配套法律。为实现村民的环境知情权，保障村民的过程参与，应在相关配套法律中建立公众获取环境信息的程序保障机制；完善环境决策参与制度和环境行政参与制度，并对参与的形式、程序、过程都要作出明确规定。还应完善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的责任追究制度，对不能保障公众参与权的相关机构和人员进行法律责任的追究等等。（范俊玉，2011）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应是国家政治民主进程中的重要内容，只有通过建立和完善一系列法律法规体系，

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效果。

## (二) 政府抓好自身定位, 适当转变职能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社会治理应坚持利益的多元化, 制定社会政策、方针、对策必须坚持利益优先原理, 促进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包括: 决策方法民主化, 即使人民群众充分行使参与决策的民主权利, 在决策中听取相关专家学者的意见; 决策内容民主化, 即决策内容要充分体现民意, 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毕霞、杨慧明、于丹丹, 2010) 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讲话中阐述了严格依法行政的重要性, 指出“各级政府一定要严格依法行政, 切实履行职责, 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 该放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 坚决克服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为此, 在乡村环境治理中, 政府官员需要从思想上根本转变, 抓好自身的定位, 进一步明确职能, 坚持“有限政府”理论, 将不属于自己的职能还给社会。在乡村环境治理的实践中, 要及时关注当地群众的和相关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通过各种渠道听取民意, 逐步调动村民参与环境治理的热情, 从而推进决策内容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提高环境决策实效。

## (三) 培养地方环保 NGO, 拓展公众参与环保的路径

在我国农村, 大部分的地方在环境治理方面的供给主体主要还是政府, 当前农村环境治理的落后状态急需将公共环保 NGO 引入到农村环境治理工作当中, 发展多元主体模式, 从而达到拓宽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路径的目的。因此, 一方面需要降低门槛、放宽成立条件。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 社会团体的成立和发展受到数量和规模上的限制, 政府应适当降低硬性标准并简化审批程序, 依法承认和保障民间环保 NGO 的法律地位。另一方面, 还要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对草根环保 NGO 的行政干预, 不宜对其实行直接领导、直接管理或包办代替, 须“政群”分开, 并通过购买环境服务将部分环境服务性职能移交给环保 NGO, 使其具有独立的法律主体地位和独立开展活动的权利, 增强其独立性和自主性, 以提升其社会公信力和影响力。(陈叶兰, 2006) 培养和壮大草根环保 NGO, 将给地方村民灌输大量环保知识, 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激发起村民的环保热情, 使得村民在具体参与环境治理过程中变得更组织化和有序化, 弥补单一供给主体效率低下的状况, 成为公众利益表达和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有效通道, 推动农村环境治理工作向前迈进。

## (四) 增强公众环保意识和能力

根据村民的认知和行为特点, 应采取多种方式加强环境宣传教育, 加大农村环保宣传力度, 提高农民群众的环保意识, 通过多样化、多层次的传播, 增进人们对于环境问题以及环保工作的认识和了解。首先, 环境宣传教育应尽量采取通俗易懂的传播方式, 充分发挥广播、电视、网络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优势, 不断灌输村民保护环境、热爱环境的思想观念, 引导村民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从而增强群众的环保意识。其次, 如何提高村民的参与能力至关重要。一是要将环保问题的相关知识通过简单实用的方式传播给村民, 使村民形成对环境问题的正确认识, 并转化为行动参与能力; 二是通过环境法律法规与相关政策的普及教育, 让村民可以充分了解到自身的环境权益以及如何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增强居民参与环境治理、维护环境权益的能力; 三是加大政府环境信息公开, 保障村民的环境知情权, 改善现实中信息不对称的状况, 使得村民参与环境治理由被动变主动。

## 四、结论

总之, 加强乡村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是纠正“政府失灵”现象并增强政府的合法性的客观要求; 是实现公民权和环境民主的基本保障; 是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必要路径。但是, 公众参与在农村环境治理中仍存在, 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 政府自身定位不准确, 职能转变不到位; 地方环保 NGO 作用有限, 公众参与渠道不畅通; 公众参与意识薄弱, 能力水平较低等问题。在乡村环境治理实践中,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政府抓好自身定位，适当转变职能；培养地方环保 NGO，拓展公众参与环保的路径；增强公众环保意识和能力等方面着手。从而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目标的实现。

### 参考文献：

- [1] 毕霞、杨慧明、于丹丹，2010，《水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研究——以江苏省为例》，《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 [2] 陈叶兰，2006，《论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3] 陈宁，2012，《试论农村环境保护中公众参与现状与提升策略》，《社会工作》，第12期。
- [4] 范俊玉，2011，《加强我国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及路径选择》，《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5] 黄大熹、汪小峰，2007，《公共政策合法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必要性分析》，《求索》，第8期。
- [6] 刘慧，2014，《农村环境治理“一主两翼”公众参与模式构想》，《资源·环境》，第6期。
- [7] 马永芬，2010，《农村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山西农业科学》，第12期。
- [8] 唐建兵、武香利，2014，《美好乡村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以安徽乡村为例》，《皖西学院学报》，第5期。
- [9] 徐成，2015，《浅谈农村环境管理中的公众参与》，《辽宁农业科学》，第2期。

☆ 作者简介：金巧巧，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3 级硕士研究生  
顾金土，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 责任编辑：王 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社会学系、长三角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系列报告

2015年10月21日下午，“河海社会学论坛（第十四期）”在河海大学江宁校区水文楼909会议室举行。本期论坛由王毅杰教授主持，陈阿江教授、顾金土副教授、杨方博士分别做了《环境健康研究中的方法问题》、《水缘关系的兴起及构建》和《中国核电发展状况及社会风险》的专题报告。

陈阿江教授结合“人·水和谐”的课题，从孟营村的调查发现、消化道疾病与饮用水、水与村庄地理环境几个方面入手，来阐释环境健康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论证了以村入手来研究“癌症村”的原因。在师生互动环节中，陈老师针对流行病学与社会学方法比较、村落定义、水与疾病的因果关系等问题作出了精彩的解答。

顾金土副教授以温州的珊溪水库、天津的于桥水库为例，从水库与周边居民关系、水缘关系的概念、水缘关系的特点、构建水缘关系的价值、如何推动水缘关系建设等几个方面来展开论述，并回答了如何体现水缘关系、如何补偿周边居民等问题。

杨方博士从核电发展中的问题、核电社会风险、核电风险管理、核事故离我们多远、中国的核安全等几个方面来讨论中国核电发展的状况及社会风险。与师生互动过程中，杨老师回答了中国核电发展的影响、核电站建立的条件等问题，并且针对研究的意义、研究的目的与各位老师进行交流。

最后，王毅杰教授总结了本次论坛并感谢三位老师的精彩报告。



## 礼俗与法律：纠纷解决机制的不同逻辑及其后果

——闫老汉死亡事件的社会学考察

谢丽丽

**摘要：**以2012年5月26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中的一期节目《“私了”》为资料，聚焦于一起医患纠纷的缘起、解决过程和结果，透视中国传统的“礼治社会”与当前社会转型中的“法治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张力和冲突。传统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主要是依据礼俗的教化性调节，“私了”即是依据礼俗经验和传统的一种常见方式。与“私了”相对，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主要是依据现代法律精神和条文制度的以法息讼，可以称之为“公了”。同一起纠纷，“私了”机制和“公了”机制不同的运作逻辑和对行动者造成的后果都表现出礼俗与法律之间的张力和冲突。纠纷中的礼俗与法律冲突，实质是因为现代社会的以法息讼机制悬浮于传统礼俗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即当前“法治社会”与传统的“礼治社会”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不同，简言之，礼俗与法律得以存在的社会文化土壤之间存在冲突和割裂。

**关键词：**礼俗 法律 社会转型 冲突

### 一、导论

本文资料源于2012年5月26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中《“私了”》这一期节目。这期栏目中的故事发生在陕西省横山县，该县是农业县，地处陕北黄土高原腹地，全县人口约36万。故事围绕主人公闫占强（以下简称闫）和安亚红（以下简称安）展开。闫和安是有多年交情的朋友。安是该县民营医院百信医院的院长。2012年3月8日中午，闫的父母、姐姐、姐夫和他五岁的女儿，因吃了隔夜剩菜，都出现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闫立马给当院长的好朋友安打电话并送往医院抢救。安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组织医生抢救。五人中四人获救，而其中食物中毒症状较轻的闫70多岁的父亲被排在最后救治，且救治中发生了胃穿孔，安随即将老人转到榆林市医院治疗，最后因抢救无效离开人世。闫认为，其一，医院大夫技术不过关导致救治老人时出现胃穿孔事故。其二，安转院不仅耽误了病情，也是为了推卸医院责任。其三，转院期间安未亲自去榆林医院安排救治相关事宜，辜负了朋友的信任和期望，虽然闫并未显露出这一点。总之，闫对安极为不满，闫与安的矛盾纠纷就因为闫老汉死亡而起。为了解决这起冲突矛盾，二人决定“私了”。双方签署的“私了协议”中的一条规定

是，百信医院需停业整顿三个月。但安未严格遵守协议，医院停业二十几天后提前营业，安“违背”私了协议，一是考虑到医院的经济损失，二是，他认为闫定协议且他遵守协议的主要是给闫面子，让闫消气，可能不必完全当真。闫得知安既未遵守“私了”协议，又未向他言明提前开业的难处就私自开业的消息后，非常气愤，一气之下，跑到百信医院，锁了医院大门，阻止医院营业。安看势态严重失控，打电话报了案，之后公安系统介入此事。公安部门依据相关法规，认定闫的锁门行为破坏了公共秩序，并处以闫10天拘留。

中国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也是“礼治社会”。（费孝通，1998）传统“礼治社会”主要依靠礼俗规范来维持社会秩序，“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礼是合适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服膺于传统的习惯”。（费孝通，1998）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推进，中国社会逐渐从传统“礼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法治社会”主要依靠现代法律体系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和谐。《新闻调查》中闫老汉死亡事件非常典型，这一案例集中反映了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同一起纠纷，传统“礼治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和当前“法治社会”背景下的纠纷解决机制之间存在的张力和冲突。笔者通过该案例来探究，闫和安之间的冲突因何而起？解决纠纷的“私了”方式得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和运作逻辑是什么？同一起纠纷，为何“私了”机制与“公了”机制的运作逻辑和造成的结果不同？

## 二、纠纷缘起与发展

### （一）纠纷伊始

#### 1. 差序格局下的朋友之义

中国乡土社会的社会关系模式表现为围绕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差序格局。这种格局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讲究“内外有别”，亲疏有别。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办事逻辑，都遵循着“差序格局”。同时，中国社会是“关系”社会，遇事找熟人就是其典型的表现，因为熟人之间好办事，熟人总是给予熟人更多照顾。闫和安是“借钱不用打欠条”的好朋友，两人相互信任，交情不错。于是，闫的亲人食物中毒后，第一时间想到安，并急忙送往安的医院救治。同时，安也在第一时间组织医护人员抢救。

朋友重义，熟人好办事，是礼俗传统。通常，朋友之间应该重义轻利，为朋友两肋插刀、义不容辞。同时，得到朋友“额外”帮助和照顾也是不言自明和天经地义的。就本案例而言，闫遇到人命关天的难事时本能性地反应就是有难找熟人、找朋友，并选择朋友安的医院进行救治，一方面因为熟人好办事，另一方面对朋友更加信任和放心。同时，闫对安也有更高的期望，即他希望并认为应该能够从安那儿得到“额外”的帮助和照顾，这一“额外”的照顾正是朋友之义。

#### 2. 重利轻义还是利义难相容

闫与安之间的纠纷比普通医患纠纷更为复杂和微妙，因为闫与安是朋友，是熟人关系，所以究其矛盾的深层原因，闫心中的怨气除了医院在救治中有过失，主要还在于闫认为安在闫老汉死亡事件中重利轻义，未尽朋友之义，即他认为转院救治是安从医院利益出发，为了推卸医院责任，并非真正顾及朋友情谊而为了救人。闫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安一人身兼不可调和的双重身份并扮演双重角色，

从私人关系讲，安与闫是朋友，但安同时还是百信医院的院长，这种利与义不兼容的身份和角色不可避免地强化了冲突。纷医院救治中出现技术失误在先，需要转院时作为朋友的安未亲自去榆林医院联系住院和抢救的相关事宜，这在道义上来讲，未能满足闫对安的期待，闫虽然一直未言明，但正如安自己也认识到的，“如果从感情上来讲，个人关系这块来讲，我是应该去的”。如果安亲自去榆林医院，结果可能并无二致，但至少在情理上安为朋友尽了力、尽了义，或许阎心中的怨气不会太重。

事后，安立刻去阎家看望，但没有得到阎和他家人的理解。几天后，安带着医院的副院长再次来到了闫家，并带去 30 万元。从安的角度出发，他拿钱的目的，一是医院在救治病人时确有处理不当的行为，拿钱补救是被大众认可的惯用的合理可行的补救措施。二是安与闫是朋友关系，出于情意安也必须抚阎及他们家人的丧亲情绪。总之，安此举的最终目的是希望纠纷能安稳从速解决。

但阎对这 30 万元有不同的认识和想法。闫认为，安现在拿 30 万元的举动不仅坐实了安推卸医院责任之嫌，更将朋友之义切断。因为他俩是好朋友，这起纠纷就比普通的医患纠纷更加微妙和复杂，普通医疗纠纷主要的关注点是赔偿问题，而朋友之间看重和在意的并不仅仅钱，更多的则是人情，朋友间“算账”、“清算”等于绝交。（费孝通，1998）更何况闫认为这 30 万元是父亲的“人命钱，要这钱就是昧良心”。对闫而言，安的这一行为无疑是火上浇油，使得误会更深。

## （二）纠纷缓冲

朋友之间伤了和气，需要找个台阶，给个面子，才好重归和睦。给台阶、给面子无非是给受伤害一方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一个承认失误的态度。就本案例而言，纠纷已出，不论是作为院长的安，还是作为朋友的安，都需要给闫一个合理的解释和交待。

### 1. “要个交待”：合乎礼

传统农村社会风俗要求，家里如有人去世，需要给亲朋、邻居等说明去世因由，这相当于给亲朋一个交待，而这个交待事关死者的子女日后在宗族中的脸面以及他们日后的名声。如果老人是自然死亡，且子女孝顺，那就是“喜丧”，人们会说老人是有福之人，在阳世不仅没受罪，在阴间也会得到尊敬和照顾。同时，人们也会称赞其子女孝顺。如此，老人入土为安，子女赢得好名声。如果老人是因子女不孝顺或照顾不周等原因去世，子女就会遭到亲戚朋友的指指点点，这些评论将成为一种事实标签一直在乡村社会传扬下去，让子女名声受损。坏名声如同背上的黑锅，“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乡土社会的人言可畏就在于此。而在以社会取向（杨国枢、余安邦，1993）的社会人际关系中，人们才更加要面子、顾“脸面”。（鲁迅，1991）所以，闫老汉是非自然死亡的，就更需要给亲朋好友交待清楚。于是，阎姨夫对安说，“检讨也好，检查也好，忏悔也好，不管什么态度，都要在灵前跟人家来的亲戚有一个交待”。“要个交待”是中国传统经验做法，合乎礼。

### 2. “给个交待”：合乎情

安答应了闫的“要个交待”，并带着医院医生近 30 人到闫老汉坟前吊唁，安还在闫老汉坟前当着闫家亲戚和乡里众人的面就医院救治中的不当行为做了检讨。从理性人角度出发，安的“给个交待”，一方面是给朋友一个交代，另一方面是以期息事宁人，尽可能把医院损失降到最低。不论是“要个交

待”的乡间传统礼俗要求，还是医院为弥补自身的过失行为，“给个交待”依然是按照传统社会礼俗而行事，是合情合理的。

总之，“要个交待”和“给个交待”，都是依据中国社会的礼俗传统和经验习惯。从传统礼俗出发，“检讨也好，检查也好，忏悔也好”的一个交待其实是一种“面子”表演，是闫表演给众亲朋看的，让他们知道，老人去世并不是作为儿子的闫不孝而致，而主要是医院的责任。“要个交待”的实质是给乡邻一个交待，是为维护自己的名声和面子，同时，是为争一口气，也是为出一口气。“给个交待”，从医院理性看，是希望纠纷能尽快解决，同样也在中国礼俗传统的经验范围之内。

“给个交待”的集体悼唁和灵前检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矛盾，但纠纷还未真正解决。

### 三、纠纷解决：“私了”与“公了”的不同逻辑及其后果

#### （一）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纠纷解决机制

##### 1. “私了”：传统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明确指出，中国乡土社会是“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是一个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费孝通，1998）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建立在民间宗法家族的伦理纲常之上的，其核心是“宗法一体化”，（金观涛、刘青峰，1992）这一独特社会结构“融国家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治于礼俗教化之中”。（梁漱溟，2005）传统中国社会天理、国法和人情三者一脉相通，最终统一并表现为儒家的“礼”，即道德、礼俗、情感和体验支撑维系的乡土社会秩序。概言之，“礼”既是齐家治国的规范，也是寻常百姓的处世之道。

古代中国人将和谐视为一切人类关系的理想，（梁治平，2013）但邻里乡亲之间的家长里短总是在所难免的。一般而言，熟人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求助于内，在乡村社区内依礼调解；二是诉讼于外，通过官府调解或依法断案。（罗亚娟，2013）中国传统社会“皇权不下县”，乡土社会秩序主要通过长老统治来维持，求助于内的以礼法调节成为解决纠纷的主要手段。具体而言，乡村社会中的矛盾纠纷，往往先诉诸长者、德高望重者或乡绅依“礼”教化调解，其目的是用“小惩大诫”的方式管教不合礼数一方的行为，一方受惩、一方让步，双方最终化干戈为玉帛，回归和睦。教化性调节很注重过程仪式，即通过“表演”、“示众”的方式让有理的一方“理得其所”，让失礼一方“丢了脸面”，同时，这种仪式性表演还有告诫后人的意图和功效，使后人为了保住脸面而不轻易惹事生非。因此，传统乡村社会也是“无讼”社会，（费孝通，1998）“惹官司”既不体面也不光彩，人们为了脸面尽量回避诉讼，（范忠信、郑定、詹学农，1992）同时，为了在乡间的名声，重视脸面的人们都尽量选择内部教化性调节机制以解决纠纷。事实上，发生在乡土社会中的绝大部分纠纷都能在“退一步海阔天空”和“凡事好商量”的基础上通过调解得以解决。如果内部教化性调节机制解决不了，则向上追诉，求助于地方官府以诉讼机制解决纠纷。进入诉讼机制，地方官府通常倾向于先用调解方式以息纠纷，调节未果的一些纠纷则依据法律典籍断讼。

不论内部教化性调节机制还是以法断讼机制，都建立在中国熟人社会及其“宗法一体化”核心的基础之上，都依据维持中国乡土社会秩序的礼俗传统来解决纠纷。教化性调节机制依据传统礼俗而来，

“调处以情”是主要调节手段，即“勤于听讼，善己。然有不必过分皂白可归和睦者，则莫如亲友之调处”，（汪辉祖，1998）这种方式较好地兼顾“情、理、法”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社会常用纠纷解决机制，其特点是调解程序简单易行，当事人既能达到争“理”、争“一口气”和“面子”的目的，同时能够不伤和气，花费还少。以法息讼要辨出是非黑白，但息讼中也会讲求“法不外乎人情”。也即是说，虽然以法息讼机制比教化性调节机制更为生硬和不讲情面，但国法“以礼入法”（瞿同祖，2003）而成，法律也带有浓重的道德、伦理倾向，（苏力，2000）即天理、国法和人情三者一脉相通，都统一于“礼”，都源自中国传统礼俗文化土壤当中。

在中国传统社会，“私了”机制是教化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维持农村社会秩序的一种非诉讼性的、非制度性手段。“私了”机制是一种“全息”式纠纷解决机制。（郭星华、李飞，2014）“私了协议”是一份“君子协议”，与法律的功效类似，如果协议有变动或是要撕毁，需要当事人双方达成一致。“私了”依据礼俗来解决纠纷，不仅成本低，也为双方留有日后重归于好的后路。换句话说，

## 2. “公了”：现代社会主要的纠纷解决机制

传统社会是一个基于血缘、情感、伦理等建立起来熟人社会，而现代社会则是以工具理性、个人权利等为基础的契约联结而成的群体。（金观涛，2010）随着传统熟人社会逐渐向现代陌生人组成的契约社会的转变，建立在分离个体基础上的契约性质的法律体系应用而生，并不断走向社会前台来规范和维持社会秩序。中国的法治化建设是随着现代化推进而进行的，尤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法制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和保障，以及“基层司法建设”是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方略”（王铭铭，2003）的大背景下，国家正式的法律制度开始自上而下大规模地进入乡村社会，即所谓的“普法运动”和“送法下乡”。“‘送法上门’是国家司法权力在国家权力的边缘地带试图建立起自己的权威，使国家意求的秩序得以贯彻落实的一种努力”。（苏力，2001）总之，随着“法治国家”建设和“送法下乡”活动的开展，建立在现代法律精神基础上的现代司法机构和国家法律体系力量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维持社会秩序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与“私了”相对，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主要是依据现代法律精神和条文制度的以法息讼，可以称之为“公了”。当前“法治社会”的以法息讼，即“公了”与传统社会的以法息讼的发生机制和逻辑起点不同，现代司法机构和现代法律体系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是从西方社会“植入”到当前中国社会土壤中的，并不是从中国传统社会土生土长出来的，其存在和生长的土壤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不同。概言之，现代法律体系追求一种普适性价值，讲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诉讼过程重视形式理性和程序理性，注重证据和逻辑。如韦伯所说，法律的形式化是法律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和集中体现，也是现代法治区别于传统法治的基本尺度。因此，在现代社会法治理念下，人们之间的纠纷解决就被置于这台工具或技术合理的“形式化法律”的机器之下。（郭星华、李飞，2014）纠纷解决机制似在流水线上按照法律体系条文规定好的流程，然后受证据、程序和逻辑的操控指示得以断定。法律的形式化决定了这一过程仅需要就事论事，保持客观和理性，而不需要顾及人情、道德、关系等这些礼俗

传统因素。与“私了”相比较，“公了”机制由一套繁杂的法律条文体系构成，其知识构造体系和运作逻辑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之外。

(二) 礼俗与法律冲突：“私了”与“公了”的不同运作机制及其后果

### 1. “私了”：礼俗传统与理性选择

2012年3月21日，闫和安通过“私了”方式解决他们的纠纷，他们签署的“私了协议”内容如下：

#### “私了”协议

一、乙方(医院)停业;二、停业三个月后，如乙方想继续办下去，应当告知甲方并会同有关专家，对乙方的管理设施以及服务质量进行实地了解座谈，确信乙方的管理能力、医疗质量、服务水平等明显提高，能为社会提供正常的诊疗服务，确保不再发生伤害无辜生命的现象，之后经甲方同意方能开业;三、如乙方违反规定，则甲方有权向有关部门控告，依据法律、法规、追究乙方责任，同时，乙方还应向甲方赔偿人民币三百万元，甲方将此款作为善款用于慈善事业。

闫选择“私了”解决纠纷，一是“私了”是传统习惯，是乡土社会常见的纠纷解决机制。二是“私了”在闫的经验范围内，他认为“打官司这个事不一定，弄得能(两边都)恰好，因为一进了公家部门就不由咱们”。总之，闫熟悉“私了”所需要的知识，运作方式，以及成本和收益。而对“公了”机制使用的一套严密而规范的“法律话语”(Sally Merry, 1990)、条文制度等知识体系，以及运作方式是陌生的，也即是说，纠纷一旦进入“公了”程序，个人就失去了控制力。三是，出于朋友关系的考量，“私了”不至于完全撕破脸，为对方留有后路。“在咱们横山这么穷的地方，安亚宏一个白手起家的，农家儿子，这么点事业(医院)创业起来真的很难，不要一下子把别人敲死，人家说是只要你起诉了，这个可能鉴定成一级医疗事故，营业执照可能就吊销了，就要关门了，一关门就倒闭了。”但“私了”同时能够出气，“那点整顿啥的无所谓嘛，就说是他那些医生叫来学习一下，开两天会，我就留这么一点点(机会)出气”。

安也同意“私了”，并签了“私了协议”。安从医院利益角度出发，一是医院耗不起，折腾不起；二是，公家力量(政府部门)介入来处理纠纷，其纠纷处理程序繁杂，运作周期长，且公事公办，效果不一定比“私了”好；三是虽说“私了协议”规定医院要停业3个月，但只要阎的气消了，就不一定完全履约而行，因为他从调和人闫的姨夫陈海法的口中得知，“大家互相面子下去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医院停业几天也就能营业了。另外，从与闫的私人关系看，他认为“私了”是给闫一段时间缓冲，让阎的情绪好起来，于情于理都是应该的。

可以看出，作为中国乡土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私了”，在农村社会依然有其得以继续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空间。闫和安选择“私了”既遵循的是礼俗传统，也是在他们生活经验范围之内的一种理性选择。这种理性选择反映了人们的生活向度，符合人们的生活逻辑。

### 2. 医院停业与否：“私了”和“公家”说法不同

百信医院发生患者死亡事件后，横山县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和县医院的一些专家共同组成调查组，对百信医院救治闫老汉的整个过程进行调查了解。调查组认为，医院在救治过程中存在一些过失行为。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对参与抢救的三名医务人员做出停职执业六个月的行政处罚，同时给百信医院下达了整改意见，要求医院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换句话说，作为“公家部门”的医院上级卫生局认为医院在救治闫老汉时确实有不当行为，并依据法律规定对医院进行相应处罚，但并未要求医院闭门停业。“公家”的说法是，“医疗机构停业必须由我们省卫生行政部门做出，任何组织个人没有这个权利”。

县卫生局要求百姓医院正常营业，但安仍然遵照“私了协议”规定，并未营业。可见，在安的生活经验中，“私了”是作数的，是有效用的。同时，闫与安既然选择“私了”，当“公家”的合法的处理方式与传统礼俗习惯发生冲突时，人们还是倾向于尊重传统礼俗习惯，“公家”的说法反而处在“失语”中。

### 3. “私了”与“公了”中的冲突及其原因

2012年4月16日，医院停业近20天后，安拨通闫电话准备“申请”营业，但闫并未同意。安考虑到医院的利益，于4月17日开始营业。闫得知医院营业的消息后，跑到医院，不仅打碎了医院的玻璃，还用铁链锁住了医院的大门，阻止医院营业。安看势态严重，当即向县卫生局汇报了情况，县卫生局认为闫的行为已经超出他们的处理范围，让医院报案。院方报警后，警方要求闫立刻将门打开，并带走了闫。

依据“私了”逻辑，闫认为安不遵守“私了”协议在前，而他锁门在后，因此，他锁门是对安不遵守协议的惩罚，锁门合乎情理，并没有不妥。首先，“私了”机制是传统社会常用的纠纷解决机制，“私了协议”是依据传统礼俗签署的，是有效用的，也是应该遵守的。正如闫所说，“私了协议”是“一份君子协议，不管法律上生效不生效，咱们这块儿君子协议常签吗？我们这里就说理，既然是个男子汉，你说出的话就要算数，（否则）你就不要说了，对不对？”其次，当事人一方没有权力私自改动或是不遵守协议，要有变动也应该告知另一方，经得双方同意，才能变动，不然就不仅违背协议，也是不尊重当事人，如闫说的，“找上两个人来一起商量，说明白是撑不住了还是咋了，那咱再看么，你就理也没理我，就把这个门都开了，那咱们签这份协议顶屁呢！”“生气的是你既然是个男子汉，你想开门就该跟我打声招呼，就我们这边说句最土的话是，你放羊的，你打羊，那肯定先喊一声，才能把手里那块石头扔出去打羊。”

依据“公了”逻辑，首先，“私了”机制未必作数，即进入现代法律体系时，乡土社会所遵从的一套“私了”运作机制极有可能失效，正如办公人员说的，“至于这个协议成立不成立，合法不合法，不是他闫占强说了算，要有相关的部门来认定这个协议。”其次，“公了”机制自有一套成体系的法律法规来判定人的行为到底合不合法，不管行为背后的社会情境是什么。公安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认为闫的锁门行为是个人扰乱单位秩序，是不合法的，并拘留了闫占强十天。第三，“私了协议”“停业三个月后，如乙方想继续办下去，应确保不再发生伤害无辜生命的现象，之后经甲方同意方能开业”的规定是无效的。发生锁门行为后（4月17日），县政府主要领导召集卫生局、公安局针对闫老汉死亡事件专门召开了会议，按照法律法规要求，百信医院正常营业合



乎程序，合乎法律，任何人没有权力干扰医院正常秩序，所以，要求医院正常营业。

“公了”机制与“私了”机制的社会文化土壤不同，其运作机制也就不同。“私了”机制源自中国熟人社会背景下的礼俗传统，而“公了”机制则是建立在现代法律精神之上的一套法律体系，这套体系由繁杂的法律条文组成，自成一体，它的存在方式和运作机制都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经验习惯之外。正如吉尔茨指出的那样，“法律和民族志都是具有地方性意义的技艺，它们的运作凭靠的乃是地方性的知识。”（吉尔茨，1998）也即是说，任何一种法律产生于自发性或是原发性社会文化土壤，不同地方的法律甚至可能完全是不可通约的。因此，简单照植入他国法律体系难免出现“水土不服”，甚至引发矛盾和冲突。于是，国家正式部门介入后，事情发展的逻辑与“私了”的逻辑完全不一样，更为甚者，二者在纠纷处理中发生了冲突和矛盾。

#### 4. “私了”的礼法兼顾与“公了”的法不容情

从“公了”的角度看，按照法律法规要求，任何人没有权力干扰医院正常秩序，百信医院应该正常营业。但从传统礼俗经验习惯看，安认为，闫跑去锁门是因为“心里还有那么大的怨恨，咱们再稍微缓一缓”再营业。

2012年5月3日，闫和安撕毁了“私了协议”，从“私了”角度看，协议已毁，百信医院就可重新营业，矛盾纠纷也随之烟消云散，一切可以恢复如常。但就在闫和安握手言和之后的第五天（5月8日），当地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认为闫的锁门行为属于扰乱单位秩序行为，并对闫处以拘留十天的处罚。

中国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在解决纠纷时会礼法兼顾。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讲人情、面子的社会，是情理社会，（翟学伟，2005）这样的社会对做人、做事及其作判断不是单从理性的、逻辑的思维和条文制度规定的角度来考虑的，而是从具体的、情境的和个别性来考虑问题。所谓“合情合理”、“入情入理”和“情理交融”或“于情于理如何”的意思都是希望人们做人做事时在情和理上都要兼顾，（翟学伟，2005）同时，即便到了“对簿公堂”的地步，也还是希望在以法讼息中能够“情理法兼顾”或“合情合理合法”，即情、理、法三者结合起来通盘考虑，消除互相冲突处，才是理想的、真正的法律。（范忠信、郑定、詹学农，1992）所以，当闫被抓起来时，安说，“很伤心，心情很复杂，抓他不是解决我们这件事情的目的。”安认为，闫有“锁门”这样的过激行为，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正承受着丧亲的悲痛，他即使违法，也情有可原。同时，熟人社会纠纷解决最根本的目的不是分清楚眼前的是非、黑白，而是最后的重归与好，即更为重视彼此之间“瞄向未来”的关系。（刘星，1999）

但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则更多表现为法不容情。换句话说，“公了”机制是一种非常正式的解决纠纷的途径，讲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就事论事，不会考虑事情发生的情境性，即当事人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亦或是难言之隐等，它只看当事人的行为是否合乎法律条文的规定，它所遵循的是“形式理性”<sup>1</sup>，即是否合法，而不讲人情，不顾情面。换言之，“公了”机制并不会将心比心，以

---

<sup>1</sup> 韦伯所使用的概念，具体注解参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情入法，考虑到闫遭受丧亲之痛的社会情境。因此，当地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闫的锁门行为处以拘留十天的处罚。

与教化性调解相比，现代法律精神的以法息讼必然要分出“泾渭”、“对错”和“黑白”，方式更为生硬和不留情面，因此，很多纠纷从形式看得以解决，但纠纷双方的矛盾常常因此僵化、激化，有伤和气。该案例中，这场纠纷以判处闫十天的拘留而得以暂时解决，但正如安认为的，“不是说今天把谁处罚了，这件事情就扯平了，我觉得有可能会引起更大的误会和伤害。”所以，当闫被抓起来时，安“很伤心。”闫对此更是感觉非常委屈，“我父亲被治死了，我还要进到这里（监狱）边”。

#### 四、结论与讨论

发生在阎与安这对熟人关系之间的纠纷更为微妙。从闫的“要个交待”，安答应“给个交待”，到二人选择“私了”来解决纠纷，闫和安都是理性的，都是按照中国传统社会的礼俗经验习惯而行事。“私了”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依据礼俗传统而成的合法合理合情的纠纷解决机制，所以，不论是让医院停业三个月的协议规定，还是闫的锁门行为，都是合乎情理和礼俗传统的。但从“公了”机制看，“私了”作不作数不一定，而医院停业与否也不是由个人说了算，同时，闫的锁门行为则完全是违法行为。

“私了”与“公了”在纠纷解决中运作逻辑的冲突实质是礼俗与法律之间的冲突，其冲突根源在于二者得以存在社会文化土壤和运作机制不同，中国传统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依据的是传统礼俗习惯，而当前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主要依据现代法律精神。传统中国社会是熟人社会，也是“礼治社会”，所以，传统社会秩序的维持和纠纷解决机制都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之上，都是依据礼俗传统，从情理出发，进行通盘考虑。即便一些纠纷无法通过乡村内部的教化性调节机制解决，已经升级到了“对簿公堂”的境地，地方官吏也常常倾向于首先通过调解的方式来息讼。如果地方官吏调节未果，才会走向以法息讼阶段，而国法是“以礼入法”而成，所以，官吏们的依法息讼理念仍然与乡间社会的礼俗、情理相通，换句话说，即使到了这一步，断讼者用法时还会考虑到“法不外乎人情”。概言之，中国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不论是内部教化性调节，还是求助于官府的以法息讼，都是建立在千百年形成的礼俗传统之上，始终未脱离中国传统礼俗社会土壤。与此不同，当前维持社会秩序的纠纷解决机制（现行法律体系）是建立在现代法律精神基础上的，这一现代法律体系是“舶来品”，是通过从上至下的力量渗透到中国基层社会，并不是从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土壤中“土生土长”起来的，因此，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以法息讼相比，其更为重视程序合理与形式理性，只就事论事，而不会遵循特殊主义的执法理念，即不会考虑纠纷发生的社会情境中的“苦衷”和“难言之隐”。所以，执法中不会顾及情面，更不会讲“法不外乎人情”。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推进，现代法律机构及其现代法治理念虽然以强势力量逐渐进驻到老百姓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尤其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础上的现代法律制度及其纠纷解决机制越来越扮演重要的作用，但人们的日常生活观念和行并未脱离传统社会礼俗规制下的路径依赖。换句话说，现代法治精神和理念并未与人们的生活世界很好地融合，现代法律体系实质上悬浮于农村社会生活传统，

于是，在纠纷解决中存在礼俗与法律“两张皮”甚至是“打架”的现象。

当前中国社会处在急剧转型时期，国家司法权力机构逐渐代替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并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能够调和、息讼和主持公道、辨明是非黑白的“中间人”角色以及整个纠纷解决机制逐渐萎缩。然而需要重视的是，现代法律体系并不能完全合理有效地解决乡间社会纠纷，其生硬的方式可能导致潜在的纠纷隐患强化或升级，形式上看似得以解决的纠纷，反而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失范问题。因此，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社会转型阶段，中国传统礼俗习惯与现代法律体系之间存在一块纠纷管制上的“空白地”，礼俗传统经验和现代法律体系都在治理，但都效力不足，呆滞这一块“空白地”反而更容易出现纠纷解决困境。另一方面，在社会转型期，对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机制中的精华部分不“一刀切”式否定，而是让其发挥更大效用也是值得讨论和重视的话题。

###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1998，《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2] 范忠信等，1992，《情理法与中国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3] 郭星华、李飞，2014，《全息：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现代启示》，《江苏社会科学》，第4期。
- [4] 杨国枢、余安邦，1993，《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台北：桂冠图书公司。
- [5] 金观涛、刘青峰，1992，《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6] 金观涛，2010，《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7] 吉尔茨，1998，《地方性知识：事实和法律的比较透视》，王海龙、张家宣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8] 刘星，1999，《法律的隐喻》，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 [9] 梁漱溟，2005，《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10] 梁治平，2013，《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11] 罗亚娟，2013，《依情理抗争：农民抗争行为的乡土性——基于苏北若干村庄农民环境抗争的经验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第2期。
- [12] 鲁迅，1991，《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13] 瞿同祖，2003，《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华书局。
- [14] 苏力，2000，《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15] 苏力，2001，《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16] 汪辉祖，1998，《学治臆说》，公共版权。
- [17] 王铭铭，2003，《“送法下乡”解》，《漂泊的洞察》，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18] 翟学伟，2005，《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19] 赵子光，1998，《一个师爷的官场经》，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
- [20] Sally Merry, 1990, *Getting Justice And Getting Even: Legal Consciousness Among Working-Class American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作者简介：谢丽丽，河海大学社会学系2012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闫春华

# 权宜理性视角下农村雇佣关系的 维持机制分析\*

——以鲁东地区 A 村的烟草种植大户为例

任宇东

---

**摘要：**在农业生产中，雇佣关系的维持离不开农村社会人情与利益的支持。本文以鲁东地区 A 村的烟草种植大户为例，从社会学的视角来探讨目前农村社会中雇佣关系的维持机制。研究发现，在当前农村社会中，人情与利益关系对于雇佣关系的维持仍然起到主导性作用，雇佣关系呈现一种“权宜理性”，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理性有所不同，并且“权宜理性”存在不同形态，随着时间、场域和对象的变化而变化。

**关键词：**权宜理性 雇佣关系 农村社会 人情与利益关系

---

## 一、问题的提出

雇佣不仅是传统社会中重要生产经营方式，也是现代社会中维持生产经营扩大化的重要手段。雇佣对于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以及其他资源的合理配置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雇佣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对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人情与利益作为社会关系的核心，对于雇佣关系的研究具有指导性意义，因此，需要将农村社会中人情与利益关系作为本次研究出发点。

费孝通先生认为“差序格局”式的社会关系结构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结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依靠亲缘与人情来维持。然而，在目前的农村社会中，随着现代因素不断融入传统的“差序格局”中，“利益”的作用越来越大，农村社会关系也逐步转向“理性化”，并且差序格局已不再是单纯的儒家伦理的差序，而是包括伦理、情感与利益这三个维度的差序，差序格局的内涵、范围与特点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利益已成为差序格局中影响人际关系亲疏的重要因素。

徐晓军从乡村社会交换变迁的角度，提出乡村社会中“网络性交换的非网络化与非网络性交换的网络化”，使看似“传统”的人情原则与看似“现代”的商业原则实现了整合，其直接后果是形成了“人情+利益”的整合机制。林聚任也通过实地调查，认为乡村社会中差序格局已经发生了裂变，在涉及利益特别是直接经济利益时，差序格局仍然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但其效用已大为减弱。而周邦君认为在农村社会的主雇之间，单纯的雇佣关系很少能独立存在，而是交织着纷歧繁杂的社会关系，雇佣关系的核心是情感、血缘与利益。但是，上述关于社会关系的研究，尤其是针对人情与利益关系的研究仍处于宏观层面，缺乏对微观层面的具体研究。

因此，笔者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微观层面的农村雇佣关系中出发提出问题，在 A 村社会中，雇佣关系呈现出怎样的一种“权宜理性<sup>[1]</sup>”？“权宜理性”的实质是什么？其背后的利益与人情之间又是如何互动的？本文将 A 村的烟草种植大户为案例，来对此做出解释。

---

\* 该文刊发于《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4 期。

[1] 笔者在借鉴韦伯提出的社会行动的四种纯粹类型：目的理性、价值理性、情感式、传统式，以及目前关于中国农村社会中人情与面子的研究，提出了本文的分析框架“权宜理性”，笔者认为“权宜理性”主要含义是：人情与利益关系之间

## 二、案例简介

本次调查以鲁东地区的 A 村作为调查对象，A 村位于胶东半岛，在山东省经济发展水平中属于中等偏上水平，2013 年，A 村居民得人均纯收入达到 23660 元。A 村乡镇企业较多，其产业主要以铸造、橡胶、轮胎等为主，这些产业吸纳了 A 村及附近村庄大量的劳动力，为土地规模化经营提供了有利条件。目前，A 村总共有 6500 多人，区域面积为 10.2 平方公里，全部为旱地，总共 7860 多亩。在 A 村，不仅有烟草种植大户，也有种粮大户，其中种植规模在 100 亩以上的有 6 户。鉴于烟草种植的特殊性，笔者将烟草种植大户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

本文研究的经验材料来自于笔者对 A 村四位烟草种植大户及部分雇工的访谈。笔者在 A 村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调查，对 A 村的生产与生活情况有了全面而细致地了解。其中，对四位烟草种植大户及部分雇工进行了深入访谈，了解目前烟草种植行业存在的优势和困境。A 村关于烟草的种植要追溯到 1992 年多左右，那时候烟草种植的规模小、较分散。然而，从 2003 年开始，在烟草公司的引导与支持下，A 村的种植散户开始逐步转向种植大户。从此，大规模的雇佣现象由此产生。在此对四位烟草种植大户及烟草种植流程作简要介绍。

目前，A 村共有 4 个烟草种植大户（资料见表 1），共经营着大约 400 亩左右的土地。笔者通过调查得知，烟草种植主要分为六个环节：育种、育秧、日常管理（程序最繁琐，包括打药水、劈烟岔等）、成熟（包括收烟和烤烟，烤烟对于雇主的技术要求最高）、选烟和卖烟等。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对于 A 村的烟草种植大户来说，需要处理的关系主要包括：与烟站的关系、与雇工的关系以及与农户的关系，其中与雇工的关系最为重要，因为笔者通过实地调查发现，雇主与雇工的关系好坏会直接影响到雇主的经济效益，因此探讨雇佣关系的合作机制尤为重要。

表 1: 四个烟草种植大户的基本情况

雇主	年份	人数	工种（长工/ 短工）	种植面积 （亩）	净收益 （元/亩）	雇工工资所 占总费用比 例（%）	本村雇 工所占 比例
YNB	2005	30	20/10	55	1200	70	60
	2008	30	20/20	50	1400	65	60
	2013	32	35/25	65	1600	70	50
YJK	2003	25	15/10	62	1700	50	50
	2008	38	20/18	80	2000	55	60
	2013	52	16/36	120	2300	40	50
YJK	2003	31	21/10	64	1800	55	80
	2008	42	20/22	80	1900	45	70
	2013	53	30/23	100	1800	55	30
RJQ	2006	24	10/14	45	1600	65	30
	2008	34	20/14	70	2000	50	50
	2013	48	24/24	90	2200	55	70

YNB 今年 46 岁，从 2005 年开始种植烟草，起步最晚。在 2005 年之前，YNB 一直经营农耕生意，帮助本村和外村的人播种、收割庄稼等。2005 年，YNB 开始种植 55 亩烟草，之后规模一直保持不变，利润提升得也不大。YNB 家的雇佣费用大约占总费用的 60%—70%，是四个种植大户中雇佣费用所占比例最高的。YNB 在雇工方面十分重视熟人尤其是亲戚的作用，他在选择雇工时，一般先雇用自己的亲戚朋友，再雇用其他人，按照“按人分事”的原则，将那些比较轻松的、容易挣钱的活给自己的亲戚或者熟人做，而将那些比较累的活则交给村外的或者没有亲戚关系的人做。这主要源于 YNB 对人情地考

虑多于经济利益地考虑，并多次表示他不好意思拒绝亲戚的打工要求，做得不好他也不好意思说。再加上 YNB 之前经营农耕生意所积累的业缘关系，所以及时在农忙时节，YNB 仍然能够雇到人。而 YNB 在雇用外村人时，认为其与外村人的合作关系属于纯粹的经济利益交换，一般不会注重与外村人建立人情关系。

YJK 今年 48 岁，妻子是 A 村的妇女主任。在 A 村，YJK 的家族势力庞大，社会关系网络密集，平时 YJK 也非常重视与村民的关系。YJK 之前一直做 A 村的农业技术员，因此，在四个大户中，YJK 的种植技术好。YJK 从 2002 年开始种植烟草，规模从早年的四五十亩发展到现在的一百二十亩，雇工费用大约占总费用的一半左右。在雇工方面，YJK 按照“按事分人”的原则做工，即按照工种性质来合理搭配劳动力，而不是按照“关系的远近<sup>[2]</sup>”来安排劳动力。另外，YJK 也十分注重与雇工之间的关系，平时多有来往。而且，YJK 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也以“老少爷们<sup>[1]</sup>”的身份出现，后来，雇工纷纷要求到他家里做工。因此，人员流动性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比较小，而且其规模逐渐扩大，经济利益也逐渐增加。

YJH 今年 50 岁，本人是村支书，政治地位较高，与烟站关系最好，社会资本雄厚，但与村民的关系一般。YJH 是从 2003 年开始种植烟草的，规模从刚刚开始的四八十亩，发展到目前的一百五十亩左右。YJH 凭借其自身的政治地位，不少村里的人会主动要求过来做工，但 YJH 从一开始并不重视与雇工之间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平时与雇工的交往较少。虽然这几年依然有雇工到 YJH 家打工，但是雇工的流动性一直比较大，YJH 与雇工及村民的关系也趋于淡薄。

RJQ 今年 58 岁，在四个种植大户中，RJQ 的政治地位与社会资本最弱，但与村民的关系较好。从 2002 年开始，RJQ 在烟草公司的扶持下，开始种植烟草，一开始是由三家合伙种植，面积总共 100 亩，合作了三年。后来，从 2006 年 RJQ 开始单干，规模从 30 亩逐步扩大到现在的 90 亩。RJQ 在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雇佣的外村人比较多，而村里人较少，雇工流动性较大。据 RJQ 回忆，当时自己在村里的影响力较小，许多村民不愿意到他这里打工，尤其在农忙时节，只能招外村的。但是，RJQ 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与雇工建立良好的人情关系，主动与雇工“走关系<sup>[2]</sup>”、拉家常。随着 RJQ 与雇工之间了解程度地加深，再加上雇工们在 RJQ “走动”下，许多村内的雇工们纷纷要求为 RJQ 做工。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 RJQ 家，因资金周转不开而存在的赊欠现象普遍存在。在目前，RJQ 找人比较容易，即便在农忙时节，他也能雇到人，雇工的流动性明显减少，RJQ 的规模与经济效益也随之增加。

### 三、雇佣关系维持的权宜理性分析

从雇佣关系的表面来看，雇佣关系中只存在着雇主与雇工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但笔者通过研究发现，雇佣关系背后的运行机制是雇佣双方通过互动所形成的一种“权益理性”。在本文中，笔者所提到的“权宜理性”是一种“过犹不及，恰到好处”的行动取向，意味着社会行动者不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遵循权宜逻辑，还要考虑到不同场域、不同时间的人情与利益关系，考虑到双方行动的可行性，其实质是多元的人情关系、多重的利益关系与个体特征的相结合，从而塑造了一个社会行动者掌控资源以及追求目标的能力。

笔者认为，从“权宜<sup>[3]</sup>”的状态来说，权宜状态分为“权宜最优状态”与“权宜次优状态”，“权

<sup>[1]</sup> “老少爷们”具有浓厚的当地色彩，在 A 村“老少爷们”是指彼此之间的地位平等，互相尊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算是比较要好的朋友，表示彼此之间的关系比较亲密。

<sup>[2]</sup> “走关系”在本文中是指雇主主动与雇工拉关系，说好话，但“关系”的效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sup>[3]</sup> “权宜”俗称“权宜之举”，是指灵活变通、暂时合适的意思，而“权宜状态”是指合适、效益优化的状态，在本文中，“权宜状态”是指雇主在追求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人情与利益经过互动所形成的一种效用状态。笔者结合农村的实

宜理性”实际上是一种权宜最优状态，与之相对应的是“权宜次优”状态，两者之间区别可以通过表2来解释。

表 2:权宜最优与权宜次优的区别与联系

权宜状态	表现形式	效用	人际关系影响
权宜最优 (权宜理性)	人情与利益相协调	经济利润较高，找人容易，雇工流动性小	利己利他的双赢格局，人情与利益关系的良性运转，形成互惠格局
权宜次优	重人情，轻利益	经济利润最低、规模最小，找人容易，雇工流动性小	利他损己的格局，人情关系趋向牢固
	重利益，轻人情	经济利润较高，找人难，雇工流动性大	利己损他的格局，人情关系趋向淡薄

雇佣关系中穿插着利、权情等多重社会关系，雇佣双方的经济行为受到各种复杂关系的影响与作用，权宜状态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从以上权宜状态的具体分类来看，雇佣关系中的权宜状态会随着时间、场域、对象地变化而变化，利益与人情之间存也在着一定张力，权宜最优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笔者认为，“权宜最优状态”（后文称“权宜理性”）主要包括以下特点：

（一）从权宜理性的表现形式上分析，权宜理性并不是一种理想状态，而是一种优化状态，主要表现为人情与利益关系地相互交织、不易分割。

在农村“差序格局理性化”的过程中，利、情、权等因素已成为影响雇佣关系的重要因素。虽然利益与人情是截然不同的维度，但是在雇佣关系维持地过程中，二者是不易分割、相互交织、互相建构的，共同对雇佣关系地维系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在目前农村社会中，雇主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只是一个“神话”，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因为纯粹的经济利益与人情关系在雇佣关系中雇主很难同时兼得。人情与利益是一对矛盾共同体，雇佣双方如果过多地追求经济利益，这会伤到对方的“面子”，要是过多地强调“人情”则会减少经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雇主只能达到权宜次优状态。而在权宜理性的优化状态中，人情关系的维系可以增加经济收益，进而促进雇佣双方合作关系地延续。

例如，YNB 一直重视熟人关系的培养，很少拒绝亲戚的打工要求，也不愿指出亲戚做工过程中的之处，以致于雇用费用在总费用中占有很大比例，也存在“窝工<sup>[1]</sup>”现象，因此，YNB 家的利润在这几年提升得不大。而 YJH 从一开始并不重视与雇工之间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平时与雇工的交往较少。YJH 在农作时，采用工厂式的管理方式，注重效率与效益，通常以“老板<sup>[2]</sup>”的身份出现，有严格的督工环境，时间掐得很紧，许多村内与外村人对于这种方式难以承受。YJH 一直比较重视经济利益的增长，访谈中多次强调“亲兄弟还得明算账<sup>[3]</sup>”。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村民都不愿意到 YJH 家里做工，都纷纷拒绝他的雇佣要求。YJK 还按照“按事分人”的原则，即按照工种性质来合理搭配劳动力，而不是按照关系的远近来安排劳动力。而且 YNB 也十分注重与雇工之间的关系，平时多有往来。另外，YJK

际情况，将“权宜状态”分为两种：“权宜最优”和“权宜次优”，而“权宜最优”也就是笔者所研究的“权宜理性”，后文将具体解释“权宜理性”。

[1] “窝工”具有一定的口语化色彩，在本文中“窝工”是指雇工在做工时偷懒、不认真做，尤其是雇主的亲戚在偷懒时，对于雇主效益的影响较大。

[2] “老板”在本文中并非指私营企业主，而是指雇主在做工过程中摆架子，有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对雇工具有命令的口吻。

[3] “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具有一定的口语化色彩，在广大乡村中，流传着“亲兄弟还得明算账”，但往往会遇到一个问题，兄弟姐妹等亲戚之间真的能明算账吗，如果真的明算账就会显得自己很小气、不讲亲情。

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也以“老少爷们<sup>[1]</sup>”的身份出现，雇工纷纷要求到他家里做工。人员流动性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比较小，他家的规模与经济利益逐年增加。

（二）雇主在不同场域，面对不同对象、不同时间时，权益理性的表现形态存在较大差异。

不同个体对事物的权衡尺度存在较大差异。雇主在不同时间、面对不同对象时，所采取的策略也不一样，权益理性的表现形态也不同。笔者通过实地调查发现，雇主在面对熟人时，往往强调雇主与雇工之间关系的远近，用关系来“拴住<sup>[2]</sup>”雇工。而雇主在面对外村人或者陌生人时，则强调经济利益，用经济利益来维持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在农忙时节，雇主要主动地与雇工“套近乎、拉关系<sup>[3]</sup>”；在农闲时节，雇主“套近乎、拉关系”的热情会减弱。另外，笔者还发现，在雇主拥有比较高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的场域中，雇主更重视，但其后果是雇工流动性地增强。而在雇主的资本容量偏弱的场域中，雇主则强调人情关系，雇主所采用牺牲部分经济利益来维持人情关系，从而保持人情关系与经济利益的“再生产”。

例如，YJH 凭借其自身的政治地位，不少村里的人会主动要求过来做工，但 YNB 从一开始并不重视与雇工之间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平时与雇工的交往较少。YJH 认为自身的社会地位较高，在追求经济利益时不需要关注太多的人情关系，多次表示“亲兄弟还得明算账<sup>[4]</sup>”。而 RJQ 在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雇佣的外村人比较多，而村里人较少，雇工流动性较大。但 RJQ 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与雇工建立良好的人情关系。随着 RJQ 与雇工之间了解程度地加深，再加上雇工们在 RJQ “走动”下，许多村内的雇工们纷纷要求为 RJQ 做工，雇工的流动性明显减少，RJQ 的规模与经济效益也随之增加。

基普尼斯强调了“关系”生产的主观性和情感性。因此，雇主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仅仅依靠经济手段是行不通的，还要依靠农村社会中的人情关系来维持雇主与雇工的合作关系，主动地与雇工搞好关系。如果雇主仅仅追求经济利益，例如 YJH 雇主，他只能到到权宜次优状态。因此，雇主在不同场域，面对不同对象、不同时间时，雇主的权宜理性的表现方式也不同，不同场域中的“权宜理性”形态体现了硬性的“经济利益”与软性的“人情关系”之间不同的协调运作机制。

（三）面对不同的雇主，雇工权宜理性的表现形态也不尽相同。

在雇佣关系的场域中，雇工权宜理性的表现形式往往与雇主的个人特质有关，并且具有一定的功利性。个人特质主要是指个体的性格、精神特质等。在本文中，笔者所说的个人特质是指雇主所拥有的资本容量<sup>[5]</sup>，包括自身的先赋性资本（血缘与地缘关系等）和获致性资本（政治地位、经济资本、关系资本等）。例如，雇工 A 一开始是在 YJH 家做工，主要基于 YJH 的政治地位考虑，YJH 是村支书，去 YJH 家做工是为了“讨好<sup>[6]</sup>”YJH，方便自己在村里办事。但是，YJH 对雇工比较苛刻，A 就辞职不做了。后来，A 就到 RJQ 家里做工了，A 表示 RJQ 他对人比较实诚，“会做人”，所以就决定留在 RJQ 家里做工。雇工 B 在选择雇主的时候，主要考虑亲缘关系和工资。相比较而言，亲戚关系更看重一些，这也是他一直在 YJK 家做工的原因，他明确表示不好意思再去其他雇主家里做工。另外，B 明

[1] “老少爷们”在前文有解释。

[2] “拴住”并非贬义词，在本文中是指雇主运用经济利益或者人情策略来维系与雇工的关系。

[3] “套近乎、拉关系”与前文所说的“走关系”“搞好关系”的意思一致。

[4] “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前文有解释。

[5] 目前关于资本的分类研究众多，笔者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并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将资本分为两类“先赋性资本”和“获致性资本”，“先赋性资本”是指雇工依靠血缘与地缘关系获得的社会资本，而获致性资本”是指雇主通过政治地位、经济实力来获得的关系资本，体现了

[6] “讨好”具有一定的谄媚色彩，但在本文中指的是，雇工不仅基于雇主政治地位的考虑，为了自己能够在村里好办事，也为了一定的经济利益，才到雇主家里做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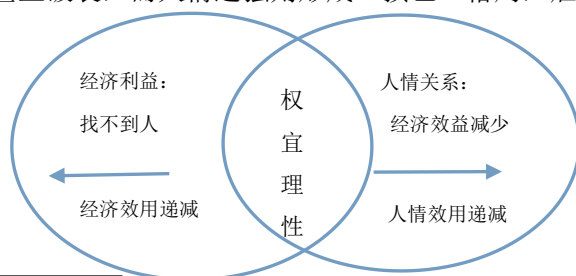
确指出，如果其他雇主给的工资比 YJK 给的工资高，B 也会选择离开 YJK，到其他雇主家里做工。

由此得知，雇工权宜理性地表现形式往往与雇主的个人特质有关，雇主的个人特质不仅包括雇主的资本容量，也包括雇主的“做人水平<sup>[1]</sup>”。因此，雇主“会做人”可以在弥补雇主竞争初期资本容量的不足，从而增加自身的吸引雇工。尤其在农忙时节用工紧张的情况下，这更需要雇主的“做人水平”，“做人水平”的高低是雇佣双方互动的结果。因此，“做人水平地高低”在农村的农业生产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社会意义与经济价值较为重大，是“差序格局理性化<sup>[2]</sup>”在农业生产领域中的体现。

（四）权宜理性在雇主之间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的博弈与交换，并且具有一定的规范趋向，雇主之间还存在“人情比较优势”现象。例如，YJK 认为，我们几个种植大户间存在着竞争关系，但平时，竞争关系体现不明显，每个雇主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sup>[2]</sup>”。但在农忙时节，由于对雇工需求较大，雇主之间会发生“抢人”现象，撕破脸也是常有的事，都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但撕破脸也是有一定限度和规则的，这主要取决于雇工个人的选择意愿，雇工一般会选择和与自己关系好的雇主，关系好的依据是雇主对雇工情感投入的多少。

翟学伟曾提出“人缘、人情、人伦”三位一体模式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具有多元性。在雇佣关系的场域中，人情关系的多元性主要包括面子、熟人信任、血缘与地缘关系、地缘关系等，而多重的利益关系主要包括经济利益、社会资本、政治地位、声誉、经济代价等。雇主之间会通过竞争来获取自身的经济利益，但竞争并不是没有限度的，而是依据乡村社会的规则与人情。雇工则会依据“人情关系的亲疏”（杨善华，1999）来进行抉择，而“人情关系的亲疏”的判断依据是雇主对于雇工人情资本的投入多少，因此，雇主之间存在“人情比较优势<sup>[3]</sup>”现象。

（五）在雇佣关系的场域中，权宜理性是有范围和边界的，权益理性的实质是社会关系的再平衡。在目前农村社会中，随着利益导向机制地形成，人情与利益关系都具有极强的伸缩性和稳定性，由此导致人情与利益关系所建构的权宜理性存在一定的范围和边界（见图 2），而且存在边际递减效用。边界内代表的是“权宜理性”，即“权宜次优状态”，而边界外则表示社会关系的失衡状态，即“权宜次优状态”。在边界内，人情与利益能够实现良性互动，人情能够增加彼此之间的经济利益，而一定的经济利益则能够实现人情的维系，形成利己利他的“双赢格局”，从而保持人情关系与经济利益的“再生产”。但在边界外，则存在人情与利益关系的边际递减效用，经济利益过大会形成“损他”格局，人情关系淡薄甚至破裂，而人情过强则形成“损己”格局，雇主的经济效益就会较少。



<sup>[1]</sup> “做人水平”在本文中指的是雇主人际关系的处理能力，俗称“好人缘”，这不仅与雇主的性格特质有关，也与雇主的个人能力有关。而“会做人”是指雇主的人缘好，关键时候能够有人帮他。

<sup>[2]</sup> “势力范围”是建立在雇主之间默契程度基础上的，在文中指雇主所拥有的工作团队、人员配置。时间长了，便形成了某些雇工专门为某个雇主做工，雇工一般不会跳槽，雇主也不会去染指其他雇主的雇工，因为这是有代价的，除非在农忙时节。“势力范围”也具有伸缩性，用它来表示雇主之间竞争与雇工的稳定性是恰当的

<sup>[3]</sup> 严霞、王宁（2013）在研究“公款吃喝的隐形制度化”时曾提出“人情比较优势”，指通过与其他接待者在接待标准上相比较而显示出来的人情优势。而在本文中，笔者借用“人情比较优势”，用来指雇工对雇工人情资本的投入多少。具体参考：严霞、王宁，2013，《公款吃喝”的隐性制度化——一个中国县级政府的个案研究》，《社会研究》，第5期。

图 1: 权宜理性的范围与边界

折晓叶指出：利益原则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交往的一个重要砝码，“利、权、情”秩序已经进入原有家族村落深厚的社会基础之上。尤其在目前市场化机制的驱使下，村民们开始在人情之外更多地考虑经济利益，思想观念开始向以利益为导向的理性化方向转变，这种转变也表现在雇工对于雇主的理性选择上。但这种转变并非是纯粹地、彻底地转，雇工仍然把人情因素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表现在做工和赊欠工资的问题上，人情关系可以起到赊欠的作用；而雇工也非常重视自身的利益，将待遇、雇主的待人水平、经济资本与社会地位等纳入到考虑范围内。

因此，雇主与雇工所追求的不单单是纯粹的经济利益或人情关系，而是能在人情与经济利益之间实现一个大致平衡。综上所述，权宜理性所追求的是雇佣双方能够在人情与利益的张力中实现良性互动，这种互动是不可计量的，而是一种心理感受，是雇佣双方的感性平衡，平衡的因素包括双方的人情关系、面子、资本容量、做人水平、品行等等。而这种平衡是人与人在经济合作或者社会交往过程中，通过彼此之间关系地反复调整，彼此的需求和利益得到协调的情况下所形成的一种互利共生、彼此相容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情与利益关系能够实现良性互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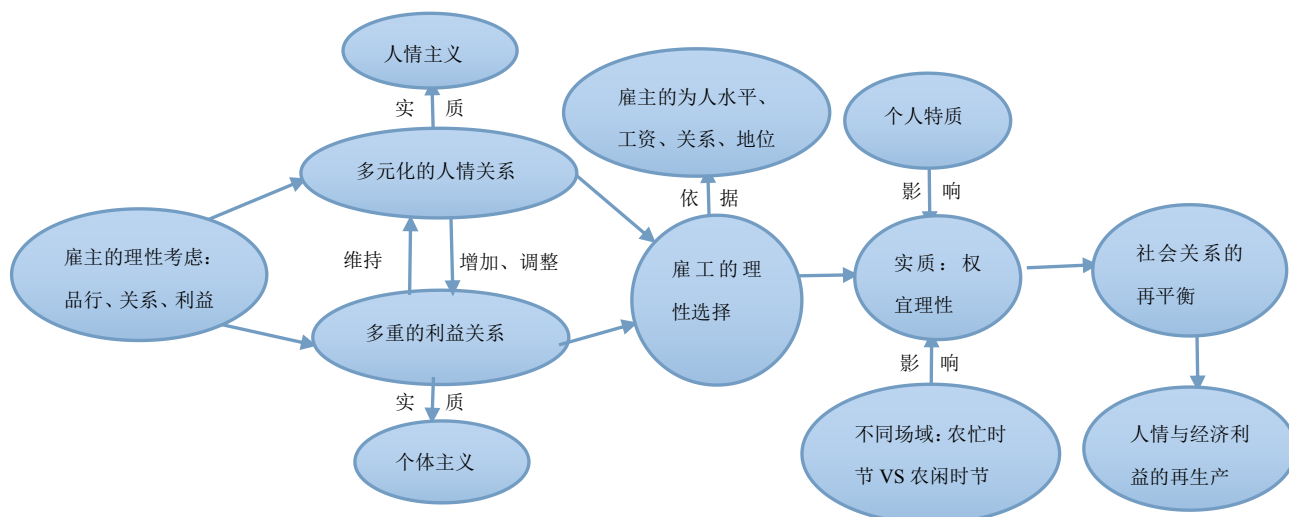


图 2: 雇佣关系的平衡状态示意图

#### 四、结论：权宜理性与差序格局的理性化

权宜理性是差序格局在农业生产领域的一种再现形式，但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差序格局”，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理性<sup>[1]</sup>”有所不同。经济理性在强调经济利益时，往往忽略人情关系地培养，而权宜理性在强调自身经济利益时，也会照顾彼此之间的关系、人情与面子等。因此，权宜理性与杨善华所讲的“差序格局理性化”有异曲同工之处，其表现形态具有双重性，即雇佣双方既有协商的余地，也有讨价还价的要求。因此，权宜理性也是一种人缘经济，实质是雇主依靠关系资本、人情投资、面子等来获取经济利益，遵循的是权宜逻辑，而非制度逻辑。

另外，权宜理性是建立在熟人关系的基础上，传统性因素依然能发挥一定作用，包括亲缘关系、业缘关系、地缘关系和拟似家族关系等熟人关系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发挥各自的作用，雇主可以通过这

[1] “经济理性”是指个体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追求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人人为自己。而乡土社会中，人们强调互相之间的伦理义务，本文所说的“权宜理性”介于经济利益与伦理义务之间的之中状态，强调人情与利益的相统一。

些关系来扩大合作体系。随着市场经济地推动，村庄的经济活动也日益扩展，权宜理性在农村生活、生产和人际交往中都有所渗透，其实质是道家的“隐忍”传统与经济理性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中国人的儒家“仁义”传统在雇佣关系中的体现。因此，权宜理性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特征，体现了“以和为贵”、“中庸”、“平衡”的文化特征及关系的技艺。另外，权宜理性也嵌入了市场化、经济理性等现代因素，是“差序格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应了适应与嬗变，也是一种更具理性化色彩的“差序格局”。

最后，笔者认为，在目前的农村社会中，权宜理性是雇佣关系在差序格局理性化中的体现，也是差序格局在农业生产领域的一种表现形式。除此之外，人情与利益等社会关系网络的塑造对于农村经济社会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国家在推动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的过程中，要重视农业管理过程中的人情与利益关系，努力构建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使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与农村传统因素相契合，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减少各类交易成本与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从而实现土地经营的合理化与社会关系的再平衡。

#### 参考文献：

- [1] 陈俊杰、陈震，1998，《“差序格局”的再思考》，《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
- [2] 费孝通，1985，《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
- [3] 林聚任，2007，《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重建——当前乡村社会关系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 [4] 翟学伟，2005，《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5] 徐晓军，2001，《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交换的变迁》，《浙江学刊》，第4期。
- [6] 杨善华、侯红蕊，1999，《血缘、姻缘、亲情与利益：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中“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趋势》，《宁夏社会科学》，第6期
- [7] 严霞、王宁，2013，《“公款吃喝”的隐性制度化——一个中国县级政府的个案研究》，《社会研究》，第5期。
- [8] 周邦君，2005，《清代四川农村雇工问题：一个乡土角度的考察》，《古今农业》，第4期。
- [9] 折晓叶，1997，《村庄的再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0] Kipin s, A.B .1997, *Producing Guanxi :Sentiment , Self , and Subcultur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 作者简介：任宇东，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3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张晓磊



## 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研究

——基于改进后的 Oaxaca—Blinder 分解\*

王毅杰 卢楠

**摘要：**已有农民工随迁子女研究集中于学校教育这一场域内部，而尚未涉及已迈进劳动力市场的随迁子女。通过对南京“城乡居民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已工作的随迁子女的社会经济状况好于无随迁经历的农民工，但是同城市居民相比仍有明显差距。使用改进后的 Oaxaca—Blinder 分解方法，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户籍身份歧视对这一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的差异是形成二者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其次为户籍身份歧视和社会资本差异。

**关键词：**农民工随迁子女 收入差距 户籍身份歧视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以“举家迁徙”的方式进城务工经商，家庭化、定居化趋势逐步扩大，随迁子女数量也逐年增加，农民工随迁子女正成为流动人口中越来越不容忽视的一部分。但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公平、学业成绩、心理健康、人际交往、城市适应、身份认同等问题。（周皓、巫锡炜，2008；段成荣、杨舸，2008；王毅杰、史秋霞，2010；周皓，2010）而对义务教育之后的情况刚开始触及，且局限于教育领域（杨东平、王旗，2009）。

现实情况是，义务教育之后，农民工随迁子女内部发生较大分化：有的在继续接受以升学为目的的高中教育，有的在接受职业技术教育准备就业，还有较多的是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开始工作，也有个别游走在城市街头。这就产生了一个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在今后生涯中，他们能否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经济基础是外来人口能否融入城市生活的基础，因此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将视野进一步拓展到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的境遇，关注他们在工作情况、薪资水平等经济状况以及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差距。除了前述农民工家庭化、定居化趋势外，学者们还关注到了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之间的代际差异（王春光，2010；李培林、田丰，2011）。但我们应注意到，这些成长乃至出生于城市、对农村和农业几乎没有体验的随迁子女，既无法等同于其父辈（老一代农民工），也无法等同于其兄辈（主要在家乡接受教育、对农村和农业还稍有些体验的新生代农民工），这应该是农民工群体内部更大的代际转化。因而需要通过与这两个相似群体相比，探讨随迁子女在融入城市过程中具有的特性。因此，本文将关注形成无随迁经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特点，与随迁子女和城市居民的进行比较，探讨随迁子女和无随迁经历农民工的异同。<sup>[1]</sup>

### 一、研究思路

在劳动经济学中，个人的收入水平被看做教育程度和生产技能的函数（SCHULTZ, THEODORE

\* 基金来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CSH015）、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SHB006）。本文已刊发于《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sup>[1]</sup> 本文中已工作的随迁子女中大部分属于农民工的一个子集，即有随迁经历的农民工，而有一部分则已经获得城市户籍，已不属于农民工的范畴，本文不涉及探讨二者的差异，统一简称为随迁子女。

W.1961)。劳动力市场内一些人的收入高于另外一些人，是因为两组人群在这些要素的占有上存在差异。因此，对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的研究需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影响收入的因素在不同群体间的相对优劣状况，这些资源禀赋的影响在模型中是可以量化和估计的，属于可以解释的部分；二是要关注各因素在不同群体收入回报率的差别，如果两个群体在某项资源上拥有的量相同，但是在不同群体中回报率却不相同进而导致了收入差异，这被看做是由群体歧视造成的。群体间回报率的差异在模型内部也可以测量，但是无法以群体在资源禀赋上差异来解释，因此被看做不可解释部分。<sup>[1]</sup>具体到本文，可解释部分与不可解释部分分别表现为随迁子女或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资源禀赋上差异、随迁子女或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所受到的歧视。

人力资本，尤其是受教育程度，作为个体资源禀赋的典型代表，是影响个人收入的主要因素之一（BECKER, GARY S. 1962）。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一些人，他们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在劳动力市场中具有较高的竞争力，因此在劳动力市场所获得的回报便会高于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人。人力资本主要通过教育和培训两条途径形成，其中受教育程度是人力资本最重要的表现。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偏向城市的教育投资体制，严重阻碍着农村教育的发展，我国农村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要低于城市人口。

由于户籍制度导致的城乡分割、以及基于此的教育经费拨款制度、分级管理制度和就近入学制度等相互强化，使得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受教育上处于劣势地位。在此制度环境下，随迁子女进入幼儿园、小学的比例以及在校学习的比例小于正常学龄儿童（黄祖辉、许昆鹏，2006），而且普遍入学年龄较大、在校学习成绩较差、成绩容易下降（熊春文、王毅、折曦，2014），相对来说更容易辍学（吕绍青、张守礼，2001）。同时，随迁子女的父母对他们的支持有限。随迁子女的父母因为家庭经济条件和自身教育水平的限制，尽管十分重视孩子的教育，但各种教育投入并不多，而且难以进行全面教育，或者说，他们对孩子的期望很高，但在教育投入上持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孩子的管理也以家长制作风为主，这使得随迁子女容易辍学（不论是显性的还是隐形的）、混迹街角（周芳，2002）。

我们认为，随迁子女虽然因户籍原因享受的教育资源不及城市居民，但是其在城市所受教育仍然优于农村，随迁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应高于农民工。因此提出

假设 1a: 三个群体人力资本存量存在显著差异，随迁子女优于无随迁经历民工，但不及城市居民。

假设 1b: 人力资本是影响随迁子女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人力资本是影响无随迁经历农民工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除了人力资本，近来的研究发现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也是影响个人收入的重要因素。个体社会网络中所蕴含的权力、信息、声望等资源可以影响人们在劳动力市场的收获。其一，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不可能完全透明，社会资本水平越高，其所得到的信息越充分，进而能够在劳动力市场获得更多的报酬。其二，劳动力市场中的雇员与雇主之间并非完全的理性人，他们在进行工资谈判等经济行动时也会受到社会资本中所蕴含的人情或信任等要素的影响。其三，社会资本还能通过提升劳动者的人力资本而影响他们的经济收入（赵延东，2003）。

社会资本是影响收入的重要因素，因此不同户籍群体间社会资本水平的差异需要关注。首先，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成员多以农村社会为主，其资源在城市中难以发挥很大作用。因此，城市居民和随迁子女、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在先天上就存在显著差异。其次，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展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农民工和随迁子女的平均工作时间高于城市居民，他们的空闲时间较少；随迁子女和农

<sup>[1]</sup> 严格来说，歧视属于不可解释部分的子集，但是不可能在方程中加入所有对收入有影响的自变量，被遗漏变量的影响会体现自不可解释部分。

民工在城市社会中所得到的公共资源比城市居民少很多，因此他们需要将仅有的空闲时间和精力来获取资源<sup>[15]</sup>。因此，他们在城市中的人际交往和公共参与受到了这样或那样限制，难以形成丰富社会资本。

因为社会交往基本遵循同质性原则(MCPHERSON, MILLER, LYNN SMITH-LOVIN, and JAMES M. COOK, 2001)，人们往往会选择同自身社会地位相差不大的人交往，无随迁经历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地位较低，同乡和工友是他们的主要交往对象，关系网络的同质性较强。他们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往往处于表层，城市社会中的异质性网络难以形成。因此我们认为，无随迁经历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要小于城市居民（叶静怡、周晔馨，2010）；随迁子女则可能由于在城市成长的过程中结交城市本地居民，而发展出城市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存量要大于农民工而小于城市居民。

综合前文中社会资本对于收入的影响作用，我们提出，

假设 2a：三个群体社会资本存量存在显著差异，随迁子女优于无随迁经历农民工，但不及城市居民。

假设 2b：社会资本是影响随迁子女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社会资本是影响无随迁经历农民工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 二、数据、变量与分析模型

### （一）数据和变量设置

本文数据源于 2014 年上半年课题组在南京进行的“城乡居民社会状况调查”，调查对象包括 15-55 岁南京城市居民、在南京工作的随迁子女和无随迁经历农民工。<sup>[1]</sup>对于城市居民，我们以南京小区均价为标准，进行多阶段抽样。首先将南京主城区的鼓楼、白下和建邺三个区的所有小区按照均价排序，根据等距抽样原则，从每个区的小区抽样框中抽出 9 个小区，共得到 27 个小区。其次，从每个小区的总户数中依据随机数表得到 13 个有效样本。户内抽样则以该户内出生时间最靠近 1 月 1 日的成员为被调查者。对于无随迁经历农民工的调查，采用以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为配额的抽样方法。随迁子女的调查，我们则使用了滚雪球抽样方法。最终我们获得城市居民有效样本 376 份，无随迁经历农民工 259 份，随迁子女 184 份。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劳动者的收入。在调查中，我们向被调查者询问了过去一年中个人总收入，并强调包含了务农、工资、奖金、收租、养老金、补助等各类收入。为了控制工作时间对于收入的影响，我们依据工作时间将年收入转化为小时收入，以小时收入的对数作为因变量纳入模型。

**人力资本** 本文以受教育年限来测量人力资本。调查中向被调查者询问了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并提供了“小学及以下”、“初中”、“中专或技校”、“普通高中”、“大专”、“本科及以上”六个选项。依据学界常用做法，将“小学及以下”赋值为 6，“初中”赋值为 9，“中专或技校”赋值为 12、“普通高中”赋值为 12、“大专”赋值为 15、“本科及以上”赋值为 16。这样得到的是一个受教育年限的定距变量。

**社会资本** 我们借鉴边燕杰（边燕杰，2004）和尉建文（尉建文、赵延东，2011）的研究，根据研究主题将其操作化方法稍加修改，以餐饮网和定位法来测量被调查者的社会网络结构，得到本研究的社会资本变量。我们选取了如下四个指标：社会网络规模，即餐饮网中人数；社会网络密度，即餐饮网中城里人的比例；网顶，即个人社会网络中位置最高的职业分数；网差，即社会网中最高职业分数与最低分数之差。职业的赋分采用尉建文的职业权力分数。我们将上述四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公因子，得到一个新的变量，作为个体的社会资本变量。由于得到的因子值为-1 到+1，为了后续模型

<sup>[1]</sup> 本文对随迁子女的定义为，父母均为农民，义务教育阶段随父母在工作城市连续生活时间超过一年以上、当前在南京工作超过半年的劳动者。

中解释更直观，将其标准化为取值 0 到 100 的数值。

控制变量 本文重点对个人的工作进行控制，除了职业（非技术工人、技术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中高层白领）和行业（重工业、轻工业、服务业、机关事业）外，组织资源也是影响收入的重要变量（李路路、秦广强、陈建伟，2012），笔者将个体的组织资源分为管理者、自由者和被管理者三个类型。其它常规的控制变量还有性别（女性为参照组）和年龄。

## （二）分析方法

由于研究主题为寻求随迁子女和城市居民两个群体之间收入差异的原因，并具体量化分析各个因素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程度，这就需要对各个影响因素进行分解。本文使用改进后的 Oaxaca—Blinder 分解方法实现此目标。

Oaxaca—Blinder 分解早先运用于研究性别之间的工资差异，后来运用范围得到了很大拓展，如果两个群体之间在某个连续变量上存在明显差异，都可以使用这种方法。以本文研究对象为例，这种方法将工资的户籍差异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以不同户籍群体之间存在的不同禀赋特征来解释（即可解释部分）；一部分由不能用不同户籍群体之间存在的禀赋特征来解释（即不可解释部分），我们一般将后者看做是因为户籍身份歧视所造成的收入差异。如果我们用  $\bar{W}_u$  表示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用  $\bar{W}_r$  表示随迁子女的平均收入水平，城市居民和随迁子女的一系列个人特征的均值分别用  $\bar{X}_u$  和  $\bar{X}_r$  来表示，这样我们得到两类户籍群体的工资决定方程分别为  $\bar{W}_u = \beta_u \bar{X}_u$  和  $\bar{W}_r = \beta_r \bar{X}_r$ 。由此可得到 Oaxaca—Blinder 分解的公式为：

$$\bar{W}_u - \bar{W}_r = (\bar{X}_u - \bar{X}_r)\beta_r + (\beta_u - \beta_r)\bar{X}_u$$

其中，等式右边第一部分是可解释部分，其中包括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第二部分为不可解释部分，即户籍身份歧视导致的工资差距。以上仅仅介绍了基本思想，笔者参照 Jann 对 Oaxaca—Blinder 分解方法的建议，使用全样本回归确定反事实工资系数（JANN B,2008）。

本文所做的比较研究，不仅在随迁子女与城市居民之间寻求差异，同时也在探讨随迁子女与农民工之间的差别，因此后文中也会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两个群体之间做收入差异分解，将两者结果所比较，希望能更细致地寻求户籍身份在劳动力市场中所起的作用。

## 三、统计分析与差异分解

我们按照城市居民、无随迁经历农民工和随迁子女三个群体，分别描述了三组在各个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上的特征差异，以对他们的社会经济情况有个直观认识。结果见表 1。

总体来看，在社会经济地位的诸多方面，随迁子女的情况处于无随迁经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年收入最高的是城市居民，达到平均 6.67 万元，无随迁经历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分别为 4.86 万元、4.73 万元。<sup>[1]</sup>由此可知无随迁经历农民工的平均年收入高于随迁子女，但是二者相差不大。无随迁经历农民工和随迁子女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较大，城市居民的年收入是无随迁经历农民工和随迁子女的 1.4 倍左右。由此可以看出收入的差异可能主要来自因户籍制度导致的城乡户籍身份群体。

进一步来看小时收入，城市居民的仍为最高，每小时 30 元；无随迁经历农民工的最低，只有 16.26 元，仅仅是城市居民的一半；随迁子女的要比农民工高，为 19.53 元，为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二。上文谈

<sup>[1]</sup> 2013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月收入是 2600 元，本文数据与之相比较；可能由于南京属于东部发达地区，工资水平较高，且近年由于出现用工荒，农民工工资每年都在增长。这可能部分解释本数据的原因。

到，随迁子女的年收入低于无随迁经历农民工，但是随迁子女的小时收入却高于无随迁经历农民工，也就是说随迁子女之所以年收入低于无随迁经历农民工，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劳动回报率低，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少。

劳动时间方面，城市居民基本上是正常的每天 8.2 小时工作，而无随迁经历农民工每天工作 10 小时，随迁子女则每天工作 8.9 个小时。另外城市居民每月休息近 6 天，而无随迁经历农民工每月仅休息两天半、随迁子女则每月休息近 4 天。这印证了前文对于随迁子女劳动回报率高却年收入少原因判断。

表 1:变量的基本描述

变量	比例 (%)			变量	均值		
	居民	农民工	随迁		居民	农民工	随迁
职业				年收入 (万元)	6.77	4.86	4.78
非技术工人	2.93	17.44	14.13	小时收入 (元)	30.58	16.26	20.21
技术工人	16.27	32.95	38.59	每天工作小时数	8.28	9.98	8.79
商业服务业人员	30.13	47.67	36.41	月休息天数	5.70	2.64	4.08
中高层白领	50.67	1.94	10.87	性别 (女=0)	48.70	60.20	68.50
行业				年龄	37.09	29.77	21.73
重工业	15.05	18.68	15.76	受教育年限	13.42	8.88	11.54
轻工业	9.95	20.23	24.46				
服务业	52.42	60.31	55.98	社会资本	40.06	20.92	30.73
机关事业	22.58	0.78	3.80	网络规模	38.06	26.77	39.35
管理情况				网络密度	7.34	2.31	4.51
管理者	36.70	14.29	24.46	网顶	52.65	27.37	39.41
自由者	16.22	35.14	16.30	网差	52.65	27.37	39.41
被管理者	47.07	50.58	59.24	样本量	376	259	184

在人力资本方面，城市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达到 13.4 年，无随迁经历农民工的受教育年限为近 9 年。随迁子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1.5 年，差不多比无随迁经历农民工的学历高一个层次。这是因为我国自近十年来对于职业教育的扶持力度逐渐加大，随迁子女在接受完义务教育后，即使考不上高中，多数也能进入了中职院校继续接受教育。在社会资本方面，城市居民得分为 40 分，无随迁经历农民工得分为 21 分，仅为城市居民的一半多，但是随迁子女得分达到 31 分，近乎为无随迁经历农民工的 1.5 倍，为城市居民的 3/4。可以看出，无论在人力资本还是社会资本方面，随迁子女要强于无随迁经历农民工，城市居民的最高。假设 1a 和 2a 得到验证。<sup>[1]</sup>

下面我们取对数后小时收入为因变量，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和关于工作的 3 个变量）纳入多元回归模型，结果见表 2。在人力资本方面，受教育年限均有助于提高年收入，在三个群体中都通过了显著检验。城市居民的教育回报率最高，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每增加一年，年收入则会增加 8% 左右；在随迁子女和无随迁经历农民工的情况相同，受教育程度每增加一年，收入增加 4% 左右，教育回报率明显低于城市居民。这个结果同 Maurer Fazio 的研究结果相似，他估计出城镇职工的教育收益率为 3.7%，农民工的为 1.5%，城镇职工比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同样高 2%

<sup>[1]</sup> 笔者分别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作为因变量，建立包含性别、年龄、职业状况等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结果表明，不同身份群体间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存在显著差异。限于篇幅，此表未在本文中列出。



(MAURER-FAZIO, MARGARET and NGAN DINH.2004)。已有研究发现在当前的户籍制度背景下，随迁子女在城市中上的学校多是私立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或者生源以外地农民工和本地底层居民为主的公立学校（王毅杰、史秋霞，2012）。后者的教育质量或许比前者略高，但是二者在城市社会教育体系中均处于较低的层次。教育对于随迁子女和城市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将在后文中进一步探讨。

表 2:三个群体的收入决定模型

变量	城市居民		无随迁经历 农民工		随迁子女	
	Beta	SE	Beta	SE	Beta	SE
性别	0.17 ***	0.06	0.16 **	0.08	0.26 ***	0.09
年龄	0.00	0.00	0.02 ***	0.00	0.08 **	0.02
行业（以服务业为参照）						
重工业	0.15	0.10	0.29 **	0.12	0.08	0.13
轻工业	0.14	0.12	0.05	0.13	-0.20 *	0.12
机关事业	0.03	0.09	-0.28	0.52	-0.10	0.23
职业（以商业服务业为参照）						
非技术工人	-0.24	0.20	-0.29 **	0.14	-0.08	0.15
技术工人	-0.15	0.11	-0.06	0.12	-0.12	0.12
中高级白领	0.13	0.09	0.45	0.35	0.25	0.16
组织资源（以被管理者为参照）						
管理者	0.28 ***	0.08	0.36 ***	0.12	0.31 ***	0.10
自由者	0.03	0.09	0.04	0.09	0.43 ***	0.12
受教育年限	0.08 ***	0.01	0.04 **	0.02	0.04 **	0.02
社会资本	0.01 ***	0.00	0.01 ***	0.00	0.01 **	0.00
(常量)	1.47 ***	0.25	1.43 ***	0.23	0.07	0.41
R <sup>2</sup>	0.322		0.252		0.373	
N	353		246		176	

注：\*p<0.1， \*\* p<0.05， \*\*\* p<0.01。

就社会资本而言，城市居民、无随迁经历农民工和随迁子女的社会资本对于提高他们年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均是社会资本每增加 1 分，则年收入增加 1%，这说明三者群体在社会资本对于收入的转化率上是相同的。在我国这个关系处于非常重要位置的社会中，每个人都会通过关系以提高自身的收入，但是这并不是说社会资本对于三个群体的收入影响是一样的。因为即使转化率之间的差别不大，社会资本总量的差异不同，那么社会资本对于收入的影响也不同。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城市居民应该有着更多的社会资本转化为收入，而模型中显示二者的转化率相同，这可能是由于无随迁经历农民工或者随迁子女的收入或许因社会资本带来的增长并不多，但他们的社会资本较少，因此转化率并不低。而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较多，其对收入的影响也更大，但存在社会资本边际效益递减的情况，所以转化率显得并不高。

上文收入决定模型表明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会影响各个群体的收入，但无法说明各因素对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有多大的影响。因此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我们使用改进后的 Oaxaca—Blinder 分解方法来量化各个因素对于群体间收入差距的影响（见表 3）。

表 3:三个群体的收入差异分解

	变量	随迁子女与城市居民		无随迁经历农民工 与城市居民	
		收入（对数）	百分比	收入（对数）	百分比
可解释部分	其它*	0.225	44%	0.247	41%
	人力资本	0.127	26%	0.281	46%
	社会资本	0.052	11%	0.123	20%
	合计	0.394	81%	0.651	107%
不可解释部分	户籍歧视	0.092	19%	-0.041	-7%
总差异		0.486	100%	0.610	100%

\*由于篇幅所限，此表将性别、年龄和与工作相关的变量合并为“其它”。

随迁子女和城市居民的小时收入总差距（取对数后）为 0.486，其中可解释部分和不可解释部分分别为 0.394 和 0.092，分别占总差距的 81%和 19%。而无随迁经历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小时收入总差距（取对数后）为 0.610，其中可解释部分和不可解释部分分别为 0.651 和-0.041，分别占总差距的-7%和 107%。这说明农民工和城市居民间的在各项资本上的禀赋差异过度解释了二者之间的差距，这表示，如果农民工有着与城市居民相同的资本，其收入将高于城市居民。

在可解释部分，人力资本能够解释了随迁子女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 26%、无随迁经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差距 46%；社会资本能够解释随迁子女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 11%、无随迁经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差 20%。可以看出人力和社会资本都是影响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重要原因，假设 1b、2b 得到验证。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无论对于随迁子女还是无随迁经历农民工，人力资本都是影响他们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最重要因素，其对总差距的贡献超过了其它因素。社会资本的作用虽不及人力资本，但仍是导致不同户籍群体间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这个结果同程诚、边燕杰的研究基本一致（程诚、边燕杰，2014）。社会资本的作用小于人力资本的现象，可以从社会资本的运行机制中得到解释。信息搜寻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信息，可以通过寻求职业者的社会网络得到传播，这可以扩大求职者的信息搜寻范围，降低寻找工作的成本，但是能否真正得到好的工作还需要看自身人力资本条件是否适合岗位要求，也就是说社会资本要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拥有一定的人力资本的前提下。

更值得注意的是来自户籍歧视对群体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对随迁子女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中，不可解释部分占了总差距的 19%，其重要性仅次于人力资本。而无随迁经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中则不存在户籍歧视的贡献。歧视理论假设，无论雇主还是顾客倾向于根据员工身上易于识别的特点来估计员工的工作能力。据歧视理论的逻辑，无随迁经历农民工或随迁子女会因为自身的户籍身份而被贴上“能力差、知识缺乏”等负面标签；根据预言的自我实现理论，人们会潜在地依据他人对自己的期望而行动。按以上两种理论，随迁子女成长于城市中，他们在外部特征上更接近与城市居民，长时间的接触也会降低人们的歧视，随迁子女所受的歧视理应小于无随迁经历农民工。

但本文结果表明，在劳动力市场中，无随迁经历农民工没有受到歧视，而随迁子女则受到一定的歧视。关于户籍歧视对群体收入差距的作用大小，一直以来都有争议。大量研究认为直接的户籍歧视对于收入差距有着重要影响（邓曲恒，2007；李骏、顾燕峰，2011；章元、王昊，2011；魏万青，2012），但

是新近的一些研究则表明并不存在直接的户籍歧视（李若建，2012；田丰，2010；吴晓刚、张卓妮，2014；邢春冰、罗楚亮，2009）。本文的随迁子女同城市居民的研究支持第一种观点，而无随迁经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模型则支持第二种观点。如果从更宏观的群体利益视角出发，我们认为，城市居民为了维持自身的优势地位，更倾向于维持一定的收入差距。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资源禀赋的差距维持这种优势更具有合法性，因为无随迁经历农民工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资源禀赋上同城市居民已存在较大差距，这可能导致直接的户籍歧视便不明显。相对于无随迁经历农民工，随迁子女在资源禀赋上更接近于城市居民，难以体现出收入差距，各种隐形的歧视可能便会发生作用。以上仅是笔者对这一现象的假设，尚需更多的数据进行验证，其具体机制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四、结论与讨论

以往对随迁子女的研究多集中于教育阶段，关注他们的教育公平、学业成绩、心理健康等方面，对于劳动力市场中的随迁子女尚未涉及。这或许是因为已工作的随迁子女没有可供易于辨识的特征，而且其分布也相对分散，相互间的联系也不够紧密，使得调查者无法使用受访者推动的方法收集数据；如要严格抽样，则需动用大量的各种资源才可能实现。因此，限制了对已踏入劳动力市场的随迁子女的研究。由于上述原因，笔者所在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融入”课题组，2014年在南京收集的随迁子女数据，使我们对已经参加工作的随迁子女的研究成为可能。

利用上述数据，以城市居民和无随迁经历农民工两个群体为比较对象，本文分析了随迁子女在都市中的经济社会地位状况，并探讨了各种因素对于随迁子女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往研究户籍收入差距的分析着眼与人力资本和身份歧视，笔者通过将社会资本加入歧视研究的分析框架中，全面考察各因素对已工作的随迁子女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时以无随迁经历农民工情况做对比，寻找随迁子女群体的自身特点。研究发现，随迁子女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存量好于无随迁经历农民工，但是与城市居民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影响随迁子女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为人力资本，其次为户籍歧视，再次为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同样是无随迁经历农民工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因素，其次为社会资本，户籍歧视在这方面并没有影响。本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由于调查中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群难以接触到，调查对象的结构略偏中下层，可能使本研究结果倾向于低估户籍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作为一个探索性的尝试，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样本量较少，因此随迁子女的代表性成一定的问题，其研究结果需谨慎对待。

由“户籍歧视对群体收入差距的作用”这个议题激发了大量的研究，但各种结论却相互矛盾，难以达成共识。究竟是何种原因所致？笔者尝试探讨一二。

已有研究一致假设全国存在统一的城乡户籍差异。然而，现实情况是，我国内部各个城市发展水平差异非常大，虽然全国各地都有城市和农村户口的划分，但在不同地域，二种户籍之间所含的资源差异各不相同。县城的户籍和农村户籍之间享受资源的差距远远小于特大城市中两类人群享受资源的差异。因此忽视的城市本身的差异，将农业非农、本地外地分别看作同质性的影响因素会忽视内部差异而导致结论产生偏差。

许多学者在一定程度上意识这个问题，但在具体研究操作时，一般仅在模型中控制地区变量，如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划分，但这难以有效控制组内的差异。首先，同样在东部地区，不同区域的发展水平差别也很大，如在江苏省内，苏南与苏北地区城市发展水平便存在着巨大差距。其次，即使在发展水平差异不大的小区域内，省会大城市同周边的县城之间户籍含金量也无法相比。因此利用不同结构特征的数据，得到的研究结果难免有偏差。如吴晓刚<sup>[31]</sup>的研究以全国1%的人口调查数据，发现并不存在直接的户籍歧视；而章元<sup>[27]</sup>的研究使用上述数据的上海市部分，则发现直接的户籍歧视非常严重。

与后者的研究相似，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作为东部发达城市的南京市，分析结果也显示出一定的户籍歧视。

### 参考文献:

- [1] 边燕杰, 2004, 《城市居民社会资本来源及作用: 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 《中国社会科学》, 3期。
- [2] 程诚、边燕杰, 2014, 《社会资本与不平等的再生产——以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收入差距为例》, 《社会》, 第4期。
- [3] 邓曲恒, 2007, 《城镇居民与流动人口的收入差异——基于 Oaxaca-Blinder 和 Quantile 方法的分解》, 《中国人口科学》, 第2期。
- [4] 段成荣、杨舸, 2008, 《我国流动儿童最新状况——基于 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人口学刊》, 第6期。
- [5] 黄祖辉、许昆鹏, 2006, 《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问题与对策》, 《浙江大学学报》, 第4期。
- [6] 李培林、李炜, 2007, 《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 《社会学研究》, 第3期。
- [7] 李路路、秦广强、陈建伟, 2012, 《权威阶层体系的构建——基于工作状况和组织权威的分析》, 《社会学研究》, 第6期。
- [8] 李培林、田丰, 2011,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 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 《社会》, 第3期。
- [9] 李骏、顾燕峰, 2011,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户籍分层》, 《社会学研究》, 第2期。
- [10] 李若建, 2012, 《广州市不同户籍人口工资收入差距研究》, 《南方人口》, 第2期。
- [11] 吕绍青、张守礼, 2001, 《城乡差别下的流动儿童教育——关于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调查》, 《战略与管理》, 第4期。
- [12] 田丰, 2010, 《城市工人与农民工的收入差距研究》, 《社会学研究》, 第2期。
- [13] 尉建文、赵延东, 2011, 《权力还是声望?——社会资本测量的争论与验证》, 《社会学研究》, 第3期。
- [14] 王毅杰、史秋霞, 2012, 《利益相关群体视角中的流动儿童学校教育》,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第2期。
- [15] 王毅杰、史秋霞, 2010, 《流动儿童社会认同的策略性选择》, 《社会科学研究》, 第1期。
- [16] 王春光, 2010, 《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的认识》, 《人口研究》, 第2期。
- [17] 熊春文、王毅、折曦, 2014, 《“混日子”: 对农民工子弟就学文化的一种理解》,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期。
- [18] 魏万青, 2012, 《户籍制度改革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研究》, 《社会学研究》, 第1期。
- [19] 吴晓刚、张卓妮, 2014, 《户口、职业隔离与中国城镇的收入不平等》, 《中国社会科学》, 第6期。
- [20] 邢春冰、罗楚亮, 2009, 《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基于半参数方法的分析》,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第10期。
- [21] 杨东平、王旗, 2009, 《北京市农民工子女初中后教育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 第1期。
- [22] 叶静怡、周晔馨, 2010, 《社会资本转换与农民工收入——来自北京农民工调查的证据》, 《管理世界》, 第10期。
- [23] 周皓, 2010, 《流动儿童的心理状况与发展——基于“流动儿童发展状况跟踪调查”的数据分析》, 《人口研究》, 第2期。
- [24] 周皓、巫锡炜, 2008, 《流动儿童教育绩效及影响因素: 多层线性模型分析》, 《人口研究》, 第4期。
- [25] 周芳, 2002, 《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教育干预》, 《教育科学研究》, 第11期。
- [26] 赵延东, 2003, 《社会资本理论的新进展》, 《国外社会科学》, 第3期。

- [27] 章元、王昊, 2011, 《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户籍歧视与地域歧视: 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 《管理世界》, 第7期。
- [28] BECKER,GARY S. 1962,*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alysi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Issue 5.
- [29] JANN B,2008,*A Stata Implementation of the Blinder-Oaxaca Decomposition* , The Stata Journal, Issue 4.
- [30] MAURER-FAZIO,MARGARET and NGAN DINH.2004, *Differential Rewards to, and Contributions of,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s Segmented Labor Markets*,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Issue 3.
- [31] MCPHERSON,MILLER,LYNN SMITH-LOVIN,and JAMES M.COOK,2001,*Birds of a Feather: Homophily in Social Network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Issue 27.
- [32] SCHULTZ,THEODORE W.1961,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Issue 3.

☆ 作者简介: 王毅杰,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卢楠,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2015级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张晓磊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级社会学硕士研究生暑期调查报告会成功举办

9月24日, 14级河海大学研究生暑期调查口头报告会顺利开展。本次报告会分别在2015年9月24日、28日、29日、30日以及10月9日于新公管楼909会议室举行, 社会学系老师及部分非2014级的社会学专业学生参加此次报告会。

这次报告会共有23名同学参加。按照同学们的研究内容, 此次报告会主要分为五组——环境小组、基层社区小组、职业小组、劳工产业小组、教育信仰娱乐小组进行, 我系社会学硕士研究生通过暑期调查工作呈现了丰富的研究主题, 包括环境问题、城镇发展与治理问题、就业问题、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民间宗教信仰问题等, 涉及环境社会学、城乡社会学、职业社会学等社会学分支学科。通过暑期调查, 同学们成功的将上课学习到的理论和方法学以致用, 用社会学的理念去接触社会、认识社会。到9月份, 为期一个月的暑期田野调查已经结束, 同学们也将收集到的经验资料进行了分析, 并形成了研究文本。暑期调查口头报告就是同学们一年以来学到的专业知识以及问题意识的呈现。

报告人、评论人和评论老师都十分认真地对待此次报告, 对每一位同学都进行了精彩的点评, 从选题、研究方法、问题分析、结论思考以及文本格式等方面都提出了建议, 原定的每组一个半小时的报告时间, 结果几乎都用了超过两个小时的时间, 现场的热烈气氛由此可见一斑。

2015年10月9日中午12点, 暑期调查报告会议圆满结束。社会学系每年9月举行的暑期调查报告会议不仅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调查成果的机会, 也为全体师生搭建了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 为后期的论文开题和答辩顺利进行做下了铺垫。

# 地位、政治关注、政府信任与基层民主选举中的投票参与\*

——一项来自 CGSS2010<sup>1</sup>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研究

李向健 孙其昂 孙旭友

---

**摘要：**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的数据，利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检视了当前中国城乡基层民主选举中的投票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民主选举参与的社会经济地位模型并不适用于中国城乡基层民主选举。同时指出从两个方面促进基层民主选举中居民的投票参与：一是依托党员和积极分子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同时提升居民的政治关注度；二是加快基层政府治理体制改革，提升居民对基层政府的政治信任。

**关键词：**投票参与 政治关注度 政府信任

---

## 一、问题的提出

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王浦劬，1995）。它是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制度得以存在的基础，民主所有的价值和意义只有通过公民的政治参与才能真正实现。在政治参与的诸多形式中，政治投票，作为公民个人在相互竞争的政策或候选人之间表示偏好的行为，是制度化程度最高的一种参与形式，也是参与人数最多、最为集中的一种参与形式，是“有很大一部分公民参加的唯一政治行为”（格林斯坦、波尔斯比，1996）。尽管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学者西德尼·伏巴及其调查小组关于政治参与方式的报告的公布，人们已经将目光转移到了政治参与的其他方式，诸如政治选举、合作活动、个别接触等，但是在比较各种参与在影响力、影响规模、传递的信息量、所需主动精神和与其他参与者发生冲突可能性等方面之后（诺曼·H·尼、西德尼·伏巴，1994），政治投票仍不失为现代公民社会最主要的政治参与方式之一。

作为推动民主迈向现代化的行动主体，中国公民在法律意义上拥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权。但是，在现实情况中我国城乡居民政治参与情况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基层社区中存在大量的置身于政治过程之外的“参与冷漠者”，这必然损害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因此，深入分析城乡居民政治参与特

---

\*本研究使用数据全部来自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之“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二期项目。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全国 25 家高校及社会科学院具体执行，数据出处可查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数据与调查中心”官方网站：<http://nsrc.ruc.edu.cn/>。作者感谢上述机构提供的数据协助，文责自负。本文已刊发于《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15 年第 4 期。

别是居委会/村委会选举投票的影响因素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往的研究发现，无论采用怎样的测量方法，居较高社会地位阶层（或社会经济地位，通常包括个人的收入和教育水平）中的公民能够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社会常规的政治活动中，或者说由于社会经济地位对常规政治参与的影响，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民众之间存在参与方面的差别（安东尼·奥罗姆，2006），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更愿意投票。“那些受教育多、收入较多和职业地位较高的人，参与的积极程度通常比那些贫穷、未受教育和职业地位低下的人要高”（陈镇明，2003）。对于高社会地位阶层来说，政治秩序与他们有较大的利害关系，因而更倾向于以常规的政治方式参与其中。一项来自CGSS2006的经验研究表明，公职新中产、市场新中产、小业主与自雇者均比工人更有可能参加投票，而这又由其收入更高、更认同中产阶层来阐明；收入越高越认同中产阶层，收入越高、越认同中产阶层就越有可能参加投票（刘欣、朱妍，2011）。刘欣进一步指出，阶层政治论是分析当前中国民众政治参与的有效的理论工具，阶层地位与投票行为的联系机制就在于阶层利益。

在公民投票的“社会经济地位模型”提出的几十年以后，许多研究者发现，在美国，尽管人们的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有所提高，然而实际的投票率却在下降。万斌、章秀英基于在浙江中部地区的实证调查，发现社会地位与参与投票具有负向直接效应，只有通过政治效能和政治关心习惯等中介变量的作用，社会地位才会对政治参与产生正向的间接效应（万斌、章秀英，2010）。由此，政治身份与政治关注程度成为影响居民投票行为的重要解释项目。

史蒂文·罗森斯通和约翰·马克·汉森为政治参与率的差异提供了另一种解释：美国投票人数的减少的原因在于政党没能有效地动员选民（安东尼·奥罗姆，2006）。由于社会各种矛盾和冲突的存在，促使人们通过卷入政党组织活动并希望通过其力量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政党对于选民的组织动员以及选民的政治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投票率，许多经验研究范式一再提醒我们注意作为动员机构的政治组织在常规政治建构中的重要性。

刘春荣在银杏居委会换届选举个案研究发现，选举委员会及其所联系的积极分子网络，形成了一个包容性的动员结构，这一特定的动员结构在各个动员环节中，策略性地把国家的政策话语和居民对选举的不同感受衔接起来，整合了民主权利、邻里怀旧和社区认同等阐释框架，由此激发了更大尺度的共鸣和参与（刘春荣，2010）。

基层民主选举的动员理论促使笔者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当前中国城乡基层民主选举中，对基层政府机构（区政府、街道或县政府、乡政府）的信任程度对居民的投票参与是否存在显著的影响呢？孙昕等人基于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样本调查数据，分析了村民对农村基层乡镇党委、政府的主观政治信任对其村级选举参与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我国当前特定的政治体制中“政治信任”对村民选举参与起到了特殊作用，政治信任度越高，越有可能参与基层选举投票（孙昕、徐志刚、陶然、苏福兵，2007）。

由此，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试图通过“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数据，建立地位、政治关注、政府信任与基层民主选举中的投票参与的logistic回归模型，一方面检视社会经济地

位、政治关注等变量对基层民主选举中的投票参与的影响，另一方面明确提出居民的政府信任是影响基层民主选举中投票参与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个结论不仅适用于农村样本，同样得到城市样本数据分析的支持。

因此，下文将对以下研究假设进行验证：

假设一：在居委会/村委会选举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居民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居民更有可能投票。该假设又分为收入假设和受教育程度假设。

假设二：在居委会/村委会选举中，政治关注度较高的居民比政治关注度较低的居民更有可能投票。该假设又分为政治身份假设和时事关注假设。

假设三：在居委会/村委会选举中，政府信任程度较高的居民比政府信任程度较低的居民更有可能投票。该假设又分为政府机构信任假设和政府人员信任假设。

## 二、数据和变量

### （一）数据来源

CGSS 是一项连续性的中国基本社会状况调查项目，主要目的是了解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城乡居民的就业、教育、社会关系、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等方面的状况。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系主持、与全国 25 家高校及社会科学院合作完成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项目 2010 年的调查数据，调查采用分层四阶段概率抽样方法，以全国（含 22 个省、4 个自治区、4 个直辖市；不含西藏自治区、港澳台）人口为调查总体，实际完成样本量为 11785 个，其中城市样本量 7091 个，占总样本量的比例（有效百分比）是 61.1%，农村样本量为 4519 个，占总样本量的比例（有效百分比）为 38.9%，缺失 175 个，数据经过加权处理。

### （二）变量的测量

#### 1、因变量

城乡居民参与居委会/村委会选举的投票状况。变量的测量来自于 CGSS2010 调查问卷中“上次居委会选举/村委会选举，您是否参加了投票”这一问题，其答案选项是“是、否、没有投票资格”这三种。笔者将后两项合并，形成投票参与的二分变量，即“参加投票编码为 1”和“未参加投票编码为 0”。

#### 2、自变量

（1）社会经济地位 收入变量——由于 CGSS2010 的个人年收入存在严重的正向偏态状况，笔者采用三分割点法，将个人年收入分层为“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教育程度——变量的测量来自于“您最终完成的最高教育程度是”这一问题。笔者将答案合并成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大专以上四个属性，分别编码为 1，2，3，4。

（2）政治身份和政治关注度 政治身份变量——变量的测量来自于 CGSS2010 调查问卷中“您的政治面貌是”这一问题。笔者将答案合成党员和非党员两个属性，分别编码为 1 和 0。政治关注度变量有两个维度。其一是问卷中“请问您是否知道我国现任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是谁？”，答案“知道且回答正确”编码为 1，“不知道/回答不正确”编码为 0。其二是问卷中“近一年来，您从事以下活动



的频率如何？”，笔者将“阅读有关时事方面的报刊、杂志和书籍”和“与他人议论有关时事的话题”两种活动进行因子合成，形成“时事关注因子”，如下表：

表 1：时事关注主成分因子分析

	成分	公因子
	时事关注	方差提取
(时事) 阅读	0.811	0.900
(时事) 议论	0.811	0.900
特征值	1.621	
解释的方差%	81.067	81.067

(3) 政府信任。政府信任变量的测量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地方政府信任，问题来自于问卷中“您对于下面这些机构本地政府（乡政府）的信任程度怎么样？”答案为“完全不可信、比较不可信、居于可信和不可信之间、比较可信和完全可信”五种。其二是政府员工信任，问题来自于“对以下说法，您在多大程度上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大多情况下我们可以相信政府工作人员在做正确的事”。答案为“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居于同意和不同意之间、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五种。各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 2：

表 2：变量值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统计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居委会/村委会投票参与		0.48	0.500	11166
背景变量	城乡差异（农村=0）	0.61	0.488	11610
	性别差异（女性=0）	0.48	0.500	11783
	年龄	47.31	15.681	11779
社会经济地位	教育程度分层	2.14	1.074	11777
	收入分层	2.00	0.816	11785
政治身份	是否党员（非党员=0）	0.12	0.330	11769
政治关注度	是否知道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不知道=0）	0.25	0.434	11655
	时事关注因子	0.00	1.000	11699
政府信任	地方政府信任	3.68	1.096	11714
	政府员工信任	3.85	0.961	3631

### 三、数据分析

多层回归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是将重要预测变量的单一作用逐次纳入回归模型中，

以了解各阶段的回归模型对因变量的单一及整体影响。本研究将从受教育程度、收入、政治身份、政治关注度和政府信任等多个层面考察基层民主选举中投票参与的影响因素，故采用阶层回归分析法来验证相关假设。以下是数据分析结果：

(一) 模型结果解释

表 3 是对城乡居民参与居委会/村委会选举投票的影响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拟合结果，其回归结果展示了社会经济地位、政治关注度和政府信任等不同因素对居民参与居委会/村委会选举投票的影响。笔者在背景变量的基础上，先后加入社会经济地位、政治关注度和政府信任变量，形成三个模型。

模型 1 呈现的背景变量和社会经济地位对城乡居民参与居委会/村委会选举投票的影响，统计结果显示 Nagelkerke $R^2=0.157$ ，-2 对数自然值=13851.709，卡方值为 1376.841， $P<0.001$ ，城乡差别、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 95%的置信度下，收入变量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上政治身份变量和时事关注因子，统计结果显示 Nagelkerke $R^2=0.161$ ，模型的解释力度上升 0.4%，-2 对数自然值=13666.438，比模型 1 有所下降，卡方值为 1398.137， $P<0.001$ ，城乡差别、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时事关注因子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 99%的置信度下，政治身份变量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不过在模型 2 中，收入及是否知道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对城乡居民参与居委会/村委会选举投票没有影响。模型 3 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加入了地方政府信任和政府员工信任两个变量，回归的拟合度上升了 2.5%，Nagelkerke $R^2=0.186$ ，-2 对数自然值=4038.590，卡方值为 490.378， $P<0.001$ ，相比模型 2，-2 对数自然值和卡方值明显下降，尽管有样本数的减少（加入政府信任变量时存在大量缺失值）。地方政府信任变量在 99%、政府员工信任变量在 95%的置信度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表 3：居委会/村委会选举投票的影响因素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B	Exp(B)	B	Exp(B)	B	Exp(B)
背景变量	城市 a	-1.120 * *	0.326	-1.153 * *	0.316	-1.094 * *	0.355
	男性 b	0.188 * *	1.206	0.125 * *	1.133	0.129	1.138
	年龄	0.023 * *	1.023	0.021 * *	1.022	0.022 * *	1.022
社会经济地位	教育程度分层	-0.135 * *	0.873	-0.215 * *	0.806	-0.281 * *	0.755
	收入分层	0.067 *	1.069	0.034	1.034	0.025	1.026
政治身份	党员 c			0.202 * *	1.224	0.212!	1.236

政治 关注度	知道人大常委 会委员长 d			0.012	1.012	0.054	1.055
	时事关注因子			0.143 * * *	1.154	0.142 * * *	1.153
政府信任	地方政府信任					0.111 * *	1.117
	政府员工信任					0.091 *	1.095
	截距项	-0.413 * * *		-0.104		-0.928 * * *	
	N	10996		10879		3275	
	-2 对数自然值	13851.709		13666.438		4038.590	
	卡方检验	1376.841 * * *		1398.137 * * *		490.378 * * *	
	NagelkerkeR2	0.157		0.161		0.186	

注释：（1）！表示  $P < 0.1$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01$ ；（2）a 参考类别是农村，b 参考类别是女性，c 参考类别是非党员，d 参考类别是不知道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 （二）变量分析和假设回应

经检验，每个模型在增加不同自变量后，整体模型均达到显著性水平。各自变量经过不同模型的回归数据显示：

1. 从背景变量来看。城乡差别、性别、年龄均对对城乡居民参与居委会/村委会选举投票存在显著影响。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的可能性比城市居民参与居委会选举投票的可能性高，模型 1、2、3 中城市居民对村民的胜算比分别为 0.326, 0.315 和 0.315。对此，一项对上海的社区选举的考察表明，与村民自治相比，城市区选举之所以缺乏活力，关键在于村委会选举以分配性利益为基础，需要选出“当家人”；而居委会选举以维持性利益为基础，只要选出“守夜人”（熊易寒，2008）。从已有的个案研究发现，部分社区居委会选举存在的高投票率是由于积极分子的“复票权”导致的。整体上，城乡差异假设，即村民比城市居民更有可能参与基层民主选举是成立的。同时，年长的人比年轻人更有可能投票。随着年纪的增长，人的知识和阅历越来越丰富，政治关注度越来越高。不过，已有的研究发现，年龄与投票参与之间并非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类似倒 U 型的拟线性关系，即年轻人参与率低，随着年龄增大，参与率增高，在 45 岁左右达到高峰，60 岁以后逐渐下降（胡荣，2006）。

2. 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从模型估计的结果来看，教育程度回归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不过，模型 1、2、3 中负的回归系数可能恰恰反映当前我国城乡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与居民投票参与存在的现实性的关系——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受教育程度越高，居民的投票可能越高，而在我国居委会/村委会选举的投票参与和居民受教育程度没有太多关联，即使有关联的话，也是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弱势群体参与较多，这与我国城乡当下的居委会/村委会承担的行政职能有关。另外，统计数据表明收入也

是影响居民投票参与的重要因素，即收入较高的人比收入较低的人更有可能参与投票，不过收入变量在模型 2、3 中均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样社会经济地位假设未能得到验证。有关民主投票的社会经济地位理论模型在中国的适应性将在下一步的研究进行讨论。

3. 在政治身份和政治关注度方面。从模型估计的结果来看，党员身份在模型 2、3 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在居委会/村委会选举中，党员居民的投票可能性高于非党员居民。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既是横向的居民自治组织，同时也承担着来自纵向的国家行政任务。在现有体制下，党员身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资源，党员在社区居委会/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过程中受到党组织的积极动员，并且他们还会发动周围很多熟人去参与投票。

是否知道当前我国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是谁，在模型 1、2、3 中都未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时事关注因子在模型 2、3 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时事关注程度较高的居民比关注程度较低居民更有可能投票。经常阅读有关时事方面的报刊、杂志和书籍、常常与与他人议论有关时事话题的居民在了解国家政策方针、基层民主选举等方面要远远好于对时事漠不关心的居民。对居委会/村委会选举的信息获取与交流、对居委会/村委会自治职能的期待，都使得关注时事的居民更倾向参与基层民主选举，以试图表达自己的参与意愿和影响基层政治事件。

因此，假设二，即政治身份和时事关注假设得到验证。

4. 政府信任方面。模型 3 的拟合结果显示，居民对本地政府（农村指乡政府）的信任、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在居委会/村委会选举中，对本地政府（农村指乡政府）的信任程度较高的居民比对本政府（农村指乡政府）的信任程度较低居民更有可能投票；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程度较高的居民比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程度较低居民更有可能投票。在民主政治过程中，信任有利于居民之间信息的共享、沟通，从而减少参与成本；并且，信任可以促进选举方和被选举方的合作。

在当前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下，基层政府，特别是城市的街道、农村的乡政府，以及部分履行基层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居委会、村委会对基层社会的影响非常深刻。街道/乡政府通过执行上级的各种政策性任务和为居民提供各种公共服务等途径，与居民进行各种形式的互动。居民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形成了对街道/乡政府在社区治理所扮演的角色的基本认知，即基层“政府信任”。这种信任对于居民参与基层的政治活动有着显著影响。居委会/村委会选举投票就是本地政府的推动或干预下进行的，对本政府的信任度直接影响居民是否投票。

因此，假设三，即政府信任假设和政府员工信任假设得到验证。

####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提炼 CGSS2010 中居民在居委会/村委会选举中的投票参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数据，利用阶层回归分析法具体考察了居民的城乡差异、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政治身份及关注度、政府信任等对居民投票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村民比城市居民、年龄较高的居民比年龄较低居民、党员居民比非党员居民、政治关注度较高的居民比政治关注度较低居民更有可能参与投票。

票；民主选举中投票参与的社会经济地位模型并不适合中国城乡的居委会/村委会选举；最后，对基层政府的信任程度较高的居民比信任程度较低更有可能参与投票。本研究考虑居民在居委会/村委会选举中的投票参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而不主要探讨其有效性与局限等其他问题，由此，明晰社会经济地位、政治动员和基层政府与居民在居委会/村委会选举中的投票参与的作用，考虑如何促进基层民主选举中居民的投票参与，成为应有之意。

#### （一）社会经济地位与社区选举投票参与

西方传统的政治学观点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人们必将产生相应的政治诉求，一个典型的实例就是西方国家资产阶级诞生、成长中的国家政治革命。在选举中的投票参与是人们政治表达主要的制度化途径。不过，从本文建构的回归模型可以看出，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不影响其投票参与。主要原因是，就全国范围来说，在基层治理体制改革起步较晚的情况下，城市或农村社区一级的选举还很难表达居民或农民的利益诉求，基层的政治参与依然没有摆脱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惯性——即居民尽管被广泛地卷入到政治参与中，但并不能表达利益需求。在制度惯性与基层治理改革的矛盾冲突中，无论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都不能影响其被动员的投票参与。事实上，笔者在参与观察多数社区选举的过程中发现，社区内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居民，由于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反而会依附已有的体制保障，属于较易动员的对象；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居民，由于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转而寻求其他的政治参与途径，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

#### （二）国家的力量：政治动员与社区选举投票参与

从本文建构的回归模型可以看出，当加入党员身份和政治关注度两个变量，模型的解释力得到了提升。在当前中国的基层民主选举中，“选举动员”不仅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话语，而且以村或社区以及上级的党员、干部为主的动员队伍，往往在村/居委会的换届选举中会发挥强大的基层组织力量，短时间内将原本处于松散的社会与政治生活状态的下的居民集中到一起参加选举。并通过集中的、高频率的政治宣传，提高人们对社区选举的关注度。由此，从政府的立场出发，充分发动党员居民和积极分子的参与积极性，提升普通居民的政治关注度，有利于提升社区民主选举参与的效率与质量，化解社区居民参与的政治冷漠困境。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建构居民的政治认同，提升居民对由执政党和政府发起的类似社区居委会/村委会选举投票参与等城市基层民主政治生活的信任度、认可度。同时，这种政治动员还会形成强大的舆论作用，引导普通居民的从众心理，使人们有效地抵触各种不良的思想，提高民主政治意识，自觉地关注和参与基层民主政治生活。

#### （三）社会的接纳：基层政府信任与社区选举投票参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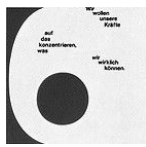
参与居委会/村委会选举投票，是当前居民“制度性参与”我国基层民主政治过程的一种主要方式。对街道/乡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信任是影响居民是否投票的关键因素之一。有研究指出，之所以对乡镇基层党委、政府的信任影响村民参与更低一级（村委会）选举的行为，是我国特定的政治体制及其所带来的“压力型”地方治理机制所决定的（孙昕、徐志刚、陶然、苏福兵，2007）。这样的结论也得到了来自城市社区数据分析的支持。

进入新世纪以来，政府通过出台推行一系列的政策，诸如城市的“二级政府、四级管理”、“社区网格化管理”和农村“粮补”、“树补”等，使得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呈弱化趋势的国家力量重新掌控基层社会。我国的基层民主政治过程是在强大的国家力量的引导下进行的，在居委会/村委会选举投票中，民众对于所在区域基层政府的信任程度往往体现了国家对社会力量的控制程度和社会对国家力量的接纳程度。因此，基层政府在本地民众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在日常生活的主要角色都会影响民众对其的信任度。尽管一再强调社会力量的自主发育、普通民众的政治文化观念的变革对基层政治参与的影响，然而只有通过行政体制改革，“使基层政府从既有体制下的‘管制型政府’逐渐向新体制下的‘服务型政府’转变，以此提高村民（或城市居民：笔者注）对基层政府的政治信任”（孙昕、徐志刚、陶然、苏福兵，2007），这才是既定框架下提高居委会/村委会选举投票率、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参与健康发展的根本途径。

#### 参考文献：

- [1] 安东尼·奥罗姆，2006，《政治社会学导论》，张华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2] 陈镇明，2003，《政治学-概念、理论和方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3] 格林斯坦、波尔斯比，1996，《政治学手册精选》，竺乾威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4] 胡荣，2006，《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影响村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的各种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第2期。
- [5] 刘欣、朱妍，2011，《中国城市的社会阶层与基层人大选举》，《社会学研究》，第6期。
- [6] 刘春荣，2010，《选举动员的框架整合——银杏居委会换届选举个案研究》，《社会》，第1期。
- [7] 诺曼·H·尼、西德尼·伏巴，1994，《政治参与》，储复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8] 孙昕、徐志刚、陶然、苏福兵，2007，《政治信任、社会资本和村民选举参与——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调查的实证分析》，《社会学研究》，第4期。
- [9] 王浦劬，1995，《政治学基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10] 熊易寒，2008，《社区选举：在政治冷漠与高投票率之间》，《社会》第3期。
- [11] 万斌、章秀英，2010，《社会地位、政治心理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其路径》，社会科学战线。

☆ 作者简介：李向健，河海社会学系 2012 级博士研究生  
孙其昂，河海大学社区研究中心主任  
孙旭友，河海社会学系 2011 级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王 侠



## 农村留守妇女文化生活的社会工作介入\*

——基于优势视角的实践模式探索

何志扬 田晚荣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目前农村留守妇女大多已摆脱物质生活贫困，但其文化生活依旧贫乏单调，亟待进行社会干预、引导和开发。“优势视角”理论重点关注人的内在力量和优势资源，尤其适合运用于妇女社会工作。本文在农村留守妇女文化生活的社会工作介入中运用的实践模式特征包括：以优势视角理论为指导、发现和评估个人层面的资源和优势、通过互助组织建构双向社会支持网络以提供内源性支撑、协调社会环境中已有或待开发的优势以提供外源性支撑。基于社工服务实践的经验启示，优势视角下留守妇女文化生活的社会工作应当重点关注案主的资源和优势、兼顾问题的挑战性和机遇性、强调案主的自助与互助、挖掘环境中蕴含的待开发优势、注重人文关怀和照顾。

**关键词：**留守妇女 农村 优势视角 文化生活 社会工作

### 一、农村留守妇女的“文化贫困”与社工介入的作用

农村留守妇女通常是指因丈夫长时间（一般在六个月以上）在外务工、经商或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而形成的异地分离和留居在农村的已婚妇女群体。白南生教授经测算后估计2005年我国留守妇女人数已达4700万（邢志刚、李先昭，2006）。相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农村居民仍然相对贫困，这种“贫困”状况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相对匮乏，也体现在精神文化生活的贫弱单调。由于丈夫离家务工经商而无法参加家庭日常生活，农村留守妇女不得不独自承担包括家庭生产经营、子女抚养教育、老人赡养照料等家庭责任，不仅要承担双倍的劳动负担，同时还要忍受与丈夫长期的地域分离带来的生理、精神、情感等方面的问题。这一社会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如李雪峰、王秀绒（2014年）在研究山区留守妇女精神文化缺失现象时发现“早上听鸡叫，白天听鸟叫，晚上听狗叫”仍是许多偏远山区留守妇女除看电视外的真实生活的写照，农村留守妇女的闲暇生活基本以看电视、聊天串门、走亲

\* 项目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极端气候影响下的人口迁移安置政策研究》（11CRK00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移民工程的跨学科研究》（13&ZD172）。

本文已刊发于《西北人口》2015年第5期。

戚、打麻将为主，明显缺乏有意义的文体活动，导致精神文化生活的匮乏（李雪峰、王秀绒，2014）。周庆行（2007年）、黄安丽（2007年）、齐建英（2008年）等人的研究都发现或证实了农村留守妇女面临着劳动强度偏大、闲暇时间较少、文化生活贫乏、精神压力巨大等问题。陈利（2006年）在研究农村留守妇女精神压力和婚姻危机时指出农村生活的枯燥和寂寞使农村留守妇女更容易产生性压抑问题，由此带来生理健康上的严重问题，严重者甚至会产生病变并进而影响夫妻生活，从而严重影响她们的夫妻感情和婚姻生活质量；此外，农村的娱乐设施稀少，娱乐方式单调陈旧，女性活动空间狭小，交往范围局限，普遍缺少文化娱乐活动，尤其是留守妇女长期独守空房，遭受性侵犯的事件时有发生（陈利，2006）。刘巍（2012年）在研究西北农村留守妇女社会支持网络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时发现，西北农村留守妇女的社会支持网络规模都偏小，其中网络规模最大的为实际支持网，其次为情感支持网，最小的是社会交往支持网（刘巍，2012）。总之，劳动强度大、精神压力大和缺乏应有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农村留守妇女面临的三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农村留守妇女的精神文化生活亟待进行社会干预、引导和开发。

作为社会弱势群中的一个特殊亚群体，农村留守妇女理应成为社会工作、政府部门乃至整个社会关注的特殊人群。因而，社会工作理应关注和重视农村留守妇女的文化生活，探索有助于改善农村留守妇女文化生活状况的社会工作专业方法。这不仅是妇女社会工作中一项重要内容，而且在解决当下的中国农村社会问题中显得尤为必要。本文以针对孝感市城乡结合部农村留守妇女精神文化生活现状的社会工作服务实践为例，探讨社会工作协助农村留守妇女改善其文化生活现状的方法和途径。

## 二、社工介入农村留守妇女文化生活的实践模式

笔者所在的社工团队在孝感市选取了最具城乡结合部特性的五个农村社区开展了旨在通过农村留守妇女的自主、自助、互助来改善其精神文化生活现状的社会工作服务实践。在所选取的农村社区中，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激烈碰撞与融合，为我们以独特社会视角开展农村留守妇女文化生活社会服务提供十分适宜的空间。这次针对农村留守妇女精神文化生活的社工介入的实践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 （一）以优势视角理论为指导

与传统的“问题视角”不同，“优势视角”是社会工作中一种新的思维模式，由美国的Dennis Saleebey教授在其《优势视角：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模式》一书中进行了系统的总结（Dennis Saleebey，2004）。优势视角强调关注社会工作服务的案主的内在力量和优势资源，主张把服务对象的优势及其所在的环境中的各种资源作为助人自助的基础和焦点，而不是仅仅着眼于他们面临的问题和存在的病理。优势视角的核心理念是坚信任何人都与生俱来就具备一种能力，也就是利用自身的资源和禀赋来改变自身境况的能力（陈红莉等，2011）。总而言之，优势视角理论突出强调应着眼于服务对象的禀赋和优势，充分利用和开发服务对象的各种潜能，帮助他们摆脱挫折并走出逆境，最终帮助他们的完成目标和实现生活理想。在优势视角下，社会工作服务者的角色不再是主导性的专家，而是作为协调者和引导者进行工作，从而达到服务对象的自主性、全面性发展。



采用优势视角理论来指导农村留守妇女文化生活的社会工作服务，其原因在于目前大部分农村留守妇女对自身资源和优势往往处于无意识状态，更勿谈利用和开发。在孝感城乡结合部典型的农村社区的调查发现，留守妇女的这种状况的具体表现包括，承担着过重的家庭负担，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精神文化生活缺失，承受力与抗逆力的脆弱性；传统思想的约束作用大，个人意愿和诉求难以表达和实现；文化素质偏低，维权意识淡薄；低收入家庭的留守妇女的无助状态表现尤为明显。针对这些状况，在服务实践过程中，笔者以挖掘她们的优势资源为出发点，发现农村留守妇女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优势：

### 1、希望

希望是激发个人力量的动力源泉，它体现着人类生命的特殊意义，贯穿着“能做什么”的思维方式。在与留守妇女互动的过程中发现，即使面临重重压力和困难，她们也仍旧表示出改变现状的强烈意愿，对未来的改变和发展充满希望，这种希望根植于内心深处并延续到下一代。这也给我们服务的开展以重要启示，即将留守妇女子女作为服务的切入点。我们招募志愿者在社区内开展课业辅导班活动，协助她们摆脱在子女学业方面力不从心的困境。课辅班活动受到了社区内留守妇女的积极响应，很多留守妇女在闲暇时候也纷纷加入到课堂与孩子们一起学习并与老师们共同探讨孩子的教育问题。这个过程不仅丰富了她们的日常交往和文化生活，也使社工与留守妇女们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

### 2、能力

社区内的农村留守妇女大部分都长期从事农业种植、家禽养殖等活动，拥有丰富的农业种植以及养殖技巧。此外，村中年纪稍长的留守妇女的传统手工艺技巧也是现代社会正在流失的珍贵文化遗产。因此社工在社区内成立了农业互助组与留守妇女文艺活动坊。农业互助组作用主要有，一是旨在农忙时期协调留守妇女相互帮助完成农事活动；二是成为村民的农事经验的交流平台；三是在社工的协助下，为农产品联系销售渠道。文艺活动坊主要是为有兴趣爱好留守妇女提供展示和交流的平台，由此第一支广场舞在社区内舞动起来。前期是由有舞蹈经验的志愿者带领，随后在与社区的协调下，在社区活动室中配置了音响设备，由有兴趣的留守妇女自学后再带领村民们共同参与。通过这些活动，留守妇女晚饭后不会再出现“数着时间等睡觉”的状况。此外，掌握传统手工艺的留守妇女以及对这些传统工艺感兴趣的村民也会在闲暇聚集到活动室，相互交流和学习。

### 3、自信

在个体设定了目标并同时具备了行动能力之后，一个人的自信程度，也就是自我效能感，就确定了他能否采取行动，从而改变现状将希望变为现实。基于优势视角，可以发现农村留守妇女绝不是毫无知识、无能力且自卑的村妇，相反，她们对自己所扮演的各种角色以及承担的责任都有清晰的认知，从不推卸并尽力做好。因此，为了让留守妇女感知自身能力并提升自我效能感，在与社区居委会和当地妇联的沟通协调后，社工倡导成立了农村社会工作站，旨在发掘留守妇女的潜能并使之得到充分发挥。通过招募有意愿的留守妇女为工作站的志愿者，利用她们在村内的人际关系为村内有需求的村民开展自助与互助服务。在她们的协助与配合下，社工工作站针对村内有特殊困难的群体制定的帮扶措

施取得了良好的反响。留守妇女们积极为社会工作站的服务出谋划策并主动帮助联系服务案主。农村社会工作站不仅紧密了留守妇女与村民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在参与服务的过程中，留守妇女们发现了自身的价值，增强了自我效能感。

## （二）以发现和评估个人与社区层面的资源和优势为切入点

基于优势视角理论，社会工作实践的关键在于发现、挖掘和利用服务案主的潜在优势和资源，帮助他们克服困难，走出困境，以致达到目标和梦想。对农村留守妇女资源和优势的发现与评估是有效介入留守妇女精神文化服务的基础和前提。入户访谈作为搜集案主的基本资料的方式一直在社会工作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除了能获得有关案主的一手资料外，还能对案主的家庭生活环境有直观的把握并在初期建议良好的关系。

在优势视角理论的指导下，通过调查和访谈，社工对所服务的农村留守妇女群体的优势和资源发现和评估如下：

1、留守妇女自身优势和资源的多样性。所服务的农村社区内的留守妇女多数在40-60岁之间，以中老年为主，她们掌握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技艺，如绣花、做布鞋等等。这些老技艺在现代社会逐渐重新受到青睐，可以利用这些资源为农村留守妇女增收并丰富文化生活。其次，长期生活在农村并从事农业活动的留守妇女拥有丰富的农业种植技能，而越来越受到推崇的天然有机食品，也使留守妇女的这种技能具有很大的开发价值。通过走访有相关技能和特长的留守妇，让她们了解自身优势和长处，鼓励她们发现、认可自己的才干，激发她们表现和展示自己的兴趣和愿意，为吸引她们参加各种文化活动奠定基础。

2、留守妇女表现出对更高层次精神文化生活的强烈需求。通过前期问卷调查和入户访谈发现，串门聊天、看电视和打牌打麻将成为留守妇女日常最繁密的文化消遣活动，虽然方式较为传统，但留守妇女的娱乐时间所占比例在增加。此外，进城逛街、看书看报、健身跳舞、上网和看电影等城市文化活动也进入了她们的视野，即便是所占的比例很少。但在访谈中发现，她们对新形式的、多样化的文化生活的强烈需求，主要是受到临近城市的地域条件的影响。因此，留守妇女文艺活动坊的成立使城市文化活动来到农村社区成为可能，特别是广场舞的开展，吸引了留守妇女极大的兴趣。

3、社区生态环境良好，公共设施较为齐全。在实际开展服务之前，社工与社区相关负责人沟通后，对社区基本情况有了整体把握和了解。经了解发现，城市化进程使这些农村社区受到城市生活的影响，社区中都是整齐划一的三层楼房，宽敞的水泥马路通向各家各户；社区内设有活动室、宣传栏、公共厕所、健身广场、垃圾收集中转站等各种便民设施和公共资源；社区周围的农田里都是郁郁葱葱的庄稼，同时呈现出浓郁的田园风情。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及较为完备的社区文化设施为社工服务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4、社区工作人员服务意识强烈，能够提供有效的资源链接。在沟通了解之后，社区负责人对此次社工服务方案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希望在社工协助下开展的妇女文化活动，能够有助于提升社区居民的幸福感，促进社区和谐发展，并承诺会全力配合和支持社工工作。社区负责人的支持给社工

服务的开展带来了有力的支持。

### （三）通过互助合作组织建构双向社会支持网络以提供内源性支撑

基于美国社会学家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环境优势的发掘不单单源于客观占有的资源，还有相当一部资源的价值可以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得以实现。因此双向性的社会支持模式把支持与被支持视为一个持续的互动过程（张友琴，2002）。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是留守妇女群体环境优势发掘的重要途径，因此在本次服务实践中，社工试图建立以农村留守妇女群体为主体的互助合作组织作为双向社会支持网络，协助其自主解决实践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而促进留守妇女的自我参与和自我发展。采用的具体的途径包括：

1、以留守妇女优势特长为依托，建立互助合作组织。为加强各社区留守妇女之间的联系，社工在社区与当地妇联的协助下成立留守妇女互助组织，即农村社区工作站，让留守妇女参与管理本社区的实务，激发留守妇女对本社区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工作站不仅在留守妇女之间发挥着的促进交流和邻里互助的作用，也是留守妇女表达自身问题和需求的桥梁。它还将社会工作专业知识运用于妇女工作中去，即通过农村社会工作站来提供资源支持和心理咨询，帮助农村留守妇女自我减负和自我减压。

2、通过互助合作组织赋权，提高留守妇女的自我效能感。以互助合作组织为平台，村委会、村妇联等合作协调农村社区的资源为留守妇女所用，增强其对环境的影响力和自信心。留守妇女文艺活动坊、农村社会工作站以及相关的活动小组都起到协助留守妇女担当起家园的“主人”的作用。农村社区“主人翁”意识和地位的确立，是留守妇女观念的最大转变。她们逐步意识到自己的现状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通过社工介入，一些留守妇女已经不能满足应付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生产中的任务，自觉地担当起发家致富和社区公共事务的重任。

3、以留守妇女互助合作组织为引导，增强个体间的互助友爱。社区内通常存在有特殊困难的留守妇女家庭，例如患有重大疾病、家庭极其贫困、子女残疾等。在农村社会工作站的协助下，社工针对这类群体，根据其个体情况制定了针对性的个案服务工作方案，从物质救助、心理疏导以及社会支持等多个方面进行服务。服务的介入过程由工作站中的留守妇女进行，一方面她们有着相似的生活背景，能够更好的建立服务关系；另一方面也让留守妇女在服务过程中发现自身的潜能和价值。社工在服务活动中只扮演引导者和组织协调者的作用，从而充分发挥留守妇女的积极性和自主性。

4、通过互助合作组织引导各种资源满足留守妇女的需求。农村社会工作站成为农村留守妇女与村委会、妇联等政府部门沟通的桥梁。社会工作站充分发挥了社区社会工作在对社区整体现状的把握、社区需求和问题的反馈以及改进相关政策措施的建议等方面的作用。引导政府和社会资源向农村留守妇女倾斜，同时也使得政府在解决农村、农民问题方面能够更具针对性和更有效率。这样不仅可以增强留守妇女的自主性和自信心，减少留守妇女的被边缘化的社会风险，而且可以促进农村社区的稳定、和谐与发展。

### （四）协调社会环境中已有的或待开发的资源以提供外源性支撑

整合作为优势视角中的理论内核之一，包括对个体资源的整合和社会环境资源的整合，既表现为个人对自身优势和资源的协调和利用，也表现为在外在力量的协助下对各种资源的利用。通过对内在和外资源的整合和评估，以更好的利用这些资源和优势发展自身潜能，改善自身环境。因而，仅仅认识到留守妇女自身的资源与潜能是不够的，社会工作者还需要发现并协调环境中已有或待开发的资源，协助其充分利用自身和环境资源去改善自己的文化生活现状。本次社工介入，基于资源优势分析和需求分析，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整合不同类型的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资源，为留守妇女提供外源性支持。

1、开展留守妇女子女的学业辅导活动以整合教育资源。农村留守妇女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其子女的课业辅导常常让她们感到力不从心。由大学生志愿者组成学习辅导小组，在社区活动室开展学业辅导活动，包括学习小组和游戏小组两种方式。学习小组致力于协助留守妇女对子女的课业进行辅导，并且留守妇女也要参与辅导中，这样更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和意识。游戏小组致力于通过游戏过程来改善留守妇女的子女的同伴关系和亲子关系，让他们在游戏中体验与同伴和父母沟通的乐趣，并学习沟通的技巧。

2、通过小组活动改善留守妇女的人际关系以整合社会关系资源。组织小组活动的优势在于，首先有助于成员较快的寻找彼此之间的共通点与相异点、克服留守妇女受困于家庭的孤独感，有利于在小组活动中形成了成员间的互助与团体凝聚力；其次有助于建立留守妇女的社会支持网络，从而有利于巩固女性主义信念并集结力量，并能够从政策与社会结构层面来解决女性问题；再次通过小组工作来集合力量，可以针对特定问题而采取一连串的社会行动，促使政府重新分配资源与做出政策改变的回应[11]。在这个留守妇女成长小组中，社工通过小组活动帮助留守妇女们寻求情感支持和丰富集体文化生活，寻求一些共同问题的解决途径。

3、开展女性健康卫生宣传活动以整合公共卫生资源。成立妇女卫生健康小组，争取与县城的卫生院的合作，让医务人员进入社区为留守妇女进行全面的健康体检，并邀请他们为留守妇女开展妇女健康卫生知识讲座与宣传，包括保健知识的宣传、心理咨询以及照顾小孩和照料老人等方面的卫生知识。这些活动使留守妇女了解到更多健康知识，有利于保障自身和家庭的卫生与健康。卫生健康小组定期举办交流会，以及时了解留守妇女的健康状况，也促进了该社区留守妇女之间的相互关心与帮助。

4、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辅导以整合就业服务资源。通过用专家讲座的形式，对农村留守妇女提供就业辅导，具体包括求职渠道、求职技巧、技能提升和求职陷阱防范等内容。此外，针对留守妇女的实际需求，社会工作站邀请人力资源专家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并开展技能交流活动。留守妇女在日常生活和劳动中也面临着各种安全隐患，风险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较为薄弱，为此社工还邀请专业人士为她们开展劳动安全教育。这些活动有利于协助留守妇女摆脱经济上的依附地位，使其获得人格上的独立，以实现自我发展，增强其自我意识和能力。

5、开展提升权利意识和维权能力的法律服务以整合法律援助资源。借助大学生志愿者在服务过程中与留守妇女家庭建立的信任关系，鼓励留守妇女参与各种法律服务活动。通过定期举办有助于法律

政策普及和提升维权意识的讲座，向留守妇女普及相关的法律和维权知识，协助留守妇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树立维权意识，提升她们的维权能力。

### 三、社工介入农村留守妇女文化生活的实践经验启示

总结上述基于优势视角理论的农村留守妇女文化生活社会工作服务实践，可以得到以下经验启示：

#### （一）关注留守妇女案主的资源和优势

面对农村留守妇女普遍面临着文化生活缺失的现状，社工首先需要关注到农村以及农村留守妇女的发展潜力和资源。在此次社会工作服务中成立的留守妇女文艺活动坊以及农业互助小组，形成了很多优秀的成果，如绣花鞋垫、手工布鞋、棉服、有机蔬菜和家禽等。农业互助组在社工的协助下积极联系商家，并组织留守妇女进城贩卖，明显激发了留守妇女的积极性，这也为后继的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挖掘留守妇女自身的资源和优势是解决农村留守妇女文化生活困境的根本。

#### （二）兼顾留守妇女问题的挑战性和机遇性

从优势视角理论出发，社工服务不应仅仅着眼于问题本身，而是需要从问题关注到其存在的机遇和挑战。当前农村留守妇女身心健康问题突出，其生存与发展同时受到社会关系与自然环境的交叉性制约。在注意到这些问题的挑战性的同时，社工也应该意识到这些问题中蕴含的的机遇，如留守妇女解决自身问题、满足文化需求、改变现状的强烈需求和动力。这恰是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应关注并加强引导的地方，也是贯穿此次整个服务活动的主线。在发现和利用这些机遇的基础上，社工在当地社区中建立的留守妇女文艺活动坊、农业互助小组以及农村社会工作站举办了各项活动，在丰富留守妇女文化生活、疏导其不良情绪、促进积极人格的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取得预期的效果。

#### （三）强调留守妇女案主的自助与互助

社会工作者旨在引导、激发留守妇女的潜力，相信她们有促进自我改变的能力，同时提升她们对抗逆境的能力，即为自助。但个体的力量总归有限，因此必须寻求留守妇女群体力量的集合，组建留守妇女互助合作组织，以集体力量解决留守妇女文化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留守妇女在参与集体活动的过程中培养了自助、互助、自决的精神，提升了参与的意识 and 能力，增加了留守妇女对公共文化活动策划的影响能力，是为互助。

#### （四）重视案主环境中蕴含的待开发优势

当下我国在不断加大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投入力度，从国家规划到政策扶持都体现了各级政府正在逐步加大对农村社会发展的支持，这也成为社会工作在此次服务中重要的环境资源。因此，应当按照新农村建设的总要求和目标，把农村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规划结合起来，鼓励和引导教育、医疗、卫生、金融服务等资源延伸到农村社区，加大农村各项硬件和软件设施的投入力度，增强农村经济、环境和文化的活力和吸引力，使留守妇女在当地即可享受各项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农村社会工作站的建立可以协助留守妇女与各级政府组织之间的沟通协调，协力将留守妇女的意愿和需求传达出来，寻求政府和社会组织对她们的支持，从而促进农村留守妇女文化生活的持续改善。

#### （五）注重对留守妇女的人文关怀和照顾

农村留守妇女文化生活困境不仅仅是精神文化的缺失和文化资源的匮乏，还突出反映了农村留守妇女的孤单感、性压抑以及缺乏安全感（周厚生，2010）。加之留守妇女还面临生活、就业、人际关系以及社会权益方面的问题和困境，很容易形成不良的群体心理和行为。因此，社会工作者在运用专业的方法服务留守妇女群体时必须注重人文关怀与照顾，用真诚与她们建立良好的关系，使她们充分感受来自社会的诚意和关怀，帮助她们改善社会互动关系，用积极的态度参与到社会文化活动和自身发展中来。

### 参考文献：

- [1] 陈利，2006，《农村留守妇女的精神压力和适应危机》，《甘肃农业》第11期。
- [2] 陈红莉、李继娜，2011，《论优势视角下的社区发展新模式——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求索》，第4期。
- [3] 高万红，2011，《增能视角下的流动人口社会工作实践探索——以昆明 Y 社区流动人口社区综合服务实践为例》，《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4] 黄安丽，2007，《农村留守妇女生存现状的调查及思考》，《安徽农学通报》，第3期。
- [5] 李晓凤，2008，《社会工作：原理·方法·实务》，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 [6] 李雪峰、王秀绒，2014，《山区留守妇女精神生活缺失现象探析——以陕西省商洛市为例》，《安徽农学通报》，第11期。
- [7] 刘巍，2012，《西北农村留守妇女社会支持网络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来自甘肃省的调查发》，《妇女研究论丛》，第5期。
- [7] 齐建英，2008，《河南省农村留守妇女发展状况研究》，《黄河科技大学学报》，第3期。
- [8] 许传新，2009，《西部农村留守妇女的身心健康及其影响因素——来自四川农村的报告》，《南方人口》，第2期。
- [9] 邢志刚、李先昭，2006，《“留守妇女”生存状况堪忧》，《中国妇女报》，12月5日。
- [10] 张友琴，2002，《社会支持与社会支持网——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的工作模式初探》，《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11] 周庆行、曾智、聂增梅，2007，《农村留守妇女调查——来自重庆市的调查》，《中华女子学院报》，第1期。
- [12] 周厚生，2010，《农村留守妇女心理研究综述》，《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2期。
- [13] Dennis Saleebey，2004，《优势视角——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模式》，李亚文等译，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 作者简介：何志扬，河海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

田晚荣，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张 洁



# 移民 生计

## 水库移民长远生计问题处理阶段性效果对比分析

——以岩滩水电站 D 县移民安置区为例\*

邹子楠 伊庆山

**摘要:**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结合调查数据, 对水库移民安置区实施移民长远生计问题处理规划以来的效果进行逐年对比分析, 分析内容包括移民安置区的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分析结果表明, 水库移民长远生计问题处理使安置区移民的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但是人力资本、自然资本以及金融资本中的部分指标变化不明显。建议在今后的水库移民长远生计问题处理中加强文化和职业教育, 引导农民合作组织建设, 并设立金融支持、鼓励自主创业, 以保证水库移民生计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水库移民 可持续生计 对比分析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不断增多, 水库移民数量也不断扩大。世界银行在其投资的非自愿移民项目中强调, 移民安置不仅仅是简单的赔偿财产损失, 更应该力求真正达到全面恢复, 提高移民的生活水平。(严登才, 施国庆, 伊庆山, 2011) 土地的征收和房屋搬迁使移民的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受到损害, 因此水库移民长远生计问题处理对于水库移民生计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 一、背景简介

岩滩水电站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岩滩镇, 是红水河梯级开发的第五座电站, 以发电为主, 兼有航运。水电站建设工程于 1985 年动工兴建, 1996 年通过竣工验收。水库移民安置工作从 1985 年开始进行, 移民影响范围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的 5 个县( 自治县)、20 个乡( 镇)、94 个村民委员会、905 个村民小组。国家先后于 1991 年及 1996 年对岩滩水库移民进行了两次追加投资, 以解决由于物价大幅上涨及库区周边出现地裂、坍岸滑坡等造成的移民安置和专项设施迁( 改) 建工作难以进行的问题。但由于岩滩水电站库区环境容量有限, 基础设施条件差, 就地后靠安置资源匮乏等因素, 两次移民投资的追加仍然没能彻底解决移民生产、生活困难的问题。2009 年, 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 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始对岩滩水电站安置区移民长远生计问题进行处理。

\* 本文已刊发于《水利经济》2015 年第 3 期。

## 二、数据、理论及研究过程

### (一) 数据来源

笔者自 2011 年起，连续 4 年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 D 县进行实地调研，与调研团队跟踪岩滩水库移民 214 户、858 人，通过问卷法和访谈法，收集了大量信息和资料。

被跟踪调查的 214 户、858 人由等距抽样法抽样产生，分布在 D 县的 3 个乡镇、8 个村、97 个组，其中男性人口 463 人，女性人口 395 人。

### (二) 理论基础

#### 1. 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

2000 年英国国际发展机构( DFID) 建立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该框架是围绕可持续发展而提出的一种新的研究工具，是一种旨在分析社会和物质环境之间多维复杂关系的框架(苏芳，徐中民，尚海洋 2009)。框架包括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结构和制度的转变、生计战略、生计输出 5 个部分，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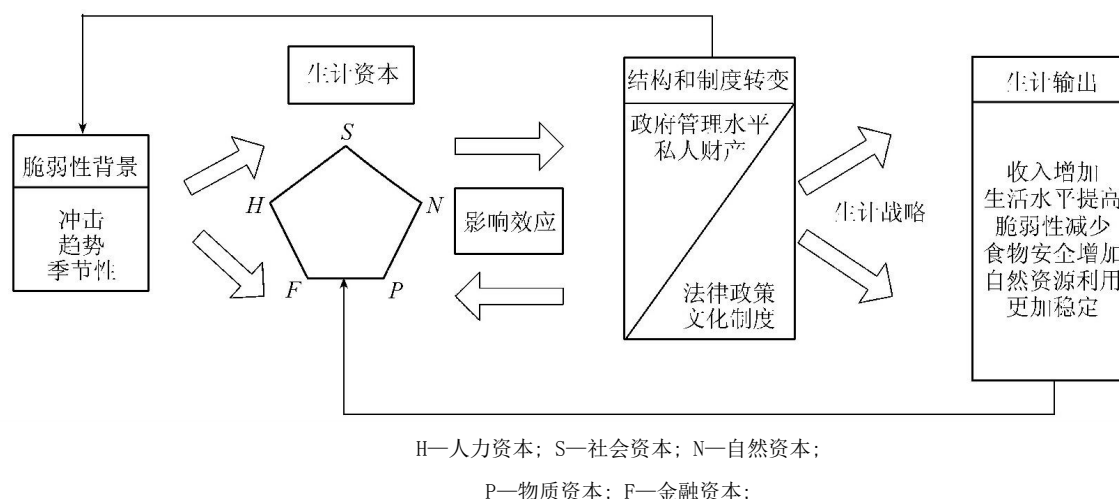


图 1: 可持续生计框架示意图

#### 2. 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 AHP) 是美国运筹学专家 Satty TL 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一种简便、灵活而又实用的多准则决策方法。(SATTY T L.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1980) 层次分析法以一定的标度把人的主观感受量化成数据，首先将与决策有关的元素分解为目标、决策、方案等不同层次，然后通过各层次的两两元素比较，计算出各元素的相对权重。

### (三) 研究过程

选取水库移民的生计资本，即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进行对比分析。根据岩滩库区实际情况，将人力资本(H) 分为：健康状况(H<sub>1</sub>)、文化程度(H<sub>2</sub>)；自然资本(N) 分为：生活用水(N<sub>1</sub>)、土地面积(N<sub>2</sub>)；物质资本(P) 分为：住房(P<sub>1</sub>)、生活用品(P<sub>2</sub>)、生产用



品 (P<sub>3</sub>)、基础设施 (P<sub>4</sub>)；金融资本 (F) 分为：一般年收入 (F<sub>1</sub>)、补助性收入 (F<sub>2</sub>)；社会资本 (S) 分为：社会交往 (S<sub>1</sub>) 和社会支持 (S<sub>2</sub>)。

根据层次分析法的计算原则，将水库移民生计资本各要素按重要性赋值，计算出各资本要素的权重，结合调查数据，计算出 2010—2013 年各资本要素的测算值及增长率，以判断实施长远生计问题处理以来岩滩水电站 D 县移民安置区移民生计资本变化情况。

### 三、水库移民生计资本计算

#### (一) 人力资本

岩滩水库移民长远生计规划方案对库坝区后靠及县内异地安置的移民进行医疗卫生改善，同时对移民子女上学进行教育扶持。因此将人力资本分为健康状况和文化程度 2 个方面。其中健康状况 (H<sub>1</sub>) 被分为 5 个等级，即健康状况非常好 (H<sub>11</sub>)、比较好 (H<sub>12</sub>)、一般 (H<sub>13</sub>)、比较差 (H<sub>14</sub>)、非常差 (H<sub>15</sub>)，文化程度 (H<sub>2</sub>) 被分为 4 个等级，即小学及以下 (H<sub>21</sub>)、初中 (H<sub>22</sub>)、高中 (H<sub>23</sub>)、大学及以上 (H<sub>24</sub>)。

根据各年份选择各健康状况及各文化程度的人数 m<sub>H</sub>，乘以权重，计算出每年人力资本的测算值。

$$H_1 = m_{H11}H_{11} + m_{H12}H_{12} + m_{H13}H_{13} + m_{H14}H_{14} + m_{H15}H_{15}$$

$$H_2 = m_{H21}H_{21} + m_{H22}H_{22} + m_{H23}H_{23} + m_{H24}H_{24}$$

$$H = (H_1 + H_2) / (858 \times 2) \times 9$$

例如：2010 年被调查者中有 46 人选择健康状况非常好，131 人选择比较好，499 人选择一般，113 人选择比较差，69 人选择非常差。那么  $H_1 = 46 \times 0.252 + 131 \times 0.130 + 499 \times 0.067 + 113 \times 0.034 + 69 \times 0.017$ 。具体人力资本测算值情况见表 1。

表 1：人力资本测算值情况

类别	指标	权重	内容	权重标准值	测算值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H	H <sub>1</sub>	0.5	H <sub>11</sub>	0.252	67.07	68.62	70.98	75.479
			H <sub>12</sub>	0.13				
			H <sub>13</sub>	0.067				
			H <sub>14</sub>	0.034				
			H <sub>15</sub>	0.017				
	H <sub>2</sub>	0.5	H <sub>21</sub>	0.024	34.277	34.384	34.498	34.518
			H <sub>22</sub>	0.054				
			H <sub>23</sub>	0.129				
			H <sub>24</sub>	0.293				

#### (二) 自然资本

对于岩滩库区移民来说，生活用水和土地面积是其最为重要的自然资本，根据库区实际生活状况，笔者将生活用水（ $N_1$ ）又分为自来水（ $N_{11}$ ）、井水（ $N_{12}$ ）、泉水/河水（ $N_{13}$ ），将土地面积（ $N_2$ ）分为旱地面积（ $N_{21-3}$ ）、林地面积（ $N_{24-6}$ ），根据实地情况，各种耕地又被分为人均  $0 \sim 0.002 \text{ hm}^2$ 、 $0.002 \sim 0.004 \text{ hm}^2$ 、 $0.004 \text{ hm}^2$  以上。见表 2。

表 2：自然资本测算值情况

类别	指标	权重	内容	权重标准值	测算值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N	$N_1$	0.198	$N_{11}$	0.163	124.56	124.681	125.844	130.072
			$N_{12}$	0.018				
			$N_{13}$	0.017				
	$N_2$	0.802	$N_{21}$	0.024	163.607	163.791	163.791	163.996
			$N_{22}$	0.087				
			$N_{23}$	0.29				
			$N_{24}$	0.024				
			$N_{25}$	0.087				
			$N_{26}$	0.29				

### （三）物质资本

岩滩水库移民长远生计规划方案包括对后靠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公共设施进行完善，对外迁移民安置区增补生产安置措施项目，对危房问题进行处理。因此，笔者将物质资本细分为住房（ $P_1$ ）、生活用品（ $P_2$ ）、生产用品（ $P_3$ ）、基础设施（ $P_4$ ）。其中住房包括住房面积和住房结构，根据实际情况又将住房面积分为：户均  $90 \text{ m}^2$  以内（ $P_{11}$ ）、 $90 \sim 100 \text{ m}^2$ （ $P_{12}$ ）、 $100 \sim 110 \text{ m}^2$ （ $P_{13}$ ）、 $110 \text{ m}^2$  以上（ $P_{14}$ ）；将住房结构分为：砖混结构（ $P_{15}$ ）、砖木结构（ $P_{16}$ ）、土木结构（ $P_{17}$ ）、其他结构（ $P_{18}$ ）。生活用品按拥有的数量计算分为：有 1 个（ $P_{21}$ ）、有 2 ~ 3 个（ $P_{22}$ ）、有 4 个以上（ $P_{23}$ ）。生产用品分为：无农具（ $P_{31}$ ）、有农具（ $P_{32}$ ）。另外，将基础设施分为村内道路（ $P_{41-3}$ ）、医疗卫生条件（ $P_{44-6}$ ）、就学条件（ $P_{47-9}$ ）3 部分，每部分又分为很好、一般、不好 3 个等级。见表 3。

表 3：物质资本测算值情况

类别	指标	权重	内容	权重标准值	测算值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P	$P_1$	0.484	$P_{11}$	0.011	28.726	29.037	30.308	31.369
			$P_{12}$	0.018				
			$P_{13}$	0.054				

			P <sub>14</sub>	0.138				
			P <sub>15</sub>	0.156				
			P <sub>16</sub>	0.068				
			P <sub>17</sub>	0.028				
			P <sub>18</sub>	0.011				
	P <sub>2</sub>	0.13	P <sub>21</sub>	0.008	5.628	5.754	6.197	6.699
			P <sub>22</sub>	0.031				
			P <sub>23</sub>	0.091				
	P <sub>3</sub>	0.038	P <sub>31</sub>	0	0.19	0.191	0.193	0.196
			P <sub>32</sub>	0.038				
	P <sub>4</sub>	0.348	P <sub>41</sub>	0.083	33.292	35.801	39.013	42.756
			P <sub>42</sub>	0.033				
			P <sub>43</sub>	0				
			P <sub>44</sub>	0.083				
			P <sub>45</sub>	0.033				
			P <sub>46</sub>	0				
			P <sub>47</sub>	0.083				
			P <sub>48</sub>	0.033				
			P <sub>49</sub>	0				

#### (四) 金融资本

水库移民的金融资本包括务工收入和种植养殖收入，此外岩滩水库移民长远生计规划方案包括对库坝区后靠及县内异地安置的移民给予逐年生活补助。因此，笔者将金融资本细分为一般年收入（F<sub>1</sub>）和补助性收入（F<sub>2</sub>）。其中一般年收入又被细分为务工收入和种植、养殖收入。根据当地工资水平和种植收入情况将务工收入分为人均年收入1000元以内（F<sub>11</sub>）、1001～2000元（F<sub>12</sub>）、2001元以上（F<sub>13</sub>），种植、养殖收入分为人均年收入100元以内（F<sub>14</sub>）、101～300元（F<sub>15</sub>）、301元以上（F<sub>16</sub>）；补助性收入又被分为耕地补助（F<sub>21</sub>）和后期扶持（F<sub>22</sub>），见表4。

表4：金融资本测算值情况

类别	指标	权重	内容	权重标准值	测算值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F	F <sub>1</sub>	0.5	F <sub>11</sub>	0.015	108.504	108.533	108.552	108.601
			F <sub>12</sub>	0.054				

			F <sub>13</sub>	0.181				
			F <sub>14</sub>	0.015				
			F <sub>15</sub>	0.054				
			F <sub>16</sub>	0.181				
	F <sub>2</sub>	0.5	F <sub>21</sub>	0.25	429	429	429	429
			F <sub>22</sub>	0.25				

### 3.5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即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和所能获得的社会支持。笔者将水库移民社会资本分为社会交往(S<sub>1</sub>)和社会支持(S<sub>2</sub>)2个方面。其中社会交往包括与亲朋交往情况(S<sub>11-3</sub>)和与原住民交往情况(S<sub>14-6</sub>)，社会支持包括得到亲朋支持(S<sub>21-3</sub>)、得到原住民支持(S<sub>24-6</sub>)和得到村干部支持(S<sub>27-9</sub>)，每种交往和支持又分为很好、一般、不好3种情况。见表5。

表5：社会资本测算值情况

类别	指标	权重	内容	权重标准值	测算值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S	S <sub>1</sub>	0.5	S <sub>11</sub>	0.181	44.986	47.123	50.906	54.999
			S <sub>12</sub>	0.069				
			S <sub>13</sub>	0				
			S <sub>14</sub>	0.181				
			S <sub>15</sub>	0.069				
			S <sub>16</sub>	0				
	S <sub>2</sub>	0.5	S <sub>21</sub>	0.121	41.803	44.845	48.032	51.56
			S <sub>22</sub>	0.046				
			S <sub>23</sub>	0				
			S <sub>24</sub>	0.121				
			S <sub>25</sub>	0.046				
			S <sub>26</sub>	0				
			S <sub>27</sub>	0.121				
			S <sub>28</sub>	0.046				
S <sub>29</sub>	0							

## 四、水库移民生计资本变化分析

### (一) 人力资本变化分析

通过计算 D 县水库移民的人力资本测算值增长率、文化程度增长率以及健康状况增长率，发现从 2010—2013 年，移民人力资本总体保持增长，尤其是移民健康状况，2013 年增长率达到 6.34%（图 2），这主要得益于水库移民长远生计问题处理中的“基础设施扶持”，D 县安置区村庄内扩建、新建多个卫生所，为移民的健康提供了保障。此外，根据统计数据发现，移民的文化程度有小幅增长，但去除自然升学后，增长幅度不明显。根据了解得知，由于水库移民长远生计问题处理计划分项目、分年度进行，安置区“移民教育扶持”尚未实施，移民子女就学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因此移民文化程度增长率变化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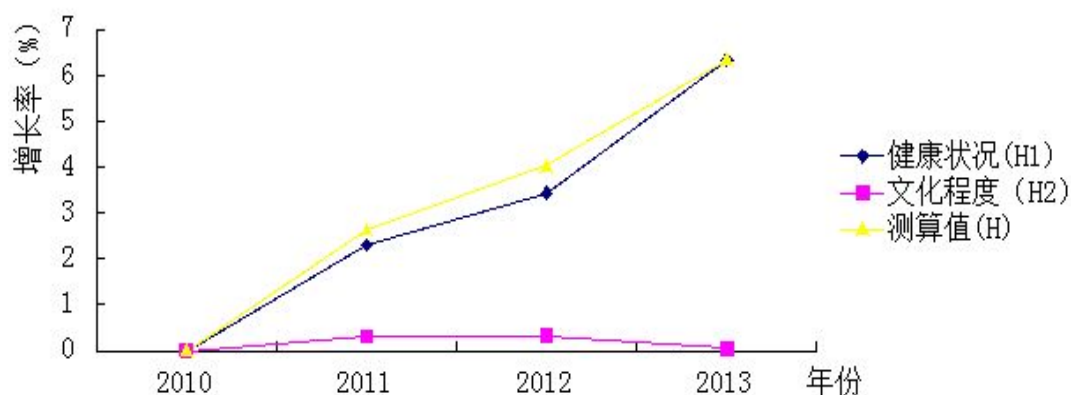


图 2: 人力资本增长率变化情况

## （二）自然资本变化分析

D 县实施水库移民长远生计问题处理以来，移民自然资本总体保持增长状态。其中生活用水情况改善较为明显，2013 年增长率达到 3.36%（图 3）。笔者在调研中通过访谈得知，当地在 2009 年以前生活用水都是由村民自行在山上引水，2010 年政府组织实施了人畜饮水工程，在用水质量提高的同时又节约了水资源，移民生活用水水质及水量逐步得到保证。此外，通过实地观察发现，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当地土地资源匮乏，因此土地面积方面变化情况不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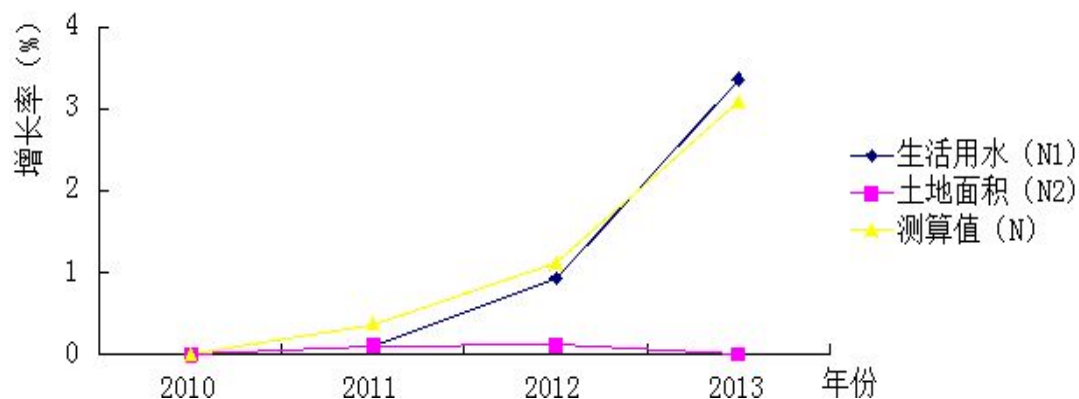


图 3: 自然资本增长率变化情况

### （三）物质资本变化分析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实施水库移民长远生计问题处理以来，移民的物质资本变化较为明显，增长率逐年提高，其中基础设施增长率提高最为明显（图4）。据了解，计划实施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资最多，道路基本实现了村村通、户户通，从根本上解决了移民出行难的问题；在生活用品方面，由于移民经济收入的增多以及政策性补偿的增多，移民生活水平有了提高，家庭生活用品数量增多；在住房方面，当地政府实施了危房改造工程，在保证移民生活安全的同时，提高了移民的生活条件；在生产用品方面，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移民土地数量不多，不宜进行大规模农业生产，因此生产用品方面增长率不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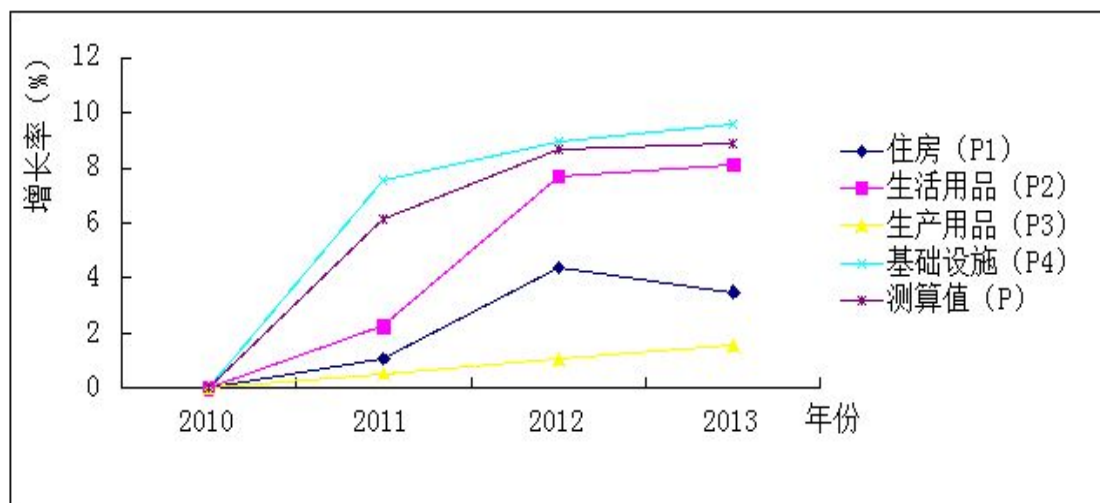


图4：物质资本增长率变化情况

### （四）金融资本变化分析

相较于其他资本，金融资本变化不大，年增长率保持在0.16%以内，且2012年一般年收入增长率出现下降（图5）。访谈得知，由于文化水平和技术能力的限制，长期到村外打工的移民占少数，部分移民短期到离村庄较近的地方打零工（多是体力劳动，如搬砖等），或者靠养殖鸡、鸭等家禽到集市上买，因此年收入不高，且不稳定。补助性资金按年发放，安置区移民全部享有，这部分收入较为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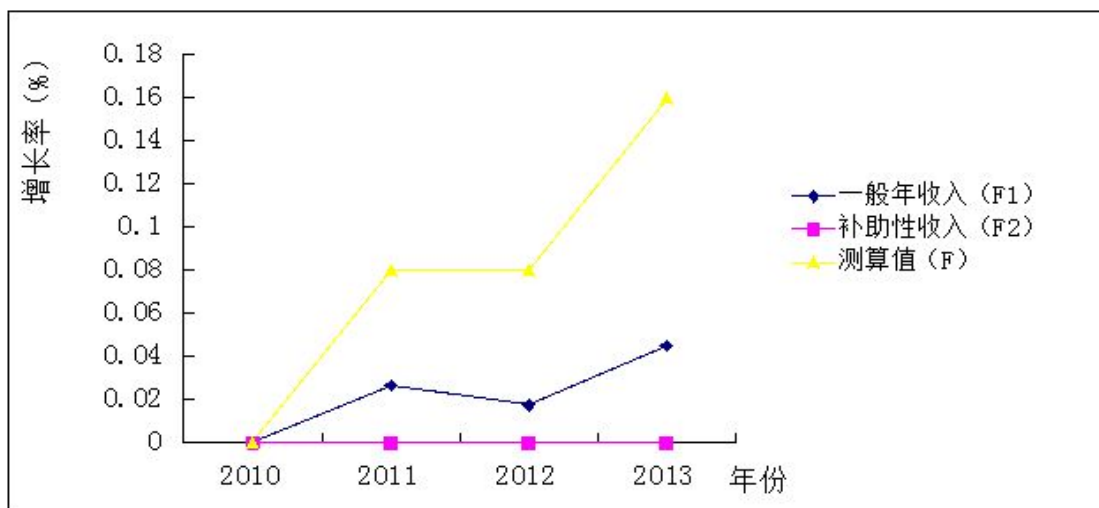


图 5: 金融资本增长率变化情况

#### (五) 社会资本变化分析

D 县水库移民社会资本变化较为明显, 社会交往、社会支持情况较好(图 6)。访谈中移民谈到村长会经常组织会议和联谊, 目的是通过与原住民的互动, 帮助他们融入新的生活环境中。当他们遇到困难时可以向身边的人求助, 而且绝大部分人都很愿意帮助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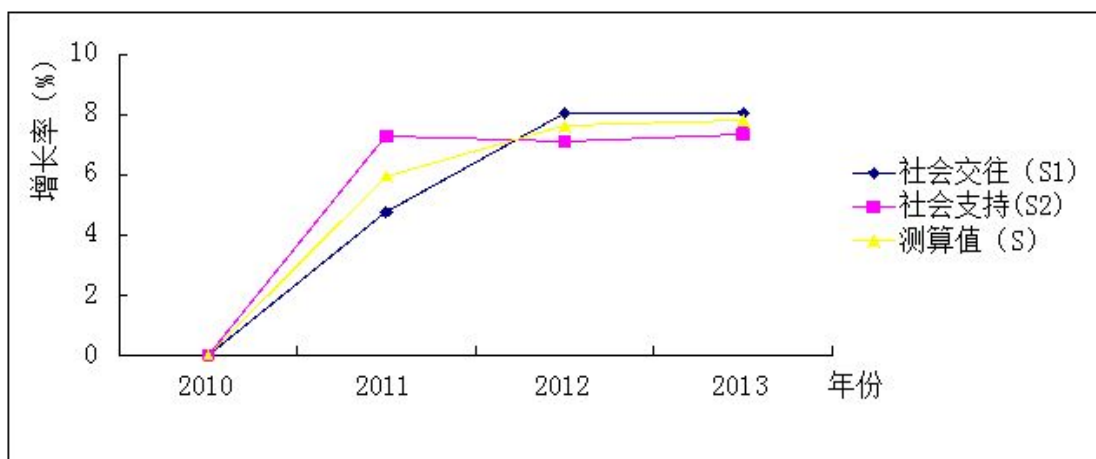


图 6: 社会资本增长率变化情况

### 五、结论与建议

分析结果表明, 水库移民长远生计问题处理使广西壮族自治区岩滩水电站 D 县移民安置区移民的生计资本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通过实施基础设施项目、公共设施项目以及危房改造项目, 使安置区移民的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但是人力资本、自然资本以及金融资本中的部分指标变化不明显。因此, 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 加强文化和职业教育。岩滩移民中劳动力转移还存在困难, 无效或低效率劳动力资源较多。教育和职业培训既是正规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 也是促进移民与所在地加速实现社会融合的重要渠道(杨云彦、徐映梅、胡静等, 2008) 当土地的征收和居住地点的变化使水库移民生产方式发生转

变时，移民的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直接影响了移民的经济收入和安置区的社会稳定。因此移民子女就学问题和移民劳动技能培训问题应予以重视和解决，只有这样才能提升移民人力资本，推进劳动力转移，发展劳务经济，完成安置区资金的原始积累。

（二）引导农民合作组织建设。对于移民而言，水库淹没线以上剩余土地的质量差，其粮食亩产量仅为河谷地带的 50% ~ 60%，农业收入难以维持（严登才、施国庆，2012），广西壮族自治区又属于欠发达地区，这类地区受城市化和市场化影响较弱，但移民存在共同记忆，彼此认同感较强，所以应当利用这种认同，引导农民合作组织建设。安置区政府可以根据当地产业结构，组织移民开展特色合作种植、养殖，在节约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增加生产性收入。

（三）设立金融支持、鼓励自主创业。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失地农民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对他们来说，非正规就业是一条更合适的出路，而在这方面他们面临的困难就是资金不足（张蕾，2006）。因此，一方面要加强水库金融支持，尤其是小额贷款，鼓励发展中小微企业，利用库区资源做文章，以实现库区劳务经济和创业经济双轨运行；另一方面要鼓励和支持农村精英发展自主创业，以带动移民富裕，实现安置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 参考文献：

- [1] 苏芳，徐中民，尚海洋 2009，《可持续生计分析研究综述》，《地球科学进展》，第 1 期。
- [2] 杨云彦、徐映梅、胡静等，2008，《社会变迁、介入型贫困与能力再造：基于南水北调库区移民的研究》，《管理世界》，第 11 期。
- [3] 严登才、施国庆，2012，《农村水库移民贫困成因与应对策略分析》，《水利发展研究》，第 2 期。
- [4] 严登才，施国庆，伊庆山，2011，《水库建设对移民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及重建路径》，《水利发展研究》，第 5 期。
- [5] 张蕾，2006，《人力资本视野下的失地农民生计模式转化研究：成都温江区乡村案例分析》，四川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 [6] SATTY T L,1980,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NewYork: McGraw-Hill.

☆ 作者简介：邹子楠，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3 级硕士研究生

伊庆山，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2011 级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闫春华





## 2011 级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摘要\*

### 社会变迁中的村落林业

——上村个案研究

袁记平

指导老师：陈阿江教授

**关键词：**林业制度 林权 村落林业 村落生态 地方性知识

**摘要：**村落林业、村落生态与林业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上村个案研究发现：传统时期，村民在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地方性林业制度，含有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具有较强的地方适应性，易为村民所接受和认同。土地改革时，国家凭借强大的动员将上村原有的林权制度解体，取而代之的是注入了强烈国家政治意志的均分的林地私有制。后来国家通过集体化将私有林权转变成集体所有。这种转变，使林业服务于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需要。乡村所有的林木只是国家建设的资源，而不再与村民的具体利益衔接。同时，使林业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和配置，降低了林业的效益。林业三定后，林权中的国家意志逐渐淡化，地方的自主性得到进一步发展，是国家的还权于社会的体现。林改后，国家的主要作用是为林业走向市场提供交易的制度，清除不合理的税费，让村落林业走向市场。村落在这种制度环境下，加快了向市场迈进的步伐。在长期的林业制度演变过程中，形成了林权的村落共享，即林业收益由村落范围内的村民共同享有。村落通过内部的利益整合机制实现林权的共享，其中最关键的是村落成员身份的确定。国家制度、村落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对林权的村落共享有重要影响。村落生态文化、国家林业制度对村落环境有着重要的作用。村落生态文化植根于村民的生活之中，依靠村民内心的信仰而实现其效力，容易得到村民的遵守，能够稳定地发挥保护村落生态的作用。国家林业制度对村落生态具有破坏与改善的双重作用。国家通过法律政策及行政手段，强制性地贯彻生态保护的国家意志。它是国家在面临生态恶化时采取的手段，对维护生态环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它牺牲了地方的自主性，执行的难度较大，维持法律、政策运转的成本较高，是其突出的缺点。这种强制性的做法，由于受益圈与受损圈的不一致，容易产生社会不公平。

### 远去的森林——民族地区生态变迁的社会机制研究

耿言虎

指导老师：陈阿江教授

\*以作者姓名首字母为序。

**关键词：**民族地区 断裂 地方性知识 现代性 经济理性 生态变迁

**摘要：**在我国民族地区的发展历程中，生态经历了急剧的变迁。生态变迁与现代性密切相关。本研究从权力、知识和资本的视角对云南一个民族自治县 1949 年以来生态变迁的社会机制进行了阐述。主要内容涉及森林管理制度演变、农业知识变迁和经济林产业发展三个方面。传统时期地方森林管理制度和信仰禁忌对森林保护作用明显。依托于头人制度和社会资本的森林管理制度和以竜林为核心的信仰禁忌形成了较为有效的社会规范。1949 年以后，国家权力下渗导致地方社会组织和信仰观念被冲击，森林管理处于失范状态。随着科层化森林管理制度的建立和逐步完善，森林管理逐渐“中心化”。当地森林产权制度数次变迁以及现代产权制度与地方传统的冲突，对森林保护造成了不利影响。科层化森林管理制度由于较弱的地方嵌入性、缺乏地方性知识、人员不足以及管理机构的谋利属性等缺陷影响了其效果的发挥。农业知识的演变是地方生态变迁的重要变量。经典意义上的刀耕火种农业并不是“原始”、破坏生态的农业体系。刀耕火种农业中有丰富的生态知识，可以实现农业生产和生态保护的平衡。1949 年后，在“以粮为纲”的政策指导下，民族传统农业被政府改造。汉区农业知识体系成为主导的农业知识。扩大耕地面积、固定耕地、农业技术的改造等措施造成了森林面积的骤减和生态的退化。随后，现代科学技术成为农业的指导知识体系。科学技术的推广提高了产量，但造成了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消失，农业面源污染等后果。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以来，孟连县经济林产业迅速发展。政府、企业、村民三方利益主体在经济林产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在经济林产业发展早期主导了产业的发展，并且通过招商引资方式吸引外来资本。外来资本进入林业，通过承包、租用林地，大量种植经济林。本地村民的经济理性逐渐膨胀，他们租出林地，转变林地的经营方式。林业“生产的跑步机”的运作使得森林覆盖率急速回升，但是却表现出物种单一化、农业面源污染等负面后果。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地方政府和民间的生态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也面临着严重的困境。综上，现代性所内含的断裂的特性是生态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具体而言，资源管理中心化、外来知识特权化和自然过度资本化是生态变迁的产生机制。需要对现代性进行深刻反思。

## 由兴盛到困顿：传统柳编业的变迁阐释

——以未来庙村为个案

刘永飞

指导老师：许佳君教授

**关键词：**柳编业 社会变迁 传统手工业 困境 现代文化产业

**摘要：**在农村社会的发展历程中，传统手工行业经历了一定的变迁，这种变迁与社会内在机制密切相关。本研究本着社会学视野，以时间为脉络，对苏北 N 县未来庙村柳编业从传统社会产生以来的整个变迁进行考察，记叙了柳编业生产、销售过程中出现的鲜活的人、物、事，从制度、市场、文化、手工人工行为取向等角度进行柳编业变迁的社会机制阐释。主要内容涉及生产行为、销售行为和社会机制分析三个方面。1949 年之前的传统社会时期，柳编业是一种依附于小农业的家庭副业，它的发生和持续发展也是为了弥补农业生产、生活工具单一以及土地资源、农业收入的不足。在生产、销售的行为组织上由“L 氏”推动，由 L 氏家族生产扩展到宗族生产，进而到村庄生产。生产原料主要通过采摘天然柳条获得，农业、盐业等行业拉动着柳编业的生产；集市交易、销往盐场和极少量的外国

人订购是主要销售行为方式；小农经济、封建土地制度、乡土宗族结构、生产群体的生存理性以及齐鲁文化、婚姻表征等机制阐释着柳编业在这一阶段的产生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进入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柳编业成为集体化产业。在生产、销售的行为组织上由“国家”推动，从单干到互助合作生产，从专业社生产到生产队生产，由社办企业到队办企业，开始少量种植原料，生活类产品的生产行为被禁止；在销售上，私人买卖逐渐消失，与其他公社之间、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出口交易是主要销售行为；在柳编业运行的机制上，从国家行为方式到基层组织的运行再到乡土社会居民的参与都彰显出国家政策、制度对柳编业的“规训”、“改造”以及“支持”。1978年之后，在市场化进程中，各种利益群体的行为推动着柳编业的生产、销售。在生产行为上，未来庙人主动更新生产技术，引入现代工艺柳编，出现了个人“家庭作坊式”的家庭编织和企业“工厂式”的企业编织，并开始大量种植生产原料，产品种类多样化；在销售行为上，各利益群体具有自主性，销售方式多元化；市场经济有效的制度性安排，企业主导力功能的发挥，文化意义表征的复活，手工人行为的经济理性等内在机制演绎着柳编业的发展。进入新世纪，柳编业发展面临着困境。在生产行为上，组织生产的主体解散，原料种植行为停止，产品创新行为滞缓，生产群体流失；在销售行为上，销售群体流失，市场失范行为发生，产品国内外销路受阻；现代化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农村财税改革的推行，乡土习俗的移易以及乡土手工精神的凋落诉说着柳编业面临的困难境遇。最终指出：以柳编为代表的传统手工业在现代性的时代，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向现代文化产业转型，走现代文化产业之路。最后，本文反思现有的政策、制度、结构、市场、文化设计，反省行动者取向的选取，重视发现、传承、发展传统手工业文化、经济中的合理内核，以此获得柳编业及其他传统产业未来发展的定位。

## 倾听暮年：李村老人日常生活实践研究

仇凤仙

指导老师：杨文健教授

**关键词：**农村老年 日常生活实践 生活场域 生活理性 农村社会变迁

**摘要：**在当前农村社会中，伴随着社会转型过程的深度推进，农村社会传统出现渐变，家庭结构发生变化，村庄社会生活呈现出消解和重构的现实。这些变迁折射出“传统—现代”的二元化断裂倾向，对于身处其中的生活主体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对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和家庭生活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在身处这些变迁和日渐陌生的生活方式中，村庄内部不同的生活主体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在这些生活主体中，农村老人的生活处境和他们的生存状态无疑是我们日常关注和理论探讨的重点，在渐入人生夕阳中的他们面对这些陌生的社会生活变迁中，他们作为老年固守在乡村，依附于土地，失去了依靠自身来改变个体命运的机会和能力。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是积极建构自己的生存系统或悲观消极静候生命的终结？他们的人生意义和生存状态如何在这些变迁的社会中得以重构？作为弱者的他们如何运用“弱者的反抗”来积极建构自己的生存保障。因此本文主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农村老人在面对日渐变迁的农村社会生活时，他们是否具有相应的主动性来积极建构自己的日常生活？第二，当前农村老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形象是弱者和悲惨者，在家庭养老弱化，社会传统变迁，农村老人是否具有“弱者的反抗”意识？来为自己建构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第三，他们这种主动性适应的实践策略是什么？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建构及其晚年生活预期起到什么样的帮助？本文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预设，运用“生活过程—事件”理论分析框架，勾连“制度—结构”研究视角，以

李村老人的主体经验和以这些经验为基础的具有主体性的日常生活实践为主要的叙事脉络，在日常生活理论研究思路指引下，提取了李村老人日常生活中三个最为重要的日常生活场域来具体分析李村老人在这三个场域中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而建构了李村老人三种不同的日常生活实践类型，即情感性实践、经济理性实践和礼俗性实践。进而深入的考察了这三种实践类型所投影的日常生活场域和特定的生活情境中，农村老人的日常实践呈现出变迁的过程，隐蔽于日常生活实践逻辑背后的是农村老人应对社会变迁的积极主动的社会现实。笔者通过对他们日常生活实践的详细考察，提炼出“生活理性”这一本土化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农村老人行动准则。“生活理性”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传统理性，也有别于西方社会中的经济理性的界定，而是在中国农村社会传统日益多元化的一种生活理念中的农村老人的生存选择。虽然李村老人的这些日常生活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展现出来的是艰辛和无奈，但是在当前农村社会现实中，他们的这些实践选择相对于他们的个体而言却是相对的最优选择。这些选择实践也具有他们经过仔细考虑过的理性成分，这种理性成分正日益成为他们生活的指导。这种转变是他们对于农村社会变迁的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回应，虽然这样的实践方式依然还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和问题，但是在当前的农村社会现实中，李村老人用自己的主动实践来建构自己当前的日常生活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和空间想象，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生活理性原则来积极建构家庭、个体和社会生活的意义与归属。因此作为结论，本文认为在面对变迁的农村社会现实和毫无确定的遥远未来，当前农村老人已经开始了自主性的生活构造，并且他们的生活重心已经开始逐渐转移到自身生活，而生活理性无疑就是他们日常生活实践的最好注释。

## 生态移民行为选择及其演化——以青海省德令哈市生态移民村为例

隋艺

指导老师：陈绍军教授

**关键词：**生态移民 理性选择 原因分析 生态性

**摘要：**生态移民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以青海省德令哈市生态移民村落的实地调查为基础，探讨生态移民行为选择及其演化的过程，重点关注的是行为演化背后的原因。在搬迁前，移民们基于生存的角度，做出搬迁的决定。到新居住地后，迫于生活的重压，通过上访的渠道，确立了身份，成为当地居民，从开始享受优惠的政策和项目，改变了生活窘境。此阶段所从事的行为选择多是以生存理性为主。离开原居住地后，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和生存环境被打破，需要一个重新适应和恢复的过程，此过程可以称为落地生根，落地生根后走向了生计恢复的道路。移民们通过开展以经济理性为主的行为选择从而在与生活环境以及和其他非移民群体的经济交往中获得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同时，移民作为新居住地的“外来者”，需要融入当地的社区。这是一个从搬迁到生计恢复与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从生存理性选择来剖析，这只是移民搬迁的最初的、根本性原因。显然，社会理性的出现及发展是移民群体更高层次的追求。整个过程中，移民做出的具体情境下的符合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相关选择。为了揭示移民行为选择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层层衔接进行阐述和剖析。宏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包括：国家以及地方相关政策和项目的扶持因素等。微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包括：个人选择偏好的形成与改变，家庭因素的影响以及移民对所掌握的各种资本的运作及其转化；第三，深入挖掘移民行为选择的差异与变化背后的深层机理，揭示了移民的行为选择具有理性与实践的双重逻辑，是理性行为的社会建构。最后，分析得出此地区生态移民的特性以及他们共同生态环境的关系，即从人与自然的恶性循环到良性循环。